

走天路的教会(博饶本)

目录:

序言.....

绪言.....

译序.....

第一章 开端.....

公元二九—三一三年

新约圣经适合现况——旧约与新约——基督的教会和神的众教会——使徒行传为应用于现代提供了样式——本书记录后来事迹的方案——五旬节和众教会的建立——犹太会堂——犹太会堂与众教会——散居外地的犹太人传扬神的道——犹太人最早建立的教会——犹太人敌挡基督——犹太宗教、希腊哲学与罗马权势敌挡众教会——圣经的结束——以后的著作——革利免(CLEMENT)致哥林多人的书信——伊格那丢(IGNATIUS)——连上新约时期最后的环节——受浸和主的晚餐——教牧特权阶级的成长——俄利根(ORIGEN)——居普良(CYPRIAN)——诺洼天(NOVATIAN)——不同类型的教会——孟他尼主义者(MONTANISTS)——神哲主义者(MARCIONITES)——初期教会的坚稳——迦达尔斯(CATHARS)；——诺洼天主义者——多纳徒派(DONATISTS)——摩尼教派(MANICHAEANS)——给丢奈特(DIOGNETUS)的书信——罗马帝国逼迫教会——君士坦丁颁布宗教自由——教会胜了世界。

第二章 基督教国的基督教.....

公元三一三—四七六年 三〇〇—八五〇年 三五〇—三八五年

教会与政府联合——众教会坚拒与政府合一——多纳徒派被定罪——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亚流主义(ARIANISM)恢复得势——亚他那修(ATHANASIUS)——信条——圣经的正典——罗马世界与教会——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奥古士丁(AUGUSTINE)——伯拉纠(PELAGIUS)——教会地位的变化——假放训：摩尼教派，亚流主义，伯拉纠主义，祭司圣职制度——寺院制度——仍以圣经为指导——差传工作——离开圣经差传的原则——爱尔兰和英格兰差人往欧洲大陆传道——英国和罗马的差传工作间的冲突——培利司里安(PRISCILIAN)

第三章 保罗派和波各米勒派.....

公元五〇—四七三年

教士权势增长——初期教会坚守信仰——初期教会历史文献被毁——小亚细亚的初期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时代小亚细亚的早期教会——被敌对者诬为摩尼教派——保罗派(PAULICIAN)和桑历克(THONRAK)——新约教会的延续——康斯坦丁西拉(CONSTANTINE SILVANUS)——西缅提多(SIMEON TITUS)——敬奉古物和崇拜圣像——反对崇拜圣像的君皇——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希腊天主教恢复圣像崇拜——法兰克福会议(COUNCIL OF FRANKFURT)——突伦主

教克劳底斯(CLAUDIUS BISHOP OF TURIN)——伊斯兰教(或称回教)——森伯(SEMBAT)——士求(SERGIUS)——小亚细亚众教会的领袖——提阿多拉(THEODORA)时期的迫害——(真理之钥)——卡备斯(CARBEAS)和屈梭卓(CHRYSOCHEIR)——圣经与可兰经——小亚细亚教会的特色——信徒由亚洲迁移至欧洲——保加利亚教会的后期历史——波各米勒派(BOGOMILS)——比绍(BASIL)——对保罗派和波各米勒派的意见——波各米勒派传入波斯尼亚(BOSNIA)——古林宾(KULINBAN)与罗马——波各米勒派与海外信徒的交往——敌人入浸波斯尼亚——回教徒进浸——波各米勒派受逼迫——土耳其人侵占波斯尼亚——在波斯尼亚的(神之友)(FRIENDS OF GOD)教派成为托勒斯山脉和亚尔卑斯山脉间的一环——波各米勒派信徒的基地

第四章 东方.....

公元前四年——公元一四〇〇年

东方的福音传播——叙利亚和波斯——波斯帝国众教会脱离罗马帝国天主教会——东方教会持守圣经原则比西方教会维持得更长久——巴伯宾阿给(PAPABEN AGGNI)把教会联合——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舍普二世(SAPORII)执政时期的逼迫——阿夫勒赫(AFRAHAT)的讲章——悉劳西亚会议(SYNOD OF SELEUCIA)——逼迫复燃——聂斯托利(NESTORIUS)——(荷勒克拉斯(HERACLIDES)的市集)——容忍——西方主教大量涌入——权力逐渐集中——叙利亚教会散布亚洲——回教入侵——主教长由悉劳西亚移迁至巴格达(BAGDAD)——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在中亚细亚景教与回教之争——帖木真(TAMERLANE)——方济各会和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发现景教工作遗迹——十六世纪时期圣经部份译成中文——景教势力在亚洲大部份地区泯灭——失败原因

第五章 瓦勒度派和亚勒比根斯派.....

一一〇〇——一二三〇年 七〇——一七〇〇年 二六〇——一三八一年 一一〇〇——一五〇〇年

彼得波路(PIERRE DE BRUEYS)——执事亨里(HENRI THE DEACON)——拒绝宗派含意的名称——亚勒比根斯(ALBIGENES)——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弟兄——(完全人)——进占普鲁旺斯——宗教法庭成立——瓦勒度派(WALDENESSES)——量尼派(LEONISTS)——名称——谷地的传统信仰——彼得瓦度(PETER WALDO)——(里昂(LYONS)的贫民)——传教活动日增——亚西亚的法蘭西斯(FRANCES OF ASSISI)——修道士制度——教会扩展——弟兄们的信仰与实践——瓦勒度派谷地被袭——

第六章 中世纪末期的教会.....

一三〇〇年——一五〇〇年

弟兄们给其它地方的影响——巴都亚的马尔西革流(MARSIGLIO OF PADUA)——同业工会——建筑大教堂——市民和工会的抗议——科伦的华尔德(WALTER IN COLOGNE)——多马阿奎拿(THOMAS AOUINAS)和阿尔韦聿伯拉纠(ALVARUS PELAGIUS)——弟兄们的文献被毁——伊克哈尔特(ECKHART)——固勒尔(TAULER)——(九块石)——来自奥拔仑(OBERLAND)的(神之友)——逼迫复燃——记载众教会坚守信仰的史塔司堡文献——在塔尔(TEPL)发现的古卷——古时译成德文的新约圣经——狂热的盲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发明印刷术——新事物的发现——印刷圣经——柯列特

(COLET), 锐赤林(REUCHLIN)——伊拉斯母(ERASMUS)与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平改革的希望——罗马教会的反抗——施道比次(STAUPITZ)发现路德(LUTHER)

第七章 罗拉德派、胡司派、与同寅会.....

一三五〇年——一六七〇年

威克里夫——农民革命——英国信徒受逼迫——所德(SAWTRE), 百里(BADLEY)、和哥保咸(COBHAM)——禁止读圣经——信徒聚会——胡司(HUSS)——悉士喀(ZIZKA)——他泊(TABOR)——胡司派的战争——饼酒同领派(UTRAQUISTS)——札谷伯克(JAKOUBEK)——尼古拉(NIKOLAUS)——其尔士威司基(CHELTSCHEZKI)——(信仰之网)——洛其该那(ROKYCANA)、贵格里(GREGORY), 根和尔德(KUNWALD)——里察诺(REICHENAU), 劳达(LHOTA)——同寅会(THE UNITED BRETHREN)——布拉格的路加(LUKAS OF PRAGUE)——德国宗教改革消息传至波希米亚——约翰奥古斯达(JOHN AUGUSTA)——施马加德战役(SMAKALDWAR)——逼迫和迁徙——乔治以色列(GEORGESRAEL)和波兰——弟兄们返回波希米亚——波希米亚大宪章——(白山之战)——甘美纽斯(COMENIUS)

第八章 宗教改革.....

一五〇〇年——一五五〇年

要道问答手册——共同生命, 弟兄会——路德——帖次勒(TETZEL)——威登堡的九十五条款——焚毁教皇谕令——在沃木斯(WORMS)举行帝国会议——瓦特堡(WARTBURG)——翻译圣经——伊拉斯谟力图折衷妥协——路德会的发展——路德会的改革与缺点——施道比次的规劝——路德在新约教会样式与国家教会体系间的抉择——罗耀拉(LOYOLA)与反宗教改革

第九章 重浸派.....

一五一六——一五六六年

(重浸派)得名的由来——不是新宗派——迅速增长——立法禁制——胡伯迈尔(BALTHAZER HUBMEYER)——撒特拉(M·SATTLER)——逼迫增强——黑森(HESSEN)的兰贵夫腓力(LANDGRAF PHILIP)——欧顿巴克(ODENBACH)提出抗议——慈运理(ZWINGLI)——瑞士信徒受迫害——格里布(GREBEL), 曼斯(MANZ), 巴拉洛(BALAUROCK)——克士挪(KIRSCHNER)——在奥地利的信徒受迫害——奥地利匈牙利重浸派的编年史——费迪南德的凶残——纒特(HUTER)——曼德尔(MANDL)和他的同工——共同生活——闵斯特(MUNSTER)——新锡安王国——闵斯特的人歪曲事实诬蔑信徒——人怎样待基督, 也照样待他的门徒——门诺西门(MENNOSIMON)——马贝克(PILGRAM ARBECK)和他的著作——宗派主义——在西日耳曼的信徒受迫害——科伦的纒耳曼(HERMANN)——大主教试图改革——士文克斐特(SCHWENCKFELD)

第十章 法兰西与瑞士.....

一五〇〇——一八〇〇年

勒非甫尔(LEFEVRE)——巴黎的信徒——摩市(MEAUX)——法勒尔(FAREL)的讲道——米兹——圣像遭毁坏——处决——在法兰西的逼迫转剧——法勒尔在瑞士法语地区——纽沙特勒(NEUCHATEL)——窝度士派(VAUDOIS)与改革宗会面——法勒尔与疏尼亚(SAUNER)同赴谷地——工作在纽沙特勒开展——法兰西南部信徒一同擘饼——加尔文(JEAN CALVIN)——在坡阿帖(POITIERS)的信徒一同擘饼——

—差遣传道者——弗若敏(FROMENT)在日内瓦——日内瓦以外的信徒一同掰饼——加尔文在日内瓦——苏西尼主义(SOCINIANISM)——瑟维都(SEVETUS)——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标语——施图麦(STURM)致书墨兰顿——法兰西众教会的组织——预格诺派(HUGUENOTS)——圣巴多罗买(ST.BARTHOLOMEW)的大屠杀——南特勅令(EDICT OF NANTES)——以龙骑兵逼害信徒(DRAGONNADES)——废除南特勅令——逃出法兰西——色芬群山(CEVENNES)中的先知——加米撒尔战役(CAMISARDS)——沙漠地区的教会改组——若哲尔(JACQUES ROGER)——库尔弱团(ANTOINE COCRT)

第十二军 在英国的不奉国教者.....

一五二五——一六八九年

廷德勒(TYNDALE)——禁止读经——英国教会成立——马里皇后时期的迫害——浸礼派和独立派教会——白朗尼(ROBERT BROWNE)——巴饶(BARROWE), 草林武德(SREENWOOD), 彭力(PENRY)——在伊利沙伯女皇时期的异己者受害——在伦敦的隐蔽教会(PRIVYE CHURCH)——呼克尔(HOOKER)所提倡的教会组织——流亡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英国信徒的教会——亚米纽斯(ARMINIUS)——弟兄们由英国迁至荷兰——鲁滨孙(JOHN ROBINSON)——清教徒航海至美洲大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的各种教会——印行圣经钦定译本——内战——克林威尔(CROMWELL)的新模范军队——宗教自由——差会——福克斯(GEORGEFOX)——(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运动的特色——对付不奉国教者的法案——基督教的著作——本仁约翰(JOHN BUNYAN)

第十二章 喇巴第、敬虔派、亲岑多夫、非拉铁非.....

一六三五——一七五〇年

喇巴第(LABADIE)——在罗马天主教会内成立团契——加入改革宗——往俄冉遮(ORANGE)——往日内瓦——提领克(WILLEM TEELINCK)——佛依地(GISBERT VOET)——罗顿斯台恩(VNALODENSTEVN)——喇巴第往荷兰——长老会派和独立教派间的意见分歧——米第堡(MIDDELBURG)教会进行改革——与改革宗教会会议冲突——唯理主义(RATIONALISM)上的争论——喇巴第指责教会会议——喇巴第被逐出改革宗——在米第堡成立新教会——新教会被迫离开米第堡——迁移至威耳(VEERE)——在移至阿姆斯特丹——家庭教会成立——许热曼(ANNA MARIA VANSCHURMAN)——与佛依地分道杨镳——家庭教会发生难处——移至纒立佛得(HERFORD)——喇巴第死于阿统拿(ALTONA)——家庭教会迁往魏窝特(WIEUWERD)——家庭教会解体——见证的果效——施本尔(SPENER)——敬虔派(PIETISTS)——夫兰克(FRANKE)——基思强大卫(CHRISTIANDAVID)——亲岑多夫(ZINZENDORF)——纒仁护特(HERRNHUT)——分裂——接纳亲岑多夫所立的规条——复兴——在西投(ZITTAU)发现的文献——恢复波希米亚教会的决心——与路德会的关系问题——黑人安东尼(ANTH ONY)——摩利维亚差会——在英国的差会——森依克(CENMCK)——中央集权制度不宜于教会扩展——(非拉铁非)(PHILADELPHIA)组织——模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盖恩夫人(MADAME GUYON)——阿尔诺得(GOTTFRIED ARNOLD)——威根司坦(WITTGENSTEIN)——马尔堡(MARBURG)版本圣经——伯尔堡(BERLEBURG)版本圣经——非拉铁非发生的呼吁——霍次努(HOCHMANN VON HOCHENAU)——特尔斯铁根(TERSTEEGEN)——斯提领(GUNGSTILLING)——早

期教会、改革宗、及其它教会——回到圣经原则去的各种途径

第十三章 循道会及国外布道工作.....

一六三八——一八二〇年

十八世纪英国的情况——韦尔斯的复兴——暂设学校——成立团体——牛津的（圣洁会）——韦斯利夫人——韦斯利约翰和查理前往乔治亚州——韦斯利约翰回国与薄勒会面——用信心接受基督——访纒仁护特——威特腓德——在京士活(KINGSWOOD)向矿工传道——韦斯利约翰也开始露天布道——普通信徒担任传道工作——奇异的现象——大复兴——韦斯利查理所写的诗歌——摩利维亚教会与循道会分道扬镳——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分歧——会议——循道会派脱离英国教会——分裂——复兴运动带来的益处——国外布道的需求——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富勒耳(ANDREWFULLER)——差会的成立——差会与教会间的分别——哈尔登(HALDANE)兄弟——詹姆斯哈尔登在苏格兰传道——教会会议反对——大批人民听见福音——在爱丁堡(EDINBURGH)成立的教会——传教自由——浸礼问题——哈尔登若伯特往访日内瓦——查考罗马书——日内瓦信徒守主餐——教会成立。

第十四章 西方.....

一七九〇——一八九〇年

坎伯尔多马(THOMAS CAMPBELL)——（宣言）——坎伯尔亚历山大(ALEXANDER CAMPBELL)——百鲁舒仁(BRUSHRUN)的教会——浸礼——（有关律法的宝训）——联邦循道宗信徒改称（基督徒）——浸信会信徒称为（基督徒）——史顿(BARTEN WARREN STONE)——奇特的复兴现象——春田长老部(Spring, Field Presbytery)成立及解散——给恩列治(CANE RIDGE)的教会——基督教会团体(CHRISTIAN CONNECTION)——改革派与浸信会分离——基督教会团体与改革派联合——悔改的本质——司各特(WALTER SCOTT)——受浸使罪得赦免——尔捏特(ISSACERRETT)的见证

第十五章 俄罗斯.....

一七八八——一九一四 八五〇——一六五〇 一六一二——一九三〇 八二三——一九三〇 一八二八——一九三〇

门诺派和路德派信徒移居俄国——门诺派教会独享特权，因而变质——乌斯特(WUST)——复兴——门诺派弟兄脱离门诺派教会——门诺派教会复兴——俄国教会的聚会遭受禁止——准许圣经俄文译本流通——圣经翻译——路迦士(CYRIL LUCAS)——斯顿得教派(STUNDIST)——福音传入俄国的各种途径——教会增添——俄国的政治局势引起迫害加剧——放逐——放逐出境的事例和新约圣经的影响——神圣议会(HOLY SYNOD)反对斯顿得教派属下的教会——福音派信徒和浸礼派——俄国境内动荡不安——容许宗教自由——教会激增——取消宗教自由的法令——无政府状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府产生——试图扫除宗教——信徒受苦与教会增长——共产党屠杀信徒——盎肯(J. G. ONCKEN)在汉堡建立的浸礼会——迫害——对宗教宽大的政策——圣经学校——在俄国的德国浸礼会信徒——美国的馈赠——拿撒勒教派(NANARENES)——弗若列池(FROHLICH)——带来复兴——被逐出教会——匈牙利工匠与弗若列池相遇——布达佩斯(BUDAPEST)的聚会——拿撒勒教派的传扬——因拒服兵役而受苦——弗若列池的教训。

第十六章 葛若弗斯、穆勒、卓曼.....

一八二五——一九〇二年

在都柏林成立的教会——葛若弗所(A. N. GROVES)——与信徒前往巴格达——工作开展——瘟疫与水灾——葛若弗斯太太去世——来自英国的同工——科屯上校(COLONEL COTTON)——葛若弗斯迁至印度——在此停留的目的——把传道工作带回去新约圣经的样式——使神的子民重新合而为一——穆勒(GEORGE MULLER)——革拉克(HENRY CRAIK)——在英国毕士大教堂内成立教会，实行新约圣经的原则——穆勒往访德国——设立团体及孤儿院以激励对神的信心——卓曼(ROBER CHAPMAN)——伊文思(J.H.EVANS)——卓曼悔改信主——他在班斯泰甫 (BARNSTAPLE)的事奉和周游传道——接受圣经为唯一指引的个别团体

第十七章 交通与灵感的问题.....

一八三〇——一九三〇年

在普里茅斯的聚会——瑞士法语区的情况——达秘的探望——他的理论的演变——（在败坏中的教会）——若查特(AUGUST ROCHAT)——达秘与那些接受新约教会样式的弟兄们在教导上的分歧——由地方性教会转为普世性教会的原则——聚会扩散出去——葛若弗斯写给达秘的信——提议成立中央权力组织——达秘与牛顿(NEWTON)——达秘与在毕士大堂的教会——达秘排斥那些不与他同心拒绝在毕士大堂的教会的人——与教会断绝交通的原则的应用普及各地——拒绝服从这个断绝交通原则的众教会——给其它信徒的影响——在各国内依照新约圣经样式建立的教会——理性主义——圣经批评学——圣经广传各地

第十八章 总结.....

众教会仍能依随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么——不同的答案——注重仪文的教会——唯理主义——改革宗——神秘派及其它——福音奋兴派——历世历代以来以新约圣经为指引的弟兄——福音的传扬——外国传道差会——回转到圣经原则而带来的复兴——每个基督徒都是传教士、每个教会都是传福音的组织——教会与布道所的分别——社团与教会的分别——众教会的合一和福音的传扬——在万人中建立在同一根基上的新约圣经教会——结论

中英名词索引.....

序言

《走天路的教会》，最初在一九三一年出版。读者们公认这本书是对基督教历史长久以来为人所忽视或误解的一面，作了首先开拓性的研究。此书面世后不到两个月，已故述慈教授(PROFESSOR A.RENDLE SHORT)就跟我提起，认为这是该书商所出版的书籍中最有价值的一本。

作者博饶本(EDMUND HAMER BROADBENT)（一八六一——一九四五），花了先后差个多五十年的工夫，遍游欧洲中部及东部，认识了不少的基督徒团体，都是脱离当地所认为正统的教会组织的，因此有时他也受到相当大的迫害。他与这些信徒来往相交多年，引起了要追溯他们历史渊源的念头，于是展开了广泛的探讨，《走天路的教会》就是他研究多年的成果。他在此书的绪言、目录、和注释中，罗列了他所引用的数据源，其中有已出版的，也有从没有发表过的。在《福音季刊》(THE EV ANGELICAL

QUARTERLY)的书评中，评述者说：“在绪言中所列出来的书目，为人提供了最具启发性的研究途径。”接着的几年，也有其它的人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维杜恩(LEONARD VERDUIN)研究重浸派所著的“THE REFORMERS AND THEIR STEPCHILDREN”(1964)——，可是仍以此书开了倡导的先河。

有人批评，这本书把一部份立场不明朗的团体也包括在内，例如仁士曼爵士(SIR STEVEN RUNCMAN)在“THE MEDIEVAL MANICHEE”(1974)所论及的。但是作者一开始已经说明，有关这些信徒团体的资料，泰半是来自与他们敌对的人所拥有的文献，而他们在提及这些信徒们的信仰和生活的时候，免不了会加以恶意的渲染。我们也要记得，这些信徒，出于自愿也好，或出于被迫也好，是与当时的文化主流疏离的，就不免会在态度和行为上与常人迥异。作者虽然胸襟宽大，却也给自己划定了界线，没有把杜科波派(DUKHOBORS)包括在那走天路的行列中。

书中所提及的各处信徒的聚会，不但在这走天路的行列中配占得一席位，也应该可以包括在继承使徒传统的系列中，因为他们

写福音书的四位历史著述者，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叫作“四位传福音的人”，也就是把好消息传扬出去的人。

这部历史所记载的，说到神如何借着神迹降生，与人成立了一种关系，甚至是在人被创造时也没有的一种关系；又说到祂如何牺牲受死，借着大能的复活，败坏了死权，除掉罪孽，彰显祂的荣耀——祂不但是造物的主宰，更是拯救世人的救赎主。

这段历史的根源和预备阶段，甚至有关它的实际预言，和它的真实性的证据，都写在圣经中旧约的书卷内，而其中以色列人的历史，与它相互交错不可分离，因而蕴涵着普世性的意义。

教会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因信接受基督并跟随他的人群的历史，这段历史仍正在发展中，尚没有终结。因这个原故，又因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教会历史虽然极度重要，但能记述下来的，仅限于其中的一些部份，或某段时期而已。首先有人把他所看见的，或从可靠的记录中所获悉的，记叙下来，然后又有别人把他所知的，也接着记述下来；就是这样不断地接续下去，照着所走过的这漫长的天路，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地延续记载下来。

下面所写的，正是论及这些在开展中的史实；遍采前人的研究所得，加以整理，兼附作者本人的评论见解，汇编成书。作者在书中列明所引用的参考材料，是希望读者们也会参阅这些资料丰富的著述，更多分享这些作者们的辛勤研究的成果，参考这些精辟的论评。

本书的目的，是要为那些没有太多工夫去阅读或从事研究的人，提供一些《神的教会》的历史数据。这些教会，曾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努力尝试在他们的聚会、组织、和见证中，持定圣经，相信这是神的话语，照着遵行，并认定神的话足以供应他们在任何环境下一切的所需。

这些教会一直都存在着；大部份的史料虽已遗失，但所留存下来的，数量也不少，本书所引用的，只能从其中选用一部份。

书中论到某些教会的经历时，除了必须要提及当时有关的历史背景外，本书对一般的历史，并没

有提及。本书所记叙的主要对象，是那些专一遵行圣经教训的信徒们的教会；因此若不是涉及这些信徒们的聚会，一般人所知的所谓“基督教历史”，也没有包括在本书内。

书中提及一些属灵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没有全面接受圣经为唯一的指引的原则，但因为它们本身也能对奔走天路这方面有所启发，因此也列为本书的内容。

除了下面所详列出来的书籍以外，作者也尽量引用了一些方便参阅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和哈斯丁斯(HASTINGS)的《宗教伦理百科全书》。

开始从事研究的人，可以先在这类标准的参考书中，找到研究的对象；参考书中通常会将一些具权威性的有关著作列明出来。参阅过这些有关的著述后，就能转而参考原作；多半时候，原作不易找到，那么就可以参考可靠的评述。本书所引用的参考书，多是人所熟知，而且也方便查阅的。作者宁愿舍弃渊博的巨著不用，转用其它较通俗的，好叫有志研究者，能更方便的获得更全面的数据。非英文的参考书，如有英文译本，则予以采用；否则将原作列明，让懂得该种语文的读者得以参阅。

(为方便读者查索，下文中所提及的参考书籍的作者姓名及书名全部照录，未加翻译。译者按。)

历史的开头部份，泰半资料采自《THE 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到了玛西安(MARCION)的时期，本书参考了 AD. V. HARNACK 所著的《MARCION DASEVANGELIUM VOM FREMDEN GOTT》；有关罗马帝国的史实，则参考 BR. GENL.G.F.YOUNG.C.B.所写的《EAST AND WEST THROUGH FIFTEEN CENTURIES》；关于奥古士丁(AUGUSTINE)的事迹，由 J.C.PILKINGTON, M.A.所翻译及注释，并由 PHILIP SCHAFF 编纂的《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成了主要参考材料。

DEAN MILMAN 所著的《LATIN CHRISTIANITY》，为好几个时期都提供了数据。我们很感激 GEORG SCHEPSS 把培利司里安(PRISCILLIAN)的真实历史和教训写了出来；他在一八八六年在武殊堡(WURZBURG)大学，发现了这位西班牙籍宗教改革者的重要手稿，当时的经过，在《PRISCILLIAN EIN NEUAUFGEFUNDENER LAT. SCHRIFTSTELLER DES 4 JAHRHUNDERTS》一书中，详述出来；这份手稿，并经 FRIEDRICH PARET 加以研究及解释，书名：《PRISCILLIANUS EIN REFORMATOR DES VIERTEN JAHRHUNDERTS EINE KIRCHENGESCHICHTLICHE STUDIE ZUGLEICH EIN KOMMENTAR ZU DEN ERHALTENEN SCHRIFTEN PRISCILLIANUS》，本书引用了其中不少珍贵的注释。有关保罗派(PAULICIANS)的重要资料，都是来自亚美尼亚(ARMENIA)教会的中心 EDSCHMIATZIN 副主教 KARAPET TER - MKRTTSCHIAN 所作的《DIE PAULIKIANER IN BYZANTISCHEN KAISERREICHE.ETC.》。论及这时期另一本无价的参考书，是 F.C.CONYBEARE 所编译的《THE KEY OF TRUTH A MANUEL OF THE PAULICIAN CHURCH OF ARMENIA》，他在一八九一年在 EDJMIATZIN 神圣议会的图书馆中发现这份文献，他在著述中所加上的诠释，甚有价值；这份文献公开以后，挑起了对说明这些弟兄们的信仰和教训的文物发现有更多的希望。有关巴尔干半岛上的波各米勒(BOGOMILS)派弟兄们的资料，大部份来自 J.DE ASBOTH (匈牙利国会议员)所著的《AN OFFICIAL TOUR THROUGH BOSNIA AND HERZEGOVINA》和著名的旅行家及古物收藏家 A.J.EVANS (日后封为爵士)所写的《THROUGH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N FOOT, ETC.》,也有部份资料出自 WILLIAM MILER 的《ESSAYS ON THE ORIENT》。至于谈及东方教会那一章，尤其是论到聂斯托利派(NESTORIAN)，则

有赖于下面三本参考书：J. LABOCRT 的《LE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RE PERSE SOUS LA DYNASTIE SASSANIDE》；J. W.ETHERIDGE 的“THE SYRIAN CHURCHES”；和 F.C.BURKITT, M.A. 的《EARLY CHRISTIANITY OUTSIDE THE ROMAN EMPIRE》。悉劳西亚(SELECCIA)会议的一段记载，是根据 OSCAR BRAUN 的《DAS BUCH DES SYNHADOS》；而有关聂斯托利(NESTORIUS)的事迹，则根据 J.BETHUNE-BAKER 所著的《NESTORIUS AND HIS TEACHINGS》和《THE BAZAAR OF HERACLIDES OF DAMASCUS》；这两本书对聂斯托利本人作出生动的描述，读者应该在可能范围内将这两本书全本过目。HAKLUKT SOCIETY 所印行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作者 COL.SIR HENRY YULE)，详述聂斯托利派的信仰远扬中国的经过，很值得留意；这本参考书也提供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写到瓦勒度派(WALDENSES)和亚勒比根斯派(ALBICENES)的那部份所需的资料，大量出自 G.S.FABER 的《THE ANCIENT VALLENSIS AND ALBIGENES》和 S.R.MAITLAND 的《FACTS AND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DOCTRINE AND RITES OF THE ANCIENT ALBIGENES AND WALDENSES》，但最大部份的材料却采自 DR. LUDWIG KELLER 的著作，尤其是有关瓦勒度派的历史和教训那些方面；他身为国立文物馆主任，常有机会翻阅这些重要的文献，他藉此专心钻研所谓“异端份子”的事迹，把研究的成果公诸世人，消除了不少人对这些信徒的误解；本书所引用的著作，包括《DIE INFORMATION UND DIE ALTEREN REFORMPARTEIEN》，《EIN APOSTEL DER WIEDERTAUFER》，和其它的几本，其中尤以前者所蕴藏的材料最丰富，能读的人都该去读这本参考书。论及宗教改革的时候，以下几本着作给我不少帮助：J.A.FROUDE 的《LIFE AND LETTERS OF ERASMUS》；JOHN RICHARD GREEN 的《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的《ENGLAND IN THE AGE OF WYCLIFFE》；和 LECHLER 所翻译的《JOHN WYCLIFFE AND HIS ENGLISH PRECURSORS》。此外还有 H.B.WORKMAN 的《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AGE OF HUSS》；他所引用的数据源极具权威性，甚有价值；KARL VOGEL 由古捷克文翻译为德文的《DAS NETZ DES GLAUBENS》(作者 CHELTSCHEZKI)，也供给了不少资料。有关摩利维亚(MORAVIAN)教会的描写，主要是根据摩利维亚出版社所发行的《HISTORY OF THE MORAVIAN CHURCH》(作者 J.E.HUTTON)；至于有关甘美纽斯那一部份，则根据两本由波希米亚文译为德文的书籍：DORA PERINA 所译的《DAS TESTAMENT DER STERBENDEN MUTTER》，和 FRANZ SLAMENIK 所译的《STIMME DER TRAUER》。其中一本曾广泛引用过的参考书，是 THOS.M.LINDSAY 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J.WARNS 所作的《DIE TÄUFEN

GEDANKEN ÜBER DIE URCHRISTLICHE TAUFEN-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GEGENWART》，贡献也很大，尤其是说到重浸派的历史这方面，和所引用的重要资料。提到奥地利境内的重浸派那些要紧而又有意思的记载，多是取材于 DR.J.BECK 和 JOH.LOSERTH 所写的《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及其它著作；在本书有关的篇幅内，对这些引用的材料有详尽的报导。有关俄国境内的门诺派(MENNONITES)的记述，主要是根据 P.M.FRIESEN 的《GESCHICHTE DER ALT-EVANGELISCHEN MENNONITEN BRUDERSCHAFT IN RUSSLAND》-FRIESEN 是《MENNONITEN BRUDERGEMEINDE》所委任的编史员，可以自由参阅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档案；在这些史料方面，

我也参考了 JOH.DEKNATEL 所写的《FUNDAbCENTE DER CHRISTLICHENLEHRE U.S.W. 》。马贝克 (PILGRIM MARBECK) 所著的《VERMANUNG ETC. 》的摘要，现存只有两本，其中一本存放于大英博物馆。KARLECKE 所写的《SCHWENCKFELD-LUTHER UND DER GEDANKE EINER APOSTOLISCHENREFORMATION》，极有价值，本书也多次的引用它。在法国发生的史实描述，是取材 J.H.MERLE D AUBIGEN 所著，由 H.WHITE 所译的《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 CENTURY》。至于有关法勒尔(PAREL)那段写实，却是以 FRANCES BEVAN 所写的《LIFE OF WILLIAM FAREL》为蓝本；这位作者曾写了好几本同样性质的书籍，颇堪注意。片外一本引用过的 MERLEDAUGIGNE 的著作，是《THE REFORMATION IN EUROPE IN THE TIME OF CALVIN》。SAMUEL SMILES 的《THE HUGUENOTS THEIR SETTLEMENTS CHURCHES AND INDUSTRIES IN ENGLAND AND IRELAND》，为预格诺派 (THE HUGUENOTS) 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数据。《UN MARTYR DU DESERT JACQUES ROGER》，是 DANIEL BENOIT 所写的，论及南特勅令 (EDICT OF NANTES) 废除后的“沙漠中的众教会”。

回到英国的那一部份，我曾引用 GEORGE OFFOR 的《MENMGOIR OF WILLIAM TYNDALE》。至于提及英国的不奉国教者的那些报导，下面几本书都给了我不少的帮助：HERBERTS. SKEATS 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FREE CHURCHES OF ENGLAND》；C.SILVESTER HORNE 的《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FREE CHURCHES》，RICHARD HOOKER 的《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JOURNAL OF GEORGE FOX》。提供了他一生最完整的数据。论到德国和附近国家的属灵运动，尤其是在宗教革命发生以后那段时期的历史，见载于下面三本参考书，颇为详尽：《GESCHICHTE DES CHRISTLICHEN LEBENS IN DER RHEINISCH-WESTPHALISCHEN KIRCHE》(作者 MAX GOEBEL)；《GESCHICHTE DES PIETISMUS UND DER MYSTIK IN DER REFORMIRTEN KIRCHE U.S.W. 》(作者 HEINR HEPPE)；和《GESCHICHTE DER PIETISMUS IN DER REFORMIRTEN KIRCHE》(作者 ALBRECHTRITSCHL)。《JOHN WESLEYS JOURNAL》内有他本人生平最详尽记载。本书提到克里威廉 (WILLIAM CAREY) 的事迹时，引用的材料，不少出自《THE LIFE OF WILLIAM CAREY SHOEMAKER AND MISSIONARY》(作者 GEORGE SMITH)。论到哈尔登 (HALDANE) 弟兄俩的部份，则得力于 ALEXANDER HALDANE 所作的《LIVES OF ROBERT AND JAMES HALDANE》。至于要参考关乎俄国和斯顿德教派 (STUNDISTS) 的历史材料，我主要是靠这两本书：P.M.FRIESEN 的《GESCHICHTE ETC》，和 J.WARNS 的《RUSSLAND UND DAS EVANGELIUM》。论到德国浸礼宗的兴起经过，主要参考书是 JOHN HUNT HOOK 所著的《JOHANN GERHARD DNCKEN.HIS LIFE AND WORK》。我又找到不少论及英国后期的各种运动的手稿，也参考过 W.BLAIR NEATBY 的《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葛若弗斯 (GROVES) 太太，为亡夫的事迹编撰了《MEMOIR OF THE LATE ANTHONY NORRIS GROVES CONTAINING EXTRACTS FROM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记载他在新约教会样式的教会的建造上所作出的贡献和教导，我从这本参考书中引用了很多资料。《A NARRATIVE OF SOME OF THE LORDS DEALINGS WITH GEORGE MULLE》记载了穆勒有力的见证。W.H.BENNET 的“ROBERT CLEAVER CHAPMAN OF BARNSTAPLE”详细报导了车曼 (CHAPMAN) 的生平，作者是他生前的密友。WILLIAM KELLY 在所编纂的“COLLECTED WRITINGS OF J.N.DARBY”中，

报导了达秘(DARBY)的教导。《NAZARNEES IN JUGOSLAVIA》是在美国的“拿撒勒教派”(NAZARENES)信徒所编印的，还有其它各种小册，都是论及这些信徒的工作。

《走天路的教会》所遭遇的难处和她的荣耀，就只能这样简略地描画出来，她那完整无遗的经历，却只能等到主的话成就的那一天方得以显明。那时“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太 10:26)。现今，虽然往往出于无知和误会，时有模糊不清的情况，但我们实在看见了这个走天路的教会，如何敌挡黑暗的权势，如何在地上为她的主作见证，又如何因着跟随祂的脚踪而受苦。这些信徒永远是走天路的，并没有在地上成立任何属地的组织，因为他们看见了天上的一座城。因为像基督的原故，他们也可以给称为“匠人所弃的石头”(路 20:17)，并且因信，指望有一天当他的国度显现的时候，他们必与他在国度中一同得份。

译序

三年多前，在教会中和弟兄姊妹一同阅读这一本书，众人都在交通心得中大得帮助。那时，就有好几位弟兄有意把这书译成中文，只是因着一些条件上的限制，迟迟没有实行。去年秋天，我们感觉中国的教会在这方面的需要比前更迫切，就决心开始作翻译的准备，由内子把全书译成初稿，我亲自作校译，全书定稿以后，再由两位弟兄分别作全书的审阅。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心意，盼望主使用这书，使许多神的儿女从其中看见神所要得着的教会，能以越过人间的习惯而追求活进神的心意中，叫神得着满足，神的儿女也满蒙祝福。

这书虽是在三十年代写成，近几十年的历史资料并没有收集在其中，但这并没有影响这书的属灵价值，它的属灵意义仍旧是那样的强烈。这书与其说是一本教会历史，倒不如说它是透过神在历代的圣徒中所作的工，向神的儿女传递神关于教会在地上的见证的实意，这正是本书与一般的教会历史不同的地方。写作教会历史，很容易把神在人中间所作的贬低成为人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结果，新派的人固然是采取这种观点，就是称为信仰纯正的基督教学术工作者，也常常在不自觉中向这方面看齐。

使徒行传是教会见证的原则，书信是教会见证的真理基础，离开了神的话，教会见证的路是闭塞的。基督教的现况是偏离神的话的结果，从使徒行传的日子开始，已经出现了人的见解代替了神的话的事实，要使神的儿女偏离神的见证，但在历世历代中，神不停止的吸引人，兴起人，单纯的根据神的话去站立，作当代的神的见证人，他们没有只在口头上标榜神的话是权威，而是实在的活出神的话，以行动去见证神的话的权威。人偏离神的心意，使基督教变成了西方的文化。但是体贴神心意的基督徒，认识了神的定意，他们持定神的话，从各种的偏离中出来，回转到神的见证去，他们不承认教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教会的历史在某一方面说来，可以说是人偏离神的话的记录，并不能作为教会见证的正面参考的数据。主自己是中心，一切都得以正意分解出来的真理之道为根据。恢复神所要的见证就是本书的主题。

为了本书的中译名，我们等候了许久也决定不下来，起初曾选定为“爱慕神的教会”，但这名的含意有点不明确；又想过用“爱慕神心意的教会”，可是又觉得在行动上的表达得不明显；有弟兄提议作“寄居的教会”，但这名也不够全面的表达本书的讯息，最后，我们看定了“走天路的教会”，也确定了以它为本书的中译名。我们十分盼望每一位阅读本书的人，都看见神在祂的儿女们身上的等候，

因而使自己也投身进入这一群行走天路的人的行列中。

因为在已有的中文书籍中都没有统一的名字译名，为了使读者容易查阅书中的人物，我们编制了一个中文的中英文名字索引，是依照该名字第一次在本书的那一章出现而编制。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有不少弟兄姊妹们用祷告给我们作扶持，在爱心中给我们鼓励和关心，我们也在致此致谢，深信主必纪念他们向着祂所作的一切，那些因阅读本书而生发对神的见证的想往的人，也就是他们在主面前所得的赏赐。

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

王国显写于旧金山

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九日

第一章 开端

公元二九一一三一三年

新约圣经适合现况——旧约与新约——基督的教会和神的众教会——使徒行传为应用于现代提供了样式——本书记录后来事迹的方案——五旬节和众教会的建立——犹太会堂——犹太会堂与众教会——散居外地的犹太人传扬神的道——犹太人最早建立的教会——犹太人敌挡基督——犹太宗教、希腊哲学与罗马权势敌挡众教会——圣经的结束——以后的著作——革利免(CLEMENT)致哥林多人的书信——伊格那丢(IGNATIUS)——连上新约时期最后的环节——受浸和主的晚餐——教牧特权阶级的成长——俄利根(ORIGEN)——居普良(CYPRIAN)——诺洼天(NOVATIAN)——不同类型的教会——孟他尼主义者(MONTANISTS)——神哲主义者(MARCIONITES)——初期教会的坚稳——迦达尔斯(CATHARS)——诺洼天主义者——多纳徒派(DONATISTS)——摩尼教派(MANICHAEANS)——给丢奈特(DIOGNETUS)的书信——罗马帝国逼迫教会——君士坦丁颁布宗教自由——教会胜了世界。

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美好的完成，是律法和先知书自然发展的唯一结局。新约并没有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成全和替代，并使它更充实丰富。新约本身具备了完整的特性，它所显示的并不是一个新时代初步的开启而需要经常加以修改和加添、以期适应不断改变的世代。它本身就是一种启示，适合历世历代众人的需要。除了四福音所记载的有关基督耶稣的事迹之外，我们再无别的更佳途径去认识耶稣基督；同样地，除了新约书信所谈论关于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所引发出来的结果和教训以外，亦没有其它更正确的教导。

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和它的历史，而在基督显明之前，神就是借着以色列民族向世人启示自己。新约圣经是把基督的教会显明出来：教会是一切因信神的儿子得了重生、有份于圣灵和永生的人所组成的（约 3:16）。

这个身体——基督的全教会——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也不可能仅在某一个指定的地点活动，因为其中许多肢体早已离世与基督同在，其余的却散居在世界各地。既是如此，神就命定这个身体要借着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代的神的众教会显明出来，并要作见证。神的众教会，每一个都是由跟随主

耶稣基督的人，各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奉主的名聚会而组成的，主在这些聚会中应许与信徒同在，并用各种方式通过肢体显明圣灵的工作（太 18:20；林前 12:7）。

神的众教会，每一个都直接联于主，服从祂的权柄，直接向祂负责（启二、三）。从来没有提到一个教会可以控制另一个教会的说法，也没有说及任何教会应有组织的联合而存在。而是众教会只靠个别信徒彼此亲密的交通来联结（徒 15:36）。

教会主要的任务是向普天下传福音，就是救恩的大喜信息。这是主在升天之前的命令，还应许赐下圣灵作传福音的能力（徒 1:8）。

使徒时代的教会历史事迹，在使徒行传中给摘要地记录了下来，作为众教会永久的样式。教会的发展离开了这样式，就产生过惨痛的后果，而以往每次教会的复兴和恢复，都是回转到这样式和圣经的原则所带来的结果。

本书以下所记载的事迹，乃是搜集了不同作者的记录；这些记录，都显示出一个由一班决心遵照新约教训的信徒所组成的贯连不断的教会的连续。这些连续，不一定局限于某一地区，因为这样的教会往往会被分散，或甚至堕落变质了，而在别的地区，却又有持守真理的教会兴起。圣经将这个教会样式清楚地描写出来，使教会不难有所依循；就算对以往曾经有信徒走过这条路的事实毫不知情，或甚至不晓得在其它地方同时有人亦持守这样的心意，都全不碍事。读普通历史的记载，若留意到一些关涉到教会的史实时，那些史实会帮助我们更明白上面所描述的众教会。

本书也会提及一些属灵运动，这些运动虽未导致根据新约教会样式而建立的教会的产生，但却可以说明我们更清楚认识其它产生这种样式教会的运动。

从五旬节开始，福音迅速传扬各地。在耶路撒冷参加节期而听到福音的人，把这信息带回去各处犹太人故居的地区。新约只将使徒保罗的传道行踪详尽地记录下来，事实上其它使徒亦曾周游四方传道，并在各地建立教会。凡信主的人，都成了基督的见证人。“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徒 8:4）只要有人接受福音归信主，不论人数多寡，便都成立教会；这样的做法，使教会的事奉有了一定的永久性。又由于教会从开始就学习直接倚靠圣灵行事，尽忠于基督，因此不久就成为传扬生命之道的中心。圣经提到帖撒罗尼迦新成立的教会时，指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帖前 1:8）。虽然每个教会本身都具独立性，不受任何组织或教会联合组织形式所管束，但各地教会彼此间的紧密联系一直在维持着，而且因为传道的弟兄们经常到访而不断的兴旺起来（徒 15:36）。聚会都在家中，或其它可以容纳多人的房子里，或在户外举行，所以无需特别形式的建筑物。这种所有肢体一同参加的聚会，活动自如；虽无组织，却仍是一个整体；只强调在基督里分享同一的生命和同一位圣灵的内在，不拘形式，使教会能经历逼迫而屹立不动，将救恩的信息向世人宣扬。

最初的时候，福音是由犹太人传给犹太人，经常利用当时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会堂的制度，是犹太人在分散各地数百年来仍能保持民族意识与宗教统一的简单而有效的机构。会堂主要传讲旧约圣经。犹太人散居外地多年，没有被外邦所压服或同化，可见圣经与会堂维系力量之大。设立会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念诵圣经，讲解经文、和祈祷；其源始于上古时代，诗篇七十四篇记着说：“你的敌人在会中吼叫，……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诗 74:4、8）。（“会”与“圣所”，原文与“会堂”一字相同。译者按。）据说犹太人被掳归回后，以斯拉进一步强化了会堂的组织。犹

稣均在其中。他曾说：“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主也以圣经作为教会永不更改的引导；各处教会不至于消灭，原因亦在此。如果在某一地方教会遭破坏，在别的地方就会兴起另一个教会来。

散居外地的犹太人，在外邦人中热心宣扬真神。因着这些见证，许多人归向真神。在主后第三世纪，希伯来文的经卷给译成了希腊文，就是所谓“七十士译本”。希腊文是当时和以后多年来在不同语言的民族彼此间沟通的主要语言，所以在“七十士译本”圣经面世以后，外邦人也可以阅读旧约经卷；有了沟通的工具，犹太人就利用会堂的集会和商务上往来的机会去作那美好的工。主的兄弟雅各曾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徒 15:21）。希腊人和其它的人就给带进会堂去听律法书和先知的的话。他们在罪的重担和异教之风的重压下，正感混乱不安，而哲学又不能满足他们，会堂就使他们认识这位唯一的真神。因为商业上的关系，犹太人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物；他们就利用这些机会努力不懈的去传扬真神的道。有过这样的记载：有一位寻求真理的外邦人，决定不参加当时风行的一种哲学派别，因为他幸运地邂逅相遇到一个来自罗马的犹太布贩，那布贩以很简单的方法就使他认识了这位唯一的真神。

在会堂里，人们可以自由地事奉。耶稣经常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路 4:16）。巴拿巴和保罗周游传道时，来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们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甚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徒 13:15）。

当救主基督来到地上，要应验以色列人的盼望和见证时，大批犹太人和信奉犹太教的虔诚人，都归信了祂，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基督是亚伯拉罕所蒙的应许的后裔，是大卫最伟大的子孙，但当时的统治者妒恨祂，又见外邦人蒙恩，一同聚集，正如福音书听说的，心中就更嫉忌，拒绝不信他们这位君王和救主，逼迫主的门徒。他们没有救主，只好继续走他们那满了悲惨愁苦的路。救主原是神向人所显出的大爱和拯救的大能。

最初教会在犹太人当中建立起来的时候，犹太人是最先敌挡教会的人。但不久以后，教会纷纷在各地成立，而当外邦人也蒙恩归信基督时，教会就受到希腊哲学思想和罗马帝国权势的冲击。在主被钉的十字架上面，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罗马三种文字写上给祂的控罪（参约 19:20），就在这些文字所代表的思想和政权的领域内，教会开始受逼害，受苦，但后来却是在这些权势下首先得胜。

犹太教给教会的影响，并不止于有形的攻击；带来更长远影响的，却是把基督徒带回去律法之下。保罗在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中，就大力抨击这种开倒车的论调，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 2:16）从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的记载，可见教会最初遭遇的严重危机，就是把自己囿限于犹太教派的范围内，以致失去了向所有的人宣扬神借着基督所拖行的拯救大工的自由和能力。

希腊哲学所寻索的，不外是一些关乎神的哲理、自然的阐释、和行为的准则，尽量取材于各种宗教和各类思潮，不拘是来自希腊的或罗马的，甚至是非洲的或亚洲的，于是产生一种所谓神秘的直觉领会，各种哲学系统因之先后应时而生，引起一片激辩。诺斯底主义(GNOSTIC)的各种派别，多半是把不同来源的思想，冶为一炉，管它是异教、或犹太教、或基督教，一概兼收并蓄；他们所探索的，不外是那些隐藏在异教的外表形象下的所谓“奥秘”，常常标榜二元思想，主张两位神的并存：一为光明、

一为黑暗；一善、一恶；又主张物质和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是来自黑暗的权势，受这权势的管治。至于一切属精神领域的，却是源出于至高的神。这些哲理推测，形成了当时冲击初期教会的多种异端的理论基础。在新约圣经中，尤其是在保罗和约翰的书信里，早已对这些异端提出抨击。结果，教会为了保持信仰纯一，采取了反击，但这些反击手法带来给教会本身的影响，远甚于这些异端所引起的影响；主教的管治和权力，因此得以随着圣职人员制度而膨胀，很快就使教会严重地变了质。

罗马帝国亦逐步地介入对教会的逼害，至终要倾其全力去粉碎毁灭教会。

约在主后六十五年，使徒彼得殉道了。几年以后，使徒保罗亦遭受同样的际遇。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帝国攻毁了耶路撒冷，这事实说明了一件事：为众教会，神并没有安排肉眼可见的领袖，或在地上的中心组织。接着，使徒约翰把约翰福音、书信、和启示录写下来，作为旧约与新约圣经的结束，其意义与其它在这以前所写成的书卷同等重要。

在新约圣经和同时期的作品，与后来出现而未包括在圣经正典内的著作，两者之间有显明的差异。后者虽然亦有使人击节赞赏的妙文，但其内容显然远比不上前者。它们虽然也阐释圣经、为真理辩证、指斥谬论、劝勉信徒，但是同时却也慢慢地偏离了自使徒时代便已明示并日渐明确的新约原则。

在使徒约翰尚在世的时候，革利免(CLEMENT)写信给哥林多人，书信的第一卷，写出了在使徒时代末期教会的光景。革利免是在罗马的教会的长老，见过使徒彼得和保罗，在书信中就提及他们殉道的事。书信开首这样说：“在罗马神的教会，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述及当时教会所经历的逼迫时，他用得胜者的平静口吻说：“受迫害的众妇女，忍受了无法形容的折磨，坚定地走完了她们信心的路程，虽然身躯软弱不堪，却接受了无比荣耀的赏赐。”作者也用满了谦卑的口气说：“我们写信给你们，不但是劝勉你们当尽的责任，也是提醒我们自己。”作者并多次引用旧约，提及其中的意义，亦引用不少新约经文。他不断用主再来的盼望，来激励读书信的人，提醒他们，救恩之道不在乎自己的智慧或善行，而是因信得救；人因信称义，也绝不会叫人在善工上怠慢。但书信中所写的，已开始把圣职人员和普通信徒明显地划分清楚，这一点是深受旧约条例的影响所致。

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听说的话，提及他们是圣灵所立作全群的监督（参徒二十）。在这段记载里，可见“长老”和“监督”两种不同的称谓，实际上是指同一群人；在同一教会内可以有多位长老（亦即监督）。在革利免之后数年，伊格那丢(IGNATIUS)也写了书信；虽然他也认识好几位使徒，但他却高举监督的地位，主张给予他们的特权，远超革利免所主张的，也是新约圣经所未见提及过的。论及使徒行传二十章时，他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监督和长老来，硬把同一的称谓分为两种不同的衔头，还说他们是从以弗所和附近的城市来的，抹杀了他们实际是来自同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的事实。

最后一位直接认识使徒的是波利卡普(POLYCARP)，是士每拿的监督，后来在主后一五六年在当地殉道。他一直在使徒约翰门下受教，也和那些与主同行的人交往甚密。另一位是爱任纽(IRENAEUS)他是波利卡普的门生，也是直接连上基督的时代的一个，他在主后一七七年被立为里昂的监督。

信徒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便可受浸。这个教训早已在新约圣经里有例证可循，以后教会亦照着遵行。但明指婴儿受洗的事例，最早是见于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后一九七年的著作。其中他指斥当时的人开始为死人及婴儿施行洗礼的错误。引起这种陋习的原因，乃由于偏离了新约的教训里关于

受浸的教导，因为在第二世纪时已经出现“受浸使人重生”的错误观念。此外，当时又有人认为由神职人员执行纪念主的受死（亦即信徒擘饼饮杯纪念主）的仪式时会有奇迹发生。这个谬论，加上上述对受浸的误解，更加深了圣职人员和普通信徒间有高下之分的说法。主教（监督）负责管理一切教牧圣职人员，而在广阔地区内所有的主教，又听命于该教区的大主教；如此，不久便演变成一种人为的宗教性组织，替代了教会中圣灵的大能运行和圣经的指导原则。

这种演变是循序渐进的，许多人并未立时受影响。起初的时候，一处教会从未有意要辖管另一处教会；虽然人数较少的教会，间或会请人数较多的教会派遣“被选上的弟兄”在必要时去协助一下；而同一地区的监督们，有时亦会聚集开会商讨，但直至第二世纪末期所见到的情况，显示出唯有在必要时，为了方便商讨大家共同关心的要事，才会偶然召集开会。特士良说过：“宗教从来不勉强人接受信仰，只会任人自由抉择，不能出于勉强，或施以压力。”

俄利根(ORIGEN)是当时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也是教父中思想最属灵的一位。他曾为教会的属天性质作出辩证。他在一八五年生于亚力山大城，父母均为基督徒。他幼年时便经历过圣灵的工作。他父亲利欧尼达斯(LEONIDAS)睿智而敬虔，是他研读圣经的启蒙老师，父子情深。当父亲因信仰而下狱时，他年仅十七岁。他爱父心切，要到狱中陪伴老父，幸亏母亲心生妙计，把他的衣服藏起来，以致他不能出门。他写信给在狱中的老父，鼓励他坚持信心。后来父亲殉道，家产全部给没收。年青的俄利根就肩负起供养母亲和六个弟弟的责任。他作教师的特殊恩赐，不久就使他声誉鹊起。他自律甚严，但对受逼迫的弟兄，则极为体贴，甚至与他们一同受苦。他曾逃到巴勒斯坦避居一段时期，在那里从事著作。他渊博的学问，吸引了不少主教（监督）来聆听他对经文的讲解。亚力山大城的监督底米特里斯(DEMETRIUS)获悉后，甚为震怒，指斥他没有资格教导主教，因为他本身只不过是平信徒，于是召他返回亚力山大城。俄利根听命回去，但最后仍不免被逐出教会（主后二二一年）。他那特殊可爱的人格和渊博深邃的学问，吸引了不少人跟随他，并且在他去世以后，仍遵行他的教训。在罗马德修王逼害基督徒时，他被囚禁在推罗，受尽酷刑，五年后由于刑伤复发而身亡，时在二五四年。俄利根认为教会是所有在生命里经历过永生神大能的人所组合而成，这就是属灵的真正教会，与一般所谓教会组织有别。他思考敏锐，能深入探讨常人所不能领会的，所以有好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异端，其实他在阐释的时候常作审慎的分辩，他指出有些教训必须明确地说出来，一点也不能含糊，但另外一些教训，他要人慎思明辨，不要胡乱接受。关于后一类的教训，他说过：“将来必成的事，只有神确实知道，也只有基督里因圣灵而能与神为友的人，才能领会。”他一生勤奋，全心专注于圣经的讲解，其中一本伟大的著作就是 HEXAPLA。与俄利根的主张迥异的，乃是迦太基的监督居普良(CYPRIAN)。他生于主后二〇〇年左右；他常应用“大公教会”这名称（大公教会是指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还没有分裂前的教会组织，译者按。），且认为一切在大公教会门外的人都不能得救。由此可见，雏形的“天主教会”，在他当时已形成，大公教会是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教会所采用的名称，而且排斥凡不肯加入大公教会的人。他批评诺洼天(NOVATIAN)的论著和一切拥戴诺洼天和与他表同情的人，并那些为致力于教会的纯洁的信徒，指斥他们“是反对大公教会的不合法组织”，又说凡支持诺洼天的信徒，不能加入大公教会，因为他们目的在“分裂大公教会所代表的一个身体”，又指责他们不敬拜马利亚，与大公教会的合一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必须悔改回转。他又说：“虽然麦子当中掺杂了稗子，但我们不该退出教会，

而必须努力作麦子，作大户人家里的金器银器。”如果有人质疑，他就叫人读他所写的小册子；而当提到诺洼天的主张时，他就说：“凡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的，就不是基督徒……。教会只有一个，……主教也只有一个。”

当教会数目日渐增加的时候，教会也慢慢的失去了起初的热心，渐渐跟从了世界的样式。这个趋势并非没有引起责难。当天主教形式的教会组织日渐发展，当中就兴起了一小部份提出改革的信徒，同时亦有教会离开了天主教形式的组织，也有一些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坚持原来新约圣经教训的，他们自己也逐渐地发觉受其它教会所摒弃而被孤立起来。大公教会系统后来成为最有权势的宗派，至今存留下来大批有关他们的文献，至于涉及那些和大公教会不同看法的文献记载，则被删除掉，所以现在所仅知道的，都是搜集自那些抨击他们信仰的论著，所以很易叫人产生错觉，以为在第一至第三世纪期间，只有一个联合的大公教会和其它一些零星而无关重要的传异端的团体，事实恰好相反，当时就正如现今一样，有为数不少的各种不同见证的派别，各有其特点，而有些甚至是彼此相互排斥的。

在大公教会中力图改革而又恋栈不去的无数小团体中的人，统称为孟他尼主义者(MONTANISTS)。一种广泛而又有深远影响的属灵运动，多冠以某名人的名字，不免容易引起误会。虽然有时为了方便的缘故而沿用这名称，但在引用时总得要记着：不管那人物是一位如何伟大的领袖和倡导者，总不能与那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的宗教运动相比。

因为教会属世的倾向日深，宗教领袖们都以学问来替代了属灵的能力。许多信徒深受圣灵内住与运行大能所吸引，渴望得着灵性的复兴，回复当初使徒们的教导和实践。主后一五六年孟他尼(NONTANUS)在非利济亚(PHRYGIA)开始教导人；他和附从他的人对当时教会与世界同流合污，大表不满，其中还有人自命有圣灵特别的启示，尤以两位妇人彼莉思嘉(PRISCA)和马西米亚(MAXMILLIA)为甚。罗马皇帝马可奥利流(MARCUSAURELIUS)在一七七年逼迫信徒，引起更多信徒迫切等候主再来，于是孟他尼主义崛起，希望设立聚会，带领人回复起初的敬虔，因等候主再来而敬虔度日，迫切要让圣灵可以在教会内自由运行。虽然他们当中有人夸大所得的启示，但是他们究竟还是提倡和实行当时亟须的改革。一般来说，他们接受天主教会的组织方式，还尽可能保持彼此交通。当时的主教主张教会尽量收容皈依的人，但孟他尼主义者则认为皈依的信徒，必须有真正的生命经历。大公教系统规定加强主教对教会的管治，但主张孟他尼主义的人表示反对，坚持只有圣灵的权柄才是教会的依归，因此必须让圣灵自由运行。这些歧见，不久便引致在东方形成许多分离的教会。但孟他尼教派继续在西方的天主教圈子里活动，经过多年以后才被排斥，另一说是他们自行脱离大公教会。在迦太基(ARTHAGE)帕皮图亚(PERPETUA)和弗里西塔(FELICITAS)在主后二〇七年殉道时，虽然信奉孟他尼主义，但他们仍保留着大公教教友的身份。(他们殉道那可歌可泣的史实，令他们名留千古。)但在第三世纪初，非洲教会伟大的领袖、著名作家特士良接受孟他尼主张时便离开了天主教。他说过：“即使只有三个人，而且都是平信徒，那仍然是教会。”

另一种截然不同而又蔓延迅速、与大公教系统分庭抗礼的运动，称为玛西安主义(MARCIONITES)(亦称神哲主义，译者按)。特士良抨击这种主义说：“玛西安(MARCIN)宣扬的异端，已经充斥了全世界。”玛西安在公元八五年生于黑海的西诺彼，在本都省的教会中长大。本都正是使徒彼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彼前 1:1)，也是亚居拉的本乡(徒 18:2)。玛西安的主张是经年累月地发展出来的，在他年六十

岁时才发表出来，在罗马掀起一片激辩。

当他目睹世人犯罪日趋严重，深感不安。他感到在旧约圣经中神的启示，与新约所启示的，大不相同；又认为一方面是公义的审判和愤怒，另一方面却是慈爱和怜悯；一边是律法，另一边是福音；这两者间的表面冲突，他无法领会，又不晓得根据圣经和当日教会所领受的真理去加以调和，结果他就采纳了一种二元论去解释，认为世界并非至高真神所创造，而是出于一个较低级的神，就是犹太人的神。至于基督所显明的，就是这位救赎的真神，他原与世界无分无关，但因为出于爱心要拯救世人脱离痛苦的原故，亲自来到世间；世人不认识祂，结果祂被那自称为创造者的世界的主宰，和犹太人，并一切跟随这世界的王的人所迫害。玛西安因此教导人，真正的基督徒的责任，是對抗犹太教，反对一般的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亦不过是出于犹太教。他不赞同诺斯底主义，不认为救恩是靠“奥秘”或知识而来的，而是因信基督而得着救恩。他的初衷是要改革基督教会，但结果附从他的人后来也和基督教会彼此敌对。

玛西安因为不能在圣经里找到支持他的主张的论据，结果摇身一变成为最激烈的圣经批评家。他把自己的主张应用到圣经里，而将其中与自己主张冲突的经文全部摒弃，只保留了他认为能支持他理论的部份，还以自己的观点加上解释，而不根据圣经的大要；甚至他认为必要时，可以加上自己的意思。如此，早期他虽然接受旧约，后来便全部拒绝，认为旧约不过是论及犹太人的神和犹太人的弥赛亚，而不是有关至高与救赎的真神和基督的启示。他认为当时门徒错认基督，以为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认为只有保罗获得真正福音的启示，所以只接受新约圣经内的保罗书信和路加福音，但后来他还是将其中与他私见抵触的部份任意删改。至于新约其它书卷，他说是出于信奉犹太教的人，旨在摧毁真正的福音，而且还将其中部份经文加以窜改，来迎合犹太教的信仰，正如他自己的手法一般。玛西安将这本给删减得七零八落的新约圣经，还加插上自己所写的一卷对照录(ANTITHESES)，代替使徒行传。

玛西安狂热信奉自己的福音，声称这是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无可比拟的感人、充满活力，叫人惊奇。当人批评他的主张是异端时，他就自己着手另外建立教会，迅速发展。他们也行浸礼，守主餐，仪式远比大公教会的简单，也阻抑教牧阶级的特权和趋向世界潮流的倾向。根据他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主张极端的禁欲；禁上婚娶；受浸的人都一定要发誓终生守童贞。他们认为耶稣并没有物质的肉身，只是一个形像，但他有感官的知觉，和我们的肉身一样。

如果将圣经断章取义，任何的错谬都可以找到论据。但是真理的根基是完整的圣经。玛西安所犯的错误，在于他只接受合乎自己心意的经文，而拒绝其它的部份。

教会偏离新约教会原来样式的倾向，很早便遭遇厉害的反対，结果教会内有少部分人结集起来对抗歪风，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这些人一部分被逐出了大公教会，自己另立聚会；另一些人在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情况下自动离开，也另立聚会。这些分别出来的信徒，自然地加强了从起初便坚守原则的阵营。接着而来的几个世纪，常见提及这些坚守使徒信条的众教会；他们声称是直接继承使徒时代的见证。在君士坦丁时代的前后，人把他们称为迦达尔斯派(CATHARS)、或清教徒，但他们却从不这样自称。

亦有人称他们为诺洼天主教者。其实诺洼天并非创始者，只不过是当时他们的领导人。当教会遭

遇逼迫时，产生了一个使教会常受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有人信仰上后退，亦即在受浸以后又拜祭偶像，教会能否再收纳他们？诺洼天对这问题持很严厉的意见。按立诺洼天而后来殉道的罗马教会监督费卡安(FABIAN)，有一个门生叫哥尼流(CORNELIUS)，他主张可以再收纳这些软弱失败过的信徒。少数人不同意他的主张，于是另立诺洼天为监督；诺洼天欣然同意，结果他和拥护他的人同被罗马的大公教会开除（二五一年）；后来诺洼天殉道，但跟随他的人，（有人称他们为迦达尔斯人，亦有称之为诺洼天主义者，名称不一而足），日渐增多，遍布各地，公开否定大公教会和他们的教条。

在北非的多纳徒派(DONATISTS)，深受诺洼天的影响。他们主张节制自律，强调主持圣礼的人的品格，但大公教徒则只强调圣礼的本身。这一派教徒的名称，来自他们两位同称多纳徒(DONATUS)的领导人物；这一派早期的教徒，与大公教徒迥异；他们的人品清高，行为检点。在北非一带地方，成为各种不同派别的教会中人数最多的教会。

当教会演变成各种不同形式之际，另外又兴起一种新的诺斯底主义教徒，称为摩尼教(MANICHAISM)（在中国称景教，译者按。）蔓延迅速，与基督教分庭抗礼。创立人摩尼，约在公元二二八年生于巴比伦；所主张的三元教，取材于波斯、基督教和佛教。他自称蒙召作挪亚、亚伯拉罕、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波斯拜火教源始人，译者按）、佛祖和耶稣的接棒人，完成他们的善工。他周游列国，四处传教，足迹远及中国和印度，对当时几位波斯君王的影响至大，但最后被钉十字架处死。后人继续信奉他的主张，教徒遍布巴比伦和中亚区域的撒马尔罕(SAMARCAND)，虽然遭受极厉害的逼迫，教徒还是布散到西方去。

在此各派争鸣、混乱不清的情况下，仍有持守正道的教师，耐心地把救恩之道教导人，循循善诱。其中有一位不名经传，在第二世纪时曾写信给一位名叫丢奈特(DIOGNETUS)的慕道者，指出基督徒敬拜神的方式、对神的专一信仰、和信徒彼此相爱，还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不跪拜希腊人的神像，也不信从犹太人的宗教，并说明这敬虔的新信仰到那时代才显出来的原因。

他说：“基督徒与世人的分别，不在乎国籍不同，也不在乎语言有别。他们各人按着命定在自己的地方居住，随从当地人的服式、饮食习惯和一般行为举止，但同时也活出一种美好、叫人印象深刻的生活样式。他们以作客的身份居住本土，与当地入分享一切，但又有如寄居作客者忍受一切。对他们来说，异邦尤如本土，而祖国又尤如异地。……他们在地上过活，却是天上的国民；他们遵守当地法纪，但生活行为所表现的，却远比法律的准绳更高超。……他们受人辱骂，却回报以祝福。”然后论及神的时候，他说：“神是全能的，是万物的创造主宰，……从上帝差遣祂（真神的儿子：译者按）来，住在人中间。祂是真理，是那神圣不可言喻的真道。神把祂牢牢地放在世人的心里。神并非如人所想象的，差遣……天使或统治的君王来；……神是差遣万物所本的主宰来，天地都是借着祂造的，祂也划定海水的界限。——众星宿也听从祂的命令。”神差遣这位使者，……就如坐宝座为王的差遣儿子，而儿子也是坐宝座的；这被差遣来的，亦有如神自己，也是救主。”神差祂来，不是为了审判，虽然“神有一天会差祂来审判世人，祂显现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呢？”神延迟未差救主再来，只因祂长久忍耐。祂的旨意永不改变，“祂的心意极其高深难测，唯独祂的儿子知道。”当祂把智慧的谋略隐藏起来时，我们就以为祂离弃了我们，其实是要显明我们凭自己不能进神的国，但到了指定的日子，“祂亲自背负我们的罪孽，赐下祂的儿子，为我们赎罪；圣者代替了罪人；无可指摘的代替了恶人；义的代替不义

的；不可朽坏的代替可朽坏的；永存的代替必死的。因为除了他的公义以外，还有什么可以遮盖我们的罪呢？我们这些不虔不义的人，除了靠神的独生子以外，怎能称义呢？啊，何等甘美的替代！啊，何等奥秘的工作！啊，远超过所想所求的福气！众人的罪污被那位独一的义者所洗净，因一人的义令无数罪人得称为义！”

当教会与罗马帝国接触时，便马上爆发冲突。全盛的罗马帝国倾其全力企以征服教会。教会并没有反 抗 或 反 * 群 · · 醇剑 x 浼渌渚 𠂆 · 屑付渭湫 𠂆 钠骄彩逼冢 𠂆 · 泵悬淮喂 𠂆 骰捅破仍侑 𠂆 (6) 保 𠂆 急浔炯永鳌 7 渤腥现髅 · 娜耍 𠂆 几 𠂆 遥 𠂆 徊断掠 · 𠂆 𠂆 淮 λ 赖囊嗖患破涓 · x 渲谢褂肋簧僖 · 淌芟髦帜岩匝杂鞞目喽獭 7 蚕蚌 · 𠂆 婷芳娜硕嫉弥庵停 𠂆 𠂆 踊 𠂆 盘降娜春托盘揭谎 𠂆 ★ 𠂆 铮 𠂆 煌 𠂆 淮 λ 溃桓 · 穀榉 (11) 值氛 𠂆 𠂆 · 可栈佟：罄吹搅说谒氛兰统跗冢 𠂆 庖怀 𠂆 译渴 5. 穆靡崇蟪鄙 · 虢袒嶂 𠂆 淇筛杓善 · 恼 𠂆 街校 · 蠢此坪跻 · 菇袒崞涤谄览 # 𠂆 · · 醇饶侵帧八渲劣谒溃 𠂆 膊还讼 𠂆 约旱男悦 · 钷木 > 癩凰 · 撬湮从蟹统梗 𠂆 < 床磺 · 荒印 J 贾彰挥斜徽鞣 · *

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意外地结束了这场历时长久而又残酷可怖的斗争。在当时罗马帝国内关所引发的权力倾轧中，君士坦丁(CONSTATINE)渐占上风，他于三一二年大获全胜，挥军进驻罗马城，马上颁布谕旨，停止对基督徒的迫害。跟着在一年之后，颁布所谓“米兰谕旨”准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

这样，罗马帝国终于被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的至死不屈的忠心所征服了。他们那种坚忍毅力和包容忍让的表现，把罗马人的敌对仇恨化解了。罗马人对基督徒先是怜悯同情，后来转为敬佩钦羨。

当时异教并未受到迫害，但因为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就逐渐衰微了，而基督教信仰却大受欢迎；国家的法律禁止欺压弱少民族，反进一步的施行保护，因之帝国空前繁荣起来。众教会一旦从外面的压迫下得解脱，重获自由，便进入另一个新阶段。许多教会仍坚守起初的单纯，但不少却因内部组织深入的改变而受影响，改变发生了以后，教会的样式和使徒时代的新约教会，便大不相同了。以后更大规模地进行改易，其引致的后果就越发明了。

第二章 基督教国的基督教

公元三一三——四七六年 三〇〇——一八五〇年 三五〇——三八五年

教会与政府联合——众教会坚拒与政府合一——多纳徒派被定罪——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IA)——亚流主义(ARIANISM)恢复得势——亚他那修(ATHANASIUS)——信条——圣经的正典——罗马世界与教会——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奥古士丁(AUGUSTINE)——伯拉纠(PELAGIUS)——教会地位的变化——假教训：摩尼教派，亚流主义，伯拉纠主义，祭司圣职制度——寺院制度——仍以圣经为指导——差传工作——离开圣经差传的原则——爱尔兰和英格兰差人往欧洲大陆传道——英国和罗马的差传工作间的冲突——培利司里安(PRISCILUAN)

天主教的主教势力抬头，加上大主教教区的兴起，使天主教会和政府机构间更易于沟通。君士坦

丁本人，除保留以前所拥有的异教大祭司的无上权威外，兼揽基督教众教会的统治大权，因此政府和教会很快便密切地联系起来。不久以后，国家大权更转而听命于在教会组织中那些执牛耳的人，使政令更利于施行。这样，本来是受迫害的，却摇身一变而成为迫害人的。

在接着的一段日子，那些忠于紧守神话语的教会——就是当年饱受国家教会逼迫及被指为是异端的一一，都在他们的著述中不断地指出：他们绝对不同意在君士坦丁在位和西利维斯特(SYVESTER)任罗马大主教时教会和政府的联合。在不少其它教会与属世的权势联合的时候，这些忠心的教会并未受玷污；他们当时对真道的持守，可直追溯至新约教会使徒时代的榜样，相沿不绝。就是这个原因，逼迫又复起，但这一回的逼迫，并非来自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而是来自这个皈依基督的国家里掌握大权的教会组织。

当时北非的多纳徒教派人数众多，他们当中保留了不少天主教的组织形式，但为了与天主教的歧见争持不下，上诉于罗马君王。君士坦丁便下令召聚双方主教开会商议，结果裁定多纳徒教派不合。这些人便马上受到迫害和惩治，但这场冲突并未因此止息。两派一直互相争论，直到第七世纪回教徒入侵时期才告消弭。

天主教会第一次会议，由君士坦丁于主后三二五年在毕斯尼亚(BITHYNIA)的尼西亚(NICAEA)召开。主要讨论事项是有关亚历山大教会一位长老亚流(ARIUS)所提出的主张：他认为神的儿子是被造的，是首先被造而且也是最伟大的。但既然是被造的，就不能与父同等。当日会议有三百多位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主教出席，每人随行都带同不少的侍从，会议开会仪式由君士坦丁本人主持，隆重其事。出席的主教中，有一部份人身上还带着在过去遭逼迫的日子里受酷刑而留下来的伤痕。会议结果，除两人附同亚流的主张外，其它众人认定亚流的见解错误，与教会从起初所教导的真理不符。尼西亚会议的议决案成了教规，确定了神儿子的真正属天性和与父神同等地位的真理。

虽然这项议决正确无误，但要经由君王和主教们的共同努力，始得达成协议，还要由国家出面执行，这种程序无形中显示天主教会已离开了圣经的原则。尼西亚会议举行后两年，君士坦丁又改变看法，把放逐了出去的亚流迎回来。到了他儿子君士坦梯亚士(CONSTANTIUS)继位后，全国的主教职位，概由追随亚流的人出任，而政府亦转而向天主教会迫害，就像以前迫害亚流主义信徒一样。

当时身居高位而不趋炎附势，亦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中，有一位名叫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人。他年青时曾出席尼西亚会议，后来成为亚历山大的主教。五十年来他虽然屡遭放逐，却始终如一坚持地为基督的神性力辩，不屈不挠。他虽屡受毁谤，又要逃难至旷野藏身，后来又回到城中，经历一切的艰苦，他却坚守所信的真道，毫不摇动。

亚流主义风行了三百年之久，且成为好几个国家的国教，尤以在北方新兴的国家为甚。意大利的林巴德族(LOMBARDS)是最后放弃亚流主义作为国教的民族。

天主教最初举行的那六次会议，（第六次是在主后六八〇年召开），主要都是讨论“神性”问题，涉及父、子、圣灵三者的关系。在不断的争论中，教会拟就各信条教义，并加以颁布，希望从此止息争端，确立真理，传予后人以为明训。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圣经并没有采用这种清除争论的方法。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光有字句，并不能传达真理，因为真理只能透过心灵去领会；真理亦不能透过人的传达去领受，必须每一个人直接去领会吸收，并按照自己内心向神的心意去取用，还须在

日常生活的争战中不断持守，这才能使人在真理中站立得稳。

有人以为教会光有圣经，仍不足为准绳，最低限度还得加上早期教会的遗传，因为圣经的正典也不过是初期教会会议订明出来的规条教训。说到这一点，当然只能指新约圣经而言。以色列人独特的民族性和与众不同的经历，使他们更易领受从上而来的启示，明了受感于圣灵而写出来的经文，并且能以百折不回的能耐去保存这些经卷。至于新约圣经，其中的教训亦非经由教会会议决定出来的，因为圣灵早已明显地把这些教训启示出来，只不过是后来再经教会会议承认，以后又为众教会所接纳。这些启示和被人接纳的真理，无论在价值方面，或所显出来的能力而言，显然都凌驾于其它非正典的著作之上；此后，在每一次与圣经的正典比较之下，这些伪经次卷总是相形见拙。一再证明正典里真理的高超。

从君士坦丁在主后三一三年颁布容忍宗教自由的谕旨开始，教会就进入历史的第二阶段。这阶段意义重大，因为教会与政府的联合作了大规模的试验。究竟教会能否依靠与政治联合来挽救自身呢？

当时罗马帝国的势力已达全盛时代。除了对神的认识暂时撇开不提之外，人类文明当时亦已达到很高的地步，但世人的痛苦却极端沉重；富人穷奢极欲，而人民大部分沦为奴隶。在公众场所所见的各种不道德的残酷的竞技表演，成为大众化的娱乐，使人日趋堕落。纵然罗马帝国表面的国势，在与四邻为敌的当儿，仍能兴盛不衰，然而罗马内部的腐败邪恶，正威胁着整个国运，使帝国难逃灭亡的命运。

当教会和世界保持分离的时候，教会就能一直为基督向世人作出有力的见证，不断地吸引通道者进入教会中。但当人的权力冒出来代替圣灵的管理时，教会就开始软弱，加上突然与国家政权由接触而连上关系，于是便开始败坏，日走下坡。教会圣职人员居然为高官厚禄而明争暗斗，甚至和政府官吏一样厚颜地争权夺利。而在教会充斥着属世的风气下，愿意入教的人都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渐渐失去当年受迫害时的纯真，日渐沦落，失去能力，无法去挽救日趋败坏的文明世界，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

意味着审判的乌云，在此时已在天际密集。在遥远的中国，因着人口向西迁移，引致匈奴(HUNS)大量外徙，横渡伏尔加河，迫近即今在苏联国土上的哥德人(GOTHs)，把他们驱赶到罗马帝国的边界。当时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亦称拜占庭(BYZANTINE)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西部则称西罗马帝国。日耳曼(GERMANS)和条顿(TEUTONS)民族亦纷纷由祖居的森林地带向外移居，他们因蒙古游牧民族由东方迫近，又睨视罗马帝国的财富，加上已洞悉帝国的脆弱，于是哥德人起来，(其时已分为东哥德(OSTROGOTHs)

和西哥德(VISIGOTHs)，与及日耳曼人(包括法兰克(FRANKS)，范鞅儿(VANDALS)、勃艮第(BURGUNDIANS)、绥威(SUEVI)、赫劳里(HERULI)等民族)，势如洪水泛滥，涌入罗马国境；不到一年，大片幅员如西班牙和高卢(SAUL)等省份，先后落入外族手中。罗马人民平日过惯了太平盛世的日子，聚居在城市中养尊处优，但一旦遭外族犯境，边境的防军竟然迅速土崩瓦解，人民惨遭城陷家毁的命运，平时从来不注重军事训练而只重文明享受的罗马人，大遭屠杀，也有被掳去给异教蛮族为奴的。主后四一〇年，罗马城被阿拉利克(ALARIC)所领导的哥德人攻陷，这名城备受蹂躏浩劫，主后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倾亡，它所管辖的大幅国土上，蛮族纷纷立国。东罗马帝国则仍苟延残喘，差不

多一千年以后，君士坦丁堡才落入回教土耳其人的手中。

在这时期出现了一位伟人——奥古士丁(AUGUSTINE) (三五四至四三〇年)，给后世留下不能磨灭的训诲。他著作甚丰。在这些著作中，尤其是在《忏悔录》一书中，他亲切地把自己生平娓娓道来，使读者感受如见其人一般。他生于努美地亚(NUMIDIA)，在著述中他详述自己幼年生活的环境、思维和感想。他母亲慕尼卡(MONICA)，为人敬虔。她为儿子的祷告、早年对儿子的期望、并后来儿子生活堕落时心里为他的忧伤、与及她对儿子至终得救的信心等等事迹，都在这些著作中跃现纸上。当时她因见异象而得以信心坚固，并得助于米兰(MILAN)主教安波罗斯(AMBROSE)的明智忠告。奥古士丁的父亲则较关心儿子的物质生活和属世享受。

奥古士丁虽然竭力要寻求亮光，本身却沉溺于放纵犯罪的生活中不能自拔。有一段时期，他以为在摩尼教中能寻得解脱，但不久便发现这派教义的弱点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思想深受安波罗斯影响，但内心始终没有平安。他年三十岁在米兰出任修辞学教师时，内心极其痛苦；他的自述如下：“我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不知怎地全身仆倒在地上，眼泪如泉涌出来，……大声哀叹说：‘我还要等多久呢？要多久呢？明日复明日？干吗不就在现在呢？为甚么不能就在这一刻除去我的污秽不洁？’当时我一面说，一面从心底痛悔地狂泣着。突然，我听到从邻居的房子里传来男孩子也许是女孩的声音，（我一时也分辨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的声音），那声音不断重复地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当时我脸上都变了色，脑海中竭力在思索孩子们在哪个游戏里唱歌时所说的这句话，但没法可以想起和这句话相似的句子。于是，我强忍着淌下来的泪水，站起来，心里开始领会这必定是从天上来的命令，要我把圣经翻开，翻到那儿就读那一节经文。……我把圣经牢牢地拿在手里，翻开了，把视线首先接触到的那一节经文，默默地读出来：‘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没有再念下去，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当我把这两节经文读完的时候，心里的感受就像有一线满了平安的亮光直射进心里一般，所有的疑惑不安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他悔改归主的经过，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乐。但那恒常为他代求的母亲，却全不感到意外。一年以后，他们母子两人返回非洲，不久他母亲亦安然去世。三八七年，米兰主教安波罗斯为他施浸；三九五年，他出任北非洲希坡(HIPPO)即今之波拿(BONA)教会的主教。后来他因西罗马帝国的沦亡而写成那本名著《神的城》(CITY OF GOD)，该书的全名标志了该书的主旨：“世上最大的名城虽倾亡，神的城却永存。”但可惜他对神的城的看法，引出了其它错误的教训，造成了无法形容的遗毒，而他的盛名竟使这些谬误造成更深的祸害；他的看法，比其它作出同样谬论的人的见解更激烈，极力主张救恩纯然出于教会，人得救亦只能靠各种圣礼。这种谬论，把救恩从基督手中挪移到人的手中，又在罪人与基督之间强插进人为的制度，这实在刚好与救恩的福音背道而驰。基督说过：“到我这里来。”不论神父或教会，都无权从中干预。

奥古士丁为教会合一大发热心，不能容忍任何在形式上的分歧或教义上的差异，结果反而忽略了教会那属灵活泼而不能摧毁的合一性质，没有认识到所有分享神的生命的信徒，因得救重生而联于基督的身体这个事实，因此他无法领会神的众教会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个别教会可以直接与主及圣灵连系，同时亦与其它教会彼此有交通。事实上，各教会亦可能因人的软弱，在圣经真理的了解和实践上有各种程度上的不同的领会；对于这些事实，他也无法接受。

他既然认为教会是个地上的组织，为了要顾全它的完整性，便不惜采用各种外在及物质的方式，甚至用强迫的手段，来维持这个眼见外在的合一。他在和多纳徒教派争辩时，曾经这样说过：“人因教导受吸引来敬拜神，当然远比那些因惧怕刑罚或痛苦而被迫归信的好得多。但是，虽然前者远比后者优胜，却不等于就此可以放弃后者那批人。事实上，有不少人起初都是出于恐惧和痛苦才来亲就主。（我们有过这种事实的验证，而且这种事实天天在发生），以后他们才因受教导而慢慢改变，进而在行为上活出他们所学习的真道。虽然那因受主爱吸引而归信的会较理想，但事实上因惧怕而信主的人数更多。有谁比基督更爱我们呢？祂曾为羊舍命。但祂用话语呼召了彼得和其它使徒以后，当祂呼召保罗时，……祂不但开口拦阻他，还甚至用大能把他推倒在地上；为了要强迫这个正在不信的黑暗中疯狂迫害信徒的人来找寻心灵中的亮光，祂甚至不惜弄瞎他的眼睛。既然如此，教会为何不能用武力来使丧失的人归回呢？”

这样的教导，出自这么一位权威的口中，很快就促成罗马天主教会不惜采用高压迫害手段来引人入教的作风；这些手段的残忍程度，不下于昔日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就这样，一位充满强烈感情、对人温柔同情的人，一旦离开了圣经真理，尽管用心良苦，到头来就给牵连到这项影响广大、冷酷无情的迫害运动中去。

和奥古士丁始终格格不入的，有伯拉纠(PELAGIUS)。他出生于不列颠岛，五世纪初叶前往罗马，那时他年不过三十。他虽然身为平信徒，却被人公认为满有能力的圣经学者。他为人严谨正直：虽然奥古士丁后来成为他在教义争辩上的死对头，也不得不承认他为人严谨正直。以后耶柔米(JEROME)所发表诋毁他的报导，看来并不全然根据事实，倒是受当年彼此激辩、争持不下的影响因素居多。伯拉纠在罗马认识了色勒斯丢(CELESTINUS)，后者成为拥戴他的教训的最活跃份子。伯拉纠提倡改革。当时不少自认基督徒的人，生活放荡不羁，他深以为憾，极为伤痛，因此竭力主张实行公义和圣洁的生活。

他过份强调公义和圣洁，反而令他只着重人意志上的自由，而忽略了圣灵恩惠的运行。他认为除非人效法亚当所为，否则不会受亚当犯罪的影响。他认为亚当就算没有犯罪，总归还是要死亡的；他又认定没有所谓原罪：每人所作的事，都基于自己的抉择，因此人可能绝对的公义。他又主张婴儿出生时，并没有带着罪，与天主教的见解，适得其反；他也主张为婴儿施洗，但否认这是令婴儿重生的方法，只下过是能使婴儿进入蒙恩的地位，得以进入天国，并因此可以得救重生、甚至成圣，和基督联合。奥古士丁为了反对这种论调，曾在聚会中宣读了一段引自一百五十年前居普良的著作中的教训，指出婴儿必须受洗，才能使罪得赦；他因此呼吁伯拉纠放弃这种基本上与教会教义和实践相抵触的见解。伯拉纠在祈祷时，从来不说“赦免我们的罪”，认为这句话与基督徒身份不相称，因为他认为基督徒无必要犯罪。假如我们犯罪，那只不过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和拣选；所以如果祈祷时说这句话，就等于是假谦卑。

奥古士丁为了伯拉纠和色勒斯丢所持的见解，和自己所见大大冲突，而且影响所及渐渐扩大，于是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去谋求对策，出版了不少著述，教会亦召开了不少次会议。东方天主教会宣称伯拉纠并没有犯错误，但西方天主教会因受奥古士丁的影响，直斥其非，当时西方天主教会，对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两者间的关系的探讨，比东方天主教会较易接受一些肯定但武断的定义，这一点明显

地也是深受奥古士丁的影响所致。当时天主教会向罗马教皇英诺森(INNOCENT)请命，英诺森正乐得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威，于是宣布把伯拉纠和他的追随者逐出教会。但不久以后，他的后继人佐息末(ZOZIMUS)教皇，又恢复他们的地位。后来西方教会主教们在迦太基开会，赢得了政府的支持，结果把伯拉纠及他的追随者驱逐出境，又没收他们的家产，此时教皇佐息末望风转舵，随而宣布他们的罪名。但其中有十八位意大利的主教，拒绝附从这项谕旨，其中有一位益格兰南(ECLANUM)的主教祖利安(JULIAN)，以非常冷静的态度，有力地继续和奥古士丁辩论，指出借助武力，又利用教皇改变主意的时机，去消弭教义上的争论，决非善策。

伯拉纠所教导的，内容多属真实和有益的，可惜他的基本教义基本上与圣经真理有违，而且亦与人的天性不合。人根本上自知本性堕落败坏，被罪恶所捆绑，现实的生活更将此显明出来。我们分享了一人（就是首先的亚当）的生命和本质，也就分承了他的罪，和他一样受死亡的辖制，因此我们亦可以因着各人的拣选和信赖，真正联于另一人，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而藉此分享他的永生和属天的性情。

最初三百年的教会历史，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任何一种属地的权势，可以摧毁教会；亦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从外面攻击教会而令她崩溃。不少目睹基督徒受苦的人，甚至亲自迫害基督徒的人，后来都归信基督。教会不断壮大，远胜过世人所给她的伤害。接踵而来的二百年，教会与政府联合。教会虽然掌握了强大帝国的实力，却不能把日趋灭亡的国家挽救回来。“教会”这名字的意思，正是“从世人中呼召出来”，分别出来，归于基督。因此当教会一旦放弃了这个地位的时候，她就失去了因顺服基督而得来的能力，换来归地的权势，而自取败坏。

基督教会不但要忍受外来暴力的残害，和属地权势的吸引，还要抗拒异端教训的侵蚀。自第三世纪至五世纪期间，兴起了以下四种异端，它们的本质对基本真理影响至大，直至现在不但不少教会仍深受其影响，且亦波及世人。

(一)摩尼教派对圣经的教训，和宇宙万物明明显出神是创造主宰这两点真理，一并加以抨击。但圣经开章明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1:1）。又说：“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创 1:27），显示人是在神所创造的一切中为首。神察看了一切被造之物以后，便说：“一切……都甚好”（创 1:31）。摩尼教却把一切肉眼可见的属物质的创造，推说是出于一种黑暗邪恶的势力，认为只有属灵的一切，才是出于真神，这一点说法，直接攻击圣灵启示的根源，包括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和主的救赎，这一连串的事实，都是基本而又不能分割的真理。由于这一点对人肉身的错误认识，一方面产生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认定肉身邪恶，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因为认为人的肉身尤如其它动物的身躯，只能作出卑劣的行为，就否定了人属灵的本质，也否定了人能被挽回，恢复与神儿子的模样相像的可能性。

(二)圣灵荣耀的启示的极峰，就是指出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中显现，成为人的样式，使人认识祂。又因着祂牺牲受死，为世人赎罪，使人与神和好。但亚流主义的主张，却否认基督的神性，认为基督不过也是被造的，虽然是首先的及最高的被造，却始终是被造之物。这样的见解，只有使人无从亲近神，无从认识耶稣作为救主，结果人就只剩下虚渺的祈望，指望有一天能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品格。

(三)伯拉纠学说，否认圣经中论及世人都给圈在亚当的罪过中的启示。他认为亚当的罪的影响，只涉及他本人和他与神的关系，又认为人出生时原本都没有罪。这么一说，就把人急需一位救主的必要

性大大削弱了，也拦阻了人真正的认识自己，令人以为可以靠自己得救。事实上，从圣经中可见：认识自己在人的堕落上有份，是与人在基督（末后的亚当）的救赎大功上可以有份的这个事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然也强调个人的责任和自由意志，但不等于就不提及神的旨意和世人密切的关连，这两者必须相提并重。这样，既然世人都被定罪，也就同被圈在救恩里。

(四)祭司僧侣制度，引致一种歪风，就是认定人只能在教会内凭神甫所施的圣礼下才能得着救恩，这里所说的教会，当然是指罗马天主教而言。但在许多其它组织内，或多或少也有这种观念，以前如是，现在也如是。事实上，主和使徒们的教导是再清楚不过地坚定指出：罪人得救，全在乎他对神儿子的信靠，相信祂替死赎罪，而且从死里复活。若有教会或团体认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有救恩；若有人僭称拥有接纳人入天国或把人驱出天国的权柄；又如果自己认定某种圣礼方式才是得救之道；这一切一切谬论，都给人带来了说不尽的灾害，掩蔽了那向所有世人敞开的，通到基督救恩的真正途径；这途径原是只要人凭信心就可以进入的。

教会在属灵方面日渐衰败，远离新约圣经教会的样式，必然的趋向世俗化，随从世界的样式，纵容罪恶，结果不但引起了多次的改革，信徒另外建立教会，例如当年的孟他尼主义和多纳徒教派等；同时亦令不少追求圣洁和爱慕与神相交的信徒，相继自动的离开了天主教会，不再与他们有交往。当时欧洲各地正惨遭蛮族蹂躏，教会又失去了向世人应有的见证，这些爱主的信徒，不能维持每日与神正常的交通，亦无法与众教会的圣徒相交，结果他们只好远走旷野，过隐居的生活，期望能脱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扰和引诱，借着安静默想，以求达到心灵内所渴求的与神面对面的相交。他们深受当时流行的“物质尽恶”这观念所影响，所以主张生活极度简单，实行禁欲，以期克服因肉身的限制而得不着属灵丰盛生命的种种拦阻。

第四世纪时，埃及的隐士安多尼(ANHONY)因离世独居而出了名，许多人纷纷效尤，还搬到他住的地方附近蜗居，学习他那种生活方式，还请求他为众人定下一些生活准则。隐居者人数日增，其中有些自律甚严，有一位西免施泰拉(SIMEONSTYLITES)，就因在一根柱子的顶上独居了多年而名留后世。隐士的风气不久又引起另一种新运动：在埃及南部，帕科缪斯(PACHOMIUS)在四世纪初期创立了寺院，凡愿离世隐居的人，一起聚居，不再个人单独行动。这种寺院生活，在东西方教会蔓延开去，不久就成为当时社会生活里相当重要的一面。到了六世纪初叶，意大利努西亚(NURSIA)的本尼狄(BENEDICT)，大力推行这种运动，而他给寺院生活所立下的规矩，比其它人所立的更具影响力。他指令僧侣们减少对克苦己身的注重，而把精力转移至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和服务人群方面，尤重农事。七、八世纪期间，基督教得以传遍条顿族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本尼狄派的寺院兴起。同时，爱尔兰的科伦宾(COLUMBAN)寺院，也差遣了传教士，取道爱安拿岛和苏格兰，进入欧洲北部及中部。

当罗马的主教们垄断了天主教会内的大权，且正在与属地的权势互相勾心斗角之际，那些属灵追求亲近神，亟欲过圣洁生活的人，就渐渐被寺院生活所吸引。可惜寺院究竟不是教会，与新约教会的样式相去太远，因此虽然这些人被迫离开属世的罗马天主教，加入寺院修道，但在那儿，他们仍然找不到真正的教会，反而多受了一重组织的捆绑，经历不到圣灵自由运行的工作。

各种不同的寺院僧侣组织的发展经过大致相同：起初修道者都自甘淡泊，克己禁欲，但慢慢地他们富裕起来，渐渐拥有势力以后，纪律性就松懈了，开始过放纵的生活，贪爱世界，渐渐成了歪风。

有人就离开寺院，自立门户，决心绝对克己，自甘卑微，但不久也重蹈覆辙。从事这种改革的人中，有十世纪初期在克吕尼(CLUNY)地方的伯尔拿(BERZARD)，和十一世纪中在西托薛(CITEAUX)的司提反哈定(STEPHENHARDING)。贝拿达早期在西托薛的雪司突西安(CISTERCIAN)寺院内修道，后来被按立为克雷华(CLAIRVAUX)寺院的主持。当时的君王和主教，都深受他的影响。但留存更长远的，是他所写的几首圣诗。

当时亦有不少妇女在女修道院内避世而居。在那一段黑暗混乱的时期，这些宗教组织，就成为那些软弱的人之避难所，也是在蛮族侵入下，学术和古籍得以保存的地方，圣经书卷也在此被人抄缮、翻译及念诵。但在修道院中，人变得终日无所事事，并且更落在教皇手中，被他利用，逼迫那些企图把神的众教会恢复原来应有的样式的信徒。

新约教会渐渐由原来的样式，改变成为一种组织，面目全非，几乎叫人难以追溯到当日使徒时代的样式，情势看来似乎这种改变可能继续下去，直至不可收拾。当时想凭借主教和神甫以挽救教会从分裂的危险和异端中回转的努力，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引起不少恶劣的后果。原来以为可以借着与政府联合，帮助那些受迫害的教会，但这些希望亦告幻灭。寺院制度的兴起，要替代教会的地位作为逃避世俗的避难所，结果也是不成功，寺院本身也受了世俗污染。但是，在那时还存留了一样东西，叫人藉此得以在灵里复苏的，这就是一一圣经。圣灵借着圣经，大有能力地运行在人心内，攻破一切谬论，领人回归真道。同时真正的教会，一直维持聚会，以圣经为信心及信仰的依归，也是个人行为 and 教会秩序的准则。这些真正的教会，虽然是隐藏不露，不为人所见，亦未受重视，但所引出来的影响，至终结出了果子。

在当时的混乱世代，传福音的活动不但没有中止，反而日益蓬勃。传教士既热心，亦忠心耿耿。事实上，在十一世纪十字军兴起，激动起天主教国家的热心之前，基督教的见证，一直未有中断，而且更把那些蛮族征服者慢慢感化过来，将基督的真理，远扬各地。聂斯托利派(NESTORIAN)（即景教，译者按），教士的足迹，远及中国及西伯利亚，并且建立教会，遍布撒马尔罕至锡兰一带。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希腊教士，经过保加利亚，并深入俄罗斯国境；而从英国及罗马各地教会来的教士，则纷纷往中欧及北欧传道。在北非及西亚，信奉基督的人，比今日的还要多。

但是，最可惜的，是传教士们的工作也蒙上了各人信仰上的各种谬误的色彩。昔日纯粹传扬基督、建立教会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教会中虽仍保留一部份真理，但也掺杂了对礼仪和律法的墨守成规。当君主皈依基督教时，在政教合一的原则下，大量人民被迫皈依各种新国教，还要参加那些以罗马或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庞大宗教组织；不像以往的情况，信徒在各城各乡自立教会，直接联于基督，不受任何中央组织的控制，正如使徒时代的情况一样。这种转变影响所及的范围，无远弗届，甚至祸及个人。罪人不再是给引到基督面前来，学习以圣经的教导为准则，而是被迫加入由外国传入的宗教公会组织，不然就是转向那些外国差会求助，结果在信徒中间圣灵恩赐的显明大受拦阻，而他们向本国同胞传福音的工作，也受到抑制。

此外，有一股传福音的活动，比以罗马为中心的传教活动更为纯全。这活动发源于爱尔兰，经苏格兰，开展至欧洲北部及中部。远自第三、四世纪，首先由商贾及军人，把福音传到爱尔兰；到了第六世纪，爱尔兰奉基督教为国教，传福音工作亦已由北海及波罗的海峡，传到康士坦思湖（即今瑞士

北部，译者按)。

从爱尔兰来的修道士，要觅地避世而居，于是在爱尔兰及苏格兰之间的岛屿上，设立了寺院；其中有爱安拿岛(IONA)，众称“圣徒岛”，正是科伦巴(COLUMBA)隐居之地。传教士自这岛出发前刚往苏格兰。后来这些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僧侣，到英国各地传教，还横渡海峡，到欧洲大陆向异教徒传道。

他们传教的方式一般是这样：传教士到了某地，如果认为合宜，便动手建造村舍。村落中心是一座用木料盖造的简陋教堂，周围盖课室和僧侣们住宿的茅舍。僧侣们一身兼数职：盖房子、传道、教书。如果有需要的话，在这中心四周，也为学生们盖房子，使他们安心读书；以后，学生们的家人，也会陆续迁来聚居。整条村落用墙围起来，但居民的活动范围，往往展伸至墙外。僧侣们出外传教时，十二人成为一组，由一位主持率领，分往四方开辟福音工厂。留居村落的，便负起教学任务。当他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时，便着手翻译那份圣经，誊写下来，也编写诗歌教导学生们唱。僧侣们可自由决定成家立室，但大多数宁愿独身，方便工作。有人归信以后，传教士从他们当中挑选有才干有作为的青年加以训练，尤重手艺技术和语文学习；也教导圣经，教他们如何向人讲解，使他们能在同胞中层开传福音的工作。信主的人，通常要等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导，且能表现坚稳的信心以后，才能受浸。传教士都避免抨击当地人民的异教信仰，宁愿专一宣扬真理；他们认为这样作，效果要远胜于给异教徒揭疮疤。他们承认圣经是信仰和生命的根源，亦传扬因信称义的真道。他们不过问政治，也不向政府求助。这些活动的基础和开展，虽然在某些方面与新约的教导和使徒时代的样式有异，但他们却能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自成一家，而且在某些重要的教义上，也与罗马天主教会所主张的，大不相同。

在公元五九六年，罗马教皇贵钩利一世(GREGORY I)，差遣奥古士丁和四十位本尼狄派僧侣，前往根德(KENT)，向英国的异教徒传教，成绩十分美满；但不久就和原来在该地旧有的传教团体发生冲突。教皇封立奥古士丁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全权统管全英国的主教，包括在该地原来的那一批，于是引起冲突；但这场冲突，因为加上了民族因素，更形复杂。不列颠人，凯尔特人(CELTS)和韦尔斯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罗马天主教会坚持该国境内只能容许罗马控制的系统存在，但不列颠派的教会，坚决反抗，到了十三世纪，这些份子才被吸收入罗拉德(LOLLARD)运动潮流中。

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传教士，在欧洲大陆的传教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也遭遇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攻击。当时由一位来自英国的本尼狄派教士波尼法修(BONIFACE)发起攻击，主张强迫所有在英国传教的教士们服从罗马教皇，并指出最低限度表面上也要做到这一点，否则要被除灭。他受了罗马的指派，又取得政府的协助，开始进行他的阴谋，但在主后七五五年他为法勒斯人(FRIESIANS)所杀害；他所发动的行动，慢慢消灭了早期的传教团体，结果却反而更坚固了不少接踵而来的改革运动。

约在主后八三〇年左右，出现了一本四福音合编，书名叫海利晏(HELIAND)，(意思就是“救主”)，是一本押头韵的史诗作品，用古撒克逊文字写成，显然是出于欧洲大陆上不列颠派传教士的手笔。书中内容，是把福音书的记载，以一种为当地居民易于接受的文体写成。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对圣母马利亚和众圣徒的敬拜，也没有当时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的其它特色。

在四世纪中叶，兴起了一位改革者；他所提倡的改革运动，在西班牙影响至大，且及于路西坦尼

亚(LUSITANIA) (即今葡萄牙) 和法国的阿奎坦尼亚(AQUITANIA), 甚至波及罗马。

培利司里安(PRISCILLIAN), 是个有钱有地位的西班牙人, 他满腹经纶, 能言善辩, 成就非凡。他也像其它同阶级的知识分子一般, 无法接受旧社会的异教信仰, 但亦未受基督教所吸引。他宁愿研读经典古籍, 却雅不欲翻阅圣经, 所以曾经尝试在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中, 诸如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和摩尼教义等寻求心灵的慰藉。后来他结果归信了基督, 受浸以后, 开始过奉献给神的生活, 远离世俗, 热心钻研圣经, 爱慕神的话语, 过严谨克己的生活, 务使己身成为更合乎圣灵内住的居所, 与基督更紧密地联合。他虽然身为平信徒, 却常常讲道, 殷勤教导人, 不久更成立聚会地方, 经常聚会, 教导信徒在行为上活出信仰的实际, 吸引了不少人加入, 尤以知识分子为甚。后来他成为阿维勒(AVILA)的主教; 但不久他遭受一部份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们的敌视, 其中为首的是路西坦尼亚城的赫德修斯(HYDATIUS)。主后三八〇年, 在西泽奥古斯德(CAESARAUGUSTA) (即撒拉哥沙SARAGOSSA) 举行的圣教会议中, 控诉培利司里安奉行摩尼教和诺斯底主义等异端, 但过程并不顺利, 此次以无结果而告终。到了罗马皇帝马塞麦斯(MAXIMUS)的时候, 他因谋杀了格拉齐安(GRATIAN)而篡位, 极力拉拢西班牙天主教的教士们; 因而到了三八四年, 在勃迪加拉(BURDGALA) (即波尔多BORDEAUX) 举行的圣教会议中, 声名狼藉的益太古司(ITHACUS)主教, 加入抨击、控告培利司里安和跟随他的人——(他们给人家起了个“培利司里安主义者”的名号)——指他们行法术和有伤风化的事, 于是被控的人, 给带去直里维斯(TREVES) (即直拉亚 TRIER) 受审, 被教会定了罪名, 交由地方政权执行处决 (三八五年)。当时有几位著名的主教, 如都尔 TOURS 的马丁和米兰的安波罗斯, 群起极力抗议无效。培利司里安和其它六人被斩首示众, 其中包括一位声誉出众的贵妇欧曹鲁思亚(EUCHROTIA), 是一位已故著名诗人和演说家的遗孀。这是天主教会第一次公开迫害基督徒的事例, 以后各地纷纷效尤。此事发生以后, 马丁和安波罗斯拒绝与赫德修斯和其它有份参与迫害的主教们来往。到了马塞麦斯皇帝倒台以后, 众人对这次迫害信徒的行动, 都感到痛心疾首, 而益太古司亦因此被免除了主教的职位。培利司里安和他的同工们的尸首, 亦给运返西班牙安葬, 且被奉为烈士。但无论如何, 当时直里维斯圣教会议表示同意这事件的执行, 等于是正式批准罗马教会迫害信徒。一百七十六年以后, 伯勒格(BRAGA)会议更进一步肯定了天主教会处决这些所谓培利司里安主义者的事实, 还指斥培利司里安和与他持定同样信仰的人奉行摩尼教和诺斯底主义异端, 行为不当, 作为史实记录在案, 以后几百年相传下来, 为一般人所公认。

虽然培利司里安著作颇丰, 但一般人认为这些著作均已失传, 因为当时天主教会烧毁了他的作品, 不遗余力。但在一八八六年, 乔治雪比氏(GEORGSCHPESS)在武殊堡(WURZGURG)大学的图书馆, 发现了十一篇他的著作, “藏在一本珍贵的安色尔字体(UNCIAL)手稿内, ……一直未被人发现。” 这些作品都是用古拉丁文写成, 是现存已知的最古老的拉丁文手稿。该份手稿共有十一篇短文, (其中部份残缺), 头四篇详细记载当时他受审的经过, 其它七篇就都是他本人的著述。从这些短文所见, 相传下来有关培利司里安的评论, 实在全不正确。他的为人事实上十分敬虔, 教训亦无懈可击。他热心致力改革, 而和他一起聚会的人, 都是真诚忠心跟随基督的信徒。当时天主教会把他们或杀害, 或放逐、或将他们的家业充公, 还嫌不足, 竟仍要不断诋毁中伤他们, 使他们遗臭万年。

培利司里安的写作手法活泼生动, 报导详尽, 经常引用圣经支持他的论调, 无疑地他熟念新旧约

圣经，但他并不反对基督徒阅读其它经卷记载，因此有人诋毁他，指他把伪经也纳入圣经的正典内，其实他并没有这样作。他为自己和同工们辩护，解释为何在查经聚会中，平信徒和妇女们都可以参与交通分享；他也解释为何要反对与玩世不恭和恋慕世界的人一同守主的晚餐。对他来说，教会中一些对神学问题的争论，意义不大。他本人深识神的恩赐，用活泼的信心接受下来，所以从不辩论有关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理，他认为只要认识在基督里可以藉圣灵得着那位唯一的真神，那就够了。他教导人说：救赎的目的，是叫我们归回转向神，因此人必须极力远离世界，否则与神的交通就会受阻；不错，教会负责向人宣扬忏悔之道，给人施浸，传讲神的话语和命令，但是信徒本身，每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自己相信并接受。假如信徒和基督的交通断绝，信徒本人必须悔改，才能恢复与主的交通。他指出：没有任何人是预定承受某种特殊的恩赐，每一位平信徒都可以接受圣灵，与圣品人所接受的无异。他评论摩尼教派的谬误；他那些根据圣经写出来的著作，亦与摩尼教谬论大相径庭。他又认为禁欲本身并不重要，只不过为了人可以与神及基督完全联合，人的肉身就必须接受节制，因为身体是圣灵内住的居所；如此，人才能在基督里享受安息，经历圣灵的大爱和引领，这实在是永不朽坏的无比福气。神已经把自己彰显出来，信祂的，必须是出自个人信心的行动，包括把他自己整个生命和一切，都投靠在神里面；有了信心，好的行为就随之而来，因为信徒接受了新的生命以后，在他里面就有了行善的德性。圣经不仅是历史性的真理，同时也是得恩惠的途径。人的灵以圣经为食粮，所以人能从其中发掘出所蕴藏的启示、教导和对日常生活的指引。人要明白圣经中的比喻含意，无须先受任何技术训练，只要凭信心就成。旧约圣经指着弥赛亚所写的话，和新约圣经一切历史记载，都不是为了人的知识而写的，而是指出所有圣徒，（不是单指一部份圣徒），都必须全然成圣。

就是因为以上的教训，就引起了与罗马大主教会的冲突，尤其是在当时天主教教会里为首的正是那诡计多端、好弄权术的赫德修斯主教。那些教士们，认为平信徒所活出的圣洁生活，会构成对他们本身特殊地位的威胁；他们自称是“使徒的传人”，享有祭司职份的特权；而培利司里安极力主张信徒要圣洁，藉圣灵与神相交，不断叫生命更新；这种教训，会使教士们的特权地位大受动摇，而他们和平信徒间的分野就会消失，对他们本身大为不利，尤其是在圣礼的魔力被攻破以后，代之而兴的是因信而活活泼泼地得着救恩这事实。

这两批人中间的分裂，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基本上大家对教会的见解截然不同。问题已不仅限于要压制不同见解的聚会，或反对一种脱离罗马天主教而独立的教士体系，而是主要的症结在于彼此在原则上的完全分歧。赫德修斯主教的政策，重在加强代表罗马教廷的大主教区的权力，目的在促成以罗马为中心的组织系统；但当时西班牙教会，并不欢迎这种组织制度，有部份名声不大的主教们，更极力反对，培利司里安那批人的主张，在原则上正好与这种以罗马为中心的制度背道而驰；他们专心研读圣经，在凡事上完全信赖圣经的指引，因此他们所致力，是个别教会的独立；他们就是依照这原则去实行的。

培利司里安和他的同工们受害以后，追随他的信念的那些人的小圈子，迅速扩大，信徒日益加添。可是基督徒受迫害的事件迭起，都尔的马丁主教虽然协助抑制了这些迫害，但逼迫并不因此终止，反而变本加厉。一直在二百年以后，持守培利司里安教导的聚会，才逐渐星散。

第三章 保罗派和波各米勒派

公元50——一四七三年

教士权势增长——初期教会坚守信仰——初期教会历史文献被毁——小亚细亚的初期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时代小亚细亚的早期教会——被敌对者诬为摩尼教派——保罗派(PAULICIAN)和桑历克(THONRAK)——新约教会的延续——康斯坦丁西拉(CONSTIAN SILVANUS)——西缅提多(SIMEON TITUS)——敬奉古物和崇拜圣像——反对崇拜圣像的君皇——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希腊天主教恢复圣像崇拜——法兰免福会议(COUNNIL OF FRANKEURT)——突伦主教克劳底斯(CLAUDIUS BISHOP OF TURIN)——伊斯兰教(或称回教)——森伯(SEMBAT)——士求(SERGIUS)——小亚细亚众教会的领袖——提阿多拉(THEODORA)时期的迫害——《真理之钥》——卡备斯(CARBEAS)和屈梭卓(CHRYSOCHEIR)——圣经与可兰经——小亚细亚教会的特色——信徒由亚洲迁移至欧洲——保加利亚教会的后期历史——波各米勒派(BOGOMILS)——比绍(BASIL)——对保罗派和波各米勒派的意见——波各米勒派传入波斯尼亚(BOSNIA)——古林宾(KULIN BAN)与罗马——波各米勒派与海外信徒的交往——敌人入侵波斯尼亚——回教徒进侵——波各米勒派受逼迫——土耳其人侵占波斯尼亚——在波斯尼亚的“神之友”(FRIENDS OF GOD)教派成为托勒斯山脉和亚尔卑所山脉间的一环——波各米勒派信徒的墓地

跟随主的信徒，一直认定教会与政府的联合违反主的教训。但教会一旦掌握了左右政府的权力，就不惜向一切与自己的政策相左、或反抗教会命令的敌对者，施以高压手段，迫令他们归顺。许多人或是出于无奈，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恐惧，都只好作出表面上的依顺，可是，有一群信徒始终不为利诱，亦不为势所迫，一直忠心跟随基督，坚守他的吩咐和使徒的教训；这些信徒就成了不断受迫害的对象。

君士坦丁时代以后，接着的几百年历史，暴露了东方和西方的天主教会教士的腐化；他们渐趋世俗，野心毕露，竭力要完全控制人的一切所有和人的良知，为此不惜诉诸武力，并用各样诡计以求达到目的。这段历史，给我们看到无数圣徒在不同地区受到这个极权的大公教会残害，他们走上满了苦难的路途，宁愿受迫害，也不肯否认基督，坚决不肯背弃主。

这些信徒的史实记录，已被迫害他们的人倾其全力，千方百计的加以毁灭，而他们的著述，也和作者本身同时遭到毁灭的命运。非但如此，那些定意造谣诋毁信徒来表示自己清白的人，更捏造出各种史料，歪曲事实。在这些史料中，信徒给形容为旁门左道之上，信奉异端邪说；其实事情正好相反，这些异端邪说正是信徒们所极力反对的。信徒又被诬称为“异教派”，还加上各种名号，都是他们本身所不能接受的。他们通常自称为基督徒、或弟兄，但其它的人故意给他们加上各种不同的称呼，目的是要扰人视听，使人以为他们代表许多不同的新奇教派，互不相干；还给他们冠以种种可耻不雅的名称，目的在使他们声名狼藉。因此，若要追溯这些信徒的过去历史，实非易事。他们的仇敌所写的资料，不能尽信；他们在酷刑下被迫供出来的供词，亦毫无历史价值。但尽管有这许多的困难，在不断的发掘考证下，积存下来可用并可信的数据仍然甚为可观。我们由此得知他们的为人，事迹，信仰和

教训。这些记录才是可靠的指南，说明我们去探讨他们的信心和生活。

在公元后最初三个世纪内，早已有不少的基督徒团体，对当时教会内部的道德堕落和贪恋世界的趋势，表示不满，并抗议教会日渐远离圣经的原则。结果复兴运动迭起。虽然有时各次运动之间彼此并无显著的关联，但推动这些运动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回复实践新约圣经真理的心志。打从最早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运动多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一带孕发，而从起初就坚守纯正信仰和敬虔生活的教会，也都在这些地区寻求庇护。

最早的时候，福音由安提阿向北方传扬出去。使徒巴拿巴和保罗，并许多其它的使徒，都曾小亚细亚一带传道并建立教会。从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的记载中，可见当时使徒的教训，给这些初期教会带来有力的启发和净化，亦可看见当时教会所必须反抗的一些对立论调的势力是如何利害。天主教系统中（亦可称为“大主教”，因它自认为唯一的总教会）的教士权势，虽然亦在当地迅速膨胀，但反对天主教的信徒，从没有终止过活动。第三世纪时，亚美尼亚国预期君士坦丁大帝必定施行政教合一，于是宣布采用基督教为国教；但持定新约圣经原则的教会，却仍能继续存留下去。

打从摩尼的时期开始，不少教会的信徒，为了与罗马天主教徒分别出来，称自己为基督徒，他们一直被人诬为摩尼教派；但这些信徒极力否认，更指出他们根本反对摩尼教派的主张。别人虽然不停地如此指斥信徒，但是反复的指斥，并不等于是事实，尤其是因为这些基督徒遗下的著述，都丝毫不带摩尼教派的色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并非奉行摩尼教。这些信徒不但不接受别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名号，个别来说，他们叫自己是“基督徒”或“弟兄”，而整体来说，则是“主耶稣基督的圣洁的普世使徒教会”。当属世的教会——无论是希腊的、罗马的，或者是亚美尼亚的——离开圣经原则的趋势愈来愈明显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就索性不称它们为教会，指出：它们与政府联合、因接受婴儿受洗而容纳了不信的人、接纳不信的人一同守主的晚餐、还有其它种种谬误；这一切的弊端使他们已老早失去教会的地位。基督徒的聚会给人称为保罗派(PAULICIAN)的原因不明；也有人因为在桑历克(THONRAK)曾有不少基督徒聚居，而以该地的地名称之。这些基督徒屡受迫害，有关他们的记载，亦曾受到有计划的破坏，因此能存留至今的文献，可算凤毛麟角。但是，这些幸存的数据，已足以证明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一带，及亚拉腊山四周和幼发拉底河以北的一大片广阔地区内，当时确实有受浸的信徒的教会存在，他们都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信徒，遵守使徒从基督领受的教训和圣经内一切的教导。他们的见证，从起初就一直未曾中断过。

这些为数不少的基督徒聚会，都自称是使徒时期教会的真正继承者，虽然我们目前只拥有部份残缺的史料，但这一点事实，并不会因此而不能成立。（所谓继承者的意思，不一定是指父传子那种血统的关系，虽然有时或有此可能性。所谓“继承者”真正的意义，是指属灵特色的延续。）当年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国家天主教会，决心把基督徒和有关的史料，全部消灭，因此现存资料自然是残缺不全了。这些破坏，大部份已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许多地区内，在不同的时期中，这些破坏的行动显然已达到目的，因为这些圣徒和教会的珍贵见证，都已给全部毁灭，我们只能等到审判的日子，才可以获悉真相。然而，叫 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不少史料仍给保存下来。这许多一心遵守初期教会教训的基督徒，所以能存在的原因，不外是一如他们自己所提出来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他们坚守新约圣经的教训，绝不偏离。他们中间并没有任何组织的形式，也没有任何属地的控制中心；他们只承

认每个聚会的独立性，因此不免引致各地教会间的一些分歧。又因为各时代在他们当中的杰出的领袖，各有不同的特殊作风，以致不同时代的教会，在属灵气质上或某些强调的教训上，亦各有差异。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直接从圣经领受教导，而且继续使徒的遗风。我们既找不到驳斥他们的充份理由，又不能证明上述的事实有何谬误，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这些事实了。

留存下来的史料中，曾经记载一些周游各地专一传福音，并探望及坚固各地教会的信徒，他们都大有使徒之风，刚强、忍耐、谦卑、和满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其中有一位叫康斯坦丁，后来改名叫西拉(SILVANUS)，在主后六五三年，有一名亚美尼亚人，曾被撒拉逊(SARACENS)人掳去囚禁后获释，返家途中，在康斯坦丁家中受到热情的接待。那名亚美尼亚人颇擅观察，从交谈中，深知康斯坦丁才识过人；既见他对两人一齐翻阅的圣经深感兴趣，为了表示谢意，这位眼光远大的过路客，在将要离开的时候，就把这份珍贵的礼物赠予家主，就是一本载有四福音和保罗书信的圣经。康斯坦丁专心研读这本圣经，孜孜不倦，至终使他里面的生命起了剧烈的变化。不久他就开始为他所领受的真理，到处作见证，改名叫西拉，就是使徒保罗同工的名字，又加入了当时的一处聚会，是拒绝敬拜圣像和源出于拜占庭教会的一切迷信的，因而引起当地掌权人士的愤怒。他当时在亚美尼亚的基波沙(KIBOSSA)居住，向周围各地的人民传道，三十年之久，引领不少人归信主，其中包括有原来信奉天主教的人，还有异教徒。他传道的脚踪，远及幼发拉底河平原一带，更越过托勒斯山脉，深入小亚细亚西部，影响至大，连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博各纳德司(CONSTANTINE POGONATUS)也注意到他的活动了。

六八四年，拜占庭皇帝下谕旨，攻击这些信徒的聚会，还指名道姓的抨击康斯坦丁，派出一名叫西缅(SIMEON)的官员去执行死刑。当时为了要突出迫害康斯坦丁的事例，西缅特地吩咐给康斯坦丁几名较亲密的朋友，每人一些石头，命令他们用石子打他们所敬爱的老师；但这些人宁死也不肯这样作，还把石头统统扔在地上。但其中有一个青年人，素来是康斯坦丁所特别疼爱的，还收了他作干儿子，名鸣乍得斯(GUSTUS)；他把石子掷到康斯坦丁身上，把他打死，一时极得统治当局的称许和赞赏，把这件事大肆渲染比作大卫杀死歌利亚一般的轰动。然而当时殉难的情景，使那行刑官西缅大受感动。他后来和基波沙的信徒交谈，大为折服，深信这些信徒的信仰，果真是真理，他们的行为，也中规蹈矩。后来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在宫廷中继续任职，但内心一直没有平安。经过三年内心的挣扎，结果决心放下一切，逃到基波沙，易名叫提多(TITUS)，继续那位由他执行处死的殉道者的传道工作。但过了不久，他也参加了其它殉道者的行列，因为过了两年，乍得斯运用他对信徒行踪内情所侦得的资料，向大主教告密，大主教随即报告给当时的皇帝犹斯底年二世(JUSTINIAN II)，引致大批的信徒被捕。为了要使这些“异端”教徒害怕而投顺，皇帝下令要把他们一齐焚毙，西缅也在其中。可是，殉道者的坚强不屈，使皇帝的毒计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信徒的信心和勇敢，反大得激励，如火挑旺起来；信徒越发热心，到处作见证。有更多的传道人和教师兴起，聚会人数也大增。他们勇敢地忍受了一切逼迫，未加以反抗。后来，当时天主教教会圈子内发生了别的事情，给信徒带来了一段喘息的日子。

教会历史初期，早就有了敬奉古物的陋习。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HELENA)，曾从耶路撒冷带回来一些木片和废钉，据说木片是从十字架上剥下来的，而钉子是用来钉耶稣的；接着人就开始重视画像、雕像、图像之类，又盖造教堂，用以保存古物，或为了纪念殉道者。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把原来在简陋的房子或房间聚会的形式，就开始完全改变了：所有的人，不论情愿与否、真心相信与

否，都一起挤在一些纪念童贞女或所谓圣人的圣堂内崇拜；堂内还摆满了各种雕像、圣像、或古物，这些东西也成了膜拜的对象；向神发出的祷告，转而改向了童贞女或圣人。渐渐地形成了对有关圣像、神甫、和宗教圣礼的迷信，其情形有如拜偶像的异教的翻版。但尽管在天主教会中正充斥着这种拜偶像和迷信之风，其中仍不乏深信救恩的指望全在基督的信徒，并坚持过敬虔的生活，这正是圣经中所载的基督启示的大能所致。可惜这些信徒在当时的宗教范围内，只属于少数份子，而且厕身在那些受蒙骗、拜偶像、任意犯罪和无知的教徒中，隐藏不露；他们所发的抗议，也无人理会。

那些被称为保罗派、或冠以其它称谓的团体，极力反对向偶像崇拜，因而受到厉害的逼迫。后来在托勒斯山脉一带，保罗派信徒聚居之地，里奥(LEO)出生了；他日后成为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的君王；人称他为爱索林的里奥(LEO THE ISAURIAN)。他是所有拜占庭君王当中最好的、也是最成功的一位，他从撒拉逊手中，把君士坦丁堡抢救回来，又同时在国内励行明智的改革，巩固帝国的势力。他因见及当时的东、西罗马帝国腐败衰微的原因之一，是在于当时流行的偶像崇拜和迷信，他就以身作则，首先铲除这些邪恶的陋习。七二六年，他首次下令废除偶像崇拜，接而雷厉风行地执行破除偶像，并下令处决一切拜偶像的人。这政策引起了反抗；这些反抗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不久更兴起了一大群和他对敌的人，其中最能言善辩的，是那位大有学问的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

他曾说过下面的话：“……既然有人批评我们崇拜救主和马利亚的圣像、并其它圣人和基督仆人的图像是不合理的，那就请他们别要忘记一件事：起初神是照着祂自己的形像造人。……在旧约圣经中，形像的使用，并不常见。但到了神因怜悯的心肠，又为了要拯救我们，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为人……住在地上，行神迹、受苦害、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又被接到天上去。既然这些事实实际上已发生过了，又为众目所睹，事实就给记载下来，为了要我们纪念这些事，也为了叫我们得教训，因为我们当时并未在场目睹这一切。但是因为有了这些记载，我们现在仍可以听得见，并且因着信，接受了主的祝福。但可惜不是人人都是识字的，也不都有时间读圣经，因此我们的列祖允许人用图像把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描绘形容出来，作为简要明显的纪念品。毫无疑问的，当我们心中并未存着主的大爱的时候，只要目睹基督被钉的形像，我们就能马上联想起祂那救赎的大爱，我们就会因此俯伏敬拜。但我们并不是敬拜那物质的形像本身，而是形像所表明的事实。……但这一点是未见载于文字的遗传，就如向东方膜拜，向十字架跪拜，或许多其它相类的传统一样。”

差不多所有的神甫僧侣都群起反抗里奥。那位年老的君士坦丁大主教，就因反抗而被革职，由别人代替；罗马教皇贵钩利二世，和后继者贵钩利三世，也极力反抗。后来反对的人，在希腊另外选立一位君王，与里奥抗衡，但结果不敌。在意大利的天主教会，亦公开谴责里奥，表示反对。里奥因为积极破除偶像，给人起名为“反对崇拜偶像者”(ICONOCLAST)。他儿子君士坦丁和孙子里奥四世，先后继位，比他更大力贯彻执行这种政策，不遗余力。但在里奥四世去世以后，皇后爱任依(IRENE)一反作风。但接着经过几代君王的统治，冲突一直未有停止，直至八四二年，反对偶像崇拜的提阿非罗皇帝(THEOPHILUS)驾崩，儿子迈可三世(MICHAEL III)尚年幼，由皇后提阿多拉(THEODORA)摄政，她本来深受神甫的影响，私下膜拜圣像，所以一旦当她掌握了政权，马上恢复圣像崇拜，还在君士坦丁的圣苏菲亚(ST. SOPHIA)教堂内，隆重举行重光仪式；多年来给收藏起来的圣像，又重见天日。教会和

国家的显要人物，亦纷纷去膜拜。

七九四年，查里曼(CHARLEMAGNE)大帝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会议中，圣像问题成为主要议案之一。当时政府官员和教会领袖都有出席，所以一切通过的议案，都算是正式立法的。当时教皇亦派代表出席。以前尼西亚第二次会议，曾批准圣像的崇拜，这项决定，事后亦得教皇同意，亦为东罗马帝国所接纳。但在法兰克福会议时，这项议决遭受否决。那些赞成膜拜圣像的狂热份子，不但称那些对立者为“反对崇拜圣像者”，甚至诬蔑他们是回教徒。可是，法兰克福会议的结果，一致同意废止圣像崇拜，包括对圣像的仰慕、供奉、尊崇，跪拜等等，或向圣像燃点香烛，或亲吻圣像等；就算圣像代表童贞女或圣婴，也不能跪拜。但议决中允许教堂内保留圣像作为装饰之用，或作纪念敬虔的人物或事迹之用。此次会议也推翻了以前只准用三种语文（即罗马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教导圣经的规定，强调“可以采用任何一种语言祷告”。至此，甚至教皇的代表要提出抗议，也没有用了。法兰克人与信奉异教的撒克逊人，连年争战，又有教士多年来向他们传道，因此法兰克人一般都不赞成崇拜圣像。

查里曼大帝第三个儿子路易，原是阿奎亨(AQUITAINE)的分封君王，后来继其父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他一向心意西班牙人革考丢(CLAUDIUS)的教导。革考丢研究圣经，甚有心得，所著有关圣经的注释，十分著名。路易登基后，立刻就封立革考丢为突伦(TURIN)主教。这位新任主教爱慕并谙熟圣经，还立即趁着法兰克福会议所引出来的有利情势，推动对圣像崇拜的破除，把突伦市教堂内所有圣像统统拆除，他还索性称这些圣像为偶像，连十字架的形像也不幸免。当地教会人士多表拥护，因此这些行动未受阻挠。革考丢还公开指出，所谓彼得的使徒地位，已随他的离世而中止，而“天国钥匙的权能”，亦已传给整个主教集团(EPISCOPAL ORDER)，罗马大主教若有使徒生活的实际，才能享有使徒的权能。这样的说法，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其中著名的有尼米斯(NIMES)附近寺院的主持；但他虽然反对，却不得不承认，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的主教们，都大多数同意突伦主教的说法。

就在此时，和圣像的争论有关的另一件大事，正在阿拉伯开始萌芽。五七一年，穆罕默德(MOHAMMED)生于麦加。当他死于六三二年时，他所创立的伊斯兰教，已遍传阿拉伯大部份地区。他自命为该教的先知。“伊斯兰”一字，意指“顺服神的旨意”；其教条声言：“除神以外，没有别神；而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回教绝对拒绝跪拜任何圣像或图像。回教的可兰经内，载有不少圣经曾提及的人物和事迹，但记述相当混乱。亚伯拉罕被誉为神的朋友；摩西代表神的律法；而耶稣是神的灵。这些人均受回教徒敬重，但穆罕默德身为神的先知，凌驾其它以上。回教徒一手持剑，一手拿可兰经，为要传扬回教，不择手段；就是因为这股不可抗拒的传教狂热，穆罕默德死后不到一百年，他的门徒就把回教势力范围扩大，东至印度，西迄西班牙。人们在接触回教的时候，就只有两种选择：皈依回教或处死。这种传教方式，大大加强了回教的阵营。但无数基督徒，宁愿死也不肯否认主。特别在北非，教会众多，以前在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时代，曾有不少信徒为了信仰殉道，现在碰上回教徒，该处信徒结果大部份都牺牲了。回教是偶像崇拜带来的审判，不管这种偶像是出于异教还是天王教。

反对崇拜圣像的运动，给小亚细亚受逼迫的弟兄们带来了一段喘息的日子。但到了八四二年，提阿多拉皇后掌权时，拥护崇拜圣像的人又大大得势；他们决定要把拿些所谓“持异端者”完全消灭。因为那些人坚信圣像和古物毫无意义，并且一直维持属灵的敬拜，深信所有圣徒都享有祭司的职份。

为了叫忠心的信徒在面对试炼的日子能站立得稳，一些充满能力的人曾劳苦作工，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森伯(SEMBAT)，他生于八世纪末期亚美尼亚的贵族家庭。他的传道工作甚为出色，因此在他死后多年，天主教还认为他是保罗派的创立人。

其它一位名叫士求(SERGIUS)，(亚美尼亚文语音是“沙吉斯”)。他说过：“从八〇〇年至八三四年，我从东至西，由南到北，为了传福音，四处奔波三十四年，直至双膝发软。”他强烈的确信自己是蒙召传道，说话满带权能，常常帮助弟兄们止息他们中间的纷争，教导信徒要同心合一。他能存清洁的良心，向那些认识他的人，问他可曾欺压过任何人，可曾傲慢待人。他虽只是个木匠，但足迹遍及小亚细亚中部高原的各地。他因为被人劝服，细心研读圣经而明白真道，悔改信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位女信徒曾经问他为何不读那神圣的福音书卷。他就答说，那只是神甫才能读的，平信徒不能读。那位妇女便告诉他，神并不看重人的身份，祂只盼望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甫故弄玄虚，不叫别人在福音上有份，好让自己能享有读圣经的特权。士求听了她的话，拿起圣经细读，结果信了主，还多年为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他所写的书信，在信徒中传阅，并备受敬重，他的事奉一直持续到他被逼害他的人用斧头把他斩为两段，气绝身亡时才止息。

这些敬虔的圣徒们所作的忠心事奉，使他们名留千古。士求是这些著名的圣徒中之佼佼者。其它包括康斯坦丁、西缅、真尼西柯(SENSSIOS)、约瑟、撒迦利亚、白奈斯(SAANES)森伯等。这些圣徒经过苦难以后，名字永留青史。他们满受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的精神所感染，渴慕能把新约的传统精华，原封不动地持续下去。他们为了纪念使徒们曾经在那一带地方劳苦作工，建立起初的教会，特别喜欢采用圣经中的人物或教会的名字，蔚然成风。康斯坦丁改名为西拉；西缅自称提多；真尼西柯改称提摩太，而约瑟采用的名字是以巴弗提。这些名字，与敌对他们的人所给他们起的名号，显然大异其趣。他们称撒迦利亚是“为金钱受雇的牧羊者”；称白奈斯为“污秽之子”，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如此自称，是为了有别于“罗马天主教徒”。)又给作为聚会活动中心的教会起一些叫人永志难忘的名字：例如康斯坦丁和西缅工作的地方基波沙，成了他们的马其顿；真尼西柯作工的马拿那列(MANANALIS)村，称为亚该亚；其它教会有名为腓立比、老底嘉、歌罗西等等。

这些圣徒在七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期间，作工二百年之久。就在这个时期，有人写了一本书，书名《真理之钥》。作者可能是上述圣徒中的一位。书中生动地把他们的事工，记载下来。这段时期快要结束时，提阿多拉皇后正大事残害基督徒。接踵而来的争战，使信徒们纷纷逃往别地，不少南下至巴尔干半岛。当时教会内有纷争，外有攻击。真尼西柯就曾为了这些争端，给召去君士坦丁堡提出报告。当时同情圣徒的爱索林里奥皇帝，并未认为真尼西柯的见解有何不妥，最高主教日耳曼奈(GERMANUS)也同意他，结果他们打发真尼西柯回去原地，还带了皇论，命令保护保罗派的信徒。但是，当时的政府，并非一贯同情教会，对圣像崇拜的遏抑，亦未令政府放弃对教会的控制，而且政府的行动，常因政治因素而改变。因此，亚美尼亚利奥皇帝(LEO THE ARMENIAN)，本身虽然反对崇拜圣像，但为了取悦希腊天主教会，下令准许人民攻击“保罗派”的信徒，大大削弱了那原该是他强大的后盾力量。

提阿多拉皇后摄政时期，她对基督徒施以有计划的残杀，滥用斩首、焚烧、溺毙等残酷刑罚。可是，这一切并未能动摇信徒坚定不移的信心。据说在八四二至八六七年间，因为提阿多拉皇后和教廷裁判官的狂热行为，当时死了十万多人。这个纪录，反而是格哥利马哲司推劳(GREGORY MAGISTROS)

所揭露的。他是二百年后，在同一地区执行对同一类信徒迫害的负责官员。他记述说：“在我们以前，有许多将领和裁判官，把他们用刀剑杀害，毫不留情，不分老幼，一律处决。这样的处理，可谓十分恰当。还不止此，教廷裁判官还把狐狸形象的烙印烧红，烙在他们的额上，……还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对他们说：‘既然你们看不清属灵的事物，就让你们也看不见感觉性的东西好了。’”

上文所提的这本在第七至第九世纪期间以亚美尼亚文写成的《真理之钥》一书，把当时在桑历克的“保罗派”信徒的信仰和实际生活，都记载下来。虽然当时这许多分散各地的教会彼此间略有不同，但当时其它众教会的情形，由这些出自他们自己手笔的记载中，可见一斑。无人知道这书的作者是谁，但他的文笔有力，文体流畅，而且充满深厚的感情和真诚。这本书，是为了给主耶稣基督的普世使徒教会内才生的婴孩，供应灵奶，好叫他们在信仰上得供养。作者说：主向人首要的要求，是悔改相信，然后才受浸，因此我们也理应如是，不可受别人虚谎的争论所影响；他们连不信的、无理取闹的、和未曾悔改的人，都一概予以洗礼。当婴儿出生以后，教会的长老就该教导为父母者，应如何以敬虔和信心，教养孩童，同时还要读经，祈祷，并给婴儿起个名字；如果有人要受浸，那必须是出于那人自己的心愿；施浸应该在河里面，或在户外有水的地方；受浸的信徒要双膝跪在水里，在众人面前承认他所信的，还要充满对主的爱慕而流泪；施浸的人，应有无可指责的品德；施浸时要祷告和读经。还有，选立长老的事，要十分谨慎，不要随便选立不配作长老的，一定先要查明他是否有完备的智慧、爱心（这是最主要的）、慎重、温柔、谦卑、公义、勇敢、节制、口才等。祷告和读经以后，在接手时，教会要先问那受按手的弟兄下面的问题：“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么？我所受的浸，你们能受么？”受按手的弟兄所该回答的话，可以表明他愿意承担的危难和责任，是何等的大；只有真诚爱主，为了跟随基督看守羊群而甘愿受苦的信徒，才会肯承当这样的后果。那回答是这样的：“我甘愿受鞭打，被囚，忍受痛苦、辱骂、十字架的苦难、击打、祸患和世界一切的试探，正如我们的救主和中保，并那普世使徒的圣教会所曾甘愿忍受的。我这主耶稣基督无用的仆人，照样以莫大的爱，立志情愿忍受这一切，直至最后一息。”接着诵读过许多经文之后，长老们就严肃诚恳地把他交托给主，并对主说：“我们谦卑地祈祷、切求、恳请主，……将你圣洁的恩惠，加给这位弟兄。他现在到祢面前来，为要得着祢圣洁权能的恩惠……求祢使他脱离一切恶念，全然圣洁，……求祢开启他的心灵，使他明白圣经。”论到圣像和古物，作者又说：“……至于默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非甚么其它圣人，或是已死的，或石像，或十字架，或甚么图像，）有人竟然拒绝向神的爱子思念和祈求，反而随从没有生命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图像、石像、十字架、河流、树木、泉水，或其它虚妄的东西；他们承认并跪拜这些东西，烧香燃烛，还献上祭物，这一切都是与神的性情不相合的。”

这些在托勒斯山脉附近地区的教会，和在君士坦丁堡逼迫他们的人的冲突，影响当时的教会去特别强调圣经内某部份的真理。当时庞大并自称教会的天主教会，因为慢慢引入了对童贞女马利亚的崇拜，而掺杂了异端，又因为给婴儿施洗的习例，而把世界的样式，也带入了天主教会内；因此初期真正的教会，极力强调基督降生时的完全人性，要表明马利亚并不能称为神的母亲，虽然她是主肉身的母亲。教会又强调耶稣受浸的重要性，因为当耶稣受浸时，圣灵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至于关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许多争论，经过了一切解释的努力，既然始终是个奥秘，他们就运用了某些帮助表明的字句，却让敌对者误会他们不相信耶稣在受浸前所保有的

神性。事实上，他们似乎认为基督的神性，在他降生后到受浸的那段日子之间，并未发挥作用；他们认为主耶稣基督在三十岁时受浸那日子，才接受了权能，得着大祭司的位分和天国的权柄，然后他被召，获得作主的荣耀，才成为罪人的救主，为父神所充满，被立为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活物的上宰，正如他自己在马太福音廿八章十八节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这些教会，在真理上大部分都能遵照新约圣经的原则，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在遵照的程度上，无异亦大有出入；敌对他们的人，管叫他们为摩尼教派、保罗派、或其他不同的称号。他们长时期坚忍地受苦，忍受加诸他们身上各种可怕的逼害，并未反击。在反对圣像崇拜的拜占庭帝国君王统治的时候，这些信徒虽有一段喘息的日子，但提阿多拉皇后所发动的厉害逼迫，结果使其中一部份的人，走头无路，愤而武装起来反抗。

当时宫廷的行刑官，在一次执行皇后的残酷命令时，把一个人用尖钉刺死。那个人的儿子卡备斯(CARBEAS)，是在宫廷中任高级官职的；他获悉父亲惨遭杀害的噩耗后，怒火中烧，立刻宣称不再效忠拜占庭帝国，有五千多人跟随他反叛。他们随即在接近特利彼桑(TREBIZOND)的突法利司(TEPHRCE)，设立总部，兴筑防御工事，又和回教撒拉逊人的卡立夫(CALIPH)（穆罕默德死后继承人的统称，译者按）结盟，四处袭击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国家；借着回教人的帮助，他们击败了提阿多拉的儿子迈可皇帝的军队，攻陷的城镇，远及以弗所，并把这些城镇内的偶像全部毁坏。

卡备斯死后，由屈梭卓(CHRYSOCHEIR)继续领导，战火蔓延至小亚细亚的西部，甚至迫近君士坦丁堡。安基拉(ANCYRA)、以弗所、尼西亚，和尼高米底亚(NICOMEDIAG)等城市，先后落入他们手中。在攻陷以弗所城后，义军将其中的教堂用作马廐，并对里面陈列的圣像和古物，极尽抑贬轻蔑之能事，视教堂如偶像的庙宇一样。当时的君王巴书一世(BASIL I)，只好求和，但屈梭卓提出希腊人全部撤离小亚细亚为条件，巴书不肯接纳这条件，无奈只好再串兵反抗，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大败敌人，屈梭卓阵亡，全军溃败，拜占庭军队攻陷突法利司，其中居民四散逃难，以后避居到山上去，继续坚守他们的信仰。这些揭竿起义的保罗派信徒，一方面身受崇拜圣像的人最残暴的压制，另一方面却有不沾染偶像的回教徒向他们伸出救援之手，在此情形下，一时要决定那一方是较接近（或较远离）在基督里的神圣启示，实非易事。回教徒因为拒绝圣经，规范于出自人手的可兰经，自然就没有可能在真理上再进一步；对真理的探索，亦只能止于原来创教始祖所发明的限度。而当时的希腊和罗马教会，虽然离开了真理，但究竟还保有圣经，因此在他们当中，结果有人借着圣灵的大能，带来了复兴。

敌对者所写有关这些信徒的记载极尽谗骂污辱之能事，叫人不但难以接受，且觉其荒诞不合情理。如果就是根据这些记载而对信徒加以迫害，无疑是等于妄信一些全不可靠的证据。这些记载曾提及信徒们所行的善工，显然这些善工是他们所不得不承认且无法推翻的事实，尤其是因为记载中指控信徒是心怀不轨而行善工，那就更叫人深信这些善行的真实性。他们经常诬蔑信徒奉行摩尼教，可是信徒们不断加以否认，而且为了坚守与摩尼教教义相反的圣经教训，经常受苦，那就可见这些诬蔑全不可信。还有，信徒们保存了完整的，（或大部份完整的），纯全而未加修改的圣经原本，而且勤读钻研，更可以证明他们本身不可能是摩尼教派，因为只有拒绝接受全本圣经、或欢喜肆意窜改圣经的人，才能接受摩尼的主张。此外，敌对者还硬说信徒们的行为极度邪恶，却又不得不承认他们行为敬虔，品德清高，这样的报导，虽然互相矛盾，而且叫人难以相信信徒的好行为，只不过是假冒为善。这些诋

毁信徒的记载，可说是汗牛充栋，而出自信徒手笔的记述，却寥寥可数，这样的情况，更叫人不得不推翻各种指斥信徒是摩尼教派或旁门左道的说法，而相信在这些受迫害的教会中，实在有一批属主的信徒，在当时以无比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勇敢，始终如一坚守耶稣基督的见证。

拜占庭帝国，把这些勇敢虔诚的信徒，驱赶到山上去，以致他们与世隔绝，至终迫于无奈而与回教徒结盟，这样的做法，可谓自毁帝国的天然防线，使帝国无法与威胁本身的回教势力抗衡，终而引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在八世纪中期，君士坦丁的儿子爱索林里奥，同情基督徒因拒绝崇拜圣物而招致的危机，于是把一部份信徒迁徙至君士坦丁堡和特拉斯(THRACE)居住。后来到了第十世纪，另外一位君王约翰占密实司(JOHNZIMISCES)，又把一批信徒继续向西迁徙；他是亚美尼亚人，曾从俄罗斯人手中把保加利亚救出来，后来又把它拼入自己的帝国版图。西迁的信徒就这样来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远在九世纪时，因着来自拜占庭的教士区利罗(CYCIL)和麦托丢(METHODIUS)的传道工作，早就接纳了基督教；当地教会，属于希腊正教。

来自小亚细亚的信徒，很快就带引了不少人悔改归主，而且建立了教会。在那片广泛的地区里，人称他们为波各米勒派(BOGOMILS)。“波各米勒”是斯拉夫文，意思是“神之友”，由“波各”和“米勒”两词组成，意思是：他们是亲近神的，或指是蒙神悦纳的。

在这一大批已被人遗忘的信徒中，有几个名字给流传下来。其中一人叫比绍(BASIL)，在他一生的四十多年中（一〇七〇年至一一一一年），不辞劳苦传道教训人；他本人一直以行医维持生计，为那些好吃懒做、专靠宗教混饭吃的人，留下了好榜样。

比绍传道多年，未受到骚扰；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亚勒克修皇帝(EMPEROR ALEXIUS)的函件，信内表示钦佩之情，并说对他的教导，深感兴趣，甚至说自己愿意归信基督；来函中还附请柬，邀他前往君士坦丁堡，与皇帝私下会谈。比绍依约前往，在皇宫内备受款待，然后与皇帝畅论信仰问题；比绍面对这位显然心里切慕的问道者，正在侃侃陈词之际，忽然皇帝将他座位后的幔子拉开，露出藏在幔子后面把两人的对话速记下来的官员，（后来这些对话记录，就成了起诉比绍的证据），皇帝当时吩咐把客人上了锁链，关进监牢。比绍在牢内关了多年，至一一一九年，因他拒绝宣布放弃信仰，就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上，公开焚毙。皇帝的女儿，多才多艺的安娜干慕拿公主(ANNA COMMENA)当时亦在场，还心安理得地把当日的情景描述出来，报导了竞技场那大日子来临前的一切筹备工作，还描写比绍给带到场上时的情形：说他是“又瘦又高的人，长了稀疏的胡子”，当时火堆劈劈啪啪烧起来，比绍把视线从火堆移开，然后四肢颤动地走近火堆；在这时候，一大群被“搜捕”的“神之友”，有的当场被火烧死，有的给判终生监禁。公主还出言取笑这些人出身寒微，毫无教养，又取笑他们垂下头，两唇间喃喃细语的怪模样。（在这个情景下，他们实在须要祷告呀！）公主认为他们的信念，十分恐怖，又对他们鄙视教会和轻看教会仪式的态度，表示震惊。当时计诱比绍而拟成的档，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公布文件的人在内写了些甚么话，从来未经过验证。

外人对于这些在小亚细亚和保加利亚的信徒聚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虽然一般人指斥他们和他们所奉行的教义，认为邪恶得无以复加，但同时亦有人持相反的意见。最早期的作者，把这些事记载下来，当时所持的态度，似乎并不如历史学者那样不偏不倚，而是以天主教会支持者的口吻，所以

他们指责这些所谓“持异端者”的生活可耻，行为反常，充满罪恶，又把一些道听途说的讲论，也转载过来，而且把摩尼自己的主张，和别人抨击他的文字，也加插进去。死于一一八一年后的犹他米(EUTHYMIUS)，写过下面这些针对当时信徒的话：“他们吩咐听道的人，要守福音所载的命令，要顺服，要存怜悯的心，要爱弟兄。他们教导这些善事和有益于人的教训，藉此诱人入教，然后慢慢地毒害他们，至终领人往地狱去。一位保加利亚的长老柯斯慕司(COSMAS)，在十世纪末期，曾形容这些波各米勒派信徒“比魔鬼更坏、更可怕”；又说他们不信旧约圣经，也不信四福音；又指责他们不尊崇圣母马利亚和十字架，侮辱教会礼仪和教会中在高位的，称东正教的教士为“瞎眼的法利赛人”，批评教会并未遵照神的诫命来守主餐，还说那饼并非神的身体，只是普通的饼而已。他认为这些信徒提倡苦行禁欲，是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物质都出自魔鬼。他说：“你会看见这些异端教徒，如羔羊一般安静平和，……假装虔诚禁食，以致自己脸色苍白；他们说话不多，也从不高声谈笑。”又说：“当别人看见他们谦卑的模样，以为他们是信奉真道的，就会趋前就教有关灵魂得救的事，他们就如快将攫食羊羔的狐狸一般，垂下头来，低声叹气，然后声音谦和地回答问题，装出一副满以为自己对属天的事十分在行的模样。”又有一位教父，名叫拿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REK)，批评这些桑历克信徒思想过于自由，不服权柄；他倒没有指责他们生活不检点。他说：“这些人反对（天主）教会，但对一切事都采取积极的态度，还积极探讨问题的根由，从圣经中寻求纯净的道理和道德生活的完美准绳。”在第十世纪，又有一位学问渊博的作家，叫麦施查(MUSCHAG)，对桑历克信徒的教训，印象深刻；认为一味指责他们，实非基督徒所应有的态度，事实上基督徒也不屑去这样作。他相信他们当中确实保留了真正的使徒时代基督教的样式；有一次，当他获悉他们受迫害的一个事例时，他还说：这些受害的信徒所遭遇的处境，实在叫人钦羨。

不管人称这些信徒为保罗派也好、或桑历克派，或保加利亚派、或波各米勒派、或是其它的称号都好，批评他们行为卑劣的指斥，其实并无任何支持的论据；敌对者所写有关他们教义的论著，亦不足为信。这些论著，一般还承认他们无论在生活行为、道德修养、或工作态度上，都远较别人强，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在国家教会内找不到心灵满足的人，就都深受吸引而加入他们的行列。

拜占庭帝国对基督徒大事迫害，把他们向西驱赶到雪比亚(SERBIA)，但他们不为当地的东正教会所容，只好继续向西迁移，至波斯尼亚(BOSNIA)，活跃在小亚细亚和半岛东部一带。一一四〇年，在君士坦丁堡索马勒斯(CONSTANTINE CHRYSOMALUS)的著述中，亦发现有所谓波各米勒派的谬误，后来在君士坦丁堡一次宗教会议中受到谴责。以下就是他们所指斥的见解：教会施浸，并没有任何特殊灵验效用，未悔改的人，就算受了浸，也毫无意义；此外，虽然按手能叫人承受神的恩惠，但还须视乎各人信心的程度。一一四三年，君士坦丁堡会议，议决开除两名格柏多慈恩(CAPPADOCIAN)的主教，罪名是他们属于波各米勒派。接着的下一世纪，最高主教日耳马狄艾(GERMADIUS)诉说这些人的信仰，在君士坦丁堡迅速传扬，传入许多人的家里，有不少人归信；在保加利亚，他们的聚会继续维持下去。

“保罗派”的聚会，在腓力波甫利斯(PHILIPPOPOLIS)和保加利亚其它地区，一直存留到十七世纪，甚至遍布至多瑙河以北。东正教指斥他们是“地道的异端份子”，而他们却谴责东正教会拜偶像。当时有来自波斯尼亚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教士，在他们当中殷勤作工，并不理会因东正教僧侣们的愤怒而招致的危险。这些教士眼见保罗派信徒屡受东正教会所迫害，便利用此时机，慢慢劝导他们转去

接受罗马天主教会的荫庇，结果使他们归顺罗马教会。但过了多年，他们中间仍保存一些习俗，特别喜欢在一起进食后聚会的惯例。可是他们结果还是逐渐被罗马教会所同化，把圣像安置在教堂内。近人称他们为保加利亚天主教徒，以别于一般信奉东正教或称为仆麦斯(POMAKS)的保加利亚人；后者是以前被迫改信回教的保加利亚人的后裔。

这些信徒的工作，最大的开展还是在波斯尼亚。十二世纪时，当地信徒数目，已属不少，后来还散居在西巴拉图(SPALATO)和德尔马舒亚(DALMATIA)等地，与罗马天主教会正面冲突起来。波斯尼亚的统治者，通称为宾(BAN)，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名叫古林宾(KULIN BAN)，一一八〇年，罗马教会曾称他是教会的忠心附从者，但到了一一九九年，教会人士却承认他和妻子、家人，及一万多波斯尼亚信徒，已加入了当地的波各米勒派，或所谓柏太伦(PATARENE)的异端邪说，其实即是当时信徒的教会。后来赫司哥维那(HERZEGOVINA)皇子敏努斯拉夫(MINOSLAV)也参加了这些信徒聚会，连波斯尼亚的罗马天主教主教也不例外。就因为这些人的改变，整个地区顿时改观，不复奉行天主教，一时极其兴旺，至今传为美谈。他们当中并不设神甫，所有的信徒在一起，就表明了祭司的职份。每个教会有几位长老，用抽签方式选出；各教会就由长老、监督二位，又称祖父)，及一些称为领袖和长老的服事弟兄所带领。聚会可在任何房子内举行。普通聚会的地方都很平凡，没有钟楼，也没有圣坛，只有一张铺了白布及上放圣经的桌子。弟兄们的奉献，一部份拨作帮助生病或贫苦的信徒之用，并供应出向外未信的人传福音的弟兄们应用。

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得匈牙利王的协助，向古林宾施加压力，结果在二一〇三年，主教差帕特使到拔叙鲁布之(BJELOPOLJE)（亦即古林宾宫廷所在的“白色大平原”），与古林宾开会商议，波斯尼亚的权贵们亦同时出席。会议结果，波斯尼亚的领导人，同意顺从罗马天主教会，应允不再奉行邪教；同意在聚会的地方，摆设圣坛和十字架；又只许神甫主持弥撒和告解；一年两次举行圣礼，还同意遵守禁食和圣日的规矩，不许平信徒插手属灵的职事，只有教士才能主持圣事，也只有他们才得称为弟兄；他们身穿僧袍，以别于平信徒；选出的修道院院长，亦须经教皇同意；以后亦不再许可异教徒在波斯尼亚活动。在武力威胁下，古林宾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签约表示同意遵守以上的一切条件。可是，当地人民置之不理，没有人遵守这条约。

波斯尼亚的弟兄们，和意大利、法兰西南部、波希米亚、莱茵河一带、和其它远在法兰第(FLANDERS)及英国的信徒，都有交往。后来教皇向亚勒比根斯派(ALBIGENSES)出兵讨伐，普鲁旺斯(PROVENCE)大受蹂躏，人民逃难至波斯尼亚。双方的长老们开会商讨教义问题，于是一时谣传波斯尼亚有一位“异教教皇”，并说在意大利、法兰西、和波希米亚等地一切的宗教运动，都与这“教皇”有关。其实这些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因为当时并没有这么一位“教皇”存在。但由此可见波斯尼亚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在古林宾统治时期，有一位意大利宗教法庭的裁判官，名叫雷尼劳撒干尼(RENIERO SACCONI)，他自己本身正是被人称为所谓“异端份子”；他对这些人的信仰，自然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他称这些人为迦他利(CATHARI)教会，(意即生活圣洁)。这个名称，其实远在君士坦丁皇朝时便已采用。他又指出这些信徒，当时已遍布由黑海以至大西洋岸一大片的地区。

古林宾因降顺罗马而换来的和平，并未持久，因为他无法强迫人民去遵守那些条约。他死了以后，（一二一六年），教皇便指派了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宾”（统治者），还派出传教团去使波斯尼亚人民改变信仰。他因见以前普罗旺斯之役，大收奇效，于是决定动用武力，吩咐匈牙利皇帝出兵讨伐，波斯尼亚人群起反抗，废黜了那位罗马天主教统治者，另立了一位波各米勒派的信徒，名叫尼努斯拉夫(NINOSLAV)。战事延续多年，双方各有胜负。后来尼努斯拉夫慑于情势，改奉罗马天主教，但人民并未因此改变信仰。虽然国家备受蹂躏，但每当入侵的军队撤退以后，信徒照常聚会，勤奋的人民也很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繁荣。入侵者在各地兴建要塞，目的是为了“保护罗马天主教会和信仰”。教皇将该地拨归匈牙利统辖。后来匈牙利统治多年，但人民继续保持原有的信仰，教皇终于发动了一次“全地基督教势力”对该地的征讨，设立宗教法庭（一二九一年），多明俄会(DOMINICAN)和方济各会的教士，争相向这些忠于基督的教会，实施恐怖统治。

在此同时，欧洲正面临回教势力日渐增长的危机，而匈牙利正首当其冲。可惜天主教国家，仍未觉悟，仍旧继续逼迫那原应该是他们与回教势力间的天然屏障的信徒。一三一五年，教皇致书波斯尼亚的统治者说：“我深知你忠于教会，因此命令你，要灭绝国内的异端份子，协助我所委派的裁判官费卞安。因为有为数不少的异端份子，由各地各方纷纷前往波斯尼亚定居，并散播可憎的谬论。这些人满怀魔鬼的诡计，用虚谎的谬论，毒害天主教徒。他们外表都装出纯朴的模样，还盗用基督徒的名号；他们说话缓慢，如蟹爬一般，行动谦卑，但暗中却要杀害人，就如披了羊皮的狼，把他们野兽般的凶残，掩盖起来，要蒙骗跟随基督的驯良小羊。”

在左劳高(TVRTKO)执政时，在波斯尼亚，掀起了一次政治复兴的高潮。左劳高是第一位称帝的统治者，与古林宾齐名，同为波斯尼亚最著名的统治者，左劳高容纳波各米勒派信徒；他们有不少在军队中服役。当时国势兴盛，版图拓展不小。在左劳高执政后期，经过了一场哥数伏(KOSSOVO)战役（一三八九年）以后，雪比亚陷入土耳其人手中，使欧洲所受回教势力的威胁，顿时大增。但天主教并未因此中止对基督徒的迫害，教皇又再度怂恿匈牙利皇帝出兵，并许以从旁协助，对抗土耳其人和那些所谓“波斯尼亚的摩尼教派及亚流主义者”。左劳高死后，匈牙利皇帝西淇门(SIGISMUND)终于击溃波斯尼亚军队，并将俘获的一百二十六名权贵要人斩首，尸身从多博(DOBOJ)岩投下波斯拿(BOSNA)河中（一四〇八年）。

波斯尼亚至此走投无路，只有投向土耳其人。其中一位主要大臣荷复贾(HRVOJA)，警告匈牙利皇帝说：“我从来没有寻求任何庇护，因为皇上是我唯一的庇护；但如果情势维持不变，那我就只有别图生路。只要能提供保护的任何一方，我就会去投靠，不问后果了。波斯尼亚人现在正要向土耳其人伸手求助，而且已经在进行了。”不久，土耳其人和波斯尼亚的波各米勒派人，就首次联手，在距离多博数哩的乌索拉(USORA)，击败匈牙利人，使他们伤亡惨重。

天主教势力和回教势力，在绵长的接触战线上彼此抗衡，相持不下。但每当教皇军队得胜，对波斯尼亚信徒的迫害便又告开始。因此，结果迫使四万多信徒，连同他们的领导人，越过边界，逃去赫司哥维那（一四五〇年）避难，当地史提芬伏克咨(STEFANVUKTCHITCH)皇子予以庇护。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穆罕默德二世手中，希腊、阿尔巴尼亚、和雪比亚，亦相告陷落，但天主教对付波斯尼亚波各米勒派信徒的阴谋和部署，并没有须臾停息。有时波斯尼亚的统治者投顺罗马，但该地人民

始终不肯归服，结果不久，波斯尼亚的君王向教皇求救，以对抗土耳其人，但罗马提出的条件，是要杀害波各米勒派信徒，因此到了一四六三年，当后撤的土耳其人又卷土重来时，波斯尼亚人民拒绝联合起来对敌，宁受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受宗教法庭审讯。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土耳其的苏丹攻占了的城镇和要塞，不下七十处。波斯尼亚地本富天险，但到头来不免仍被回教人所侵占。在那毁坏生命与长进，叫人麻木不仁的制度下，波斯尼亚景况萧条，达四百年之久。

这些居住在波斯尼亚的“神之友”，几乎没有遗下任何史料，因此后人必须加以发掘，才能把有关他们的信仰和实际生活公诸后世。这些人的信仰和生活，想必因时因地而异，但他们明显地同有一个心志，就是积极反抗当时基督教势力范围内的流毒，竭力持守圣经所载的初期教会的教导和典范。他们与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地方历史较长的教会，与法兰西的亚勒比根斯派信徒，与意大利的瓦勒度派(WALDENSES)和其他信徒，及与波希米亚的胡司派信徒 HUSSITES)等彼此间的关系，显示他们之间的信仰基础相同，实践一致；这一个事实，就把分散各地的信徒联系起来。四百年来，他们忍受苦难；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虽然没有全部记载下来，但相信已给后世留下了不少信心和勇敢的典范。他们对主那至死忠心的爱，实在是举世无双。这些信徒，成了把小亚细亚托勒斯山脉的初期教会，和意大利及法兰西的亚尔卑斯山脉一带的信徒联系起来的一环。在基督教世界内，这些信徒曾居住过的土地，早已因为当时他们所受长期的磨难而埋没了。

在那古老的波斯尼亚帝国遗址上，发现了不少散落各处的石碑，多是体积庞大的波各米勒墓石。这类石碑并未在世上任何其它地方发现过。这些石碑，有个别屹立的，亦有合成一大组的，有时数目不下几百之多。有人估计，这类石碑总数约有十五万，人称之为“麦拉么”(MRAMOR)，意即大理石；或称为“史特石”(STETSHAK)，意即“竖立之物”；或称为“比历克”(SILEK)，意即指示牌或路标；或称“各密尔”(GOMIL)，意即古墓或土墩。石碑上面仅有的一些铭文，都是用加拉各列文(GLAGOLITIC)写成的；碑上未见有十字架、或任何与基督教或回教有关的标志。假如偶然发现有些碑石，上有这类标志的话，那显然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大部份的碑石上，都没有铭刻任何文字。少数的石碑，上有铭文，亦不过是葬身该处的死者姓名；又有少数的碑石上，刻出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有战士、猎人、动物、和一些装饰点缀用的图案。碑石以撒勒遮伏(SARAJEVO)附近最多，在通往落革铁刹(ROGATITZA)路上的要塞内，有为数甚多的一组石碑。最大的一块石碑，矗立在帕斯洛维兹山(PRSLOVATZ)，离开哥托斯高(KOTORSKO)的遗址不远，是用整块凿出来的白石灰石制成的一副大石棺，下面还与一块更巨大的石雕旗帜相连，远看就像一幢完整的建筑物。

波斯尼亚信徒长期对抗希腊和罗马教会，但其中不少人后来归顺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曾经援救过他们，亦曾战败他们。)并改依回教。其中有人还在土耳其人中攀升到高官职位。现在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回教人的姓氏，还保留原来的样式，证明他们祖先如何逐渐向回教势力屈服。在该地的店子橱窗上，观光客不难发现一些冠以阿拉伯文或土耳其文的波斯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名字。在他们日常应用的语言中，“土耳其”和“回教”二词，截然不同；前者代表真正土耳其裔、或爱那多利安裔(ANATOLIAN)的回教徒，后者是指皈依回教的斯拉夫民族。

第四章 东方

公元前四年——公元一四〇〇年

东方的福音传播——叙利亚和波斯——波斯帝国众教会脱离罗马帝国天主教会——东方教会持守圣经原则比西方教会维持得更长久——巴伯宾阿给(PAPABEN AGGNI)把教会联合——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舍普二世(SAPOR II)执政时期的逼迫——阿失勒赫(AFRAHAT)的讲章——悉劳西亚会议(SYNOD OF SELEUCIA)——逼迫复燃——聂斯托利(NESTORIUS)——“荷勒克拉斯(HERACLIDES)的市集”——容忍——西方主教大量涌入——权力逐渐集中——叙利亚教会散布亚洲——回教入侵——主教长由悉劳西亚移迁至巴格达(BAGDAD)——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在中亚细亚景教与回教之争——帖木真(TAMERLAANE)——方济各会和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发现景教工作遗迹——十六世纪时期圣经部份译成中文——景教势力在亚洲大邻份地区泯灭——失败原因

从东方来的博士，得星光指引，来到伯利恒，朝见那刚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婴孩，献上“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然后“回本地去”（太三章），以后不免会向人传讲他们的见闻。五旬节的那天，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人中，有“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的人”，他们目睹当时的神迹奇事，和圣灵浇灌下来的情景，并且亲耳听见彼得见证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三章）这些人在很早的时期就把福音传往东方的犹太会堂。

犹西比乌(EUSEBIUS)在记录第二世纪所发生的事迹时，指出当时许多信徒“因着圣经的话，大受感动，心中充满智慧和强烈的爱慕，要遵守我们牧主的命令，首先向那些有必需和受困迫的人，分享他们所领受的真道，然后远走外地，向未曾听说过信仰要道的人，传讲福音，盼望多人归信基督，并将福音书分送出去。这些人在遥远和未开化的地区，奠下了信仰的根基，选立了牧者，将所领来归信的人，托付给他们牧养，然后自己便离开，往别处继续传福音。”就是这样，教会陆续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而这些传道人的脚踪亦愈走愈远，不但遍及罗马帝国广阔领土的每一角落，甚至进入强邻波斯帝国的领土，还远及波斯以外的地区。第三世纪时，另外一位作家记述说：“因着主和他的使徒所行的事工而兴起的一股力量，已经征服了人的感情，使许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各种形式的人，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同一的信仰。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印度，在悉吕人(SERES)、波斯人、和玛代人当中；在阿拉伯、埃及、亚洲和叙利亚；在加拉太人、帕提亚人、弗吕家人当中；在亚该亚、马其顿、和埃比勒(EPIRUS)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并且远在日出或日落之地，及众海岛，也不例外。”

这些在叙利亚和波斯帝国境内迅速开展的众教会，并未受当时西方教会所感受的冲击所影响，原因是彼此语言不通，政治情况亦不同。当时在巴勒斯坦和庞每拉(PALNYRA)通行的语言是亚兰文，也是幼发拉底河平原一带商业贸易上通用的语言。同时，在罗马和波斯这两个大国间彼此的猜忌，亦成为彼此沟通的进一步障碍。

东方的教会，在持守教会的纯正和坚持圣经原则这两方面，远比西方教会持久，到了第三世纪，众教会仍保持分立，并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国内亦未有划分教区，（有些教会在同一时间内会有几位长老）；众教会并且十分活跃，不断地把见证继续传往新的地区去。

早在第四世纪，巴伯宾阿给(PAPABENAGGAI)提出将波斯境内众教会结成联盟的方案，并拟把叙利亚和米所波大米亚的众教会，亦包揽在内，由当地首都悉劳西亚——实土方(SELEUCIA-CTESIPHON)的主教统治。这方案引起激烈的反对，但支持方案的人继续大力鼓吹，终于在四九八年，东方的大主教制度成立，最高的主教称为主教长。

当时波斯的宗教，是由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早在主前八世纪所传入的。那时他极力反对拜偶像和一切歪风，指出神只有一位，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祂全然良善，并且只有祂才配得敬拜。琐罗亚斯德在宗教的事情上，从来不勉强人，他相信自己所教导的真理，能使真道远扬；他以火和光代表神的作为，却借用黑暗和烧焦的木炭譬喻罪恶的权势；他相信神能成就一切善工，又用下面的话把行为的总纲概括出来：“要行善事，远避恶行”。主前六至三世纪期间，琐罗亚斯德学说，在波斯盛行一时，但后来慢慢衰落，直至本章所提的沙撒聂(SASSANID)王朝时期才又告复兴。

在君士坦丁宣告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波斯王就开始怀疑境内的基督徒，（他们被称为拿撒勒教派 NAZARENES），认定他们是同情和倾向罗马帝国，而罗马帝国正是波斯帝国又恨又怕的死对头。在波斯王舍普二世(SAPOR II)统治的那一段长时期，这种猜疑演变成暴力的迫害，琐罗亚斯德派的憎侣们，浑忘了他们的先祖（就是那受星光指引到伯利恒的博士）的教训和见证，大力煽动这些迫害，四十年之久，基督徒备尝煎熬，遭杀害的基督徒达一万六千多人，凡承认主名的人，都遭受莫名的痛苦和莫大的损失。但他们以无比的坚忍与信心，经过了这些漫长可怕的试炼的日子，至终胜了一切，经历了由三三九至三七九年一段受苦的日子，后来教会终于重获宗教自由。

当年留存至今的著述中，有一本叫《波斯哲人》的书，是把阿夫勒赫(AFRAFAT)的讲章，收集成书面世。书中论及教义与实行，但居然对当时因西方教会争辩教义而举行的尼西亚会议，只字不提，亦未见提及亚流和亚他拿修两人的学说辩证，可见当时罗马帝国与外地彼此疏离的情形。书中第一篇讲章，论及信仰，内说：“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信仰就是：相信神是万主之主，也是天地海洋及其中所有活物的创造者，并相信祂曾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亚当；又将律法传给摩西，将圣灵分赐先知，甚至差遣基督到地上；且相信人死后复活，相信浸礼的奥秘。这就是神的教会的信仰。还有，人要脱离下面的事，就如：对日子、安息日、月份、节期等的墨守，和各种迷惑、占卜，星相学、巫术等，且要禁戒奸淫、醉酒荒宴和世俗虚谈，因为这一切都是邪恶者攻击人的武器；不要用甜言蜜语奉承人，不可说僭妄褻渎的话，不可淫乱，不可作假见证，也不可欺骗人。一切出自信心的善行，都是建造在那真正的盘石上；那盘石就是基督，是一切建造的根基。”阿夫勒赫还批判了玛西安和摩尼的教训。他指出，有许多事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他并且承认神是三而一的奥秘，但反对人提出质疑的问题。“诸天之上还有什么？谁能回答这问题呢？地底下又是什么？这问题亦无人能解答。穹苍在何处铺开？诸天悬于何处？大地以何为枕？深渊以何为界？我们这些属于亚当的人，凭自己的理性，根本无从领会这一切，但我们准知一件事：神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圣灵亦只有一位，一信，一浸。再说下去，我们就无从探索；若勉强谈下去，就会显出我们的愚昧；若要进一步探索，我们就委实有心无力了。”阿夫勒赫研究预言的结果，使他相信波斯如要侵犯罗马帝国，就必定会失败。

当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的那段时期，波斯境内的基督徒大受逼迫，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三九九年，波斯王耶士德格一世(YEZDEGZ I)登基，罗马皇帝差遣马卢达(MARUTA)主教前往斡旋，以求

基督徒免受残害。马卢达主教的外交手腕果然不凡，他与当时首都的主教长以撒克(ISAAC)联手，征得波斯王同意，在悉劳西亚召开会议（四一〇年），重组大部份因迫害遭受破坏的波斯教会。在此项会议中，有两位出席的官员，称以撒克为“基督教的元首”。

马卢达亲自带来西方主教们的联名函件，经翻译成波斯文，呈波斯王审阅后，获准在主教的集会上宣读。其中所提各项条件，立即获得全体的同意。当时波斯的信徒刚从大患难中出来，对任何能以和平的方案，自然均欣然接受。根据会议记录，会议是在那得胜而伟大的耶士德格王执政第十一年中举行，其时基督的教会，已恢复享受安泰平和的日子，王亦已颁予信徒有集会的自由，使他们不论或生或死，均能荣耀神，并将迫害的威胁和阴影，从他们身上挪去。他又曾下令，吩咐将所有曾受毁坏的教堂重建，粉刷一新，圣坛重新开放使用，使经历各种试炼、击打、捆绑的信徒，重获自由。会议记录又写着：在会议中，悉劳西亚主教长以撒克，那备受敬重的伟大教父，被选为东方教会众主教的元首，他在神面前，配得权柄统管全东方的众教会，为众民和神的教会，引进和平与安息。他的谦和与尊荣，远超东方众教会的各主教之上。……这次协议得以成功，亦有赖来自西方教会的和平使者马卢达主教，他亦满有智慧和尊荣，为东方和西方的阵营，带来和平与团结，他为了建造神的教会，不辞劳苦，使西方教会众主教所订立的律例和信条，得以在东方教会内施行，启发真理，并使神的子民得教诲。虽然两地信徒在肉身上彼此远隔一方，但因着罗马地众主教的关注，东方众教会亦大蒙眷爱。

当时教会已脱离了一切的逼迫，信徒大大喜乐，感谢神所施行的大工，并为王祈求，愿他长寿，甚至愿他长生不老。他们当日在会议中那荣耀的一刻的感受，据说尤如在心灵中亲自觐见基督荣耀的宝座。记录上还写着：“我们一共四十名主教，来自各地，现今聚集一起，留心聆听西方众主教们的来函。”函中指示每一城市只能设立一位主教，无须多设。（这一个声明，实在多余。）按立主教，必须由大主教教区所委出的三位、或三位以上的主教联合主持：函中又指定各宗教节期的日期，而君士坦丁时期举行的尼西亚会议所通过的信条，在会议中亦当场宣读，并即获全体出席者签署通过。以撒克说：“反对这些值得赞扬的律例和绝妙的信条的人，愿他受神所有子民的唾弃，并愿他以后不能再在基督的教会中立足。”记录中还说：“当时所有主教们均同声说阿们，同意他（以撒克）所宣告的。”接着马卢达说：“所有这些律例和信条，一一腾写下来，末了我们将一同签署，以立永约的方式，表示同意。”以撒克接下去说：“我领先在众人之前签名。”然后从各地来的主教跟着说：“我们亦欣然接受，同意以上所写的，并在末页一同签署。”档呈交皇上过目后，以撒克和马卢达又一次转向主教们说：“以前你们备受苦害，只能暗中行动，但现在皇上已为你们取得和平，他亦已乐意指派以撒克作全东方教会之首，在皇面前出入。自从马卢达主教为你们带来和平，皇上对他更是恩宠有加。”随后会议更订明选立以撒克和马卢达的继任人的规则，继任人选须经皇上同意。关乎元首的地位，会议记录上说：“不准有人结党反对元首。如果有人起来反对或背逆，其它的人必须立刻举报，并向皇上请示，由皇上裁定他的罪名。”以撒克和马卢达两人，又向主教们再一次保证这些有利于天主教教会的教条，各人表示欢迎，并同意开除反对的人的教籍，使他万劫不复，并交由皇上处以极刑。

会议中还定出许多其它教规，诸如僧侣们必须独身，终生不娶；因路远而不能出席会议的主教，亦须接受会议中所通过的规条。此外，有些从起头就反对以撒克的主教，则定以叛教罪名：在信徒家

中的聚会，一律禁止；教区范围划分清楚；每教区内只准设立一个教会。

就是如此，东方和西方教会宣告合一，主教们分头往各地去，排除一切异己的主张，不再容许表示相反意见的团体存在。

可是，以上一切安排和部署，到以撒克死后，就无从实施，事情就落在皇帝手中；当时不少权贵参加了教会，引起教士们的疑忌，而皇帝始终仍是保留旧有信仰，深受部份神甫所影响。当时以撒克不复在人世，无人从中排解纠纷，结果其中一部份教士，持着权势，公然反抗皇帝，皇帝一时无法可施，索性就地处决了好几位反对他的教士，后来皇帝驾崩，先后继位的耶士德格二世和巴涵五世(BAHRAMV)的时期内，便爆发了对信徒广泛及厉害的迫害。

是时，在西方发生了一些事，日后为叙利亚和波斯境内的教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聂斯托利(NESTORIUS)是安提阿的传教士，生于叙利亚境内托勒斯山麓的小村。在四二八年，被拜占庭帝国提阿多修二世(THEODOSIUS II)封立为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能言善辩，精力过人，一时声名鹊起。他深受莫甫索斯亚(MOPSUESTIA)的提阿多(THEODORE)的学说影响，反对当时日渐流行的崇拜圣母马利亚之风，极力指斥称马利亚为“圣母”之不当。当时提阿多的学说，并未引起广泛的反对，但当聂斯托利提出同样见解，同样地对抗崇拜马利亚的歪风时，立刻就被人指责，申斥他否认基督的神性。亚力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两地主教势力的争持，由来已久，加上亚力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彼此间的抗衡，使亚力山大的息利尔(CYRIL)主教得以乘机大力抨击聂斯托利。当时为此在以弗所召开大会，但大会落在息利尔的操纵之下，他不待其它同情聂斯托利的主教们抵达会场，就展开猛力抨击，引起激辩，当时皇帝为了息事宁人，一反起初与大会决议对立的态度，转而下令开除并放逐聂斯托利。聂斯托利后来在贫困与危难中，渡过余生。他并被迫放弃了在君上坦丁堡那种活跃并风头十足的生活，迁至埃及旷野中的一个小镇，受尽孤苦。

事实上他并未宣扬什么“聂斯托利”主义。名义上他是为了一点教义上的争端而被放逐，实际上却是他那同侪息利尔主教，因忌成恨，不能容他。后来不少同情聂斯托利的主教，也相继被黜，纷纷逃往波斯避难，结果大受当地教会欢迎。这些大量涌入波斯境的教士，兼备才能与经验，为当地教会带来不少的复兴，且成了福音更向外传播的新动力。从此，东方教会给人统称为“聂斯托利派”，（虽然他们本身对这称呼并未同意，甚至表示抗议。）原因是他们拥护聂斯托利的主张，（其实他本人亦没有持什么特别主张。）然而东方教会实际上并未接受这些见解。他们与拜占庭及罗马两地的教会，均截然不同，甚至立场亦各异。其中有人这样说过：“人称他们为聂斯托利派，委实没有什么根据，也太冤枉了，他们也未奉聂斯托利为鼻祖，甚至连他用以著述的拉丁文，也一窍不通。他们不过是支持与他相同的见解，相信在那位独一的神子、独一的基督内，有双重性格与双重位格同时存在的真理，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这样的领会。因此，若说是他们随从聂斯托利的见解，那倒不如说是聂斯托利受他们的影响。”

聂斯托利在被流放期间，把自己的信仰，编成书出版，以《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BAZAAR OF HERACLIDES)为题，对作者的姓名隐而不宣，避免该书遭受烧毁的可能，下面是录自该书的内文。论到基督的顺服，聂斯托利说：“祂取了奴仆的样式，自甘卑微，完全卸下了神的形像。祂并未得着尊荣与权能，也未受人敬拜。虽然祂本来是神子，但成了奴仆的样子，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全心顺服神的

旨意，不照自己的意思，也放弃了自己的定意，完全遵照那就是“道”的神的心意。这正是“神的形像”的含意，好叫奴仆的样式不再有自己的意思和拣选，只有那原来形像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本体要取了奴仆形像的原因。祂也没有逃避任何属于奴仆的卑微样式，反而把这一切全盘接受下来，好使“属神”的样式能充满其中，而且毫无保留地承受了一切出于奴仆的样式，因为唯有如此，祂才能除去那首先被造的人的罪愆，并且将那因罪而丧掉的本来形像，偿还给人。因此，他取了那招致罪恶并受罪所辖制与奴役的形像，而且蒙受了各种的羞辱，这原是合宜的，因为除了祂的本体以外，不可能有属神的、可敬的、或自主的本性。”……当人脱离了一切叫人不能顺服神的因由后，他就能真真正正地、毫无疑问地脱离了一切的罪。因此神子取了那犯罪的模样，并没有运用那不能犯罪的本性，免得有人以为祂没有犯罪，并非出于顺服，而是因着祂的本性，使祂不能犯罪。祂虽然有了属于我们本性的一切——就如怒气、要求、思想等，而且在祂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这一切性情也随之而生，但祂那顺服的心志，却愈过愈坚定。……而祂的顺服，不是显在一些叫人可以赢得尊荣、权能或名声的事情上，而是显在一些叫人感到可怜、难堪、可耻、和软弱无能的事上。这种情况下，最易叫那愿意顺服的心志受挫，因为这些事完全不能吸引人去顺服，反而会令人松懈，甚至逃避。而同时、祂亦未得着任何鼓舞，祂的顺服，纯粹出自祂内心对神的顺服的爱慕，因此祂实在是一无所有。虽然祂身处逆境，祂却从未在思念神的事上后退，撒但千方百计要使祂离开神，不纪念神的事。撒但又见祂毫不焦急，只一味顺服、遵从神的命令，并不急于施行神迹奇事，也似乎并非专以教导为事，因此更倾其全力要败坏祂。祂与人一同出入，处处受制于各种诫命律例，祂本可以背逆不听命令，但祂没有这样作，反而在人中间，事事显出祂的果断勇敢。祂并未取法任何与别人迥异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祂所取法的，也不过是与普通人所用的一般无异，这样就表明祂不被罪所玷污，原因不是祂有任何特别的帮助；祂也决不会因为没有任何帮助而致被罪玷污，因此祂或吃或喝，都遵照一切诫命去作，祂虽然疲惫乏累，汗流满脸，仍然坚定不移，一心依照神的旨意而活，没有任何事物能使祂离开神的旨意，因为祂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祂所属所本而活；为此，祂保守了自己毫无玷污，因此祂能叫人靠着祂胜过一切。”论及基督受浸和受试探的事以后，聂斯托利接着说下去：“祂并没有用死亡的方式，来解决人的败坏，却是使人爱慕更美的事，并帮助他。”祂又指出撒但要除灭人，引诱他们置基督于死地，使人彻底沦亡，然后接着说：“祂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而死，祂要进入死地，就如人必须毁坏一样。祂并没有退后，却甘愿死亡，为要败坏死亡的权势。……为此祂以无比的大爱，全心顺服，不是为了要祂自己无可指摘，而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不是为了祂要得胜，而是要使人人得救，因亚当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被定罪，照样，因基督一人的得胜，众人也都蒙赦免。”

当东方众教会在罗马帝国势力范围外蒙受“聂斯托利”的污名而被人诬为异端份子的时候，波斯的统治者知道这些教会不可能与君士坦丁堡或罗马的教会联合，于是乐于多给他们一点自由。这个自由的机会，加上由西方流放而来的教士们所引发的动力，使东方教会顿然生气勃勃，火热兴旺，将福音广传给四周的异教徒。同时，另外一股要把教会统一组织起来使归属一位元首统治的势力，亦正在增长中。所以，当教会正纷纷在远地各处建立起来的时候，主教管辖区亦随之形成。在新设的教会中，各有主教，但均与中央组织紧密联系。因此，当福音使者为了爱主和爱异教徒丧失灵魂而几经艰苦、长途跋涉将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圣灵显出拯救灵魂的大能，但同时渐渐形成的中央组织，亦在新建

立的教会中慢慢显出控制的影响，使教会日渐离开圣经原则，以致教会一开始就有了软弱，至终自食其果。

因为信主的人日渐增加，主教管治区亦纷纷成立，远布密辅(MERV)、侯勒特(SERAT)（即今阿富汗西北，译者按），撒马尔罕（即今阿富汗以北，译者按）、和中国及其它各地。在马德里附近，和德勒芬哥(TRAVANCORE)的克泰荫(KATTAYAM)地方，曾发现了一些七、八世纪的上刻着铭文的石碑；其中一个镌了下面的文字：“这一位曾在十字架上受苦被害的，祂是那位真正的基督、独一的神、永远纯全的指标。”在印度各地，亦有不少教会。在八世纪时，有一位名叫大卫的人，被委为统理中国几个主教管治区的大主教。在九世纪时，有一份主教名单，内列出印度、波斯、密辅、叙利亚、阿拉伯、侯勒特、撒马尔罕等地的主教姓名，其中还列出一些因路远而获准无需参加每四年一度大会的主教名字；他们只须每六年呈交报告，并要按时把收集到的奉献金，送去供给大主教管治区的需要。这些满腔热血的传教士，足迹遍及亚洲大陆、甘巴乐(KAMBALUK 亦即彼良 PEKIN)、克殊格(KASHGAR)、和锡兰等地，各处均设教区，甚至深入鞑靼瑞(TARTARY)和阿刺伯；教区范围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哥莱珊(KHORASAN)等地大部分居民，在某些地区甚至与里海毗邻，其中还有蒙古族人，他们把圣经翻译成几种文字。有一份第九或第十世纪的手稿，内载他们曾把新约译成一种印度与伊朗通用的文字。在中国西安府，发现了一块碑石，（即普通称为“景教碑”，译者按。）上有颇长的碑文，以叙利亚文及中文写成，日期当在唐太宗时代（七八〇—七八三年）；碑顶刻有十字架，并镌刻着：“自大秦传至中国的要义，立碑为志。”其上并记载了一位名叫阿罗本(OLOPUN)的传教士，在六三五年自大秦国东来，带来圣经与圣像；又记着当时圣经如何译成中文，并获皇上钦准，得以公开传教；又记叙了当时教义如何传扬至各地，并在玄宗时期（七一三至七五五年），又来了一位佶和(KIHO)传教士，以后虽有佛教兴起，但教会仍得以复兴；碑文内提及圣像，可见当时传至中国的基督教，已从原来纯正的福音堕落了，信仰离开了圣经的原则，结果给后来兴起的回教预先铺好了路。此外，当时信徒人数日增，但聂斯托利派教徒（在中国称景教徒，译者按）的道德与见证，亦渐败落。八四五年左右，中国唐武宗拆毁了许多景教与佛教的教堂，强迫教徒恢复俗人平常生活，强调他们必须重新回到纳税人的行列中，重操在各人家中应尽的本份；外籍教徒则悉数遣返原地。

当回教势力席卷波斯地时，大量的迦勒底人(CHALDEAN)，又称聂斯托利派教徒，或分散各地，或改信回教；此情形尤以阿拉伯及波斯南部为甚。后来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亚伯筛(ABBASIDE)成为卡立夫统治巴格达时，叙利亚的基督徒在宫廷内，或任御医，或任大学士，教授哲学、科学、及文学。七六二年，悉劳西亚被毁后，主教长移至新首都巴格达任职，此时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崛起，东征西讨，所向披靡，蒙古人卒于一二五八年攻陷巴格达。但这些政治形势改变，并未给叙利亚教会很大的影响。那些蒙古异教徒，对宗教采取宽大态度，当时他们亟欲与西方联手对抗回教势力，还派出聂斯托利派信徒，负责与西方势力进行政治谈判，担任重要角色，其中有一位中国景教教徒，名叫洛合三世(YABH-ALAHA III)，出身寒微，但很快擢升为叙利亚教会的主教长（一二八一——一三一七年）。

在七至十三世纪期间，东方的叙利亚教会，与西方的罗马及希腊教会，等量齐观。叙利亚教会势力所及，幅员广阔，人口甚多，向波斯与叙利亚的四方伸展，远达印度及中国。这些突厥语裔的民族，大部份的人，包括他们的统治阶层，都皈依了基督教；在亚洲的重要城市中，教堂与异教庙宇和回教

寺院一样多。

在俄罗斯突厥族的高山上，在炎热的盐湖以悉究(ISSYKKUL)附近，发现了两处墓地。其中数以百计的墓石上，均刻有十字架；其上铭文表示葬身该处的都是聂斯托利派教徒，都是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时期的人物。从这些姓名所示，他们都是属鞑鞑族人(TARTAR)，正好是现今在该地区居住的大多数民族。铭文是叙利亚文和土耳其文。除了大多数是当地的聂斯托利派信徒外，亦有来自其它地方的，其中有一个中国妇人，一个蒙古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维吾尔族人(UIGUR)，可见当时在中亚细亚各地的信徒，彼此均有交往。墓碑上还记着某人的学问；某人的恩赐；某人殷勤服事教会等等，姓名前多冠以“信徒”二字，笃爱及渴望之情，溢于文中。其中碑文之一二如下：“此为柏实(PASAK)之墓，一生为耶稣我主而活。”——“此为可爱少女茱丽亚(GULIA)之墓。”——“此为肃玛(ZUMA)之墓，身为教士会长，得享高寿，备受敬重，出身贵族，为纪戎哲(GIWARGIS)将军后人。愿我主以其灵联于诸圣父老在永世之灵”——“此为教会访客柏蒙谷(PAG-MANGKU)之墓，为人谦和笃信。”——“此为雪列哈(SHLIHA)之墓，生前注释及教授圣经，负盛名，嘉惠士林，声名响亮，乃父彼得，为尊严智慧之圣经注释家。愿我主使其灵魂与众义人及诸先祖同得安息，同享天上福乐。”——“此为隶克(TAKE)神甫之墓，极其热心服务教会。”

为了争取蒙古可汗的欢心，聂斯托利派教徒与回教教士间，彼此钩心斗角，结果回教徒渐占上风，叙利亚基督教势力日渐没落，十五世纪初期，帖木儿(TIMUR)亦即(TAMERLANE)王朝兴起，建都撒马尔罕；他虽身为回教徒，但在攻陷巴格达后，照样扫荡一空，亚洲大部分地区遭受这空前的浩劫，毁坏净尽，从此一蹶不振，亚洲西部的基督教亦迅速埋没。

在十三世纪以后，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教士，远涉万水千山，向东方传教，抵达中国境内，发现已有不少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方济各教士约翰蒙特可维诺(GOHN OF MONTE CORVING)，于一三二八年死于中国。他曾经记述下面的经历：“我在主历一二九一年离开波斯的陶烈斯(TAURIS)，前往印度，在该地逗留了十三个月，为约一百名信徒施洗。……后来继续前往中国，也是鞑鞑皇的国土，人称元世祖(GRAND CHAM)。我向他呈递我主教皇的函件，劝他改依天主教，信奉我们主耶稣基督。但他迷信偶像，积习难改。但他向教徒态度宽容宏豁，我得以住在宫中，达两年之久。其时有景教，自称基督徒，其教义却违背基督教真理。他们人多势众，不容任何其它的基督教派存在，其它的教派要建小教堂，或印行与景教信仰相砥的教义，亦遭禁止。”苏坦尼亚(SOLTANIA)大主教，于一三三〇年，曾记述过有关蒙特可维诺的事迹说：“他为人正直，蒙神喜悦，受人爱戴。……如果当时没有那些假冒基督徒之名、实际却奉行异端邪说的景教徒诸多阻挠，他大概能把全国人民带领归信天主教。……他与景教教徒极力争辩，劝导他们信奉罗马神圣教会，又告诉他们，非如此不能得救。为此原故，那些景教‘分裂教会份子’，对他极度憎恨。”据说当时在中国信奉景教的人，约有三万，财雄势厚，教堂华丽庄严，其内摆设十字架及纪念神和圣人的各种圣像。“相信如果他们肯与少数教派的教士合作，又和国中其它善良的基督徒和平共处的话，他们很可能使全国人民，包括皇上在内，都皈依真道。”约翰蒙特可维诺本人，在论到他工作的方法时，曾诉说他的弟兄们久疏通信，而他甚为渴望能获悉来自欧洲的消息。他提及有一位周游四方行医的人，说：“他在此地各处故播谣言，诽谤罗马，我们教会和西方社会，有关这些事，我十分希望能获得可靠资料。……”他又去信要求多派人协助他，并说他已将新

约和诗篇翻译成中文，又吩咐人“以最佳书法誊写出来，就是这样，借着抄写、诵读、和讲解各种方式，我为基督的律法作了公开的见证。”

当罗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被伦敦会差往中国从事翻译圣经的艰巨工作前，他在伦敦研习中文。有人将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份中文手稿给他参考。手稿包括四福音合编、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还有一部份是拉丁文——中文字典，据说全部出于一位十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教士的手笔。在中国的编年史记载中，说及在元朝倾亡后，明朝开始（一三六八年）的时候，“有人从大西洋彼岸来首都，宣扬天主耶稣生于犹太地，亦即大秦（罗马）古国；又声称本国在史中早有记载，在世界被造之始就已存在，已有六千年历史；因此，这地无疑是历史圣地，世界文物的发源地，而且应该是天主创造人类的摇篮。这些叙述未免夸大其辞，不足为信。……”

除了在南印度马六巴(MALABAR)沿岸，及他们祖家附近乌律迈亚(URUMIAH)一带，还残留一些叙利亚基督徒以外，以前分布在亚洲各地的波斯和叙利亚教会，早已消散。

一直到三世纪，这些教会在处理教会事务上，都能保持以圣经为根据的纯正作风，他们亦未卷入当时西方教会在神学上的争论，因此，那些跟随使徒遗风的福音使者，被这些教会差遣出去，都能专心尽力传道，在亚洲、甚至在最远的角落，将福音传开，建立教会。四世纪时，罗马帝国内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稍告缓和的时候，在波斯和东方的信徒，就进入火一般试炼的日子，那痛苦的经历，委实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忍受了，并且靠着信心和忍耐，胜过了试炼。事实上，当时教会因巴伯宾阿给所发动的联盟而失去的元气，远比在逼迫试炼中所丧失的为大。这个联盟运动，就为五世纪初叶悉劳西亚会议铺路，引进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制度。但是，因为波斯帝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统治者，始终未有信奉基督教，所以这种天主教制度在东方要施行的时候，就不见要加以修改，以求适应，而因此政教合一，在东方成了不可能的事实；在君士坦丁时期教会因与政府联合而导致的腐化情形，亦因此而不可能在东方重演。为此之故，按理来说，东方教会的情况，应该不会更坏，可惜罗马教会一切组织制度，就如教区组织、僧侣、主教和大主教的制度等，带给教会的影响至大。东方教会舍弃了圣经内有关教会和长老的原则，反而抄袭了罗马教会的体制，结果众人为了争夺主教或主教长的高位，不断引起结党分争，争权夺利，分化了教会的力量，以致虽然也有一些复兴，但对当时教会日走下坡的颓势，始终艇力挽回。教会中有权势的教士，只顾巩固自己的势力，无心寻求圣灵在众人当中运行的明证，亦无心借着神的话，把人领回来一心归服主。

聂斯托利派，曾要把东方教会脱离西方主教的势力，如果他们在当时能使教会恢复依从圣经的样式，按理他们是可以给教会带来复兴的。但可惜的是，虽然他们曾一时激发起传道的火热，却未能挣脱教士的权势，亦未能破除人对圣礼有救恩效验的迷信。当时教会虽未与政府联合，然而受封立的主教长，依旧可以向政府求助去强施教令，所以亦未见政教分离之利；政府亦可以透过主教长去使教会就范。教会听命于悉劳西亚或巴格达，而不是持定元首基督，亦不学习仰望那位“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教徒亦只听命于主教，而不是倚靠那位把诸般恩惠厚赐与众人的圣灵，藉此成圣，并把福音广传。结果，崇拜圣像的风气就有了机会传开，大大削弱了在拜偶像的异教徒中为福音作见证的能力，以致无法抵挡回教势力的狂潮。这本是基督的真理可望发扬光大的地区，至终却完全落在回教的控制之下，时至今日，仍未能脱离它的掌握。

第五章 瓦勒度派和亚勒比根斯派

一一〇〇——一二三〇年 七〇——一七〇〇年 一一六〇——一三一八年 一一〇〇——一五〇〇年

彼得波路(PIERRE DE BRUEYS)——执事亨里(SENRI THE DEACON)——拒绝宗派含意的名称——亚勒比根斯(ALBIGENES)——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弟兄——“完全人”——进占普鲁旺斯——宗教法庭成立——瓦勒度派(WALDNESES)——量尼派(LEONISTS)——名称——谷地的传统信仰——彼得瓦度(PETER WALDO)——“里昂(LYONS)的贫民”——传教活动日增——亚西西的法蘭西斯(FRANCES OF ASSISI)——修道士制度——教会扩展——弟兄们的信仰与实践——瓦勒度派谷地被袭——

在波斯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弟兄们，取道意大利，迁移到法兰西南部，所到各处，都遇见和他们同一信仰的人。他们的教导立刻受到欢迎。罗马天主教的教士称他们为保加利亚派、或迦达尔派、或柏太伦派、或其它名称的教派，还沿用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几百年来的习惯，硬指他们是属摩尼教派。

除了上述的团体外，在罗马教会内自成小圈的一些信徒们也自己聚会起来，这些现象都是一些属灵运动的结果；一些名义上是天主教徒的信徒，离开了他们习惯上所熟识的宗教礼仪，转去追随其它向他们讲解神的话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比较著名的有彼得波路(PIERRE DE BRUEYS)，他满有才干，勤奋不懈、不顾危险，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走遍多芬尼(DAUPHINEY)、普鲁旺斯、兰各铎(LANGUEDOC)、和格司恭尼(GASCONY)等地传道，劝导众人离开从小承受下来的迷信，返回圣经真理。后来他在圣基利斯(ST. GILLES)被焚殉道而死（一一二六年）。他根据圣经，指出人必须等到长成，能自由运用理智时才能受浸；又指出兴建教堂并无济于事，因为神接纳所有出于真心诚意的敬拜，与环境无关；又力指不应跪拜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令我们的主受苦的刑具，所以我们应该对它极度厌恶才是；又说明饼和酒不能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这些都不过是他的死的表记之物；他还指出人的祈祷和善行，并不能令死人得好处。

在克吕尼地方，一位担任执事的僧侣亨里(HENRI)，追随波路左右。他仪表不凡，声音洪亮，口才出众，在传教时大力抨击当时的邪风恶俗。他讲解圣经，说服力甚强，满腔热诚，专心事主，因此吸引不少人悔改归信，其中不乏恶名昭彰的罪人。他们悔改归信以后，整个生命全然改变。反对他的神甫们，慑于他讲道的能力，又因为信服他的人很多，不是大为惊恐。亨里并未因与他情同手足的同工波路被害而畏缩，继续为主作见证。当时天主教会指帕克雷华修道院院长伯尔拿出面与亨里对抗。伯尔拿当时在欧洲，德高望重，只有他才有希望能驳倒亨里。伯尔拿发现教会极其荒凉，大批信徒背离教士，后来虽然亨里被迫暂时远走他方，避开他强大的对手，但伯尔拿的雄辩与努力，亦仅能对当时人心背向的趋势，起一点暂时阻遏作用。这个趋势亦非由于任何一个人所引起，而是所有信徒都受到影响的一种属灵趋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亨里幸免被捕，继续以无畏的精神作工，但至终落在教士们手中，被下在牢内。一一四七年在狱中去世，是病逝还是被处死，都不得而知。

当时的人，长期以来习惯给这些要回转到圣经的原则的信徒加上各种名称，就如甚么彼得波路派(PETROBRUSSIANS)或亨里派(HENRICIANS)等。其实这些名称，从来没有给这些人所承认。克雷华的伯尔拿对此甚感不满，认为他们应该接受以他们教派的创立人姓名为号的名称。他说：“如果你问谁是他们那教派的创立人，他们都说不出是谁。其实哪一门异端是没有自己的创始者的呢？摩尼是摩尼教的皇子与导师；沙彼理派(SABELLIANS)是沙彼理创立的；亚流主义的提倡者是亚流；犹努密派(EUNOMIANS)是犹努密创设的；聂斯托利派亦当然是聂斯托利开始的。照样，这一类的教派，都各有它们的鼻祖；教派的根源和名称，都是来自教派的鼻祖，但对于这些异端份子，（指随从亨里的信徒，译者按。）你们能称他们是甚么呢？委实提不出甚么合宜的名称。事实上，他们的主张，并非得自任何某一个人，也非经由某人来推动。……”结果伯尔拿所得的结论是：他们的主张，是出于鬼魔。

直到十二世纪中叶，教会大会在亚勒比(ALBI)附近的伦拔斯(LOMBERS)举行之前，还没有人听过亚勒比根斯这名号。当时在大会接受审讯的人所承认的信仰，事实上与一般罗马天主教徒所奉行的无异，但因为他们决志不肯为他们所供认的发誓，结果就被定罪。他们所承认的信仰，亦包括了奉行婴儿受洗，可见受当时宗教运动影响的信徒，在与天主教信仰的分歧上，亦有程度上不同的差别。当时的宗教情况相当混乱，各式各样的思潮不断地产生，结果引发出来的，有真理，也有谬误。有一些受盘问后被定罪的人，似乎是神秘主义者；又有一些虽然被控是摩尼教徒，但事实上和那教派全无关系。只是与一些奉行摩尼教的混在一起，无法辨别。

这些弟兄们，人多称他们为“善人”，并且都承认他们的生活行为，确实是为众人的模范，尤其是他们简朴虔敬的生活，与当时教士们的放纵萎靡的行径，成了强烈的对比。

一一六七年，在陀流(TOULOUSE)附近圣卡勒门(ST. FELIX DE CARAMAN)，举行了一次这些教会的传道人会议，由来自君士坦丁堡一位长者主领聚会。他带来了有关他本地教会大有进展的好消息，并提及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德尔马殊亚等地的教会，亦相当兴旺。在一二〇一年，另外由亚尔巴尼亚来了一位探访的长者，给法兰西南部的聚会带来了广泛的复兴。

在这些弟兄们当中，有一部份是专心周游四方传道；他们统称为“完全人”，是套用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廿一节所说的：“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们身上不带分文，四海为家，切切实实遵照主的吩咐去行。但他们亦领会到，不是每个人都蒙召走这样的道路，其它大部分的信徒，虽然他们都承认自己和自己所有的，全都属乎基督，但他们各人仍留在家中，继续尽自己的本份去干活。

在法兰西南部的兰各铎和普罗旺斯，文化发达，远比其它国家先进。那地区的人，从来就反对罗马天主教僭夺权柄，亦从来对罗马教会的命令，置之不理。当时自行在天主教会外成立聚会的信徒相当多，而且人数日益增加，人称他们为亚勒比根斯派。这名称来自这些信徒聚居的亚勒比，但他们自己却从来没有采用过这个名称，而且过了许多年以后，别人才采用这名称来称呼他们。他们与邻近各国的弟兄们来往很密切——这些弟兄们，或称瓦勒度派教徒，或称里昂的贫民(POOR MEN OF LYONS)，或称波各米勒派信徒，或其它名称的信徒——。当时教皇英诺森三世，指令统治普罗旺斯的陀流伯爵雷门六世(RAYMOND VI)，和法兰西南部其它统治阶级和高级教士，要扫灭境内所有的异端份子。这命令如果执行起来，就等于是毁坏全国的人民，因此雷门故意拖延，敷衍着去应付。但不久他和教皇发

生了齟齬，教皇于一二〇九年宣布派遣十字军征伐，依照以往十字军冒死东征要从回教撒拉逊人手中夺回巴勒斯坦圣地时的规矩，所有参加这一场不费吹灰之力便一举攻克法兰西南部的战役的十字军，人人都可获赐各种特别恩惠，如免罪等。这些恩惠，加上掳掠战利品的指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应征。十字军就在西勉蒙德服(SIMON DE MONTFORT)的率领和高级教士监管下出征；蒙德服是个大有才能的军事领袖，富野心，性残酷，他带领十字军克服了这一片风景秀丽、农事发达的地土后，大肆蹂躏达二十年之久，结果人民历尽残害，满地疮痍。当军队招降比雪尔(BEZIERS)的居民时，声言如果拒降，城中将片瓦不留，但其中的天主教徒和拒奉天主教为国教的信徒，一齐联合起来对抗，结果城陷后，藏伏城中数以千计的居民，无一幸免。又当十字军攻陷另一城市绵奈辅(LAMINERVE)以后，发现其中有一百四十名信徒，男女分别集中在两幢房子内祷告，静候他们的噩运。蒙德服吩咐人堆起一大堆木头，命令信徒改依天主教，否则就要推上木堆上；信徒们都回答说：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教皇或主教的命令，只顺从基督和他的话语，结果人将木堆燃起火来，信徒们一点不迟疑地坚定的走进火焰中去。

在一二一〇年，宗教法庭，(或称异端裁判所，译者按)，就在这地点附近，邻近拿邦(NARBONNE)的地方成立，由多明俄会的创立人多明涅克(DOMINIC)监督。后来天主教大会在一二二九年于陀流举行时，宣布宗教法庭成为永久性的组织。当时又通过了提案，只准平信徒读拉丁文写成的诗篇，不能翻阅圣经其它的部份；又决议不准将圣经译为其它文字。宗教法庭的使命，可以说是完成了十字军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后来弟兄们纷纷逃往巴尔干半岛，亦有不少四散到邻近的地区。普罗旺斯经此浩劫后，文化荡然无存，而这些南部自立的省份，不久亦合并归大法国的版图内。

在皮特芒(PIEDMONT)的阿尔卑斯山谷一带，几百年来都有自称弟兄们的信徒在此聚会。后人称他们为瓦勒度派信徒(WALDENESES，或作 VAUDOIS)，但他们却不承认这些称号。他们的根源，可追溯到使徒时代。他们就如那些所谓“迦达尔”信徒、或“保罗派”信徒，或其它名称的信徒一样，绝对不是甚么“改革宗”，因为他们无需改革，并非如罗马、希腊、或其它地方教会那样，腐化堕落，离开了新约教会的样式；他们自始至终，都或多或少保存了使徒时期教会的内容。自君士坦丁时期相沿下来，那些专心传讲福音，建立教会的信徒，一直没有中断过，也没有受当时的教会与政治联结的关系所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在托勒斯山脉和亚尔卑斯山谷一带，得以存留为数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熟谙圣经，而且没有沾染当时得势又自命为教会的天主教会拜偶像及其它的歪风恶俗。

在亚尔卑斯山谷地的信徒，在群山环抱中离世独居，全未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发展所影响，深信圣经是他们当时的信仰与教会秩序的准绳，也坚信圣经的权柄并未受时移世易的影响而减弱。他们所有的思想和行为，可说都是基于他们坚守原来的基督教会所该有的纯正的决心。他们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态度，比较上是相当宽容，可见他们并非属于“改革宗”，因为一般改革者为了要表明自己立场的正确，不免会把改革的对象尽量丑化，揭发对方丑恶的一面，但从这些信徒对退出罗马教会的人的态度，和日后他们与改革宗信徒的交往所见，证明他们绝不讳言那迫害他们的教会的长处。

死于一二五九年的宗教法庭裁判官雷尼里亚(REINERIUS)曾经这样说过：“据统计所示，古时异端教派，多至七十种，其中除了摩尼教派、亚流主义、伦卡利教派(RUNCARIANS)和影响德国至大的量尼派之外，其它教派均已全部消灭，感谢神恩。在这一切教派中，包括现存的和以前出现过的，对教会

遗害最深的，莫过于量尼派，原因有三：(一)量尼派历史由来已久，有人说是在西利维斯特任教皇时期就已存在，亦有人说他们源出于使徒时代；(二)量尼派教徒分布较广，几乎各地都有他们的聚会；(三)其它教派恣意褻渎神，不免叫听道的人反感恐慌；但量尼派的教徒，外表敬虔，在人面前生活正直，笃信教义，敬畏神，只不过他们毁谤罗马教会和天主教的神甫，这一点缺德是许多信徒都乐意指证的。”后来有一位名叫皮里道夫(PILICHDORF)的作者，他本身也是反对这些信徒的，他说这些自称由西利维斯特任教皇时代就开始存在的教徒，正是瓦勒度派信徒。

有人说：突伦主教革老丢，是皮特芒山区瓦勒度教派的创始人。他与这些信徒在信仰上，有不少相似之处，相信他们一定曾经彼此扶持，彼此激励。但称为瓦勒度派的信徒，历史更为悠久。突伦的圣乐署 (ST. ROCH)修道院副院长马可奥吕利乐伦高(MARCO AURELIO RORENCO)，在一六三〇年受委编写瓦勒度教派的历史和主张。他说：瓦勒度教派的渊源，古老得没有人能说出他们始于何时。总之在第九及第十世纪时，他们已不算是新兴的教派；而且在第九世纪时，当时的人还认为他们不过是鼓吹和推动前人的一些学说；乐伦高还说：突伦主教革老丢可算是这些鼓吹推动者之一，因为他也反对崇拜十字架，反对敬拜圣人，也极力主张破除偶像。革老丢在他所著的加拉太书注释中，明言因信称义的真理，并且指证当时教会离开这真理所犯的错误。

居住谷地的弟兄们，从来就没有忘本，也深知自己这教派存在的由来而久。后来在十四世纪以后屡遭外人侵犯而须与强敌谈和时，他们亦经常强调这一点。当时和他们有过长时期交涉、统治赛华(SAVOY)的皇侯们，也证明他们从来可以坦言自己所持的纯一信仰，自父传子，没有任何掺杂，而且直追远古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使徒时期。一五四四年，这些信徒对法国的法兰斯一世说过下面的话：“我们所奉行的信仰，并非如敌挡的人所诬告我们的所谓现代宗教，也非近年新兴的学说，而是我们的父执、长者、以至更远古的先人们所信奉的，也是诸圣者、诸殉道者、和众使徒所信的。”当他们在十六世纪与改革宗发生接触时，他们这样说：“先祖常向我们细述自使徒时代以来的历史，但我们仍同意你们的主张；事实上，我们从使徒时代开始，就一直持守这信仰。”后来瓦勒度派信徒在一六八九年重返谷地时，他们的领袖亨利亚诺(HENRI ARNOLD)指着他们说：“他们的信仰纯朴自然；他们的名声叫人起敬。这些特性，连敌对他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宗教裁判官雷尼里亚，在向教皇提出研究这教派信仰的报告中，说：“他们实在是源出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亚诺还补充说：“这群可怜的信徒，在皮特芒山谷一带，已存在了四百多年；要证明这一点事实，并非难事。当时，那些著名的人物如路德(LUHER)、加尔文(CALVIN)等，均未出现，改革宗亦未萌芽。他们的教会亦从未经过任何的改革，因此他们得称为‘福音派’。瓦勒度派信徒，事实上是从意大利来的信徒的后人，他们在意大利接受了圣保罗所传的，就离乡别井，远走他方，就如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妇人。他们来到这一带山地，把福音由父传子、子又传孙地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所传的福音纯正真朴，就如当日保罗所传的一般。”

里昂的彼得华度，原是个事业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但有一次在宴客时，目睹一位客人猝然去世，蓦地醒悟自己对救恩的需要。后来他研读圣经，愈读愈感兴趣，终于在一一六〇年，雇文士把圣经部份翻成罗马方言。他读到圣亚勒克修的生平，其中记载他变卖所有家产，然后往圣地朝圣的事迹，深受感动；后来有一位研究圣经的学者，给他指出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廿一节所说的话：“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于是在一一七三年，他

把产业给了妻子，把其余的全部变卖，分给穷人，接着花了一段日子专心研读圣经，然后出外传道（一一八〇年），并依照主的话去作：“主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罢，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后来其它信徒陆续参加，与他作伴，周游四方传道，这些信徒就是人所称“里昂的贫民”。一一七九年，他们向由教皇亚历大三世主持的勒特兰(LATERAN)会议请求承认，但受到奚落和拒绝，而且还遭皇上敕令予以驱逐出教（一一八四年）。他们分散到附近的国家，继续传道，效果甚宏，而“里昂的贫民”这个称呼，也就成了给这些跟随基督并坚守祂的教导的信徒许多称号中的一个。

又有另外一位裁判官，奥斯堡的大卫(DAVID OF AUGSBURG)说：“这些里昂的贫民和他们的同类愈艰险，就愈能装出敬虔的外貌。……从外表看来，他们的生活表现得谦卑庄重，但内心却充满骄傲。”他又说：他们自以为多有敬虔，却不知道“我们当中的敬虔人，比他们的更多、更好，也不像他们那样仅有敬虔的外貌；在这些异端份子身上，所有都是给假冒为善遮掩起来的恶毒。”有一本编年史中还提到，早在一一七七年，“彼得华度由里昂来到法兰西，在法兰克幅和诺伦堡 (NUREMBURG)开始传道，但在努仁堡所举行的宗教会议，很早就获得教廷的警告，并受命要捉拿他们，烧死他们，因此这些信徒就转去波希米亚隐藏起来。”彼得华度和瓦勒度教徒往来密切，因此人称他为这教派的创始人；但也有其它人称他们为华伦斯教徒(VALLENCES)，是以他们所聚居的亚尔卑斯山谷地为名。不错，华度在他们中间，备受敬重，但他不可能是创设教派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仰和行为，都是以圣经为依归，而且是跟随更早时期奉行圣经的人的脚踪。外人以他们中间的名人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不外又是仿效敌对他们的人的手法，又不肯承认他们是自称“基督徒”或“弟兄”。彼得华度往各处传道，至终来到波希米亚，劳苦作工多年，播下佳美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日后的胡司(HUSS)和以后时期所收获的属灵庄稼。华度在波希米亚死于一二一七年，追随他的人，成了瓦勒度派信徒传道活动的非常动力。以前这些信徒一直隐居在这些偏僻的谷地，不问世事，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纷纷前往各地传道。

在罗马天主教教会内，有不少人的心灵，因着教会爱世界的歪风，深感痛苦，极力想寻求灵性的复兴。但他们又不愿意脱离天主教的体系，也不想加入当时教外其它寻求遵守圣经吩咐的信徒聚会。一二〇九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派遣十字军征伐法兰西南部，同年冬天，廿五岁的亚西西的法蘭西斯，在一次早晨弥撒中，听见主在太福音第十章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外传道时对他们所说的话，恍然领悟这正是他所渴望得着的更新，感觉他必须撇下一切，谦卑接受主差遣去传道。方济各会就是如此诞生了，不久即传遍世界。法蘭西斯传道感人，他的真挚、忠诚、和喜乐的天性，吸引了大批人来听道。一二一〇年，他由一小群跟随者陪同下，往罗马请求教皇准许他们传教。教皇勉强在口头上批准了。后来志愿加入的人日多，其中有人又想同时维持自己的工作及事业，结果第三级教士(THIRDORDER)应运而生，(亦叫 TERTIARIES)。这些会员，一面从事俗务，一面恪守教规，作为生活准则。这些准则，都是根据主耶稣吩咐使徒的教训。他们决志将讹诈人的东西退回；与仇敌和好；与世人无争；专心以祈祷和行善为事；励行禁食和彻夜祷告；向教会作十一奉献；不发誓；不随身带武器；不说粗言秽语；纪念先人。法蘭西斯灵里迫切寻求外教人和回教徒悔改归信，也巴不得他本国意大利人早日信主；有两次为了要向巴勒斯坦和摩洛哥的异教徒传道而几乎丧命。一二一九年，方济各会举行第二次大会时，

派出许多教士往各国去，由德国以迄北非，甚至以后还到英国去。当时有五个教士奉差遣到摩洛哥，结果殉道。方济各会组织日益膨大，法蘭西斯无法再由自己一个人去管理，大权落在其它的人手中。这些人并不完全同意法蘭西斯的主张，修改了有关教徒要甘处贫穷的教规，使法蘭西斯甚感痛心。在他死了以后（一二二六年），很早就存在于各执一见的两派间的裂痕，更形尖锐。这两派，一主严谨，一主放宽；主张严谨的一派，又叫属灵派，渐渐失势，且受到迫害，其中有四位教士在马赛(MARSEILLES)被焚死（一三一八年），同年教皇正式宣布，凡认为基督和他的使徒是身无分文的，均属异端。

这些教士的新组织，就如多明俄会和方济各会，所持的心意，与旧有的修会一样，志在脱离当时充斥世界和教会的一切叫人无法容忍的罪恶，心灵内迫切追求亲近神。但旧有的修会，主要着重个人得救和成圣，新兴的修会则较着重帮助困苦的人。以上两种组织，虽然一时颇能引人向善，但因为都是以人的思想为基础，很快就败坏，且成为作恶的工具——积极抵挡那些以奉行圣经和传讲圣经来寻求复兴的信徒。

这些修士和日后的教士的景况，表明了一件事：属灵的运动，如果只限于罗马天主教会或其它类似组织的范围内，就注定失败，而且无可避免会沦落到一个地步，与他们原来想改革或振兴的情况相似。为了要免受迫害，他们就竟连属灵的生命也牺牲了。

亚西西的法蘭西斯和彼得华度，同样地受主的话语感动，同样地完全忠心的向主摆上自己，结果他们所摆出的见证和教导，同样地得着多人拥戴，同样地使人的生命完全改变，但是，两人却有一点不相同的，那就是：其一受罗马教会所容纳，而另外一个则不见容于罗马教会。两人在灵里向主的心也许相同，但两人所活出来的生活见证，却大有分别。方济各会后来结果为罗马教会所同化，成了罗马教会的帮凶，而华度和跟随他的人，却带领了不少人回归圣经真理，直接从“救恩的源头”支取新鲜活泼及取之不竭的生命供应。

一一六三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都尔召开教会会议，会中议决禁止教徒与瓦勒度派有任何交往，又申斥他们“奉行可咒可诅的异端，而这些异端早就在陀流地区流行。”在十二世纪末期前，在米兹(METZ)有一个瓦勒度派教会，信徒甚多，还有翻译好的圣经应用。在科伦(COLOGNE)的教会，远在一一五〇年前便存在；当年他们当中有些信徒被处死刑，裁判官当时还说：“他们不但从容就义，而且还满腔热切去面临死亡。”一一九二年，西班牙皇帝阿勒芬所(ALFONSO)下论贬斥信徒，声称他是照前人先例去行。当时信徒遍布法兰西、意大利、奥地利、和其它许多国家。一二六〇年，在柏梭(PASSAU)主教管内，已有四十二个教区存在，其中一位神甫这样说过：“在伦巴第(LOMBARDY)、普罗旺斯、和其它地区，异端份子的学派比正式神学的教派更多，听从他们的人也不计其数；他们公开辩论，又在市集和户外地方召集圣徒严肃聚会，没有人敢拦阻他们，因为大家都慑于他们人多势众。”在一二二二年，史塔司堡(STRASSBURG)的多明俄会，逮捕了五百名属于瓦勒度派的信徒；这些信徒来自不同的阶层：有贵族、有教士；贫富不一，有男有女。这些下狱的信徒供认在瑞士、意大利、德国、波希米亚等地，有不少与他们信仰相同的信徒；其中有八十人，包括十二位教士和二十三名妇女，结果被焚死。带领他们的长老，名叫约翰，他临刑前说：“我们都是罪人，但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问题，我们亦未犯任何诬告我们僭妄的罪。但是，我们满心相信自己的罪必得赦免，却非出于人的帮助，也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这些给处死的信徒的财产，就由罗马教会和政府瓜分，当时政府对罗马教会亦唯命

是从。一二六三年，教皇贵钩利九世颁下教令，吩咐“将所有异端份子，包括迦达尔斯、柏太伦、里昂的贫民、巴实给尼 (PASSAGINI)，约瑟彼尼甯(GOSEPINI)、亚诺迪司德(ARNOLDISTAE)，士昆隆尼斯德(SPERONISTAE)，和一切不论任何名称的教派，全部逐出教会。他们各派名称不同，但事实上暗中彼此勾结，臭味相投。”裁判官奥斯堡的大卫还承认以前“这些教派属于同一教派”，现在则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联成阵线。从这些来自不同来源的零碎报导中，可见这些原始教会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期间，遍布欧洲。在某些地区，人数颇多，势力亦大，因此享有相当自由；但在其它地方，却受到极残暴的迫害。这些教派虽然名称不同，所持意见亦可能各异，但基本上他们都是持定同一的信仰，而且彼此间经常有交通与联系。

这些称为瓦勒度派或其它名称的弟兄们，在教义上和行为上所显出的特色，表明他们并非是罗马和希腊教会酝酿改革的成果，为使他们回转到圣经原则而努力；相反地，他们的表现，显示他们本身并未受罗马和希腊教会的任何影响。反倒是一个古老传统的延续，就是坚守圣经和初期教会的样式。他们的存在，证明了自古以来，都有一些凭信心而活的信徒，满有属灵的能力和悟性，在教会中坚持使徒时代的样式，根本上与后来发展出来的国家教会，大不相同。

除了圣经以外，他们并没有其它特殊的信仰、或宗教、或教规。对他们来说，人的权威不管如何突出，都不许超过圣经的权柄。数百年来在各地，他们一致奉行同一的真理和实践。他们以福音书中基督自己的话语为最高的启示。如果偶或不能把他的话语和圣经其它教训协调起来，那么他们就会把两者都接受下来，都会依照他们在福音书中所能领会的明显意思去行。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跟随基督，遵守祂的命令，效法祂的样式。他们相信基督的灵在人身上大有功效，然而功效的大小，就视乎人顺服祂话语和甘愿跟随祂的心愿有多少。只有基督才能叫人明白祂的话；人若爱祂，就必遵守祂的话。对于有关交通的建立，他们提出一些要紧的真理，但除此以外，对众人有疑惑或歧见的细则，他们都容许相当的自由。他们强调基督的灵内住在人里面的明证，认为最高真理必须先由心灵去领会，然后才转到思想方面。这并非指有新的启示而言，而是指着对基督的话有更清楚的领会。他们最爱引用的经文，是山上宝训，认为这些教训正是神儿女生活的准则。这些弟兄反对流血，反对死刑，反对在信仰的事上施武力，也反对向伤害自己的人提出法律控诉。但他们大多数赞成自卫，甚至武装自卫，因此居住谷地的信徒，在遇到侵犯时就起来自卫。他们绝不轻易发誓，不妄称神的名，也不随便借用属灵事物的称呼，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同意与人立誓。他们不同意罗马天主教所自诩的掌管救恩之门的权柄，亦不相信救恩要靠圣礼，只承认救恩是出于相信基督的信心，而这信心自然会显在爱心的行为上。他们相信在拣选的事上，神有绝对的权柄，配合人自由的意志。他们又相信教会内随时都有认识神的人，因此他们也引用安波罗斯、奥古斯丁、屈梭多模 (CHRYSOSTOM)、克雷华的伯尔拿，和其它人等的著述，但并非全部接受这些内容，只是采用其中与那古老更纯正的圣经教训符合的主张。他们并不像其它教派那样热忠于神学问题的辩论，可是却随时准备拼死为真理辩护，极力强调实际的敬虔和安静的行善并事奉神等善行。

在处理教会的事务上，他们主张简化，绝对不是罗马教会所发展出来的那一套。但教会长老们对承担责任所采取的态度，十分严肃郑重。在选立长老和其它的安排上，全教会与其它的长老一齐参予其事。在守主的晚餐方面，两种方式都采用。所有的信徒一起守主的晚餐，纪念主的身体为他们摆上，

激励他们也将自己摆上，为主破碎，倒空自己。有一个反对他们的作家，笔名叫雷玛(REIMER)（一二六〇年），这样说过：“有些人对浸礼完全误解了，以为小孩子并不能靠水礼得救，因为他们相信主所说的那句话：‘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而小孩子是还不会相信的。”

这些信徒坚守使徒的传统，为那些确实蒙恩召的人接手，指出在教皇西利维斯特接受政教合一时，罗马教会就已失去了继承使徒的地位，而这些信徒则仍保存了这地位，虽然有时因环境的关系，他们不能运用这个地位，但神仍然给他们所需要的恩典。

在这些信徒所作的见证上，那些称为“使徒”的信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经常周游传道，探望各地的教会，而教会的长老和监督，则留在原地照顾教会。在所谓“完全人”和其它跟随基督的信徒中间，彼此有别；因为从福音书中所见，有人蒙召，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基督，但亦有人保留原来的身份，蒙召事奉祂。瓦勒度派的使徒身无长物，也没有自己的家；就算是有家人的，他也离开他们好专心服事主，完全舍己，甘愿忍受艰苦和危难，他们的行装极其简单，也不带分文，衣服也只有身上所穿的，他们所到之处，那地方的信徒就供给他们生活的所需。他们常是两个两个的出去，其中一个为长者，另外一个为较年轻的，就学习服侍长者。他们在所到的各处，备受尊重；各地教会都尽力以爱心接待他们。当时因情势险恶，他们多扮作商旅上路，年轻的一个便背起轻便的货色，或刀子，或缝针之类，到处兜售。他们从来不向人乞讨，其中不少使徒熟习医术，以便可以一面传道，一面给人医病，因此不少人称他们为“神之友”。教会要选立使徒服事主的时候，都先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真正全心奉献的人的事奉，要比一百个并未清楚蒙召的人的工作，要有价值得多。

使徒们甘愿过贫困的生活，但教会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照顾贫困的人，所以每当聚会用的家庭不敷应用而须要盖简陋的会所时，他们就多盖一些房子，接连会所，以便接待和照顾贫穷或年老的信徒。

这些教会为了供应信徒属灵生命的需要，鼓励各人经常读经，经常每天在家里聚会，保持彼此间紧密的交通，这一切都是他们十分注重的。

这些圣徒从不过问政治，使徒们或许常要出席仲裁的场合，但他们自己从来不但任裁判。

他们注重教育，就如注重灵性一样。他们当中负责讲道的信徒，许多都有大学的学位。教皇英诺森三世（一一九八——一二一六年），指出在瓦勒度派中，有学问的平信徒，取代了神职人员的地位；又说他们只听有神内住心中的人的传道；教皇这一席话，无形中为这些信徒作了双重的见证。

在瓦勒度派信徒居住的谷地一带的安宁，到了一三八〇年就给粉碎了。那年教皇克力门三世(CLEMENT III)，派遣一位当裁判的僧侣到该地对付异端份子。接着来的十三年间，大概有二百三十位信徒被烧死，家产被裁判官和当地政府瓜分，到了一四〇〇年，迫害范围扩大，许多信徒只好逃到较高的山地上去避难，结果大部份妇孺和许多男丁，在饥寒交迫下相继死亡。一四八六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下令授权喀利孟那(CREMONA)的副主教，灭绝所有异端份子，于是派出八万人进侵谷地。谷地中的农民只好起而反抗；他们熟谙该区山地的情况，占尽地利的优势，终于把入侵的军队击退。但双方的冲突，持续了一百年之久。

打从十三世纪开始，就出现了一些收容穷困或年老体弱的人的组织。受收容的人各尽所能的分工合作，但生活费用由一些富有的慈善家捐助。这些被收容的人无须许愿，亦无须出外乞讨，因此有别

于一般的修道院。但是这些组织也是属宗教团体的，称为济贫院(WORKHOUSE)，其中所收容的人，自称“基督的穷人”(CHRIST'S PAUPERS)。济贫院多附设疗养院，由一些女信徒护理病人，男信徒则为他们开设学校。他们自己喜欢称这些组织为“神的家”，后人却称他们男的叫伯赫人(BEGHARD)，女的叫伯翰人(BEGHINE)。这些组织开始成立不久，人就怀疑他们有异端的倾向。事实上，在信徒受迫害的日子，不少弟兄曾在这些济贫院中藏身，因此渐渐被人认为是传播异端的团体，结果其中的一部份人被处死。十四世纪后期，由天主教会下令接收这些济贫院，将大部份移交给方济各会的第三级教士接管。

第六章 中世纪末期的教会

一三〇〇——一五〇〇年

弟兄们给其它地方的影响——巴都亚的马尔西革流(MARSICLIO OF PADUA)——同业工会——建筑大教堂——市民和工会的抗议——科伦的华尔德(WALTER IN COLOGNE)——多马阿奎拿(THOMAS AQUINAS)和阿尔韦聿伯拉纠(ALVARUS PELAGIUS)——弟兄们的文献被毁——伊克哈尔特(ECKHART)——图勒尔(TAULER)——“九块石”——来自奥拔仑(OBERLAND)的“神之友”——逼迫复燃——记载众教会坚守信仰的史塔司堡文献——在塔尔(TEPL)发现的古卷——古时译成德文的新约圣经——狂热的盲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发明印刷术——新事物的发现——印刷圣经——柯列持(COLET)，锐赤林(REUCHLIN)——伊拉斯母(ERASMUS)与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平改革的希望——罗马教会的反抗——施道比次(STAUPITZ)发现路德(LUTHER)

瓦勒度派使徒们和弟兄们的见证，影响所及的范围，远超出他们生活工作的圈子，在十四世纪的上半期，他们给别的地方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

一三〇二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下令，宣告人人都必须服从教皇，否则灵魂不能得救，从这命令演译出来的结论就是：除了教皇以外，神没有在上世赐下别的权柄。巴维利亚(BAVARIA)的勒威格(LUDWIG)皇帝率先提出抗议，结果教皇在巴维利亚大部份地区施行褫夺教权的禁令。

这次冲突的主要起因，是因为巴都亚(PADUA)的马尔西革流(MARSIGLIO)的论著。教皇宣称他是前所未有最恶毒的异端份子，但巴维利亚皇帝却信任他，保护他。他出生于巴都亚(一二七〇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成绩超卓。一三二四年，他发表了“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一文；在文中，他根据圣经，明显指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他说：今人以教会的牧师、主教、神甫和执事等，代表教会，这是与使徒的教导，大相违背。使徒所指的教会，就是全体信徒，因此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林前 1: 1-2)。他又指出：人误用了这个名词，并不是出于疏忽，而是经过周密的考虑，认为有利于教士的特权，才故意加以歪曲；这样作，实在是给基督教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故意歪曲教会的意义，再加上误用的经文，就产生了整个教士统治的体系，违背了圣经和基督的命令，僭夺了属灵和属世的最高裁判权威。事实上，主教和神甫所享有的权力，应该是来自基督教会的，而一切教师或牧者，都没有强迫人顺服或惩戒人的权力。那么，谁有权力选立主教、牧师等

神职人员呢？以使徒而言，基督是一切权柄的源头；以使徒的后继者而言，选立的权柄是在于使徒；使徒离世以后，选立的权柄就归到全体信徒身上。使徒行传所记载有关拣选司提反和腓利的经过，就是个例子。在使徒时期，尚且是教会才有这个权柄，何况在使徒离世后，岂不是更应该只有教会才有选立的权柄？

在大城市中，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多人参加了教会，尤其是各种工会或商会的会员。在意大利和法兰西，人称这些弟兄们为“织布者”，意思指他们多是手工艺工人，连身任教师的也不过是织布者或制鞋匠，含行讥讽之意。这些行会势力颇大，在各国还有分会，分布极广，由葡萄牙以迄波希米亚，又由英格兰至西西里。工会各有精密的组织，彼此间的关系密切；组织不但是技术性的，也属宗教性的。在他们的活动中，读经和祷告都占了重要的地位。行会中势力最大的，首推石匠工会，会员包括各种建筑工人。这个工会的势力和重要性，由当时的无数大教堂、教堂、会堂和房屋建筑上的瑰丽雄伟，可以窥见一斑。这些华丽的建筑物，都是建于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直到今天，这些建筑使欧洲别具风格，迷人之处，无与伦比。在建筑大教堂时，工地盖起临时房屋，供工人住宿；在这些房子内，工人聚集，听师傅读圣经，而当时在其它的地方，如果人拥有圣经，可以招致杀身之祸。有好些与建筑行业毫无关系的人，例如妇女、店员和其它人士，只须付一笔微不足道的会费，甚至一罐蜜糖或一瓶酒，就可以加入成为会员。有时这种会员人数比工人会员更多，他们也乐得在工会荫底下逃过迫害，而且又有机会听神的话。当时工艺品的精美，可以说是归功于辛勤耐劳的工人们内心里火热的灵性。

当时帝国大城市内的人民和工会，都支持勒威格皇，与教皇极力争辩。结果在教皇所施的褫夺教权的禁令下，大受磨折。一三三二年，有几个城市联名上书直里维斯的副主教，宣称在地上所有君王中，勒威格皇是最真诚随从基督的教训而活的，在信仰和谦和的态度上，也足为众统治者的模范。他们又说：“无论何时，我们都乐意坚定效忠祂，虽死不辞；我们愿意真诚的跟随祂，信服祂，以祂为我们真正的君王和顺理成章的主宰，不管是苦难、或环境改变，都不能使我们与祂疏离。”他们往下说的时候，又举出太阳和月亮，比喻教会和政府两者间的正常关系，世人因要得着地上的荣耀，不惜破坏这个正常关系，使他们痛心疾首。他们不承认教皇拥有无上的权威；他们甘心作个“穷苦的基督徒”，祈望人不再伤害基督教的信仰。

几百年来，史塔司堡和科伦是弟兄们的主要集中地，神的教会在那里极其兴旺，也影响到信徒生活圈子外的人。有一本编年史指出，在一三二二年，有一位名叫华尔特(WALTHER)的弟兄，从买音慈(MAINZ)来到科伦。编年史中记着说：“华尔特是弟兄中为首的，是个危险的异端倡导者，多年来隐匿起来，还引诱多人跟从他的谬误；后来他在科伦附近被捕，经法庭判决用火烧毙。他内心充满魔鬼，才干过人，但常犯错误，巧言善辩，信仰败坏，不论威迫利诱，甚至酷刑，都不能令他供出其它的同党。这个罗拉德党人华尔特，来自荷兰，不懂拉丁文，用德文写了不少有关他那错谬信仰的著作，还暗暗地把这些著述分送给那些受他勾引误入迷途的人。他不肯悔改，又不肯放弃信仰，一味维护自己的荒谬言论，结果他被扔入火中，只剩下一堆灰烬。”

多马阿奎拿(THOMAS AQUINAS)的著作，大有助于申张教皇的权威。他辩说：既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基督，而教皇是代表基督，因此教皇亦理所当然地拥有这些权柄。阿尔韦聿伯拉纠(ALVARUS PELAGIUS)，是个西班牙籍的方济各会教士，也支持这个见解，他的著述亦备受推崇。他说：

“人若以属灵的眼光看教皇，他就是神，不是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自由决定是非善恶；若有人怀疑这宇宙间的大能，等于是自取灭亡。教会最大的仇敌，是那些异端份子；他们不肯顺从。这些异端教徒在意大利和德国为数不少，在普罗旺斯，他们是称为‘伯赫人’和‘伯翰人’。有人称他们为‘弟兄’，或‘生活贫困者’，或‘使徒’。”他又接下去说：“使徒和伯赫人，都居无定所，上路时不带分文，不求乞，但又不作工。在他们的情况来说，这是最坏的现象，因为他们以前是建筑工人、石匠等。”另外一个作家（一三一七年）说：当时的异端在神甫和僧侣中，散播迅速，整个阿尔塞斯(ALSACE)都充满了异端。

当时的人要消灭这些所谓异端书籍，可说是不遗余力。一三七四年，史塔司堡出了告示，谴责这些散播异端的出版物和作者，命令凡拥有这类书籍的市民，都得在十四天内将全部收藏交出来，否则要处死。一三六九年，查理士四世指派几个裁判官，把平民或教士所交出来的书籍逐本检查，当时一般人都不准翻阅任何以德文写成的评论圣经的书籍，因为教廷恐怕他们会受伯赫人和伯翰人的异端所迷惑。

一三〇七年，萨克森(SAXONY)的多明俄会副会长，正是著名的伊克哈尔特(ECKHART)。他在巴黎大学时，就已被人公认为当代最有学问的学者。他言论激进，结果使他丢了显贵的职位。但过了一段销声匿迹的时期后，他再度在史塔司堡出现。他讲道时那撼人心弦的能力，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听众跟随他。史塔司堡的伯赫人常常引用他的话，结果他也被指为异端份子，被迫迁往科伦，在该处传道多年，据说后来他在该地大主教面前以异端份子罪名受审判。后来案件转呈给教皇亲自处理，结果他被定罪，作品列为禁书。但他本人圣洁的生活和高尚的性格，继续留下深远的影响。苏所(SUSO)就是从他获悉平安的福音；还有，在科伦他认识了年轻的固勒尔(TAULER)，也给他引导和影响。

在巴维利亚王勒威格与教皇的争辩中，著名的多明俄教士图勒尔博士，勇敢地为国王辩护。图勒尔不但在史塔司堡吸引了大批信徒跟随他，备受爱戴推崇，同时在其它许多国家中，他的传道工作亦早已享誉载道。一三三八年褫夺教权的禁令实施后，大部份的教士都离开了史塔司堡，但图勒尔仍留在城中不走。当时的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中，使他有更多机会作工。他也走访其它落在同样难处中的地方，就如巴色(SASLE)和科伦。过了十年，史塔司堡的信徒备受折磨，图勒尔坚守本位，还与两位信徒合作，一同为这些备受痛苦惊吓的人服务。他们三人联名列出公开函件，为在禁令下煎熬的人民请命，指出基督既为众人死，教皇就没有权可以拦阻人进入救恩之门，这些人不过是不顺从他，只顺服那位真正的君王基督。函件公开以后，这三个人就被逐离开史塔司堡，他们移往邻近一间修道院继续写作，然后将这些公开信分发出去。以后图勒尔迁往科伦居住，在圣各陀勒(ST. GERTRUDE)教堂讲道，然后又有机会返回史塔司堡，最后死于该地，享年七十岁，死前患上痼疾，由他一位在修道院当修女的姊妹料理他。

在他的一生中，屡次被人指控为异端教徒；在自辩时，他说自己是属于“神之友”。他说：“这世界的王正在把野草杂种在玫瑰丛中，玫瑰都给挤住了不能生长，也有被杂草刺伤的。孩子们，你们必须逃避，或分别出来，不管是在修道院内还是在院外，都要分隔开来。神之友不过是要与世界之友有别，这一点事实，不能构成他们就是异端教徒的根据。”当人指斥他的教训是属伯赫派的时候，他就警告说：那些“在寒冷和沉睡中的人”，一心相信他们已经完成了“那神圣教会所命令”要履行的一切，

可是，“当他们完成了这一切以后，心里仍旧没有平安，一定要等到天父永生的道临到他们，叫他们里面更新，使他们成为新造，那时才会得着真正的平安。可惜他们没有这样的等候，反而自欺欺人说：”我们属于一个神圣体系，有神圣的交通、祈祷、读经。“于是自以为平安无事。这些瞎眼的人，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祂宝贵的血为寻常，也不为主结果子。孩子们，这是不行的，绝对不能如此。……当有人警告他们，指出他们身处的危机和他们所要面临的恐惧战兢时，他们就会反唇相讥说：“你们说话就像伯赫人一样。”他们竟如此反驳那些关心他们、要把正路指示他们的人。图勒尔又指斥那些教士自以为义，委实是“法利赛人”，是他们想毁坏“神之友”。耶稣会的会长（一五七六年）曾下令不许人阅读图勒尔的著述，而教皇西克斯都五世(SIXTUS)曾以这些禁书的索引为题发表讲章（一五九〇年），图勒尔的著作中被天主教教会认为异端成份特别重的，统统给烧毁，其余的就全部给人加以修改。此外，有些书根本不是伊克哈尔特或图勒尔所写的，但都上在他们的帐上，因为当时对信徒普遍的迫害，许多书的真正作者都隐名埋姓。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书籍中，我们可以见到图勒尔对弟兄们和基督教会深切关怀。

有一本书名叫《图勒尔悔改的经过》，通常附在图勒尔的讲章后面，该书流传甚广，但显然并非出自图勒尔手笔。书中内容记叙一位著名的传教神甫，从一位虔诚的平信徒得着指引而悔改归主，这书与另外一本影响当时信徒颇深、书名叫《九块石》的书，颇有关联，后者据说是苏所著的，但这版本是来自卢文密思允(RULMAN MERSWIN)的一份手抄稿。密思允是个有钱的史塔司堡市民，也是图勒尔最亲密的朋友。苏所把抄稿内一段删除了，以免引起罗马天主教会人士的怀疑；这段内容，正好是当时弟兄们意见的写照，大意是如下：“我告诉你们，你们求神施恩给可怜的基督教会，这是对的，因为好几百年以来，基督教会从来未有如今天这么可怜和堕落。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说：那些可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失丧的，那又不对了；我告诉你们：今天，一部份外邦人和犹太人得神的悦纳，还远胜于一些徒负基督徒的虚名而实际上违背基督真理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论在世上何处，他们的内心起码还有一点良善和敬畏鬼神的心；在他们的纯真和判别的理解力上，他们除了与生俱来的信仰外，并不知道别的，但当他们有机会获悉真正被神悦纳的信仰时，便会留心，而且乐意放下原来的认识，顺服神，甚至牺牲生命和财产，亦在所不计。我告诉你们，既然犹太人和外邦人能有如此真诚的表现，他们岂不该多得神的爱顾，胜于那些可恶的虚假的所谓基督徒吗？这些基督徒居然还受了水礼，行事却与神相违，明知故犯。”苏所还修改了另一段记载犹太人受迫害的原因，原文是说：他们受迫害，是因为基督徒的覬覦，但苏所把意思改为是出于犹太人的忌恨，这也正是一般读者较易接受的说法。

与图勒尔经常接触的许多敬畏神的人物中，最有趣的，莫如一位姓名已失传，外号叫作“来自奥拔仑的神之友”(FRIEND OF GOD FROM THE OBERLAND)。这人首先在一三四〇年出现，当时他的身份是因逼迫而隐名埋姓的“使徒”中的一个，极具影响力，也大有权能，他能操意文与德文，曾往意大利与匈牙利探望弟兄。一三五〇年左右，曾到访史塔司堡，两年后又重返该地探望，在该地邂逅卢文密思允，把《九块石》交他抄缮。一三五六六年，巴色地震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会，指出唯有跟随基督，才可以胜过一切罪恶。此事以后，他和一些同道走到山上偏僻的地方住下，和各地的弟兄们以书信联络。“来自奥拔仑的神之友”，本来身居要职，但当他决心舍弃世界的时候，便放下自己

一切所有的。他没有一下子就把钱财全部分给穷人，而是在一段时间内，把钱财当作是神所借贷的，将钱慢慢的酌量全部用在属神的事上。他一生独身不娶；他写信给卢文密思允在史塔司堡附近建立的“神之家”时，提到在山上数目不多的信徒，都是“纯朴良善、性情谦和的基督徒弟兄”，又说他们深信神快要行事，但在事情还隐而未显之前，他们要继续在山上住下来，但一旦事情显明，他们就要分散到基督教世界各个角落去。他请求信徒们为他们代祷，因为“神之友处境相当艰难。”谈论到信徒向世界死的功课时，他说：“我们的意思并非要人离开世界，转去修道，而是指人还要留在世界上，但心思和感觉却不要受朋友或地上荣华所吸引，因为如果是受吸引的话，他就只会求自己的事，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求神的事，求神的荣耀。他必须放弃世界的荣华，并要在他一切所作的事上荣耀神，这正是神每天教导人的。若能如此，神在祂至圣的智慧中，必使他明白。他有了这从上而来的智慧以后，在一个小时内他所能领会的教训，会远超过他往日在一整年中所知道的。”当密思允向他征询关乎使用钱财的态度时，他说：“把钱财周济穷人，不是比盖造修道院更好吗？”一三八年，有十三位“神之友”，在山上秘密集会，其中有一位来自米兰的弟兄；另一位来自日内瓦，原是个为基督的原故舍弃一切财产的富商；还有两位来自匈牙利。在聚会时，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就一起擘饼纪念主，接着大家交通到日后如果再遭遇逼迫时，信徒应该如何应付的问题。交通完了，就把大家的领受通知在各地躲藏的“神之友”，例如史塔司堡的密思允和其它弟兄。最后他们分散到各地去。据所知的，他们后来都因着为主作见证的原故而遇害。

勒威格皇帝死后，查理士四世（一三四八年）登基，带来了对于基督徒弟聚会的政策的恶化。登基的新皇深受教皇和他的同党所影响，教廷因此乘机发起全力粉碎所有异己者。十四世纪上半期，教会极其兴旺，许多平素与教会无关的人，都深受基督教训所吸引，但到了十四世纪下半期，火一般的试炼就临到基督教会。教廷派去国内各地的裁判官日益增加，而查理士皇帝则尽量给予教皇各种方便，欧洲大部份地区的人民饱受苦害，焚毙信徒的事件不断发生。一三九一年，在宠麦雷尼亚(POMEANIA)和伯兰顿堡(BRANDENBURG)的法庭，公审了四百名控以异端罪名的人；一三九三年，有二百八十名信徒，给关在奥斯堡的监牢中；一三九五年，在土林质亚(TURINGIA)、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MORAVIA)，有一千人据说“改信”天主教；同年，有三十六名信徒在买音慈被焚；一三九七年，在史太亚(STEIER)有一百名男女被烧死；两年后在诺伦堡又有六女一男被焚。瑞士城市的人也备受残害。就在此时，教皇波尼法修九世下令要用尽一切方法铲除异端遗害，他引述了一份报告，其中他所称为在德国的“亲爱的儿子裁判官”，形容那些自称为“贫苦弟兄”的伯赫人，罗拉德派(LOLLARDS)，雪威司特利安派(SCHWESTRIONEN)信徒，并说这些异端邪说受禁制已达一百年之久，还说在好几个地方，这些死硬派教徒几乎每年都有人被判处烧死。一三九五年，裁判官彼得皮世道夫夸说他已能镇压这些异教徒。当时许多信徒纷纷逃往波希米亚和英格兰。英格兰的威克里夫(MYCLIFF)，和波希米亚的耶柔米(GEROME)与胡司的教训，正在这些国家内大受欢迎。

在史塔司堡存留了一份写于一四〇四年的文献，虽是出于一位敌对基督徒弟的人的手笔，但文中引述了一位弟兄的话如下：“两百年来，我们的聚会相安无事，弟兄人数日增，在聚会时，出席的人数达七百余人。神为这些教会行了大事，但不久神的众仆人遭受到厉害的逼迫，到处被人驱逐、残害，直到如今。自从基督教会建立以来，真正信徒的数目，从未锐减得这么利害，甚至在某些国家，基督徒弟

几乎绝迹。因为遭受逼迫的缘故，我们的弟兄有时被迫逃到海外，在某些地方曾经遇见其它弟兄，但因为言语不通，彼此无法交往，结果弟兄们只有返回原处。教会的情况兴衰不一，就如月球表面凹凸不平一般；有时圣徒人数加增，教会就兴旺；但有时又似乎衰落，甚至似乎完全消失。但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教会消声匿迹的话，那我们准知道在别的地方，教会仍必存在；就算圣徒甚少，只要他们继续活著作美好的见证，他们就仍旧能维持属灵的交通，而让我们相信教会仍会再兴起，人数又必增加，力量也必更大。我们这聚会的创立者是基督，而我们教会的元首是神的儿子耶稣。”档中指责有些弟兄破坏教会的合一，主张基督徒虽有好行为，还得要单凭信心获得救恩；又责备他们恶意批评奥古斯丁和耶柔米。这些弟兄们没有预先写好的祷文；祷告时，先由他们中间的长者领头，祈祷长短任随己意。他们又能背诵用自己文字所译成的圣经，聚会时就用自已的语言背诵出来。文中又列举当时弟兄们所信奉的七点基督教的真理：(一)三而一的真神；(二)神创造万物，包括可见的，或不可见的一切；(三)神赐下摩西的律法；(四)神叫祂的儿子成为人；(五)祂为自己拣选了没有玷污的教会；(六)祂复活；(七)祂必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塔尔(TEPL)，是在波麦华尔(POHMERWALD)丘陵地带附近的地方，久为受迫害的弟兄们藏身之处。在该地曾发现一本十四世纪残破的古卷，书中就出现上述七点真理，不过不是用拉丁文写的，是用德文。这书是弟兄们亲自抄缮的，显然是他们当中某一个人或好几个人所使用的。书中还将主日和其它日子所用的经文列明出来，从这些经文所见到的，他们并不遵守罗马天主教的节期，只有几个节期例外。书中又指出经常读经的重要性，又指出身为每家之主的父亲，就是他那一家的祭司。书中最主要的部份，是以德文翻出来的新约圣经；这个译本，与罗马教会所用的通俗拉丁文译本(VULGATE)，大不相同，反而接近印刷术发明以后教会所采用路德所翻译的德文译本，这译者看来深受这份十四世纪的抄稿所影响；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是深受这古抄本所影响的，就是接着一个世纪重浸派(ANABATISTS)和门诺派(MENNONITES)信徒所通用的那一本。

当时信徒们处于动荡不定的局势，又面临种种的迫害，因此有不少人落在狂热盲从的情绪中。有些自称为“自由的灵”的弟兄姊妹，以为自己的感觉就是圣灵的引导，就作出一些极其荒谬愚蠢的事；有些本性善良的信徒，厉行绝对的禁欲；又有弟兄因屡受逼迫而离世独居，以至观点渐渐狭隘，误解平等，误以无知为美德，而反对求知。

十五世纪中叶，发生了一连串大事，使欧洲顿然改观。

一四五三年，突厥人（即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知识分子纷纷逃往西方；他们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带来了古希腊文学的珍贵典籍，都是在黑暗时期西方国家所早已淡忘的文化瑰宝。希腊文学的学者，不久便在意大利境内的大学讲授希腊文，正是开启这些文学宝藏的钥匙。研读希腊文之风，传到英国牛津大学，亦迅速传至其它大学，掀起了文学研究的热潮，结果带来了文艺复兴。希腊文新约圣经得以恢复原文并印刷面世，后果影响之大，远超过任何古典希腊文学研究所引发的发现。

同时，印刷术的发明，也助长了新知识的传播。早期印刷业就首先着手圣经的印刷。

此外，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新大陆；哥白尼(COPERNICUS)发现太阳系的运行。这些新事，大大扩展了人类思想活动的领域。

无数信徒读新约圣经的结果，发现基督的教训和完全腐化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强烈对比。十五世纪

末叶，印行的拉丁文圣经，共有九十八种完整的版本；至于抽印部份圣经的版本，数量更多。买音慈大主教重申禁止教会采用德文圣经，但十二年后，已经印刷面世的德文圣经版本，共有十二种版本之多，而荷兰文圣经版本，亦有四种版本；这些文字译成的圣经部份抽印版本，亦有不少。这些版本，都是以塔尔寺院内发现的新约古抄本为根据。

约翰柯列特(JOHNCOLET)是法罗棱斯(FLORENCE)的希腊文学者中之一，他后来在牛津大学讲授新约圣经；听他讲学的人，都承认他的灵命湛深。他摆脱了旧有的说法，将基督明显启示出来，又详细讲解保罗书信。有一个犹太人锐赫林(REUCHLIN)，同时亦在德国致力于复兴希伯来文研究的工作，贡献良多。

全欧洲从事学术研究和印刷的人中，最著名的，首推伊拉斯谟(ERASMUS)。他生于鹿特丹(ROTTERDAM)，幼年失怙，尝尽了生活的煎熬，但他富有天才，不久便为人所赏识，誉满士林，甚至受到宫廷人士所敬仰，自伦敦至罗马，无人不知道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印行希腊文新约圣经，附拉丁文新译，再加上大量的注解及释义，印行以后，出了多次版本，光是在法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出售了十万本。人人可以亲自读到那把救恩带来地上的话语，直接认识基督和使徒们，不免就看清了那长时期以来压制他们的宗教专政与腐败，与神在基督里给人的启示，大异其趣。在注解中，伊拉斯谟对照圣经教训和罗马教会所行的，使人们针对教士的批评日益尖锐。这些注释对罗马教会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在说到那些行乞的僧侣时，伊拉斯谟说：“这些假装贫苦的可怜人，事实上是基督教世界内的恶霸。”说到主教，他就指他们“毁坏福音，……随意订造律法，专横管治平信徒，以自己的尺度评判是非。……他们不是传讲福音，而是坐在该亚法和行邪术的西门的座位上，任意妄为。”说到教士，他指出“当时教士人数众多，一大群一大群，有的成了世俗人，有些只不过是平凡人，但其中真诚者甚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了。”至于教皇，他就说：“我目睹教皇犹流二世(GULIUS II)，……在凯旋的行列前头昂首阔步，好像他就是庞培(POMPEY)，或西泽大帝(CAESAR)；圣彼得是以信德服人，不是靠刀枪、军队、或战术；圣彼得的后继者，若有圣彼得的精神，他也该可以像圣彼得一般，征服人心。”论到教堂的唱诗班，他说：“近代的教会音乐唱出来，听众根本听不清其中的字句，……一群该为自己的罪忧伤痛苦的人，却妄想喉咙里含糊地发出一些音响，就能得神的悦纳。”

在介绍他所印行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序言内，伊拉斯谟论到基督和圣经，说：“就算我们能亲眼看见基督，其亲密认识的程度，总不能比从圣经里所领受的更大。圣经将这位向人说话、医治人，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复活的基督，活现地启示在我们眼前。”“假如我们能看见基督的足印的话，我们岂不是会肃然起敬而下拜？但为何当我们看见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活生生的基督，反而不情愿高举尊崇祂？”“我亟望多人能读福音书和保罗书信，连最柔弱的妇女也不例外；我亟望圣经能译成各种文字，使人人能读懂，能明白，不光是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甚至撒拉逊和突厥人都要能读得明白。但要这个理想能实现之前，首先要使圣经的文字显浅易明。我何等渴望有那么一天，种田的人在犁田时能唱出部份经文自娱；织布的人能和着织梭的节拍低唱；而上路的人也以圣经故事来消磨时间。”

伊拉斯谟也是主张和平改革基督教的人士之一，而当时的情势亦极有利于和平的进行改革。残忍成性的犹流教皇之后的继位人，是巴奥十世，他出身著名的麦地西(MEDICI)家族，漠视宗教，但积极提倡文学与艺术，批准伊拉斯谟印行希腊文新约圣经；法国君主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宁愿招致

全欧洲的仇视，不肯向祖利安教皇屈膝而牺牲法国应享的自由；英国亨利八世(HENRY VIII) 热烈赞成宗教改革，还罗致了不少与他同道、大有才能之士，如柯列特，汤马士爵士(SIR THOMAS MOORE)，瓦咸大主教(ARCHBISHOP OF WARHAM)，菲沙尔博士(DR. FISHER)等；其它在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的统治阶级，也都拥护宗教改革。可惜组织愈庞大，就愈难接受改革，总不能接受批评，总会反对改革。当时亦从未有人对罗马教廷恢复遵守基督的教训和样式存着任何真正的期望。

改革如要实现，就必须要有新而有力的媒介，当时在教士们的范围内，就正静悄悄地进行了改革的准备，起初是由公认为改革运动领袖的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所发现，他是奥古斯丁众修道院的牧师；有一次巡视众修道院时（一五〇五年），在阿尔弗大学(ERFURT)发现年青教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正为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极度的受困恼，尽心克己去苦修。施道比次对他十分关怀，竭力帮助他；在获得他完全信任后，就劝勉他多读圣经，并介绍他读奥古斯丁和图勒尔的文章，又读神秘主义的论著。马丁路德听从了他的话，立刻就受到光照，而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成了他灵里实际的经历。

第七章 罗拉德派、胡司派、与同寅会

一三五〇年——一六七〇年

威克里夫——农民革命——英国信徒受逼迫——所德(SAWTRE)，百里(BADLEY)、和哥保咸(COBHAM)——禁止读圣经——信徒聚会——胡司(HUSS)——悉士喀(ZIZKA)——他泊(TA OR)——胡司派的战争——饼酒同领派(UTRAQUISTS)——札谷伯克(JAKOUBEK)——尼古拉(NLAUS)——其尔士威司基(CHELTSCHIZKI)——“信仰之网”——洛其该那(ROKYCANA)、贵格里(GREGORY)，根和尔德(KUNWALD)——里察诺(REICHENAU)，劳达(LHOTA)——同寅会(THE UNITED BRETHREN)——布拉格的路加(LUKAS OF PRAGUE)——德国宗教改革消息传至波希米亚——约翰奥古斯达(JOHN AUGUSTA)——施马加德战役(SMAKALDWAR)——逼迫和迁徙——乔治以色列(GEORGE ISRAEL)和波兰——弟兄们返回波希米亚——波希米亚大宪章——“白山之战”——甘美纽斯(COMENIUS)

在欧洲大陆，当人们逐渐发现国家教会的流弊而进一步诘问基本教义的时候，在英国也发生了相类似的情形。那些指出改良宗教弊病的热心人，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意思就是“胡读者”)。运动初期，人们将政治和经济的弊端，与宗教问题混杂而谈。但最先受到攻击的是教士们的财富与腐败，但运动发展下去以后，人们就领会到教义才是基本的问题，因此教义成为冲突的中心。在英国的作风，不如欧洲大陆那样的猛烈攻击异端；但在亨利四世统治初期，即十五世纪初叶，罗拉德派势力迅速发展，以致亨利四世不得不下令将信徒处以焚烧的极刑，目的在于要讨好天主教。

在这场冲突中，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者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崭露头角；他抨击天主教的腐化，结果自己卷入当时正雷厉风行的政治斗争中。但那些利用他来巩固自己政治斗争地位的人，一旦看清了他所提出的原则所要带出来的后果，便渐渐的陆续离弃他，他也就成为一群寻求返回圣经真理和基督教训以求脱离当时宗教流毒的信徒的领袖。在他所发表的“神的国度”和其它的论文中，

他指出“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真正的宗教”，而且“只有圣经是真理”。他所称为“统治权”的理论，确立了每一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和他所该负的责任。他指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所有在位掌权的人，既然从神那里接受了权柄，就必须在他运用权力的一切事上，要向神负责。这个说法，直接否定了般人所相信的教皇和君王有绝对权威的论调，也否定了教士阶级在神与人之间作中保的地位；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尤其是在一三八一年，当威克里夫发表反对天主教的变体说(TRANSUBSTANTIATION)的时候，引起了教廷更大的震怒，因为这主张是直接攻击教士们在基督教的圈子内多年来所拥有的特殊势力。结果，在政治上支持他，和他在大学的同侪们，也放弃拥护他了。但威克里夫最伟大的贡献，是给英国人民打开了通往真正信仰的路；他所翻译的英文圣经，掀起了英国人在思想上的革新，而圣经的英文译本，也就成为有史以来伸张公义最有力的工具。威克里夫忙于著作，散发各种宣传单张，又组织周游各地传道的团体，使圣经的教训，迅速地传遍了英国。他给当时的人民影响甚大，敌对他的恶势力也无可奈何，只有将他由牛津赶逐到他后来隐居的乐特茅斯(LUTTERMORTH)，他就在那儿继续教导人，劝勉人，影响所及，遍达全英国。

在那些日子，学者们在处理宗教问题上，都相信前人教父的主张、教会会议的决策、与及教皇的谕令等等，均具有和圣经同等权威的效力；他们认为圣经的权柄，并不高于上述其它的档。但慢慢地，当威克里夫更多熟识圣经真理以后，他就领会到，唯有圣经才具有绝对的权柄，其它的主张，如果是与圣经明训一致，那才会有权力。他认为基督徒的知识分为两方面：一面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一面是出于启示，两者之间并不彼此对立。但人的理解，又可说是天然的亮光，因着人的堕落而变得脆弱残缺，因此不能发挥任何的效用，而神在恩典中，向人赐下从圣经中启示而来的真知识，这就是信徒所领会的绝对权柄。威克里夫根据圣经有无上权威的这个真理而作见证，引起各方面反对他的人的攻击，因为这些人深知，如果他的理论受到拥护，后果影响将会甚大。他在《论圣经真理》一书中，清楚阐明圣经是神的话，神的意旨、也是父神的约，而神和祂自己的话，是合而为一的。基督是圣经的作者，圣经也就是祂的律法，而祂在律法中显明自己；所以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如果圣经包含太多细节，在某些情况下就不易应用，但目前的圣经，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其中并没有任何难以遵守的教训。圣经的果效，表明圣经是出于神，也带着神的权能；而教会一般的经历，也证明了圣经的丰富与功效。教会如能遵守基督纯全的律法，不掺杂人的任何传统，那么教会就能迅速的成长，可惜教会后来掺入了各种传统，以致不断的衰败。人类各种不同的智慧都会消逝，唯有圣灵在五旬节那天给使徒们的智慧，永远长存。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而教师们，甚至伟大如奥古斯丁，都可能犯错误。推崇人的传统、教条和法则，过于尊重圣经的教训，就无异于盲从附和。就算教条含意正确，又能间接引人向善，却也不能因此而证明它是正当无误，因为甚至其它教条和魔鬼自己，也有这种特性，否则神亦不会容许魔鬼有这样的权力。从教会历史所见到的，教会离开新约福音原则而掺杂人的传统的过程，起初那倾向十分轻微，几乎觉察不出来，但时日一久，教会腐败的现象就愈来愈明显。至于阐明圣经之道，我们不能靠神学博士的解释，只有圣灵才能使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就如基督向使徒解开圣经的奥秘一般。当然，如果有人假定他有圣灵的光照，认为只有他才能领会得到圣经真正的意思，那自然是很危险的；但事实上，我们亦只能靠圣灵的光照才能明白圣经。人若没有基督的启示，他就根本不能明白。还有，人必须要有虔诚、美善和谦卑的灵才行。要明白圣经，就必信靠圣经全部

的启示，才能完整地领会整本圣经的大要；绝对要避免异端教派把圣经支离破碎、断章取义的作风。读经时，先取得经文中主要和实际的意思，然后才去深入探讨其中的喻意；用字要准确，保罗在运用文字上是十分谨慎的，连一个前置词或副词都不马虎。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从亘古以来便存在；祂成为人以后，以祂的位格，把神和人两个性质联合起来；祂是神与人当中唯一的中保，是人类的中心，也是我们唯一的元首，满了无比的荣耀。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借着人的悔改成圣，成全在各人里面；悔改是转离罪恶，是以相信来享用基督赦罪之恩，这就是悔改的信心。信心是不可缺的，而且必须结果子。威克里夫是把信心与成圣连在一起的，认为信心不能脱离行为。他所领会的教会，并不是那看得见的天主教会，也不是那些神职制度的组织，而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新妇，包括了所有蒙拣选的信徒在内；在地上可见得到的，只有教会那暂时的显明和所经历的过程；教会的居所、源头和终点，都在那看不见的永世里。救恩并不须靠人与国家教会的关系，也无须教士担任中间的媒介：相信的人，可以自由直接领受在基督里的神的恩惠；而且每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职份。威克里夫又认为教会的根基在于神的拣选；人对于自己在神的恩中所站的地位，不能有把握，只能靠领会，而敬虔的生活就是它的明证。

当教廷召他去见教皇时，他拒绝前往，说：“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万人中最卑微的，他抛弃了所有属地的权势，由此我推论出来的见解是：教皇应该放下一切眼见的权力，交还政府，也该吩咐教士们照样作，这就是我一点简单的忠告。”

他后来于一三八四年除夕，在乐特茅斯静悄悄地去逝。

在威克里夫晚年时所爆发的农民革命（一三七七——一三八一年），使当时的属灵复兴受到阻碍，因为贵族和平民联合起来攻击神的教会，将暴动所引致的破坏与损失，归咎于他们所称的“威克里夫派”信徒；虽然这样的指控，并不合乎情理，但无可否认的，真正的基督教和被压迫的人得解脱是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在地上开始传道的时候便说过，祂是奉差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 4：18）。这情景正是当时劳苦作工的人的写实，福音传到他们当中，使他们觉悟到“神是不偏待人”的（徒 10：34），他们受穷奢极欲的统治者所压制，这个情况并不合神的旨意，因为这是不义的事。威克里夫在牛津那高贵学府所传讲的，学术性较重，对农民来说，反而不及约翰波尔(GOHN BULL)那带着粗旷语气的讲道那么受欢迎。波尔的出身是个农民，他那发自农民身处的苦境中的呼声，说：“我们那些所谓主人，凭什么要比我们高贵伟大？他们享有特殊的地位，究竟根据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奴役我们？既然大家都是源自同一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所花费享用的，又是来自我们所辛苦耕耘的，那他们凭什么能说自己比我们更优秀高贵？”他又说：“在亚当夏娃的日子，男耕女织，何来绅士？”后来农民革命被粉碎，政府重施苛政使农民就范，但经过了一段漫长痛苦的日子以后，农民渐渐获得自由，对这个转变最有力的推动，莫过于当时圣经对人的良知的影晌。

圣经翻译成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批的人接受了圣经作为信仰与行为的指标。当时信徒在不同的观点上，流行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大致都接受圣经的权柄，痛斥国家教会变质和拜偶像。据说当时每两个人中，便有一个是罗拉德派、或威克里夫派信徒，而圣经“已成通俗化，一般的识字的男女都有机会读圣经，比教士们更热心去读。”

异端教徒要受焚处死的法律通过以后，首先殉道的是威廉所德(WILLIAM SAWTRE)(一四〇一年)，他是诺福克(NORFOLK)的教区牧师。后来英国下议院上书亨利四世，请求将教会盈余的收入，挪作其它用途，又请求修改对付罗拉德派教徒的法例，但英皇的答复却是下令将一位在伊夫斯咸(EVESHAM)当裁缝的多马百里(THOMAS BADLEY)烧死；百里被控反对天主教的变体说；他先在武尔彻斯特(WORCHESTER)的主教面前接受初审，再于圣保罗大教堂内，在坎待伯雷和约克郡(YORK)的两位大主教和许多教士权贵们的面前受审，至终在史勿夫非尔(SMITHFIELD)惨遭焚毙。

在罗拉德派中为首的是约翰古堡爵士(SIRJOHNOLDCASTLE)，名字叫哥保咸(COBHAM)，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人。他的城堡成了周游传道的信徒的避难所；信徒对那些重刑禁令置之不理，在城堡内照常聚会，亨利四世亦未加以干涉。但当亨利五世即位后，他立刻派兵包围城堡，城堡给攻破后，就将约翰爵士逮捕，但后来他由囚禁他的伦敦塔逃脱出来，可是其它好些信徒，包括三十九名罗拉德派的带领弟兄，都被捕并遭处决。过了几年，约翰爵士再次在韦尔斯(WALES)被捕，后来遭焚毙，是第一位为信仰殉道的英国贵族。

他死了以后，英国通过法令，禁止人读英文圣经，违命者不但全部财产充公，还要处死，罪名是奉行异端，反抗皇室，出卖国家。这样的人，不会受到任何的庇护，假如他继续顽强抗命，或在得赦以后又故态复萌的话，他就要首先以欺君之罪判受环首酷刑，然后再以异端的罪名被烧死。

当时的弟兄们，虽然是被迫躲藏起来，或是远走他方，却并没有全部被消灭，甚至有部份的聚会仍然如常进行，尤以在东英格利亚(EASTANGELIA)和伦敦的信徒最多。在亨利六世(一四二二年)登基后，在伯盖尔斯(BECCLES)附近，还有规模不小的教会，虽然聚会常会被迫停止，或必须改组以适应时势，但不少教会仍然存留了一段长时期。比方在白金汗郡(BUCKINGHAMSHIRE)，有些教会与诺福克和塞福克(SUFOLK)及国内其它的地方的信徒，维持着彼此间的交通达六、七十年之久。伦敦主教在一五二三年写信给伊拉斯谟时说：“这儿谈不上什么新兴的异端邪说，但那拥有大批教徒的威克里夫派异端份子，却如虎添翼，大张声势。”

来自布拉格的耶柔米(JEROME)，是在牛津攻读而受威克里夫影响甚深的外国学生之一。他回到本地以后，满心火热传讲他在英国所领受的真理，指责罗马教会已离开基督的教训，并指出人要返回福音寻求救恩；当时有许多人深受感动，其中有约翰胡司(JOHNHUSS)，他是住在布拉格的神学博士和传道人，也是波希米亚皇后的忏悔神父。他那真诚的信心和卓越的才能，加上动人的口才和风度，使当时已深受瓦勒度派信仰所潜移默化的信徒，大受感动。长期以来，当地的条顿族和斯拉夫族(SLAV)彼此对立，在波希米亚，这两族人民就分别以日耳曼人和捷克人(CZECH)为代表。胡司用捷克文讲道及写作，结果他所引起的宗教运动，演变成政治浪潮，日耳曼人转而拥护罗马天主教，而捷克人则支持胡司的见解。最后，教皇经由布拉格大主教下令将胡司逐出教会，并公开烧毁威克里夫的作品。但波希米亚皇、贵族们，和当地大学及大部分人士，都支持胡司和他的主张。后来在康士坦斯(CONSTANCE)的湖上举行为期三年半的宗教会议(一四一四年)，召集了一大群教廷上的要员，各国皇室和政府人员，还有来自各式行业的人士。会议期间，人人奢华宴乐，放纵情欲。当时有三个彼此对立的教皇。会议目的之一，就是要澄清局面，补救教会的分裂，结果三个教皇都被罢免，另行选立马丁五世(MARTIN V)为教皇。

当时会议另外的一个目的，是要批判与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教训有关的教派信仰。胡司被邀出席，事前西淇门王保证说：只要他肯参加，他的安全决不成问题。凭着国王的这句话，胡司就依期前往康士坦斯，及时赶上大会启幕。他满心准备藉此机会好好地在这类权贵要员面前，把圣经真道阐明。不料会议负责人将国王的保证，置之不理，把胡司逮捕，关在湖中小岛一个恶臭不堪的地牢中。会议当局为了表示清白，马上颁布教令（一四一五年），声称“教会”无须对一个异端份子信守诺言，并力指此项决定乃得自圣灵的默示，不会失错。胡司受尽软硬兼施的恫吓，要他收回以前教导人的教训，就是指：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守律法这等主张，还有就是说，人除了敬虔度日，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无须靠人任何的帮助，不管那人有何等崇高的地位或身份。胡司当时以谦逊温和，但又果敢有力的口气，坚定地回答说：只要人能引圣经的话，证明他的教导错误，他随时乐意收回这些教导；不然的话，他决不会撤回他从神的话语中所领会而教导人的；同时他亦拒绝承认他所没有表示过的意见，指出那不过是别人所附会的。当时给他的罪名，就是传讲“受瓦勒度派毒害”的道理，也是“威克里夫”的主张。这样的控诉，表明敌对胡司的人，也承认这些教派在真理认识上是合一的。当时经过一番严肃的仪式后，胡司被当众焚死。死前两个星期，他刚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主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着主这句话，我心里满了安慰。……这句话何等宝贝，我不敢说自己能全然领会这句话；要能活出这个实际，实在不易，但这句话吩咐我们在苦难中要喜乐。……将这句话读出来，又加以解释，对我来说并不难，难处是能把这句话的实际活出来。甚至那‘伟大的战士’，虽然他明明知道三日后必会复活，但在祂吃过晚餐以后，祂心里忧伤。……为这个原故，所有为基督争战的信徒，都要学习仰望那作元首的，就是他们荣耀的主。他们一直争战到如今，经过水火，却没有被打倒，反而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也深信主也必将这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也赐给你们每一个坚守真理及专一爱主耶稣的精兵。……呵，最神圣的基督！我虽如此软弱，还求祢吸引我跟随祢；因为若果没有祢的吸引，我们实在不能跟随祢。求主使我的灵刚强起来，使我能以顺服。如果我们的肉体软弱，求祢以恩典挽回我们。求祢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不能为祢的原故接受这残酷的死亡。使我心里没有惧怕，心存正确的信仰，坚定的指望，和完备的爱，好叫我能成为祢的原故，满有忍耐和喜乐，摆上自己的生命。阿们。在施浸约翰日的前夕，写于牢内捆锁中。”

布拉格的耶柔米，不久亦惨遭焚毙。波希米亚的胡司派信徒的行动，就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有继续反抗的；有试图妥协的，就是所谓饼酒同领派(UTRAQUISTS)，或称圣杯派(CALIXTINES)；也有宁愿受苦的。

第一种信徒，由庄悉士喀(JANZIZKA)率领，激烈反抗，节节得利。在波希米亚内地一个陡斜的山下小市镇他泊(TABOR)，成了当时这些信徒的军事与宗教中心。在镇内的市集上，今天还可以看见一些石案的遗迹，就是当年成千上万的信徒围聚守主的晚餐时所用的，他们一同擘饼饮杯。当时罗马教会只许教士领杯，绝对禁止普通信徒饮杯；这杯就成了他泊派信徒的标记。在他泊山麓有一个小池，直至如今仍叫约但，是许多信徒归信后受浸的地方。悉士喀不但率领贵族争战，也统领着全国。获得自由的农民都充满了不能自己的狂热；他们的农具都改为兵器；悉士喀又教他们把装运农产品的车辆，改为交通工具，或作能移动的防御设施之用。教皇当时号召十字军对付信徒，但全军溃败，胡司派信徒挥军直捣邻近各国，人肆破坏，双方军队各有暴行。教廷被迫与胡司派议和。在巴色会议中（一四

三三年)，通过了准许胡司派自由传讲神的道；准许他们擘饼饮杯纪念主；准许他们没收教士的财产；又通过了取缔许多压制信徒的教令。可是战事未有因此而停息，连年的战争，结果使民不聊生，满地疮痍，国家元气大伤。烈本(LIPAN)一役（一四三四年），他泊派大败，双方订立“巴色条约”，引起波希米亚人内部的分裂，饼酒同领派较为温和，获得罗马天主教会所认可，教皇将它定为波希米亚的国家教会，该派领袖洛其该那(ROKYCANA)被封立为大主教，结果一切权力又回复到罗马教廷的手中。

在这一连串的冲突中，就算在胡司派最兴盛的时期，仍旧有一班为信仰与见证的原故甘愿受苦的信徒，他们不依赖武力去解决问题，宁愿效法以前瓦勒度派信徒的榜样，一心寻求圣经的引导，去处理教会的事和福音的见证，全心依靠神。

在这些信徒中，最突出的是札谷伯克(JAKOUBEK)，是胡司在布拉格当教授时的同事。早在一四一〇年，他在大学授课时，就已指出违背基督真理的罗马教会与真正的教会（亦即众圣徒的全体）两者间的强烈比照，并且劝勉信徒要回转到教会的原始样式。当时又有一个德国弟兄叫尼古拉(NIKOLAUS)，因被控奉行异端，而从直历司顿(DRESDEN)被逐出境；他熟读圣经，也熟识教会历史，因此他能指出使徒当年的教训和初期教会的样式，与及后来教会如何渐入迷途。他给他泊派信徒的影响至深。当时在布拉格的信徒，热烈辩论基督徒可否动刀兵的问题。他泊派的信徒相信，为了自卫，动刀兵是在所不免的，虽然会引致伤害，在环境压力下，信徒有权利反击，甚至抢掠敌人的财产。不久，札谷伯克发现自己反对诉诸武力的立场，使他和他们泊派信徒成了对立。当时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最有力的人，是彼得其尔士威司基(PETER CHELTSCHIZKI)。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武力，甚至自卫的原故，也不该用武力。他虽同情他泊派的遭遇，但在反对他们的庄悉士喀诉诸武力的事上，也不遗余力。

虽然弟兄们的著述，往往因作者殉道而被毁，但亦有一部份著述逃脱了厄运。其中一本是其尔士威司基所写的，书名叫“信仰之网”，写于一四四〇年；内文详述当时弟兄们的信仰，影响至大。作者说：“本书的目的无他，只因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愿意借着神的帮助，寻求恢复起初的样式。我们就像一群人，来到废墟，房子已给烧毁倒塌；我们尝试要找房子原来的根基，困难重重，因为瓦砾中已长满了其它的杂物；有人就误把这些后来加上东的东西作为根基，于是说：“这是根基。”又说：“这是原来应有的样子。”其它的人就以讹传讹，找到了这些长出来的新奇东西，就以为找到根基；不料所找到的，与真正的根基相去甚远，甚至刚好相反。这情况加添了寻索的困难。如果人人都说：“原先的根基已深埋瓦砾中。”那么人人就会开始发掘，专心找寻，结果便会开始在根基上作真正的建造，就如在圣殿被毁后尼希米和所罗巴伯的建造。这个属灵建筑倒塌已有多时，现在要回复以前的样式，可说是难上加难，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现在许多人已远离了它，转向别神，另立根基。”又说：“我并没有说以前使徒传道的时候，所有听道的人都归信主，我是说：所有蒙神拣选的人，都归信了；在某些地方人数会较多，在别的地方，人数或会较少。在使徒的日子，信徒教会是依他们所居住的城镇乡村或地区为名，但他们都是同一信仰的信徒的教会。使徒把这些教会与不信的人分别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实际上信徒可以分别在某指定的街道分开聚会，而是他们在信仰上彼此联络，在该区内的聚会中，与其它信徒就属灵的事，和神的话语上彼此有交通，又根据这个在信心和属灵的事上的联合，他们得称为信徒的教会。”他又指出“在巴色，在一四三三年，教皇的代表说过：早期教会固然有许多值得称许之处，可是当时教会又穷又简单，不及后来替代它的那现代教会既华美

又荣耀，这个差别，就如圣殿代替了会幕。再者，许多早期教会所不认识的事，现在教会都领会过来了。”其尔士威司基给这句话的注脚是：“这首歌果然动听，可惜是个谎话。”

他说：那“伟大的祭司”（就是教皇），自称有赦罪的属天能力，那简直是羞辱基督。这能力是神给自己保留的。“神曾指着自已作见证说：祂要借着为众人的罪舍身的基督，赦免人的罪，涂抹人的过犯。对于这一点，信心所作出来的见证指出：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唯独祂有赦罪的权柄，因为祂是神，也是人。为了这原故，祂成为人的样式，为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给神，为罪献上燔祭。如此，因着祂和祂所受的痛苦，神就以此为根据来赦免人的罪，所以只有祂有赦免世人的罪的能力和权柄。因此，那所谓“伟大的祭司”，将自己抬拘高过了神，窃取了基督的荣耀，如同翦贼的行径一般。他发明这条通往罗马的朝圣路程，夸称人可以由此使罪污得洗清，结果，从各地来的酩酊大醉的人群，趋之若鹜，而那众恶之父高高在上，把祝福分赐各人，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免受审判；他自称能把人从地狱救出来，还说没理由要人到地狱去，于是在各地分发售卖赎罪券，保证人能从罪恶和痛苦中得解脱，甚至不必劳烦人到他那里去，只要人把钱送上去，就可以得赦罪。这个坐在官位上的，把原来该归给主的都抢过去了，还借取了他的主所该得的荣耀，靠出售赎罪券而金银满屋。这个当官的，既然能把我们从罪恶和审判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得以称义，成为圣洁，那么还有什么剩下来的，要基督为我们成全呢？是我们的罪堵住了自己得救的路，假如那“伟大的祭司”赦免了一切，那么，可怜的主耶稣还要作什么呢？世人为何不向他求救恩，反将他撇在一旁不理睬呢？就是这样，那满了威严的“伟大的祭司”，夺去了祂的光彩，使祂在世人面前黯淡无光，而那“伟大的祭司”自己，则在世上名声显赫，远近驰名。结果那已经被钉死的主耶稣，就成了世人的笑柄，而那“伟大的祭司”则人人争相称誉，纷纷向他寻求救恩的门径。

属饼酒同领派（即温和派）的大主教洛其该那，在布拉格那著名的天恩(TYN)教会讲道，极力推崇其尔士威司基的教训，申斥罗马教会的不对。但他并没有照他所批评的而有所行动。可是听了他的教训的人，有不少决心把他们所学习到的原则实行出来。他们推举了颇负盛名的贵格里(GREGORY)，（就是被称为“爱国者”的那一位），出来率领大家离开洛其该耶，在波希米亚东北部的根和尔德(KUNWALD)成立了自己的小区（一四五七年），当地有列铁时(LITITZ)城堡；许多人闻声涌至，其中有以前跟随其尔士威司基的，有属瓦勒度派教会的，也有来自布拉格的学生和其它的人。他们虽与温和派保持联系，但在许多方面努力恢复早期教会的样式，跟从圣经的教导。他们的牧师也属温和派，但他们亦有长老，又有沿用昔日瓦勒度派习惯的称呼称为“完全人”的，他们也放下一切家业跟随基督。可惜他们得享平安无事的日子并不长久。过了几年，根和尔德那小区被捣毁，温和派的人迫害他们，就如罗马天主教人士以前对待他们那么狠毒。贵格里下在牢中，备受酷刑；有一位叫雅各胡勒华(JACOB HULAVA)弟兄被烧死。弟兄们纷纷逃往山上和森林地区避难，人数却没有因此减少，反而日益增加，而迫害后来亦慢慢停息。

一四六三年在里察诺(REICHNEAU)山上，和一四六七年在劳达(LHOTA)，都曾有弟兄们在该地聚居，其中还有不少有权有势的人士。他们聚会重新研究教会的原则，第一件事就是给参加聚会的信徒施浸，因为瓦勒度派信徒一般是受浸的，而来自其它地方的大部份信徒亦如是，不过因为逼迫的原故，给信徒施浸的事曾中止了一段日子。这些信徒同时正式宣布脱离罗马教会，他们自称为弟兄会教会

(GEDNOTA BRATRСКА-CHURCH OF THE BROTHERHOOD), 或称同寅会(UNITAS FRATRUM-THE UNITED BRETHREN)。他们并无意创立新的教派, 或要将自己与其它许多地方无数的弟兄们教会分别出来, 他们只希望因此激励自己, 更明显摆出与罗马天主教体系分别出来的见证。当天聚会完了, 在参加聚会的六十名信徒中, 选出了九个人, 再在这九位信徒中抽签, 抽出来自根和尔德的马提亚(MATTHIAS), 差他往奥地利接受瓦勒度派监督司提反(STEPHEN)的按手, 表明他们继续与瓦勒度派弟兄们的联系; 他们并非认为这个按手的程序是必须的, 只不过认为如此会较恰当, 因为他们相信在西利维斯特教皇时代, 罗马教会就丧失了使徒的传统。(这句话, 是假设罗马教会以前也曾继承过使徒的传统)。如果当时还有教会保存了这个传统的话, 那就该是属迦达尔派、保罗派、和瓦勒度派的信徒们。

接着他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洛其该亚大主教, 他却在讲道时谴责他们。同寅会弟兄们回信说: 他们并非要另立门户, 只不过是一心想转回到起初基督徒的真正教会的样式, 而瓦勒度派信徒一直保存了这个样式。当人指斥他们在分别出来以后, 等于是把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定罪, 使人无从得着救恩, 他们就回答说: 他们从来不认为真正的基督教能受限于一些指定的见解或形式里; 他们认为在不属于同寅会的聚会中, 也有真正的基督徒, 而罗马教会却把一切不服从教皇的人拒于救恩门外, 这实在是罪过。大主教的侄儿, 也在弟兄们当中; 他说: “无人能指责我们排斥那些效忠罗马教会的人。……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不排斥在印度和希腊的教会内神的选民, 也不会排斥罗马教会中神的选民。”

这些信徒强调圣洁的生活, 正如主和使徒们所教导的, 也是圣经所指明的教会生活的原则。但他们容许信徒各人在操练自己良心上有绝对的自由。他们劝人生活尽量俭朴, 弟兄中也不该有人因穷困而受苦, 富裕的弟兄们随时乐意帮助穷苦的人。

同寅会信徒日渐增加后, 情形就渐渐改变。加入为会员的人, 多是有教育、有地位, 也有财富的, 领导的权力就由那些较简单的弟兄手中移到较有学问知识的弟兄手里。来自布拉格的路加(LUKAS), 是他们当中最著名的弟兄, 十分活跃, 工作了四十年之久, 直到离世的时候(一五二八年)。他著作丰富, 给人印象深刻。事实上, 当时弟兄们所写的书籍和出版之多, 更甚于罗马天主教的人士; 他们也写了不少圣诗和圣乐。同寅会不再反对弟兄们担任高级公职, 也不反对人除自己生活所需外, 从事正当买卖而获利, 也不再禁止人发誓。他们又提倡教育, 所开设的学校大受欢迎。教会能比以前更清楚的解释因信得救的真理。路加也制定了治理教会的组织方法, 也引进了不少礼仪, 使昔日的简单崇拜方式大大改观。当时有一部分弟兄并不表示同意, 不肯跟从他, 仍旧坚持保留原来的样式。

过了不久,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怂恿波希米亚皇帝对付同寅会, 指称他们日渐增长的势力, 威胁皇室的地位。教皇在一五〇七年, 下了圣雅各教令(EDICT OF ST. JAMES), 命令所有的人民皈依罗马天主教, 或加入温和派的教会, 否则必须离境。弟兄们又再一次成为受迫害的对象, 聚会被迫停止, 书籍被烧毁, 信徒纷纷下狱, 或被放逐, 或甚至惨遭残害。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 路加一直不屈不挠, 安慰弟兄, 激励信徒, 直到他本人被捕下囚。但不久, 弟兄们美好的见证, 使迫害慢慢地消失; 他们的仇敌有人甚至莫名其妙地突然去世, 叫别的人不敢再继续他们的行径。后来波希米亚皇自己也死了。罗马天主教徒和温和派的教徒起了争执, 转移了大家对弟兄们的注意, 于是弟

兄们得以再过一段安宁的日子。

在此同时，路德在威登堡(WTTERBURG)所干的一番大事的消息，由德国传来，弟兄们就立刻派出代表去和改革宗的信徒联络。路加当时已经恢复了自由；他听说有关路德和威登堡那些学生所作的事，认为有点过激，与他在同寅会的弟兄们中所教导的事事按规矩而行的作风，大不相同，因此在获悉消息后，还作了相当的保留；但弟兄们普遍都因意外地获得志同道合的人而兴高采烈。路德本人也不完全信任同寅会，但在一五二〇年他写信给斯巴勒丁(SPALATIN)说：“直到如今，我所倡导的，与胡司所坚持的不谋而合；约翰施道比次事实上也不知不觉地提出同一的主张——总括一句说，我们都不自觉地成了胡司派的人。保罗和奥古斯丁也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胡司派。但我们居然不接受那位波希米亚博士作我们的领导人，我不禁感到又震惊，又可怜……”

同寅会另一位伟大的领袖是约翰奥古斯塔(JOHNAUGUSTA)，年卅二便被按立为主教，也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有才华的领导人。主张与德国的“抗罗宗”(PROTESTANTS)新教徒紧密合作。一五二六年，波希米亚的古老皇室后继无人，皇位便落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哈柏斯堡(HAPSBURG)家族的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手中；他把波希米亚拨入自己庞大的王国版图内。波希米亚的贵族有好些一贯与同寅会弟兄们友好，有些甚至是同寅会的份子。这些贵族曾在信徒遭遇患难逼迫的日子，让弟兄们躲藏在他们的城堡中，贡献甚大。奥古斯达曾经透过其中一位贵族康勒格拉札(KONRAD KJAJEK)（这三位贵族经手建造同寅会主要中心之一），与那位存心不良的新皇进行交涉。交涉成功以后，有一段时期同寅会继续兴旺。

一五四六年，在萨克森的选侯领导下，德国抗罗宗皇侯联盟，与波希米亚皇的兄弟查理士五世冲突起来，换句话说，也就是抗罗宗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冲突。费迪南德一世号召波希米亚的贵族和人民支持他，而萨克森的选侯则请求同寅会为抗罗宗信仰助一臂之力。波希米亚的贵族中，好些有相当势力而且身为同寅会份子的，当时同寅会亦人多势众。他们在其中一位贵族的府邸中开会商议，结果议决援助抗罗宗。但在慕尔堡(MUHLBERG)一役中（一五四七年），抗罗宗信徒惨败，费迪南德凯旋班师回布拉格，立刻着手铲除同寅会的势力，有四个贵族在布拉格公开给处死，其它许多弟兄的财产给充公，聚会被迫停止。政府下令，如果有人拒绝加入罗马天主教或温和派教会，限于六个星期内离境。

接着人民就大批移居国外，长串的流亡车队，取道前往波兰；途经各地，深得当地居民的同情，免收关税便准予通行，还供应食物招待。但到了波兰以后，当地却拒绝收容，他们只好继续流亡。六个月以后，抵达东普鲁士(PRUSSIA)的哥匿士堡(KONIGSBERG)，是属于路德派的。弟兄们中有一位铁匠，名乔治以色列(GEORGEISRAEL)，在信心和体魄上，都精力充沛；他排除一切的障碍，为弟兄们争取到在奥斯曹洛(OSTROROG)安顿下来的权利，以后这城镇成为弟兄们活动的中心，不但是传福音的基地，也是联络各地抗罗宗的大本营，影响所及，遍达全国。

一五五六年，费迪南德登基为帝国君王，波希米亚的皇位便归给他的儿子玛西米良(MAXIMILIAN)。在他统治期间，同寅会弟兄们获准回归故土，重建家园，恢复聚会。他们当时在波希米亚根本未被根除，因此很快就在该地和摩利维亚重建起来，还加上在波兰新成立的聚会。约翰奥古斯达长期以来受到监禁与残害，至终加入了温和派教会，希望能藉此将温和派和同寅会联合起来。事实上，温和派信

徒有不少加入了抗罗宗，而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大部分在抗罗宗势力范围内。

在弟兄中为首的两贵族，一为保度瓦的温索(WENZEL OF BUDOWA)，一为薛乐天的查尔士(CHARLES OF ZEROTIN)。他们都拥有不少产业，所居住的城堡气派豪华，有如皇宫。但他们为人敬虔，家人注重读经和祷告。当时国家兴盛，教育发达。一五七一年，一位波兰贵族来到弟兄们聚会的地方，感慨地说：“永生的神呵！我心里充满何等的喜乐，因为我所看见和听见的，使我实实在在感觉如同身处以弗所或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或其它使徒时期的教会中，亲耳听见，也亲眼看见，在使徒书信中所读到的一切。……”一五七九至一五九三年间，圣经翻译成为捷克文，这本“喀力慈”(KRALITZ)圣经，就是现今捷克文圣经的蓝本，也成了捷克文学的基础。

联合弟兄会中的贵族，为了避免弟兄们随时会受到逼迫，一心要把这教派立为波希米亚国家教会。一六〇三年，国皇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向波希米亚国会请求金钱援助，好派兵远征土耳其。保度瓦温索便乘机提出条件，要求取缔圣雅各教令，恢复人民宗教自由。当时抗罗宗的贵族们纷纷支持，人民亦大力拥护。但国皇身处抗罗宗与耶稣会两派势力的夹缝中，一时举棋不定，答应了条件，以后又收回，反复了好几次，弄成僵局。温索于是号召贵族起来，招兵买马，誓言如不达目的，就必诉诸武力，结果国皇只有屈服，签署了波希米亚大宪章，颁布宗教完全自由，一时举国狂欢。政府成立“维护宗教委员会”，有二十四名委员，负责大宪章一切条文的实施。所有抗罗宗和同寅会的信徒，共同签署了波希米亚国家新教会的信仰声明。一六二八年，费迪南德二世登上波希米亚皇位，他受了耶稣会完全的支配，所以虽然在登基加冕时，他曾宣誓遵守大宪章，但登基后不久，就背誓食言。宫廷内两位主要大臣马天尼(MARTINIZ)和斯拉瓦达(SLAWATA)，强迫禁止抗罗宗的信仰自由，引起两大宗教派别间的正面冲突的危机，结果后来因为争夺教会产业一场争执，冲突终于爆发。国皇下令没收了一座属抗罗宗的教堂，并加以毁坏。“维护宗教委员会”的人员便进迫布拉格皇宫，当时国皇正举行内阁会议，双方展开一场激辩后，马天尼和斯拉瓦达给人从离地面六十尺高的窗口抛出去，跌在粪堆上，才免一死。“维护宗教委员会”召集军兵发难，推翻了费迪南德，另立腓特烈(FREDERICK)作皇帝，他本身原是个有王权的选侯(ELECTOR PALATINE)，是英皇詹姆士一世(JAMES I)的女婿。耶稣会的教士被逐出境，罗马天主教徒守弥撒亦成为嘲笑辱骂的话题。这两派中间那场决定性的战役，史称“白山之战”，在布拉格城外山上展开(一六二〇年)，结果“维护宗教委员会”大败。一六二一年六月廿一日，布拉格广场上，一面矗立着天恩教堂，一面是国会大厅；场内进行将二十七名抗罗宗的贵族斩首示众；保度瓦温索亦在其中殉道。行刑前予犯人获赦机会，条件是要接受罗马天主教，但他们都一一拒绝屈服。接着国内多处发生暴动，许多人扶老携幼，离开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总数多达三万六千个家庭，国内人口由三百万减至一百万，胡司派信仰，与波希米亚的独立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与此同时，欧洲大部份地区饱受“三十年战争”的蹂躏。

庄阿摩司甘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生于一五九二年)，以改革教育名闻于后世，他是这个悲惨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不赞成弟兄们牵涉到政治与战争中。当大祸临头时，他刚在摩利维亚福尔涅克(FULNECK)的弟兄教会作了三年牧养的工作；西班牙军队入城以后，肆意破坏，他只好逃难到薛乐天查尔士的城堡，成了当时聚在该地的弟兄们的领袖。他在此古堡中居住时，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世界迷宫与心灵乐园》；书中以喻言体裁隐喻人不能在世上寻找到平安，只有内住在人心中的基督才

能赐人真正的平安。甘美纽斯后来又再被迫从薛乐天逃出避难，把摩利维亚最后一批难民带走，财物尽失，途中妻儿均因饥饿致死。当难民离开国境时，他还不断激励各人的信心，相信神必能保守一些“隐藏的种子”，以后这些种子还会发芽生长，结出果子。

难民们最后终于在波兰利沙(LISSA)（亦即 LESNO）找到暂居栖身的地方。甘美纽斯出任当地学校的监督，后来应邀前往英国（一六四一年），从事改组当地教育的工作。英国内战爆发后，他只好离开英国，前往瑞典及其它国家，一六五六年，瑞典人败于波兰人手中，波兰人把利沙城内“异端份子窝藏”的地方付之一炬，甘美纽斯又再一次丧失了一切所有，包括他写作多年并拟出版的文稿。一六四八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HTPLIA)签定，粉碎了重建波希米亚同寅会的最后一线希望，天主教徒和抗罗宗信徒都与他们为敌。在此山穷水尽的光景里，甘美纽斯继续努力写作，劝勉弟兄们和世人，这些忠告，就是来自这位在地上失去了一切，但在心灵里靠神享用安息的圣徒。

一六五〇年在利沙的时候，他就写了“临危母亲的见证”。他劝勉摩利维亚教会的牧长们，如果不能在原地聚会，大可以接受其它福音派教会的邀请，去那儿继续传道，目的不是要取悦听道的人，也不是要助长分裂，而是要叫信徒的爱心如火挑旺起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也劝导一些不是作牧长的其它“孤儿”，如果找到一些聚会是专心跟随基督的，又不勉强他们跟从人，而且又能在那儿找到耶稣福音的真道，那么就可以安心在那里聚会，也可以为那里的信徒祈求平安，一同在善良的事上追求长进，自己也要摆出美好的模范，用爱心和祷告带领信徒，好叫他们能逃避全能的神快要倾倒在基督教世界上的震怒。

他还说了下面劝勉的话：“亲爱的姊妹们，这些福音派教会，我不会忘记你们；我也不会忘记怀我们的母亲，就是罗马教会，我们是从她而出的，你曾经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但现在已变成……吸血鬼，吮吸孩子们的血。在你这可怜的光景中，甚愿你能悔改，离开那亵渎神的巴比伦。……至于其它基督徒教会，我盼望众人能和平共处，为了在圣灵里的合一，在信心与爱心上互相联合。巴不得那众灵之父从起初所赐给我的灵，临到你们众人，使你们也像我一样，恳切祈求所有诚实称呼主名的人，能在基督教真理中彼此联络，合而为一。愿神把你带回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根基上，正如他所教导我的，好使你能认识所要追求的，也能分辨所该放下的，好使你们逃避那没有知识的热心；这种热心，并不能帮助教会成长，只会毁坏教会。又叫你们晓得何时需要火热，好使你们能欢欢喜喜地大发热心，将荣耀归给神，甚至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愿你们众人都能爱慕我们神的怜悯，耶稣的宝贵，和圣灵所赐人内心甘美可喜的各种恩赐。这一切都要借着在父神里面那真实的信、望、爱中的交通而得着的。真正的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在此。”

甘美纽斯所著的《反痛之声》，写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时为一六六〇年。此地亦为他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十年后，他在此地去世。书中说：“我们知道：主耶和华医治受伤的人，叫死人复活，又把下到阴间的人拯救出来（撒上二章），那么就让我们顺服祂，让祂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如果是祂的旨意要先受伤，先被害，先下到阴间，那就愿祂的旨意成就，而我们同时也深知，不论今世或永世，我们必得医治，必能复活，又必被提到天上。甚至我们的主，当祂要忍受那莫可言喻的痛苦、羞辱和忧伤的死亡的时候，也只能在下面的话里面找到安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既然祂受伤，叫人得医治；祂死了，叫人得生命；祂下到

阴间，要把天堂和救恩带出来，那么，我们这些麦子小粒，为什么不该依照神的旨意而受死？如果殉道者的血，和我们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叫敬畏神的人多多增加，那就让我们一面流泪，一面撒下这些珍贵的种子，好叫将来欢欢喜喜的收割禾捆回来。神若不建造，祂就不会拆毁；祂使万物更新。神是全知的，我们必须全心信赖祂，让祂拆毁了，再照自己的心意建造起来。祂绝对不会盲目作事；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祂伟大的计划。一切被造的，都服在神的旨意中，那么，不管我们是不是明白祂的作为，我们也该顺服祂的旨意。祂在所作的事上，不须要我们作祂的谋士。”

甘美纽斯到了七十七岁高龄的时候，誉满全欧洲，被公认为刷新文人写作的精神与方法的先驱。此时，他写了《不可少的一件事》。书中以迷宫喻世界，并指出脱离迷宫的方法，在于撇弃一切不必要的，单单拣选那绝对需要而不可少的，那就是——基督。他说：“现今许多人要作师傅，因此形成各种各式的宗派。每个教会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教会，或可以说：最低限度是那真正教会内最纯正的一群，于是与其它宗派互相排挤，彼此仇恨，无法和解，一味敌视对方。他们引用圣经塑造出不同的教条，又各自标榜教条，作为保障自己的堡垒营房，用以抵挡外来的攻击。我不是说他们这样标榜信仰有什么不对之处——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宗派内，他们确有真道——但是他们这样作，不啻是在宗派间的仇恨上火上加油。只有在大家都肯放下成见，教会的创伤才能得到医治。”“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教派的迷宫中，人人热中于争辩。……究竟争辩能有什么成效？这类学术性的争论，从来有没有产生美满的解决呢？没有！只有引起更多的争端。撒但是最善于诡辩的，从来不会在文字官司上败诉。”……“在属灵的事奉上，听见的多是人的话，少听见神的话。人人都喋喋不休，不然就是钻到学术研究的牛角尖，去抨击别人来消磨时间；很少人提及重生之道，论及人如何更多变成基督的形像，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 1:4）。说到钥匙带来的权柄，教会现在已失去维系信徒的能力。……各种圣礼，本来是表明在基督里的信徒合一，彼此相爱，和分享生命，但现在却成了信徒彼此冲突仇恨和结党分争的原因。……总而言之，基督教成了迷宫，信仰已给支解为数不清的零碎；如果有人表示不能接受其中某一宗派，就会给人指为异端份子。”……“那么，还有补救的方法吗？只有一件不可少的，那就是回转到基督那里，认定祂是唯一的元首，跟从祂的脚踪，撇下其它一切的途径，专心跟从祂直到路终，直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弗 4:13）。既然天上的主是在圣经的根基上建造，我们也当放弃各人信仰的特点，以神的启示为依归。我们手拿圣经，就该大声喊着说：我相信神在这圣经内给我们的启示；我愿意顺服遵守祂的命令；我也盼望神所应许的。基督徒啊！你们要留心听！生命是唯一的，但死亡却有各种方式；真理只有一个，而谬误却行多种的花样；基督只有一位，而敌基督何止千百。……因此，基督徒啊！你们要认识这位唯一不可少的。你们如果不回转到基督里，就要像敌基督一样的自取灭亡。你若是智慧而又要存活的话，就必须跟随那生命的元首。”

“基督徒啊！你要因被提而欢乐。……请听天上的元首的呼唤：‘到我这里来！’让我们同声回答说：‘这正是我们所想望的；我们要来了。’”

第八章 宗教改革

一五〇〇——一五五〇年

要道问答手册——共同生命，弟兄会——路德——帖次勒(TETZEL)——威登堡的九十五条款——焚毁教皇谕令——在沃木斯(WORMS)举行帝国会议——瓦特堡(WARTBURG)——翻译圣经——伊拉斯谟力图折衷妥协——路德会的发展——路德会的改革与缺点——施道比次的规劝——路德在新约教会样式与国家教会体系间的抉择——罗耀拉(LOYOLA)与反宗教改革

各国的弟兄们，不论是在山谷地区的，或是在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瓦勒度派，或是在日耳曼境内的信徒，或是在波希米亚的同寅会，他们都使用同一本要道问答手册。可见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弟兄们事实上是彼此有关联的。这手册是以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波希米亚文等文字印行，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在一四九八至一五三〇年间问世。

与这些弟兄们有密切关联的，还有“共同生命弟兄会”(BRETHREN OF COMMON LIFE)。该会在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初期，在荷兰及日耳曼西北部广设学校。创始人是荷兰的迪温特(DEVENTER)地方的耶赫格若特(GREHARD GROOTE)。他与锐斯布若克(JAN VAN RYSBROECK)商议后，成立了共同生命弟兄会，又在迪温特创办了第一所学校。格若特说明他的教育原则如下：“学习的根源与生命的镜子，必须先基督的福音中寻找。”他认为光有学问而没有敬虔，那并非是福气，简直是咒诅。迪温特这所学校教学的成绩优良，校长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厄居斯(ALEXANDER HERGIUS)；学生人数有二千，后来写《效法基督》的恩普斯(THOMAS A KEMPIS)，和伊拉斯谟，都曾在这所学校求学。不久以后，其它的地方也纷纷设立学校。这些学校教授拉丁文，也兼授一些希腊文。学生学唱拉丁文的福音诗歌；学校也开办成人班，用本国文字的福音书作读本。学校靠誊写新约圣经抄稿赚点经费，后来又印刷圣经，也大量印行弟兄会和《神之友》的单张。就是这样，弟兄会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以圣经为基础的完善教育。

一五三八年，在乌音(ULM)出版了一本诗歌集，里面有弟兄们聚会用的赞美和敬拜的诗歌；歌集的名称相当长，注明是供“基督徒弟兄们天天应用及歌咏以荣耀神；弟兄们就是直至如今还被人认定是非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毕加派(PICARDS)。”

使路德首先受光照的是圣经，再加上施道比次的指导，和图勒尔及其它弟兄们的著述所给他的启发，路德渐渐明白真道。他说他从这些著述中所获益的，比在大学时所吸收的还要多，他又认为没有比这些著述更接近福音的文字记载，也没有更完美的。路德不久便从事著作，孜孜不倦。他早期所写的单张(一五一七——二〇年)，都充满了弟兄会的作风，力指救恩非藉教会而得，是人直接到神面前，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和顺服祂的话的心意，而得着救恩。他坚持圣经的真理：得救是神本子的恩，也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路德讲道铿锵有力，大发热心，不但叫那些已经认识救恩的人重新燃起内心的希望，也叫其它还没有认识真理的人受到有力的启发。

一五一七年，一位销售教皇赦罪券的修士帖次勒(TETZEL)所表现的无耻和胡闹，使天主教骗人的勾当暴露无遗。他来到威登堡兜售赎罪券，路德眼见萨克森选候不肯采取行动，又得到施道比次从旁的鼓励，于是在教堂门口张贴了他那九十五条款，震撼了整个欧洲，使人醒悟到终于有人把当时许多人的感受说出来了，那就是：整个所谓教皇免罪的说法，简直是个骗局，根本没有圣经根据。这位卑微的教士路德，从此要面对庞大的教廷势力，并与之抗衡。他所写的《写给日耳曼贵族论基督徒的自

由》，与《教会被掳去巴比伦》这两篇文章，使全欧洲大为震动。教皇下令把他驱逐出教，他却把教令在威登堡当众焚毁（一五二〇年）。后来他被召往沃木斯(WORMS)受教廷审讯，他毫无畏惧应召前往，也没有人敢伤害他，但在他离开以后，因为受到生命威胁，朋友们便把他偷偷地带走，在瓦特堡(WARTBURG)藏起来，让人以为他是已经去世。在瓦特堡，他把新约圣经译成德文，接着又翻旧约圣经。当时人民普遍受到宗教问题厉害的冲击，也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圣经，结果整个基督教大为改观，因天主教会日益腐化贪婪，人心本来已极感灰暗绝望，现在心内又再一次重燃希望，都感到复兴终竟来临了，教会又再回到使徒时教会开始时的样式，人们重新领会基督，就如圣经所启示的，祂是罪人的救主，引领受苦的人到神那里。

可是，在此意见纷纭，情势变化的时候，冲突是在所不免。跟随路德和同情他的人，迅速增加，但罗马天主教的旧有体系，却并不会如此轻易的改变。当时有人希望与伊拉斯谟合作，共同寻找折衷的办法，保持和平。但教士们眼见本身的地位与特权面临崩溃，心有不甘，主张坚决的对抗，于是教廷决心又像以往一样用咒诅与杀害的手段来镇压新教运动，结果迫使路德一改先前的温和态度，变得像教皇一样顽强固执。

当时的政治竞争，使情势更形恶劣。压迫农民的政策，引发了农民战争（一五二四—一五年），政府归咎于路德和他的同人，欧洲面临大战爆发的危机。伊拉斯谟当时说：“我希望路德……能安静片刻。……他所说的也许是没有错，但也得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后来他写信给萨克森的乔治公爵(DUKE GEORGE)（一五二四），说：“起初路德发表意见时，人人鼓掌喝采，大人你也在其中。如今作他死对头的人，当时也是站在他的那一边。枢机主教们，甚至修士们，都给他打气。他可谓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事。当时他抨击一般老实人也看不过眼的陋习，和一群凶残贪婪的人分庭抗礼，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正在这群人的专制下叹息呻吟。当时有谁会梦想到这运动会如何发展下去呢？……路德本人也从没有想到自己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波。当他的条款论文公开以后，我就劝他不要再闹下去，……我担心会引起暴动，……我提醒他要适可而止。当时主教下教令，国皇下谕旨，不久就有人下牢，被鞭打，甚至遭焚毙。可是我一切的努力都归于徒然，运动遗害日深。……不错，我也目睹世人沉迷于各种礼仪中不能自拔；声名狼藉的教士，扼杀人们的良知；宗教变成一套诡辩，信仰变得一团糟，莫名其妙。此外还有一些甬提的神甫，主教、和教廷官员等。……我认为这是双方协议折衷的时机。……但拥护路德的人却执迷不悟，一点也不肯让步，天主教的人士只嗅到一片火药味的愤怒。……我当时深信，也着实希望，路德肯作一些让步，而教皇和君侯们也许可能同意讲和。愿基督的和平鸽子临到我们当中，否则就愿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帮助我们。路德在病重的人身上用了一服辛辣性的药物，求神使这服药能奏效。”在一五二五年，伊拉斯谟又再写信说：“我认为路德是个好人，是神所兴起的，为要纠正这时代的腐败堕落；但这一切混乱究竟何时开始的呢？是源于神甫们的厚颜无耻，腐化败坏；宗教人士的嚣张跋扈；和修士们的专横暴虐。”他劝人可以取缔一切明显错误的习例，但可以保留其它无伤大雅的，尽量容忍，发挥理性的自由。他说：“修士们长期以来以赎罪券那勾当愚弄世人，一般宗教人士亦纵容他们，但现在事情终于爆发了，那么，那些对圣经美德失去了信心的人，现在该向父子圣灵三而一的神祈求，也要在生活上效法基督，不要干涉那些仍旧信任圣人的信徒。……任由人随己意去领会炼狱的事，不要和与己见不合的人争吵。……究竟是因行为称义哩？还是因信称义？这都是无关重

要的问题，反正人人都相信，没有行为而光有信心，是不能得救的。”

当时的冲突十分激烈，这些温和的劝告当然不能产生任何功效；很少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谈容忍之道。路德在这种特殊情势下，也只得改变作风，这一点改变，也着实影响到当时众人的反应。路德自早期就是个虔诚笃信的天主教徒，在认识了施道比次以后，专心研究圣经，使他开始倾向弟兄会和神秘派的作风，但后来因与罗马教士们的冲突，使他和日耳曼君侯们拉上了关系。因着这个关系，加上他本人早期所接受的训练，使他慢慢生发了要组织路德会的心意；这个心意的发展过程的特征，就是逐渐离开弟兄会的主张，一面图谋恢复圣经真理，一面又取法罗马教会体系的特色，吸收溶入新成立的路德会内。比较上说，路德比旧有的信徒聚会更多强调保罗的教训，较少提及福音；他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但不像以前圣徒那么注重效法基督的道理，这两者原应是并重的。他相信救恩纯粹出于神的恩典，人没有意志或拣选的自由，因此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忽略了好行为的重要性。至于他在罗马教会所取法的习俗，包括洗礼使人重生的说法，因此，路德会也给婴儿拖洗。路德一面在圣经教导上恢复因信耶稣基督的所是和所作而得救的真理，但另一面却拒绝接受新约圣经内有关教会的真理。教会原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但教会要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作见证。路德又采法罗马天主教的教区制度，由圣品人负责所谓基督化世界的事务。当时欧洲好几位统治者支持他，所以路德也主张政教合一，以政治力量去对付异己。一五二九年，在斯拜尔(SPEYER)举行的国会会议中，宗教改革者向罗马天主教所委出的代表提出抗议，“抗罗宗”因而得名。后来在一五三一年，有五位拥护路德的国君和十一个弗里敦市联盟起来，成立施马加登同盟(LEAGUE OF SMALCALD)，是为“抗罗宗的势力”。

因为路德后来的转变，施道比次曾经警告过他，说：“我看见许多把福音挂在嘴里的人，误会圣经的教训，纵容肉体去犯罪，愿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至终能依照福音的教训去行，这福音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巴不得你能接受我的恳求，因为我也曾经一度是传扬福音圣教训的先驱。”最后，当他宣告他不同意路德的做法而要与他分道扬镳的时候，他把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和真正的基督徒作了个比较，说：“现在人喜欢将信心和传福音的实际生活，分开当作两回事，似乎以为人可以在基督里有真正的信心，而在生活上无须像主。啊，仇敌是何等的诡诈！啊，多少人上了当！谁听愚人的话：‘信基督的人无须要有好行为。’但请听真理的呼喊：‘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魔鬼告诉属血气的基督徒说：人称义不在乎行为，保罗也是这样教导人的。这句话说错了。不错，保罗指斥那守律法的行为和守律法的表现，人是出于恐惧才去守律法，希望因此得救，但保罗却从没有指责好行为，还极力赞扬那出于信心与爱心所结的果子，那因顺服从天上来的命令而作的好行为。在他每封书信中，他都是这样说，而且教导人必须如此行。”

路德在教导人的时候，说：“请听保罗的教训说：福音书中指出基督来了，不是要赐下新命令叫我们遵守，而是基督将自己献上为世人赎罪。”可是，从前的教会除了指出基督赎罪以外，还说：真正的基督徒，在以信心接受了基督的生命以后，就会借着那内住的基督，爱慕并追求照着祂的样式和吩咐去行。

路德大刀阔斧的作风，在那些长久以来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繁文与陋习中，打开了一条出路，好让人能进行宗教改革。他向无数罪人昭示基督是救主，并呼召人到基督面前来，无须假手神甫、圣人、教会、或圣礼，也无须靠自己的良善，只要照各人的本相和需要，用信基督而在祂里面找到完备

的救恩，它是以神的儿子那完备的大工为根基的。可惜路德就停在这儿，没有照着神的话接下去实行，反而成立了路德会，虽然删去了一些陋习，但在其它许多方面，却仍旧是那旧制度的翻版；跟随他的人，就接受了他在路德会所塑造出来的样式，但另外有好些人，见他没有回到圣经的样式，大感失望，只好留在罗马天主教会内，而弟兄们心中起初所燃起的希望，便告熄灭；这些弟兄们，发现自己处身在基督教内两种体系的夹缝间，两面受敌，因为这两个体系都是主张用武力使人在良心上就范。

路德事实上是认识教会的属天样式，所以当他下决心放弃新约圣经所教导的真正信徒的独立聚会方式，而选择外在环境迫使他接受的国家教会制度的时候，他内心里着实经过了一番挣扎。这两种方式间势不两立的对立形势，就成了当时冲突的必然战场。在这些冲突中，突出了受浸和守主餐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因为真正的教会，是因着对这两件事上的领受，而标志出教会与世界的分别；但是，在国家教会内，反而要打消信徒与世人之间的分别，因此就有婴儿受洗和施圣餐的做法，目的在否定信徒接受洗礼和主餐就必须先有个人信心的必要。再者，国家教会规定，只有牧师才能主持圣礼，因此人人信心与良知的事上，都必须听命于一种专制的权力，再加上教会与政府或国家的联合，使教会根本无法独立自由，而宗教也成为国家大事。这样的国家教会自然就包罗万有，而且必须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可以接纳不信的人参加，容忍各种不义的事，甚至连圣品人也可以表示怀疑圣经。可是，教会本身如果有权治理这些事，就可以禁止给不信的人施洗，也可以拒绝不信的人与信徒一起吃主的晚餐，因为这些事正好与国家教会本身的性质的基础有关，分歧的基本原因，并不全在礼仪，而是在教会的本身。

从来没有人像路德那样有如许的能力与胆量，指出关于罪人得救是本乎恩这个真理；但在指出信徒在一切的事上应该回到圣经原则，和有关教会真理这方面，路德却没有作所该作的。他说过：“我说了千万遍，神绝对不勉强人服事他。”“任何人都该被迫相信，也没有人能勉强别人。”一五二六年，他又写了下面的话：“福音事奉的正确程序，不可能向随便一群人说明；唯有那些认真决心作基督徒，又口里承认福音，行为上又表明他真诚信心的人，他们就该按名登记起来，分别在其它的房子聚会，祷告读经，施洗，主持圣礼及其它基督教的事务。有了这种程序，那些不按基督徒体统而行的人，就会显明出来，接受应有的责备，然后恢复事奉，或被革除，都要照着基督的法则而行（太 18:15）。这些人可以像其它信徒一样奉献钱财，但要捐得乐意，并且把所奉献的分给穷人，都要照保罗所留下的榜样（林后 9:1-12）。这些聚会无须有太多或高深的歌颂，可以举行精简的洗礼和圣餐，但总要凭爱心，依照神的话去行。可是，我至今还未能成立这种聚会，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但假如有一天有这个需要，而我也必须如此作的话，我会很乐意作我的本份。目前我就专心在呼召及激励信徒的事上，传道帮助人，推广福音，直至有一天，基督徒诚心诚意听从神的话，他们自然就知道该怎样行，也知道该如何作下去。”其实路德深知“合适的人”，大有人在，那就是他所说的“属神的真诚、虔敬又圣洁的儿女”。可是，后来经过不少考虑和迟疑，他还是反对人家实施他所曾津津乐道的理想。路德却不像其它后继者那般认定路德会是人所设计出来最理想的宗派；他形容路德会不过是属“过渡的性质”，只是圣殿的“外院”，不是“至圣所”。他也不停地劝勉警诫人，说：“假如我们正视那些自称是福音派，又能侃侃而谈关乎基督的事的人，就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的，多半都是自欺欺人。起初乐意接受我们的教导，与我们并肩的人；能坚持到如今的，仅十分之一。那些人很会说话，就像鸚

鹬一样学人绕舌，里面却没有真正的经历，始终是原来的本相，从来没有尝过神的信实，也没有感觉过神的真实。他们满口福音，起初也果真能诚心去寻求真理，但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就没有了下文，因为他们只是任从己意而行，随从自己的私欲，事实上他们的景况大不如前，也比别人更没有节制，还自以为是。……因为今天的人，不论是小市民或是贵族，都比以前在罗马天主教体系下的时候，表现得更贪婪、更散漫放纵。” “主耶和華啊！如果我们是按正处理的话，今天要求洗礼的一千人中，可接受的大概不满一百。我们如果能这样严谨的去作，那么我们所犯的过失，就会比当日教皇倚恃那些该死的法令横行无忌的情况会好一点，而我们也就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聚会，不至于像如今那样徒具虚名，我们也就能从那些并非真心相信、内无生命、外无见证的人当中分别出来。可是今天，这却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当教会受到政府所支配以后，事情就成了定局。路德从来没有表示过他所建立的教会是照着圣经的样式。当墨兰顿(MELANCHTHON)称呼奉抗罗宗的国君为“教会主要的人物”时，路德却称他们是“权宜的主教”，他还不时因为未能实现他原来的理想而感到遗憾，痛失基督徒的自由和教会的自立性。

当路德公开焚毁教皇的教令而引发了宗教政革运动的时候，另外有人正准备自己去阻抑抗罗宗的发展，组织“反宗教改革运动”，为罗马天主教夺回不少深受改革影响的领域。

这个人就是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他出身西班牙贵族，生于一四九一年，先在费迪南德王朝任王室侍从，以后作了军人，以勇猛无畏著名；年三十时，因伤退位，终生不良于行，却因此扭转了他一生的命运。

在受伤后一段长时间的疗养期间，他读到神秘派的著作，心中迫切要脱离旧造的败坏，渴望作点大事，但并不是为地上君王在战场上耀武扬威，而是为神作耶稣基督的精兵。他祷告说：“求主启示我，教我如何能寻找到祢，我就要如驯犬一般跟从祢，只望能找到救恩之道。”经过了长时期的挣扎以后，他终于向神完全顺服，得着罪蒙赦免的确据，也从肉体私欲的辖制下得释放，心里满了安息。他在著名的蒙撒勒特(MONTSERRAT)修道院那里，在山巅如火焰的群山环抱下，澈夜不睡，经过了一整夜认罪忏悔后，他把兵器解下，放在童贞女马利亚的古老木像前，决心为她和基督奉献自己；又把原来的衣服脱下，换上朝圣者的粗布衣，接着就一跛一拐地走往隔壁的曼热撒(MANRESA)多米尼古修道院住下来。在修道院内，他不但经常作自我省察，沿用神秘派的习惯，还规定将自己观察所得的一切仔细记录下来，不管是默想心得、或异象、甚至是外在的姿态与位置等，都记录下来，设法归纳出凡有助于培养灵性的一切方式。在这段时候，他完成了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属灵的操练》一书的大部分。

神秘派的信徒追求与神直接交通，不靠神甫或其它媒介。这一点事实，引起他们与神甫之间经常的冲突。起初教廷人士怀疑罗耀拉也有这样的主张，宗教裁判所和多名俄会，均曾多次判决将他囚禁，但每次他都说服了裁判官，证明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结果获释。事实上，他起初虽然深受神秘派主张的影响，但后来他另行发明了一套制度，却正好与神秘派的主张背道而驰。他不主张人在寻求与基督直接交通的经历，反而把他的组织内的每一位成员，交由另一位作“听忏悔者”的人指导；会员要发誓向“听忏悔者”供认私生活中的一切秘密，绝对顺从他的指导。这套制度就如军队的组织一般，军人都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甚至最高级的将领，也拨归一些特派的人所管理。这些人专门负责监管各人的行为，和审定各人的行为动机。罗耀拉和他的同人，经过多年研究，到处传道，从事慈善活动，

在这期间内还数度想要去耶路撒冷，但却没成功；又去觐见教皇，后来就形成一群以罗耀拉为核心的教徒，于一五三四年在巴黎正式成立“耶稣同伴会”(COMPANY OF JESUS)，罗耀拉及其它六名人士，包括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内，宣誓自甘贫苦、坚守贞诚、专心传道。一五四〇年，教皇正式承认这组织为“耶稣会社”(SOCIETY OF JESUS)，后来加尔文及其它反对天主教的人，称他们为“耶稣会”(JESUIT)。会员都经过审慎的挑选，再加以长期特殊的训练，学习向长官绝对顺从。经过这么一番锻炼，耶稣会的会员成了有力的武器，不但阻遏了宗教改革运动，还组成了“反宗教改革”的一股力量，夺回不少罗马教会所丧失了的土地。

耶稣会的工作，持守一贯，却能随机应变，势力便迅速膨胀，因着他们肆无忌惮的作风，树敌甚多，甚至在罗马教会内，也有人反对他们，而在其它的国家内，耶稣会不但干涉宗教，甚至干预内政，引起各国人士的反感。该会在发展的期间内充满了风暴，有时会完全控制了某一个国家的政策，但不久却被驱逐出境，受到禁制——但到了情势改善以后，他们又回到那儿活动。在日耳曼，科伦大主教选侯赫曼(HERMANN VON VIED)试图改革天主教，与改革宗和解，但结果受挫，原因是有一位受耶稣会影响的代表简尼修(CANISIUS)从中作梗。此外还有不少其它的事例，显明的因着耶稣会的活动，宗教改革运动不断地受阻，或是不能发挥作用，而罗马教会的势力，却反而加强。耶稣会的教士不辞劳苦，满腔热诚，把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四处传扬，远及印度，中国，和美洲。

第九章 重浸派

一五一六——一五六六年

“重浸派”得名的由来——不是新宗派——迅速增长——立法禁制——胡伯迈尔(BALTHAZERHUBMEYER)——撒特拉(M.SATTLER)——逼迫增强——黑森(HESSEN)的兰贵夫腓力(LANDGRAFPHILIP)——欧顿巴克(ODENBACH)提出抗议——慈运理(ZWINGLI)——瑞士信徒受迫害——格里布(GREBEL)，曼斯(NANZ)，巴拉洛(BALAUROCK)——克士挪(KIRSCHNER)——在奥地利的信徒受迫害——奥地利匈牙利重浸派的编年史——费迪南德的凶残——纒特(HUTER)——曼德尔(MANDL)和他的同工——共同生活——闵斯特(MUNSTER)——新锡安王国——闵斯特的人歪曲事实诬蔑信徒——人怎样待基督，也照样待祂的门徒——门诺西门(MENNO SIMON)——马贝克(PILGRAMMARBECK)和他的著作——宗派主义——在西日耳曼的信徒受迫害——科伦的纒耳曼(HERMANN)大主教试图改革——士文克斐特(SCHWENCKFELD)

一五二四年左右，在日耳曼好些弟兄教会，行了一件事，是仿照弟兄们老早就作过的，也正是在一四六七年弟兄们在劳达所行过的，那就是：他们宣告自己的聚会独立，决定遵照圣经内有关教会的教训去行。当日在场的信徒，如果还没有受过浸入水中的水礼，就都受了浸。为此之故，人称他们为“重浸派”，他们却拒绝接受这个名称，因为这是人存恶意给他们起的称号，故意叫人联想到这是个新

教派。以后这名称也给用在一些实行共产主义激烈的颠覆份子身上，事实上弟兄们和这些共产主义份子完全沾不上关系，但因为两者名称相同，便叫那些迫害弟兄的人更容易博得人的同情，以为他们是在镇压危险的颠覆份子。有关十六世纪重浸派的文献，也一如早期的信徒史料一般，遭受到毁灭的命运，反而是由那些迫害他们的仇敌把当时的事记载下来。但在宗教纠纷中写下来的数据，不免满纸谗骂攻击，因此翻查数据的人，就要格外审慎，才能探索出事实真相。

科伦大主教写给查理士五世有关“重浸派运动”的报告中，指出重浸派自称为“真正基督徒”，凡物公用，“二千多年以来，都是这样，有旧史料和国家法律记录为证。”在斯拜尔举行的国会会议休会的时候，曾宣称这“新的宗派重浸派”，早在好几百年前已被指为不合法，并“受法律所禁制”。由此可见，依照新约原则的浸礼，经过了十二个世纪之久，一直被认为是犯法的，犯法者均被处以死刑。

文艺复兴所带来各方面的复苏，使许多以往因逼迫而隐藏起来的信徒聚会，又再告出现。在里昂所发出的指控某弟兄的教廷论旨这样说：“瓦勒度派死灰复燃，滋生出不少新芽，我们必须加以严厉痛击，以警效尤。”在瑞士的山谷地带，也出现了不少信徒，彼此互称弟兄姊妹。他们自知非在自立门户或标奇立异，而是继续几百年来被人诬为“异端派”的见证。这一点，可由他们的殉道者的记录里得以证明。

受迫害的信徒，在瑞士居住的，多徙至山上；在日耳曼的，则多接受各行业工会的庇护。在宗教改革期间，过去在日耳曼因受逼迫而隐藏起来的信徒，也纷纷重新出现，有恢复聚会的，有另立新聚会的，人数日渐增多，异常活跃，使身为国家教会教徒的罗马天主教人士及路德派人士，均为之侧目。有一个非信徒却同情基督教的人，曾经记叙说：在一五二六年间兴起了新教派，蔓延迅速，全国均受影响，信奉的人甚多，其中不少是真心爱神的。他们的教训，不离信心与爱心，还有十字架的道理；在患难中他们都能忍耐顺服，坚定不移，且经常彼此擘饼，表明彼此合一及相爱，互相劝勉。他们联络在一起，人数日益增加，以致世人担心他们会引起革命，可是事实上，尽管他们在各处都遭受专制暴虐的对待。他们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这些弟兄们紧守神的话，不偏离左右，也不甘愿受任何人的辖制，却甘愿顺从在他们当中有圣灵充满而配作为带领人的长老和监督。这些作带领的，当中最著名的有胡伯迈尔 BALTHAZAR HUBMEYER)；他在弗里堡(FREIBERG)大学攻读时，成绩超卓，后来在英哥斯大(INGOLDSTADT)担任神学教授时，同时被委为热根斯堡(REGENSBURG)大教堂的牧师（一五二八年），许多人慕名前来聚会。三年之后，他迁到瓦勒司胡特(WALDSHUT)，灵里经历了一度改变，接受了路德的主张，他也被人认为是受了“自波希米亚来的异端”的影响，就是指在波希米亚的弟兄们聚会的信仰。一五二四年一月十一日，他发出请柬给弟兄们，邀请有志者带同圣经来他的住处一起聚会，目的是使大家因认识神的话而得说明，好继续喂养基督的小羊；他又提醒信徒，打从使徒时代开始，蒙召传道的神的仆人就经常相聚，集思广益，以便处理有关信仰的种种问题。在请柬中，他提出好些问题，亲切而又诚恳地劝勉大家在神的话的光中好好思想，又保证他会尽力掏腰包请大家吃顿饭。他表明自己的主张，说：“神圣的普世基督教会，是圣徒的相交，是许多敬虔相信的人的团契；他们都同心合意尊荣一主、一神、一信、一浸。”他又说：“教会是普世任何地方所有基督徒的聚会。”“教会也是指相信基督的一群人，他们与世俗分别出来的彼此交接。”他解释说：“教会有二，二者事实上彼此包括对方：一为普世的，

一为地方性的。……普世教会包括所有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而地方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份。”至于说到凡物公用，他说这是指到各人经常乐意帮助有缺欠的弟兄，因为各人所拥有的财物，并非属于自己的，那只不过是交付给各人的，而信徒就如神家里的管家。他又认为因为人犯了罪的原故，使用剑的权力，已移交给地上的政权，因此信徒应存敬畏神的心，顺服地上掌权的。重浸派的聚会经常在巴色举行；在该地，胡伯迈尔和他的同工，切切研究圣经，设法解答信徒提出的问题。

当时巴色成了属灵活动的重要中心，印刷业的人毫无忌惮地印行那些被指为异端的书籍，因此巴都亚的马尔西革流和约翰威克里夫所写的书，也给重新出版，散发至世界各地。与胡伯迈尔一起聚会研究圣经的人，其中满有恩赐及才能的，有卢百令(WILHELM REUBLIN)，据说他讲解圣经，十分精辟，符合真理，吸引许多人听道，他本来是巴色地区的神甫。以前在基督圣体节举行巡礼时，他手拿圣经，不像别人那样举起盛载主餐的饼的圣器。他受浸以后，住在苏黎世(ZURICH)附近时，被逐出国境，后来在日耳曼和摩利维亚地方传道。在聚会时，常有海外来的弟兄参加，因着这些外来弟兄的探望，教会得以与其它外地教会保持联系。参加聚会的弟兄中，有来自英国的李察克若格斯(RICHARD CROCUS)，他是个学者，学生们深受他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是来自法兰西和荷兰的弟兄。

一五二七年，弟兄们在摩利维亚第一次召开大会，胡伯迈尔亦出席参加。大会是在利恩纥德伯爵(COUNT LEONHARD)和理真司坦(HANS VON LICHTENSTEIN)的保护下进行，前者当席接受胡伯迈尔给他施浸，而胡伯迈尔本人在大会举行前两年接受卢百令给他施浸。当日大会有一百一十人同时受浸，而在大会后，胡伯迈尔再给三百人施浸，包括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瓦勒司胡特一位市民的女儿。同年，在奥大利军队进迫下，胡伯迈尔与妻子被迫逃亡，财物尽失；逃抵苏黎世以后不久，即被慈运理(ZWINGLI)的同党发现，被捕下狱。

当时苏黎世和整个行政区，全部受慈运理所控制；慈运理早在路德发动在日耳曼的宗教改革前，就在瑞士进行改革。瑞士改革宗所持的主张，有某些地方与路德所见者不同，他们影响的范围，普及许多行政区，并且深入日耳曼的王国。

在苏黎世宗教会议上，胡伯迈尔和慈运理进行了一场辩理。胡伯迈尔因曾下狱，元气大伤，结果辩不过他有力的对手。他深恐会被交给国王惩治，一时胆怯之下，竟然撤回部份的主张，但后来马上为了自己惧怕人的软弱而痛悔，寻求神的赦免与恢复。离开苏黎世以后，他下到康士坦斯，然后转往奥斯堡，在那里为汗斯登克(HANS DENCK)施浸，以后在摩利维亚的尼哥斯堡(NIKOLSBURG)住下来，专心写作，出版了十六本书；在那里短暂居留的期间，该地有六千人受浸，教会人数增加至一万五千人。弟兄们并非都能在一切主张上意见相同。汉斯纥池(HANS HUT)是个非常热心的传道人，他来到尼哥斯堡，辩称信徒不应为祖国，或自卫的原故而动刀枪，也不应为了负担军费而纳税，他认为这都不合圣经原则，胡伯迈尔听了不服，起而反驳。一五二七年，费迪南德皇迫令当地政府把胡伯迈尔交出来，带到维也纳(VIENNA)，吩咐人施加酷刑，并要加以处决。他的妻子鼓励他坚决站稳。在他被解到维也纳几个月后，他就被带去市集中心所架起的刑台上受处决；临刑前，他大声祷告说：“啊！满有怜悯的神！求祢使我在苦难中坚忍不动摇。我的父啊！感谢祢，今天使我得以脱离这愁苦的深谷。啊！神的羔羊，那除去世人罪孽的！我的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祢手里。”当他身在火焰中时，他还大声喊叫说：“耶稣！耶稣！”三天以后，他那忠心爱主的妻子，被人用绳索将石头缠在颈项上，投于多瑙

河(DANUBE)中淹死。

在宗教改革那段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帮助带领教会的弟兄中，最具影响力的，首推汉斯登克。他生于巴维利亚，曾在巴色攻读学位，因此一定曾与伊拉斯谟和当时聚居该地的著名学者和印刷商人有过接触。后来他被委任为诺伦堡一间主要学校的校长，于是他迁往该地（一五二三年）。当时路德所发起的运动，在年青而满有才华的阿西安得(OSIANDER)领导下，已经风行了一年之久，登克当时年仅廿五岁，满心盼望这个新运动能为人重整道德，重申公义圣洁。但后来当他发现这个新运动并未达成预期的效果时，大失所望。在经过观察分析以后，他就断定那是因为路德的主张有所不及之处，因为路德只主张因信称义，完全撇开行为不谈；在废掉天主教教会许多陋习以后，又忽略了强调信徒必须舍己顺服，跟随基督。同时阿西安得在慢慢领会过来以后（一五五一年），得着的结论是：威登堡的教训，不错能叫人稳妥得救，却也会令人散漫松懈。他说：“任何一种教训，如果要求人遵守严格的道德标准，抑制自己天性中的私欲，这些教训定规不会受大多数人欢迎。可是，那些人又喜欢人家认为他们是基督徒，欢喜听那些伪善的人所说的：‘我们得称为义，完全是因为神以我们为义，所以就算自己是个坏人也不相干，因为这义原不是我们所有的，也不是发自我们的内心，不过是神算我们成圣称义而已。祸哉，那些认为罪人不能成为虔诚人的！’人一听这样的教训，就会暴跳如雷，巴不得要赶绝传讲这种道理的人，但又不能这样作，只好猛捧那些伪善的传道人，恭维他们，袒护他们，好让人能快活的过日子，无须理会真理，虽然这些真理是明显不过的。可见这些假圣徒和伪善的传道人，都是同一鼻孔出气。世人如何，这些神甫也如何。”登克老早亦已有见及此，但阿西安得却全不采取行动，还说登克的教训是“可怕的谬误”。阿西安得还向地方行政当局告发登克，于是登克被邀上堂与他那路德派的对手当面辩证；根据当时对方一个人的记录说：在辩论过程中，“登克的论据异常精湛有力，显然不是用舌战方式可以驳倒他。”结果当局规定他要就指定的七大要点，把自己的见解以书面陈明，但当登克依期交卷时，诺伦堡的牧师们又改变主意，看来似乎他们自觉没有把握驳倒登克，于是改称要将卷宗直接呈交市议会。后来当局勒令登克立即离开诺伦堡，要离城最低限度十哩以上，并且要他宣誓，如果不依照法令去行，就要下狱。当局所提出的理由，是登克散播异端邪说，还千方百计狡辩，不肯接受批评，无法使他改过自新。于是登克翌日即离家别井，开始漂泊生涯，以终余年。

在登克的“自白书”内，他承认自己天性败坏，但深知内心里还存着一股要敌挡罪、又渴望得生命与属灵祝福的意愿。人家告诉他，可以因信得生，但他深知这个信心，不光是仅仅相信他所听到的或阅读领会的那么简单。他天性本来不喜欢读圣经，结果还是这发乎自己良心的催促，迫使他去读圣经，他这才发现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就与他在内心里所领会的是一样。他还体会到，光在表面上读读圣经，决不能明白真理，唯有圣灵能将真理启示在他的心灵和良知里面。

路德派的牧师所拟要将登克逐出境外的命令的文件中，声称登克“用心良苦”，还说“他的见解深得基督真理的精粹，本来也该可以获得宽容”，只是为了要顾全路德派教会的合一，他们只得采此下策，把他驱逐出境。话虽然是如此说，登克每到一个地方，总发现已经有人事前在该地故意诽谤中伤他，还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以至别人都以为他是“危险人物”。他禁止自己以恶报恶，虽然那些攻击他的文章极尽护骂诽谤之能事，他所写出来的东西，却从来没有漫骂的口气。有一次，他受到特别恶毒、带挑衅性的抨击时，就说：“有人误会了我，肆意批评我，就算我心中柔和谦卑，也要几

经艰难才能把怒气按捺下去。”又说：“我心里甚感痛苦，因为我没法与自己所称为弟兄的人和谐共处。他们所敬拜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们所尊崇的父，也就是我的父。”“因此，神若允许，我决志尽可能不与我的弟兄为仇，也不以我的父为审判者，而是在要走的路上，尽量与我的仇敌和好。”

登克在圣加伦(ST. GALLEN)一个弟兄家受到款待，过了一段日子，那弟兄和当地政府冲突起来，他就只好离开，来到奥斯堡，因着朋友的介绍，找到安身之所。当时在奥斯堡的路德派与慈运理派之间，不但彼此分争，他们又各与天主教派常有冲突，而且当地信徒灵性普遍堕落，人民深受不良影响。登克心里怜悯这些六神无主的灵魂，就聚集了一群愿意以在基督救赎大工里的信心，天天跟随他的脚踪而活的信徒，一起聚会。当时登克还未加入外人所称为浸礼派或重浸派的信徒当中，不过他发现自己的在奥斯堡所行的，正如弟兄们在别处地方所行的一样，也和他圣加伦亲眼所见的相类。后来胡伯迈尔跟他会面以后，他就决心加入弟兄们当中，自己也受了浸。在登克还没有加入之前，在奥斯堡早已有许多受浸的信徒，教会日益壮大。多数信徒家境贫困，但亦有一些有财有势的，其中有兰振曼特尔(EITEHANSLLANGENMANTEL)，热心爱主，许多人因读到他的著作而受到吸引。他出身当地望族，父亲曾十四度连任市长，并在国家政府内任要职。到了一五二七年，教会信徒人数多达一千一百名左右，在附近各国亦甚活跃，建立教会，也加强许多主要城市中的教会。

有熟悉这方面数据的人说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许多信徒由于心灵里真正的需要，又见各宗派彼此指控对方为异端，深感不安，于是亟望脱离宗派范围，寻求安静接受教诲的地方，……在重浸派清心的信徒心里，就不断地浮现着这完美的理想，他们向往当年使徒们那美好的样式，周游四方传道，建立早期的教会，信徒在爱心中一起聚会，正如一个身子上许多的肢体一样。”

在此期间，教会写成了不少诗歌，表达信徒的敬拜和经历。

当逼迫的矛头转而针对登克的时候，他就离开奥斯堡，到史塔司堡避难；当地亦有许多受浸的信徒。

当时抗罗宗的领袖是两位才能过人的弟兄——加比多(CAPITO)和布塞珥(BUCER)。他们并没有肯定归属威登堡派还是苏黎世派，虽然他们比较接近慈运理和瑞士改革宗的作风。加比多希望能保持与这两个教派的联系，从而导致两者间较调协的关系；他在受浸的事上也没有定见，但维持与弟兄们的友好关系。当时有些思想过激的人物，弟兄们一时又未能摆脱他们，这些人给弟兄们带来了不长的影响，也拦阻了一些本来想要参加弟兄们聚会的信徒不敢前来。慈运理还主张排除异己，施以极刑去对付，结果使加比多也疏远他。登克来到史塔司堡的时候，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弟兄们人多势众，成了当地宗教最占优势的份子。登克不久就与加比多成了密友；登克敬虔的品德和优越的才能，不但吸引了人所称为浸礼派的信徒，也吸引了不少无所适从的弟兄，大家公推他为领袖，信赖他。布塞珥见状，不禁暗地着急，因为他相信任何敌派，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一定不会有前途；于是联合慈运理，设法引起当地的市会恐慌起来，登克抵达以后不出数周，就接获离境的通知。同情他的人很多，都巴不得起而抗命，但登克依旧维持一贯作风，主张顺服掌权的，因此他决定离开，往别处去（一五二六年）。

登克在各地飘泊，历尽危艰。在沃木斯的信徒颇多，他在此地逗留了一段时间，与赫德琐(LUDWIGHETZER)合作翻译先知书，即在当地出版（一五二七年），三年内再版了十三次之多，第一版还翻印了五次，翌年又再印了六次；奥斯堡的版本在九个月内覆印了五次，不久以后，他在奥斯堡带

领弟兄们的大会，各地弟兄均来出席。他公开反对那些主张对日益加剧的逼迫使用武力去对付。这次大会被称为“殉道者大会”，因为当日出席的弟兄，有许多都在日后殉道。登克后来到了巴色，因为多年漂泊和经常匮乏，健康濒临崩溃；他与昔日友人豪斯查恩(HAUSSCHEIN)重逢；豪斯查恩是改革宗信徒，人称厄科兰巴丢(OECOLAMPADIUS)。他为登克预备了一个安全而宁静的地方休养，后来他就在此安然去世。他死前不久说了下面的话：“我无家可归，深感痛苦；但使我最感痛心的事，是：我虽然大发热心，可是没有多大成果。神知道，我所最珍贵的成果，莫过于能目睹所有信徒——不论是受割礼的、或受浸的、或两样都不是——能同心合意，一齐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将荣耀归给祂。我绝对不同意那些以繁文褥节和今世俗务来缠累神的国度的人的做法，不管他们是谁。”当时甚少人能表现容忍的美德，他就说了下面的话：“在信心的事上，人人都有自由；信心要出于甘心情愿。”

有关信仰的争端，不一定是出于某一方要维护真理，而另一方却坚持异端。引起争论的原因，往往都是因为某一方强调真理的某一面，而对方则强调同样的真理的另一面，双方都尽量引用支持自己见解的经文，而故意不提对方所认为重要的经节。就因为如此，有人就指出，任何道理都可以引用圣经证明，因此圣经被认为不是绝对可靠的指南。事实上，这一点特质，正相反地表现了圣经的完备；圣经并没有单方面的指出真理，而是将真理的每一面依次序指出来。比方圣经明显说出因信称义的道理，不须靠行为得救，可是圣经亦同时指出必须要有好行为，因为好行为是信心的后果和明证，这就是圣经真理的平衡性。又譬如：犯罪堕落的人，没有良善，亦不能行善，不会寻求神，救恩纯粹出于神对人的大爱和恩慈；但是在另一方面，人里面却有得救的可能性，良知会对从天上来的真光和话语作出反映，因而人会追求公义，厌恶罪恶。所以事实上，圣经所启示的一切伟大真理，都有它平衡的一面；要各方面兼顾，才能获得真理全面的知识。在这一点特质上，神的话就像神的创造一样，往往必须在相反方面的力量发动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提及宗教改革，人就以为当时在欧洲的宗教界分为两大阵营：一面是抗罗宗（路德派或瑞士派），一面是罗马天主教，但大家都忽略了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的大部份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各自独立的聚会，不倚仗政府的庇护，一心要依照新约时期圣经的原则去行。他们人数颇多，甚至西方的国家教会都担心会受到威胁。这些重要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竟占不到给人一提的地位，原因是那些国家大教会，包括天主教及抗罗宗的，不惜滥用国家权力去给他们多方的压制，以至这些信徒不是被迫逃到海外，就是留下来苟延残喘。有关他们的文献，又遭国家教会毁灭净尽，而官方所留下来的记录，则多方歪曲事实，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

一五二七年，在撒特拉(MICHAELSATTLER)和其它几位弟兄领导下，教会在巴登(BADEN)召开大会，通过下列决议：(一)教会只接纳信主的人受浸；(二)教会内要实行律己节制；(三)主餐是为了纪念主的死；(四)教会信徒不得与世界相交；(五)教会牧者的责任是在作教导；(六)基督徒不得动刀枪，也不得诉诸法律；(七)基督徒不能发誓。撒特拉在各处殷勤作工。一五二七年春天，他由史塔司堡来到禹尔吞堡(WURTTENBERG)传道；他在诺登堡(ROTTENBURG)被捕，因所传的信仰而被判死罪。根据法庭的判决，他先在城中各处被凌迟，然后解到城门口，那给宰割得支离破碎的身躯便给扔到火里，他的妻子和几位姊妹就给淹死，和撒特拉一同被捕的好些弟兄就给斩首，这是在诺登堡所发生的一连串逼害基督徒的行动的第一个事例。在奥斯堡的信徒聚会，也遭遇同样命运，信徒星散，第一位殉道的是汉斯路浦

尔德(HANSLEUPOLD)，他是教会的长老，在聚会时与其它八十七位弟兄一起被捕，斩首处死（一五二八年）。他在狱中所写的一首诗歌，后来编入弟兄们的诗集中。这些浸礼派信徒所写的诗歌，好些都是在狱中写成的，充份流露出他们为主所经历的苦难和对主的爱慕。这些诗歌迅速在受苦的圣徒中流传，使他们深受安慰与激励。两个星期以后，满有恩赐的兰振曼特尔(EITELHANSLANGENMOANTEL)，虽然平时与最有权势的家族过从甚密，亦不免一死，与其它四位弟兄一起被处决。大批信徒遭毒打，额上烙了十字架的记号，便被逐出城外。在沃木斯，信徒人数太多，一时不能赶除净尽，信徒继续秘密聚会。

黑森(HESSEN)的兰贵夫腓力(LANDGRAFPHILIP)，是当时唯一例外的统治者，敢于抗拒签署当时查理士王由斯拜尔所发出的法令，不顾后果。法令规定全欧洲的君王与官长，“要将一切受浸或再浸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要用火烧或用刀剑处死；所施的死刑，则按个别情况而定，一律不必经过宗教裁判官的审讯”；还有，凡不将婴儿交来受洗的，同样定罪；如有人接待这种基督徒，或收藏他们，或不检举那些试图逃避法令的，一样要定罪。萨克森选候当时受了威登堡宗教人士的怂恿，强迫兰贵夫腓力将一些重浸派信徒放逐或下狱，但兰贵夫腓力的行动，只止于此，并没有进一步杀害他们。他坚守这个原则，认为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对错误的一方，只能以道理劝服，不应加以压力。他还说：他在那些所谓“狂热信徒”中所见到品行端正的人，比在路德派教会中所见的还多，因此在没有其它充分理由的情势下，良心不许他单凭信仰为根据而任意惩治人，或将人置之死地。

在巴勒登丘(PALATINATE)，(即德国西南部，译者按)，在海德尔堡(HEIDELBERG)，亚尔西(ALZEY)，和克鲁兹那克(KERUNNACH)等地区，还有不少弟兄。在一五二九年，有三百五十位弟兄遇害。在亚尔西的信徒所受的迫害，格外凶残，曾引起一位勇敢的福音派牧师欧顿巴克(JOHANNODENBACH)直斥其非，申斥那些“被委负责审讯在亚尔西那些称为重浸派的可怜囚犯的法官”；内文如下：“你们这些可怜无知、不学无术的人，应该诚恳地切切求那位真正的审判者，求他赐下从上面来的智慧和恩典，帮助你们，使你们不致手沾无辜者的血，虽然是皇上和君侯们命令你们去执行审讯的。但这些可怜的囚犯，罪名不过是受浸；他们并没有犯罪得罪神，不该因此招受咒诅；他们也没有犯法，违抗政府或世人的定例，没有理由要他们偿命；因为无论受浸或重浸，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叫人得救或定罪。我们应该认清：受浸不过是个表记，表明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向世界死，敌挡撒但；这些信徒所寻求的，不是眼前暂时的好处，而是永远的福份；他们不停地与肉体、罪恶和撒但争战，生活效法基督。在捆锁和酷刑下，你们当中能有谁还可以说得出受浸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说不出来，那你就该因此被判死刑吗？当然不该！我这样说，不是要支持重浸。如果要废止重浸，就只能用圣经的话，不能出动刽子手。因此，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僭夺那该属于神的权柄，免得神的震怒临到你们，像所多玛和地上其它作恶的世人所遭遇的。你们审问过不少盗匪、杀人犯、恶棍之类，他们所得的判决不过是下狱，比这些人所受的仁慈得多了，而这些可怜的人却并没有偷窃、没有杀人、没有纵火、也没有卖国，更没有犯任何可耻的罪，只不过是触犯了一些定例，犯了一些小错误；他们却是以至诚单纯的心意，再受浸来荣耀神，并无意伤害别人，那么凭良心说，你们怎么可以认定他们就该斩首、或因而受咒诅呢？假如你们对待他们的态度，能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法官那样；又假如你们懂得以圣经真道来教导他们的话，事情就不用藉刽子手来解决，真理也就一定会得胜，而他们顶多不过是该

受囚禁而已。同时，你们这些神甫就该好好地教导他们，把他们领回基督那里，就如牧人把迷路的羊背在肩膀上带回羊圈中；又使他们明白，从今以后你们这些神甫就会以仁慈和弟兄的爱安慰他们、扶持他们，并以甘美的福音教训使他们得以恢复。你们不要上当，胡里胡涂地就把这些可怜的人处死。在这件事上，按理你们应该感到惊骇汗颜才是，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是在那儿出了错，你们也不该对他们所说的掩耳不听。这些可怜的人说：“我们愿意从圣经里面得着更美好的教导；若有人用福音指引我们一条正途，比我们所走的路更好，我们甘愿听从。”然而你们竟犯了大错；想想你们该如何永远蒙羞！想想其它普通人看见这些可怜的人去服刑时会何等愤怒不平，何等不耻你们的所为！后人论到这些受害的人，不免会说：“看这些虔诚人！他们存着多大的容忍爱心、和敬畏神的心而去接受死刑；他们在与世界争战时显得何等英勇侠义！”啊！愿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神面前无愧！真的，他们并未被打倒；他们忍受了人的烈怒；他们是为神牺牲的殉道者。以后人人会说：你们作出残酷的判决，目的不在废止重浸派的错谬，而是要用暴力毁坏福音和神纯全的真理。……

这番大义凛然的陈词，终于使那些审判官拒绝纯粹为了信仰问题而作出判决。

慈运理所领导的伟大改革工作，主要是在日耳曼瑞土壤内进行。在苏黎世和当地的行政区内，他都拥有很大的势力。一五二三年，他在苏黎世创设了国家教会制度，市议会掌握一切有关教会和信仰的事上的判决权力。不久，这个权力便转而针对弟兄们。当时有一个弟兄叫穆勒尔(MULLER)，给带到议会堂上受审。他说：“不要强迫我的良心，因为信心是出乎神的怜悯，是白白赐下来的，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涉。神的奥秘原是隐藏的，就像埋在地里的宝藏一样；人若有主的灵作引导，就会找到这宝藏。所以我求你们这些神的仆人，不要干预我的信仰。”但审判官对他的恳求充耳不闻，因为这个新兴的国家教会，采用了旧天主教会的作风，认为国家教会有权用监禁甚至死亡的刑罚，去对付那些所谓“异端教徒”。

早期的时候，慈运理和弟兄们过从甚密，他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受浸的问题，也说过婴儿受洗并没有圣经的根据。可是，当改革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循着国家教会体制发展下去而需要依靠政府的势力去执行决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逐渐疏远了这些弟兄们。

在苏黎世的弟兄们为数不少，且甚活跃；其中有三位弟兄最为突出，当中有一位是慈运理的密友，那就是肯略加里布(CONRADGREBEL)，是市议会委员的儿子。他在巴黎和维也纳两所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很出色，后来回到苏黎世，参加了当地信徒的聚会。另外一位是腓力士曼斯(FELIX MANZ)，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学者，他母亲是个热心的基督徒，把她的家开放给弟兄们作聚会之用。第三位是个修士，在改革运动影响下，离开了罗马教会；他被称为“巴拉洛”(BLAUROCK)，意思是“蓝衣者”，又常被人称为“强壮的乔治”，因为他身形高大，充满活力。

这三位弟兄诲人不倦，四处逐家传道，教导训诲众人；许多人接受了福音，在教会中受浸。在苏黎世，信徒经常公开施浸，亦经常聚会擘饼纪念主。他们称自己是神真正的儿女，远离世俗，而他们是把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会，都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当地市议会明令禁止他们的活动，于是双方公开辩论，但市议会握掌大权，结果下令所有还未把自己的儿女送来受洗的，必须在八天之内送来受洗，另一方面又严厉禁止弟兄们为信主的人施浸。格里布、曼斯、和巴拉洛却不屑去理会，反而加紧传道，成千上百的人都来听道，并且受浸。格里布和曼斯，为人温和，尽量以理服人，但巴拉洛则为人冲动，

有时会闯入聚会内打岔，自己站起来讲道；众人都很爱戴他。弟兄们与执政当局间的冲突转趋白热化，许多弟兄受到严厉的处分。巴拉洛毫不犹疑地向慈运理直斥其非，说：“我的慈运理，你以前经常向罗马天主教人士辩说：凡不是出于神的话语的，都毫无价值；但你现在所说的，许多都不是根据神的话语，而你却辩说这是出于与神相交的启示。你以前用以反驳腓伯(FABER)主教和其它修士的那些满有能力的话语，现在都到哪儿去了。”但不久，这三位传道者和其它十五位信徒，（其中包括六名妇女），被判下狱，每天只获供应面饱清水，要睡在干草上，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其它施浸或受浸的弟兄们，都被淹毙（一五二六年）。被囚的弟兄后来用各种方法逃出，有许多人同情他们，可是无情的迫害愈趋激烈，在百伦(BERN)和圣加伦两地的行政区内，也像苏黎世一样，展开消灭教会的迫害行动。在百伦行政区，有三十四人被处决；有些弟兄逃到比力(BIEL)，在那里有大群弟兄，但追捕他们的人也跟踪到那里。当晚上他们在树林内秘密聚会的时候，被人发现，惊散了聚会，结果他们要另外找地方聚会。在这个时候，格卫布染上瘟疫死亡（一五二六年），巴拉洛也再度被捕，给人绑起来在城内巡行一周，又被剥光了衣服，用棒痛打，“直至鲜血涌流”，然后被放逐离境。曼斯亦被捕，惨遭淹毙。

可是，这一切的事故，都不能遏止教会继续发展，传道者转向邻近的奥大利省泰罗(TYROL)作见证，在那儿很快就建立起教会。巴拉洛也是传道者中之一，周游泰罗全地，不畏艰险，因他的见证而归信的人甚多，尤其是克劳逊(KLAUSEN)和那儿附近的地区，信徒无数，都殷勤的向外传道；巴拉洛逃过几次围捕，但至终与他的同工汉信兰格直(HANSBNLANGEGGER)一起被捕，在克劳逊被烧死（一五二九年）。

同年，迈可克士挪(MICHAELKIRSCHNER)也在该城内当众被焚毙；他曾在音斯蒲如克(INNSBRUCK)为主作美好的见证。接着有弟兄兴起接续巴拉洛负起那艰险的使命，其中有雅各纻特(GACOBHUTER)。就在巴拉洛被焚的那一年，有一天纻特正与弟兄们擘饼纪念主，忽然有兵士走进来，把十四位弟兄姊妹抓起来，其它的人幸而逃脱，纻特亦在其中。纻特不顾危险，四处传道，调解冲突，劝勉受苦的弟兄，但当时逼迫十分利害，许多人逃到摩利维亚，在当地暂时得享自由，可是政府严密防守边界，防止信徒离境，又与威尼斯当局协议，禁止那些被追捕的男女越界逃入该地区。在奥大利全境。福音广遍传扬，建立起无数教会。但信徒经过长期英勇地忍受各种迫害后，仍不免要四散逃避，教会大受打击。在泰罗和哥士(GORZ)，有一千人或被焚死、或遭斩首、或被淹毙。在撒尔司堡(SALZBURG)一个牧师家中的聚会，也突然被人搜捕，有许多信徒遇害。其中有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女，年青貌美，众人都为她求情，但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行刑官把她抬起来丢在饮马的水槽内，将她的头按到水面下直到她气绝，然后把尸首放火烧掉。林斯(LINZ)的施皮特迈亚(AMBROSIUSSPITTELMEYER)为主作见证，多结善果，后来也在诺伦堡殉道。忠心看守林斯教会的布兰胡伯(WOLFGANGBRAND-HUBER)，和其它七十位信徒，在一五二八年被害。就是这样，在各地为主作见证的人前仆后继，传扬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切切实实跟随主的脚踪，而各地政府不停派兵搜捕这些所谓“异教徒”，无须经过审讯的程序，一律格杀勿论。

这些弟兄们虽然给称为“重浸派”，但他们满有勇敢受苦的心志，却不是因为受浸这个事实。他们与他们的救主直接相交，不容任何人或宗教仪式在他们的心灵与主之间发生阻隔。他们与神秘派信徒在一起，发现只要自己常在基督里，而基督也常在他们里面，他们就能分享他的得胜，胜过世界。他

们与主相交，好使他们也能与那些与主相交的信徒彼此交通，且在教会内活出这个圣徒相交的实际。这些教会各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经历，且因其中信徒品性各异而有所不同，但这些教会却都有同一的心志，要照着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初期教会的样式去行，因此他们拒绝婴儿受洗的歪风，这一点也是改革宗所拒绝的。他们又拒绝接受一切从世人而来的济助，而一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却认为如果没有世人的支持，他们就根本不能维持下去。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整个事实的一部份，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他们接受圣经为神心意的完备启示，他们都以此为依归，并仰赖神帮助他们能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实行出来。他们拣选了这条道路，遭受到不少特别的试探；他们何时顺服肉体的私欲，或贪图政治势力的时候，何时就会严重地失败。但一般来说，他们大部份都能为神的信实作美好的见证。他们给基督教会所下的定义是这样：“教会是信徒的聚合，而信徒是由圣灵召聚，因基督教训而远离世俗，在属天的爱中彼此联络，真诚地向主献上属灵的祭。任何人进入了教会，成为神家里的人以后，就必须在神里面生活，与神同行。凡在教会以外的人，都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他们拒绝给婴儿受洗，于是引起人们诘问：如果婴儿夭折就怎么办？他们的回答是：因为基督的原故，夭折的婴儿也必能分享永生。

奥地利——匈牙利的重浸派编年史中记载着：“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各地使徒们所建立的，但因暴政和假师傅的教训，这信仰的根基受到严重的打击和侵蚀，使教会衰微，甚至几乎消失，不复存在，正如以利亚所诉说的：祭坛被毁、先知见杀，只剩下他一个人。但神却没有让祂的教会完全消失，否则下面这一条基督教信条就等于空话了——‘我信基督教会只有一个，圣徒的交通也只有一个。’就算有些时候教会并不显明，甚至找不到两三位信徒，然而主照祂的应许与教会同在，又因信徒忠心持守主的话，主并没有离弃他们，反而叫他们人数加增。但当信徒疏忽闲懒，忘记了主的良善信实的时候，神就撤回祂所赐下的各种恩赐，另外在别的地方兴起忠心的信徒，给他们各样的恩赐，他们就为主建造教会。因此，基督的国度，由使徒时代到如今，由一个国家转移到别的国家，现今就临到我们中间。”

记载中又写着：“在别的地方，教会有了好的开始，而当主的见证人为主摆上生命的时候，教会也已经走了一段美好的路程。可是罗马教会的专制暴虐，把这一切善工差不多全部扫光，只有毕加派和瓦勒度派信徒，还能持守一部份真理。在查理士五世登基初期，主重新差遣他的光到地上来，路德和慈运理将巴比伦的恶毒除掉，如同平地起响雷一般，可是，他们所建立起的替代品，并不见得更好，因为当他们取得权势以后，就信靠人多于仰赖神；因此，虽然他们有了好的开始，可是真理的亮光反而更暗淡了，就如人把旧锅子的破洞补了，后果却更不如前，他们使人更放肆犯罪，许多人跟随了这两个人——路德和慈运理，以为他们的教训正确，甚至因此有人为此舍命，还以为是打了美好的仗，因之就必得救了。”编年史中还记载了当时信徒和慈运理在苏黎世为受浸的道理所发生的冲突。慈运理本来说过：婴儿受洗的习俗，并没有圣经中神的话的根据，可是他后来又在讲台上说：成年人和信徒受浸是不对的，应该严禁；以后他还在苏黎世地区立法规定：凡受浸的人都要给淹毙。神的仆人所受到的迫害，叫许多信徒四散到各地去，其中有一部分到了奥地利传道。

在奥地利和邻近的国家的教会，迅速增长，十分兴旺；有关信徒被害的数字，和他们受苦的记录，叫人不忍卒读，可是传道人和长老的职事，不断有人接续下去。记录中说及“他们如何满了喜乐，从容就义。当有人给淹在水中快要断气的时候，其它轮候受刑的信徒，一齐唱诗，欢喜快乐地等待行刑官来拉他们去受刑。他们坚守自己所信的真理，又因信神，得以坚立不动摇。”信徒们的不屈不挠，常

引起众人的惊奇，这些人因此就去探索信徒得胜苦难的因由，结果许多人归信真道。但罗马天主教和改革宗的教派，却把这现象归咎于撒但的工作。信徒们自己却见证说：“他们饮用了从神的至圣所中所流出来的活水，就是涌流自生命源头的活水，因此也领受了一种心志，是世人的头脑与心思所无法领会的。他们经历到神的帮助，使他们能背负十字架，胜过了死亡的痛苦。神的爱火在他们里面燃烧起来，他们的会幕并不在这地上，而是在永世里。他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牢靠稳固。他们的信仰纯净如百合花；他们的信心美丽如玫瑰花；他们的虔诚公义，就如神所栽种的奇花。主的使者在他们面前挥动矛戟作保护，好使他们所戴的救恩头盔，和大卫的金盾牌，不致被仇敌夺去。他们已听见锡安的号筒吹响了，心中明白，就把所有的苦难和牺牲的顾虑撇下，毫不畏惧。他们那属神的性情，叫他们看清了，世人所珍贵的，都不过如影飞逝，转眼成空，他们却认识并爱慕更大更宝贵的事。他们受神的操练，以至他们似乎是一无所知、一无所求、一无所慕，单单爱慕天上的永生神，因此他们在苦难中所显出的忍耐，远胜那些使他们受苦的仇敌。”

西班牙王查理士五世的兄弟费迪南德一世，疯狂杀害基督徒。各地施政当局，有好些并不乐意去执行他的暴政，宁愿宽待这些敬畏神，又不伤害人的信徒。可是费迪南德不断地下旨，指令各地官员要使用最凶残的手段，指责他们不够苛厉。泰罗的地方官员有一次迫得上书辩白，解释他们并没有放松政策。呈文内说：“两年以来，上法庭的案件，差不多每天都有重浸派的案子。在泰罗公爵辖下地区，一共有七百名男女先后处决，其余的则统统被逐出境，更有不少已逃亡到国外去，撇下所有的家业财产，甚至有人撇下儿女逃亡。……我们不敢向皇上隐瞒这些人的愚顽不冥；他们在目睹别人受刑时，非但不惧怕畏缩，反而亲自去探望那些下囚的，承认自己是他们的弟兄姊妹，而当他们因此被起诉的时候，法庭无须动刑，他们就坦白承认一切。他们不肯接受人的劝导，也从来很少肯悔过自新，大部份还希望自己快快受死。……亟望皇上开恩，体谅下情，微臣未曾丝毫放松，有辱君命。”费迪南德登基为波希米亚皇后，一贯以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为避难所的弟兄们，就走投无路，与外界断绝了联络。政府下令重赏那些告发“重浸派”而使他们被逮的市民，被处死的信徒的家产充公，补贴政府施行迫害政策的花费。行将分娩的女信徒给留牢监管，等生产后便给拉去服刑。在西里安(SLLIAN)的法官沙尔令格(JORG SCHARLINGER)，因为不忍判处两名年龄分别为十六及十七岁的少年死刑，设法拖延，理由是要进一步审讯清楚；后来判决还押监管，授以罗马天主教教义，费用由所没收的“重浸派”家业项下支付，规定他们满了十八岁时，如果还不肯发誓放弃信仰，就得处死。想想！一个爱主的少年，竟然要在这种情况下，等待他十八岁的生辰！

事态后来愈趋恶化，但纒特始终没有停止聚会，继续在树林里或偏僻地方聚会，而弟兄姊妹们因接待他，甘冒生命的危险。有一次在圣乔真(ST.GEORGEN)的一幢房子内，他和四十人一起聚会擘饼纪念主，突然有兵士来搜捕，其中七个人被捕，纒特和其它的人逃脱，但最后还是因有人贪图赏金告发他而被逮捕，他的口被人用物件堵住，“免得他说出真相，(可作‘传讲真理’意，译者按)”，给人解去音斯蒲如克，当地官府大感快慰，因为皇上谕令十万火急，指令他们必须搜出纒特。费迪南德皇接获纒特落网的消息后，马上下令不管他是否肯放弃信仰，必须立刻处死。纒特根本不会放弃信仰，还用激昂的口吻痛斥国皇、教皇、神甫，和他们所干的勾当。地方当局原想暗暗把他斩首了事，以免引起同情的市民暴动，但费迪南德不批准，坚持要将他公开焚毙，因此纒特在音斯蒲如克被烧死。

乞特在弟兄们中所作的带领地位，很快就给汉斯曼德尔(HANSMANDL)补上了。他为人温和，但同样地勇敢无畏、满有恩赐、舍己爱主，赢得弟兄们的信任和爱戴。在泰罗，他给四百人施浸；他曾数度下狱，受命要感化他的教士，埋怨法庭判刑太宽，而他三翻四次越狱成功，可能表示那些看管人员也同情他。有一次，他逃脱出来不久以后，便在树林中向一千多名弟兄姊妹讲道；但在同年，他就再被逮捕（一五六〇年）。这一回，他给锁禁在音斯蒲如克塔内的地窖里，还有两位弟兄和他一同囚禁在那里。他在窖中写了下面的话：“我在塔内被囚，而我亲爱的弟兄立比次(JORGLIEBICH)也在此被囚多时，……他躺卧着，深陷泥巴中，但上面有一小窗，在有阳光的日子里，他就能看见一丝光线。……我忍受着一切酷刑，处之泰然；他们把我审问了三天以后，把我送回塔内。我有时听见虫子在墙上爬行的声音，晚上蝙蝠群在我头上乱飞，老鼠在周围爬行，但神叫我能忍受这一切；祂于我实在是何等的真实，甚至在夜间祂差派吓唬人的鬼魅，祂也叫它们不侵犯我，反而给我好处。”当他的同工迈耶(JORG MEYER)受审时，被人盘问他为何要受浸，他便回答说：在他未认识真道以前，他曾听见关于雅各乞特在音斯蒲如克被烧死的事，又听说当人把他解去服刑时，口被塞住，以免他道出真相；此外，他又听见慕尔那(ULRICH MULLER)在克劳逊被处死，他一向受人爱戴，公认为忠心信奉这真道的；第三件感动他的事，是他亲眼在史坦拿(STEINACH)看见一个信奉这道的人被处死。这三件事，使他刻骨铭心，心里开始认真思想，认定必定有神赐给他们力量和恩典，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能坚守信仰，忍耐到底，于是他就开始研究这些人的信仰。这三位被囚的弟兄，都能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回答审讯的人，而且引用圣经，指出使徒目前虽然居无定所，并且到处受害，但至终他们必得一百倍的赏赐。他们又极力指出，他们的信仰，并非如人所指控的那些“该咒诅的宗派”，他们亦没有“教派头目”。曼德尔还解释他在所属的教会中，是被弟兄们选立为教师和作带领的。

在音斯蒲如克和该地行政区，政府委出十二个人充任陪审员。他们首先宣誓，表示乐意依照自己的判断来下结论；然后又要再度宣誓效忠国皇，遵照他的谕令；换句话说，就是要定被囚的信徒死罪。陪审员拒绝第二项的宣誓，起诉囚犯的政府官员，十分震怒，但费迪南德（当时已登基为国皇）生怕引起公愤，不愿意过份严厉，改以说服方式迫使合作，于是双方展开激辩，当局又诸多恫吓，结果十二位陪审员当中，有九名屈服让步，余下三个坚决不肯就范时，就给下在牢内，关了几天以后，结果终于屈服。于是全体十二名陪审员宣誓效忠国皇，在未开庭前就先定了罪案。曼德尔被判烧死，其余两人斩首。遇害前，他们从狱中写信给弟兄们，说：“我们现在写信告诉你们，过了基督圣体节，他们就要宣判，而我们也就要向神还愿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乐意接受这一切，一点也没有愁苦，因为对主来说，这一天将是个圣日。”观看他们受刑的人中，有利恩纥德达斯(LEONHARD DAX)，他原是个修士，但当时已成为弟兄；当被囚的弟兄们走过他的面前时，他毫无畏惧地扬手招呼他们，使他们深得安慰。他们还向人群讲道，教训他们要悔改，为真理作见证。当判词宣读出来以后，他们大声斥责那些法官和陪审员流无辜人的血，这些人急忙自辩，声称自己是受了从国皇来的压力。曼德尔大声喊着说：“啊！瞎眼的世人呀！人人都该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你们竟然只根据国皇的命令，就贸然定了我们的罪。”他们又继续向围观的人讲道，曼德尔一口气说下去，直至声嘶力竭，法官便大声说：“我的汉斯，你快住嘴吧！”但曼德尔并没有停止，说：“我所教训人的，和我所作见证的，都是属天的真理。”几位弟兄一直到气绝，都没有停止说话，也没有人拦阻他们。其中一位弟兄已病重垂危，

行刑的人生怕他要断气，便首先把他斩首；其它那位弟兄便转向刽子手，以得胜无畏的口吻喊说：“我为信仰与真理，在此撇下妻儿，房屋田地，舍弃身体与生命。”说完了，便跪下来，引颈待戮。曼德尔则被捆在梯子上，活生生的给丢在火堆中，其它两位殉道者的尸体，亦一同丢在火里。当时目睹这一切的，有保罗兰士 (PAULLENZ)，心中深受感动，不久便加入了这些被人蔑视的信徒当中，与他们一同为基督受苦。

在某些地区，特别在摩利维亚，许多信徒生活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接受同一的指导，凡物共享。他们这样作，一方面是在信徒受欢迎的地区为那些因受逼迫而要离家别井的弟兄们预备安身之所；另一方面是仿效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样式。这样凡物公用的共同生活方式，是耶路撒冷教会所领受的特殊恩赐，因为他们居住在一起，又能在圣殿里聚集。但在别的地方，信徒故居各地，这办法就不能实行，因此在新约时代，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其它教会都没有这样行。在摩利维亚信徒聚居的地方，不错，大家生活在一起，可以为许多其它信徒预备住处。在情况较好的日子，他们这样实行，因此蒙受了许多属灵的福气，作了善工，又在农业生产和手工艺训练方面，办得很成功，使他们富有起来。可是过了不久，这种集体生活方式的缺点就显露出来：儿童所受的教育，比不上自己在家中所受的父母教育；还有人脾气怪僻，相处不易。教会内的分争，好些是起原于这种共同生活方式。后来当战争在该地区内蔓延起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聚居在一起，而且较为富裕，于是成为军队抢掠的目标，这一点成了日后他们放弃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在闵斯特(MUNSTER)发生了一些事，虽然与基督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日耳曼遗祸之深，可说是空前未有。当此人心狂乱激奋之际，心思欠缺平衡，极易趋向极端。有些未信基督的人，目击无辜者为了信仰而忍受残害，心中未免不感到狂怒愤激；而许多身为教会长老及领袖的优秀人材，又纷纷受害，以致带领信徒的责任，落在一些平庸的人手中，他们没有能力阻止激烈的思想狂澜。许多信徒目睹凶残的迫害雷厉风行，都以为世界末日快要来临，而信徒身体得赎的日子，就是向仇敌报复的时辰，亦快要来到，于是有人起来假冒先知，预言基督国度的建立，亦快将实现。

闵斯特是某公国的首都，由主教统治。主教身兼政治和宗教元首之职，征收税项，国中要职亦概由教士出任，这情况引起国民普遍不满。当时有一位青年、他是一个专爱研究的神学人士，名叫伯纳若特曼(BERNARD ROTHMANN)；他周游各地，见过路德，但他在思想上受加比多和士文克斐特的影响更深，后二人都是他在史塔司堡认识的。若特曼讲道铿锵有力，富同情心，克己禁欲。他来到闵斯特传道，吸引大批听众，一时极其哄动，引起市民涌至圣莫里斯(ST.MAURICE)天主教堂，将其中的圣像全部毁坏净尽。为了要恢复秩序，大主教出兵镇压暴乱，可是黑森的兰贵夫腓力，加以阻止，结果闵斯特宣布脱离天主教，成为福音派城市，加入抗罗宗国家的施马加登同盟。这次突变，使邻近许多天主教国家内受迫害的人民，纷纷逃来闵斯特避难。难民份子灵莠不齐：有为基督的原故受逼迫的圣徒，这也是市民所欢迎和引以为荣的；但亦有一些狂热不守法的份子，破坏了市内安宁的气氛。难民均身无长物，市民依照若特曼的教训和模范，殷勤接待他们。难民中有一人说服了若特曼，使他相信婴儿受水礼并不合乎圣经原则。若特曼为了良心的原故，拒绝接受婴儿受洗，市议会因而免去他传道人的职事，但市民都十分爱戴他，反对免职的决定，于是全城为了婴儿受水礼的问题，召开大会，公开辩论。辩论结果，通过若特曼得直，有一个外来的重浸派牧师，激烈陈词，引起暴动，市议会下令逮捕

他，但工会出面袒护，结果市议会被解散，由重浸派份子重新组织议会。

在这个时候，大主教召集军队，包围闵斯特，截断城内的补给。当时城内聚居了大群难民，粮食缺乏情况显得十分严重。移居城内的外人中，有两个荷兰人，后来在闵斯特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马提斯(JANMATTHYS)，另一个名博克尔逊(JANBOCKELSON)，是个裁缝，人称李顿约翰(JOHN OF LEYDEN)。马提斯高大强壮，外貌威严、自称为先知，群众深受他那动听的口才所吸引，都听从他。他言辞激烈，信仰狂热，控制了市议会。他主张与世界分别，制定法律规定城内不许收容没有受浸的人，又宣布数天之内，全体居民都要受浸，否则就要被放逐或处死。结果许多人顺从他而受了浸，但也有人宁愿被放逐也不肯让步。这项行动可谓野蛮无道，却比不上数百年来欧洲大部份的国家教会将不信奉婴儿受洗的人处死那么残酷。此时，城内的“非基督徒”已被赶绝净尽，情况急剧变化，凡物公用，尤其是要应付四围受敌下的人民生活所需。守主日的定例遭废止，法律明定天天一样，没有分别；有时公开守主餐，并同时有讲道讯息。马提斯大权在握，负责粮食及其它日用品的分配，还委派了七名执事协助他，引起了一部份人反抗。其中有一个是造鞋匠，叫胡伯若斯切(HUBERTRUSCHER)，他率领一批原住该城的居民，愤怒抗议由外地来的人执掌市政，指出可能引致的可怕后果。当时双方争持不下，便在教堂外广场举行大会讨论，马提斯当场宣布将若斯切处死，而李顿约翰声称得了启示，要执行死刑，便举起戟刺伤了那鞋匠；场内有三个人不识时务，提出抗议，结果给关在牢内，几乎送命。过了几天，负伤的若斯切又再被提出来，由马提斯亲自行刑，这么一来，没有人再敢反抗市议会的无上权威。此时，城外敌军包围的战事仍在进行，而城内物资日益匮乏。有一天，马提斯正在与其它的人在朋友家中共进晚膳之际，他忽然陷入沉思中，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所爱的天父，不要照我的意思；愿祢的旨意成就。”说完了，和朋友们吻别，然后与妻子一起离去。翌日，他带同二十人出城，直冲围城的大主教军队的前哨基地，双方展开激战；马提斯寡不敌众，同伴们纷纷倒毙，他自己则拼命战斗，直到战死。

马提斯阵亡的消息，引起闵斯特人民一片慌乱，但是李顿约翰马上掌握了大权，宣称得了异象，要解散市议会，说市议会不过是个人为的组织。于是他独揽大权，指派了十二位“长老”从旁襄助。他善于辞令，组织力强，制定法令以适应“新以色列”的需要，使人民相信自己是神的恩爱的特别对象，是真正继承使徒的教会。又声称在闵斯特所实现的，正是全世界所要效尤的模式，而且他们有一天要统治全世界。当时闵斯特城内，男人的数目甚少，妇孺甚多。一五三四年七月，李顿约翰约了若特曼和其它传道人及十二位长老，在市议会厅开会。在会中突然提出实行多妻制度：这项提议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委实是前所未闻，因为城内人民大部份虔信基督教，实行舍己生活，人民道德水平颇高。刚好在数星期前，城内印发了单张，内文提及婚姻的神圣，该是一夫一妻的结合，人也不可离婚。李顿约翰的提议，立即遭受反对，并且引起传道人和长老们极度的反感。但他坚持主张，花了八天工夫与众人辩论，运用口才和借助自己的影响力，驳斥众人，还借用旧约时期一些善良的人失败的事例，支持他认定圣经容许多妻的见解。其实他所提出的论据，大可以应用到其它犯罪的理由上，因为他最主要的论点，就是说这是应时势所需，指出当时城内阴盛阳衰。最后他终于驳倒了对方；传道人就用了五天时间，在教堂广场上向群众鼓吹多妻制度。五天讲道结束以后，若特曼颁布法令，指定所有年青女子必须结婚，而年龄较长的，则要分别归属一些男子 户口以求荫庇。李顿约翰则马上娶了马提

斯的遗孀蒂娃拉(DIVARA),她一向以艳压群芳,多才多艺而著名,(这一点也许可以帮助解释他为何急于实施多妻制度。)但当时所遭遇的反抗,亦很利害。在敌军围城下的当儿,城内竟也爆发了内战;反抗的市民由亨利治慕伦伯克(HEINRICH MOLLENBECKER)率领。他原是个五金师傅,叛军侵占了市议会厅,把几个传道人关起来,要求将原来的市政委员复职,否则开城门投顺城外的敌军,在这种情势下,李顿约翰的政权很可能垮台。但是,大部份宗教人士仍旧拥护他,妇女们亦支持他,因此他率领人攻入市议会厅,制服了反叛份子。这条准许多妻的法令,为害不浅,后来在围城战争结束前,亦宣告废止。

当时虽然内战不已,但在守军坚守下,城池得以固守,与敌军数度交锋,亦告得利,城内人民昼夜盼望获得外援。此时,事态又再起变化,李顿约翰竟然称帝。他指使他的先知(原为金石匠),在市集广场上宣称李顿约翰为全球的君主,实现新锡安帝国。加冕礼就在市集广场上举行,隆重其事;皇冠和其它徽号的材料,都是取用自人民的金银。李顿约翰从他几名妻子中,选立蒂娃拉为后。皇上和他的侍卫军、宫廷内和皇后的侍从等所穿的服饰装备,都经过慎密设计。但人民正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并未能从快将实现的帝国梦想中得安慰。可是他们仍继续坚决抗敌,不料有人暗中通敌,开城引进大主教的军队。城内人民惨遭屠杀,无一幸免。有三百人死守市集广场,敌军诱降,答应他们如果肯放下武器,他们就可以安全出城,他们不以为诈,接受了提出的条件,放下武器,但敌军却背约,结果三百人全体被杀。天主教人士成立特别法庭,审讯一切未遭杀戮的重浸派份子,批准蒂娃拉可以免死,但条件是要她放弃信仰,但她不肯就范,宁愿接受死刑。李顿约翰和其它的领袖,就在他以前加冕的广场上当众受酷刑,死后尸首给放在铁笼内,挂在圣林拔(ST.LAMBERT)大教堂的塔尖上(一五三五年)。

当时的人乘机利用这些事件捏造是非,抨击一切凡抗拒国家教会系统的信徒,概称之为重浸派;将那些敬畏神、安份守己、长期忍受苦难的基督徒,与在闵斯特称帝和提倡多妻制度的狂热份子,一视同仁,目的在混淆视听,使人以为基督徒都是危险的颠覆人物。当权的国家教会长期管制文物保存,故意混乱各种不同教派所留下来的史料,蒙骗后世。路德和墨兰顿(MELANCHTHON)虽然有时容忍多妻制度,但没有人会因此就指证路德派教训人如此行。可是,我们不能就此说他们比前者做得更合理。

许多教会和基督徒一直被人无情地猛烈抨击,被指为作恶多端并信仰错误,使人生出错觉,以为这些诽谤中伤的话都是正确的,就信以为真。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连主自己在预言到祂要受的羞辱和痛苦、甚至受死、以后复活的时候,祂也说过:祂的门徒也要跟随祂的脚踪。人误会主,编造谎话诬告祂,宁愿要大贼,也不要祂;官长和众人都狂野地喊叫要钉祂十字架;祂死的时候与囚犯同列,复活以后也没有人相信,连自己的门徒也不相信。现在,那些跟随主的人,一样遭受世人的白眼,这就不足为奇了。该亚法和彼拉多,代表了宗教与政治的势力,联合起来对付祂和祂的门徒,吐唾沫在他们脸上,鞭打他们,定他们死罪;世人虽满有学问,却都无知可怜,大声反对他们。他们就这样夹在两个恶势力的中间,一面是虚假的教训,一面是邪恶的生活;他们自己却与这些恶势力毫不沾上关系。他们写的书籍悉数遭焚毁,他们给人捏造谎话诬告;他们本人过敬虔仁爱的生活,却被人恶意中伤。他们不管是被称为保罗派、亚勒比根斯派、瓦勒度派、罗德派、或重浸派,与其它什么名称,人一提到他们,就联想到异端教徒、分裂份子,和搞乱天下的人。但他们是走在那位天上的审判者面

前，他曾站起来迎接那被当时大有学问的人用石头打死的司提反；他们教训人要包容体恤那些被罪压伤的人；这些教训成了众人的宝贵遗产，而众人却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认识。

门诺西门(MENNO SIMON)生于此时（一四九二——一五五九年）他是在受浸信徒中作教导人的主要教师之一，说的话应该可说是有点份量。他说过：“没有人能指控我同意闵斯特人的作风。相反地，十七年来，直到如今，我一直反对这些作风；或私下地、或公开地，我都加以口诛笔伐。有人像闵斯特的人一样，拒绝基督的十字架、蔑视神的话语、假冒为善、放纵肉体私欲，我们绝对不承认他们是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因为表面上我们也和别人一样受浸，于是指控我们是与那些人同类，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假如表面上的浸果真有如此的功效，那么他们的聚会也就没有甚么两样，因为一些犯奸淫和杀人或相类的罪的人所接受的洗礼，明显地与他们所受的洗礼一般无异。”

自从闵斯特的的事件发生以后，信徒的教会竟也受到牵连，被人指为同流合污，因此所受的迫害加剧。教会原来盼望能得着良心上的释放，自由敬拜，好有力量给日耳曼民族带来好处，但现在这个盼望已告幻灭。在这个时候，门诺西门兴起，甘冒危险，四处探望这些分散各地、备受困扰的信徒，激励扶持他们。这些重新聚会，跟随他的信徒，后来就给人称为“门诺派”，但这却并非出于他们的自愿。

经过了十八年的事奉以后，门诺执笔写下自传，述及他在二十四岁时在北荷兰的乡村中当罗马天主教神甫。他说：“当时我还从未碰过圣经，因为我担心圣经会使我误入歧途。……过了一年，我每次在做弥撒擘饼饮杯时，我就想到那可能不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起初的时候，我以为这些疑惑是来自撒但，引诱我离开真道，于是我经常忏悔祈祷，但我始终没法抛开这些念头。”就像其它的神甫一样，他饮酒作乐自娱；有人提及圣经的话时，他总是拿来开玩笑。自传内记着说：“最后，我决心把新约圣经好好地读一遍。开始读了不久，就发现自己是一直受了蒙骗。……因着神的怜悯，我天天在圣经的知识上进深；有些人称我为“福音派传道人”，事实上我并不是，人人向我请教，称许我，当时我很受世人欢迎，我也爱世界。但众人公认我是个好人，以为我是在专心传讲神的话。

“以后，有一个敬畏神、虔诚勇敢的人，叫息克司拿德国(SICKE SNWDER)，因为重新受浸而在流窝顿(LEEWARDEN)被斩首。当时我还未听过弟兄们的事，所以当我听见有重浸这么一回事，觉得十分出奇，于是殷勤查考圣经，认真地思想，发现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婴儿受洗。当我明白过来以后，就把事情告诉我的牧师，谈了许久，结果他也不得不承认婴儿受洗的定例，并没有圣经根据。”接着门诺继续参考各种有关书籍，并就教于路德和布塞珥及其它的人，结果每个人所给有关婴儿受洗的理由都不一样，而这些理由又都与圣经教训不符。

这个时候，他给调回去故乡韦马森(WITMARSUM)工作，（该镇亦在北荷兰地区）；他继续研究圣经，在工作方面很成功，大受欢迎，可是他的私生活仍然放纵不羁。他在自传中说：“各位读者：因着神的厚恩和圣灵的光照，也因着我殷勤研究圣经，默想神的话，我得以明白关乎受浸和守主餐的真理，我并没有像人家所指责的那样去求助于一些宗派的见解。但假如我得以明白真理，是由于任何人的帮助的话，我也要为此感谢主。当我在新的地区工作了一年左右，有人就提出受浸的事。我并不知道提出的人从那里来；属于何种宗派；是什么人；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我甚至没有见到他们。在这个时候，闵斯特的的事件发生了，使许多敬虔的人，包括在我们当中的，都受了迷惑。我心里十分痛苦，因为我晓得他们心里火热，可是在真理上却犯了错误。我虽然自惭能力微薄，也只得在传道教训人时，尽力

抵挡这些谬误。……但我的教导并没有果效，因为我自己也明知故犯。可是我的努力，不胫而走，人人称赞我堵住了那些人的嘴巴，都在赞扬我，无形中我就做了那些来就近我的死硬派的支柱。我心灵中异常痛苦，里面多有叹息，我就祷告呼求主，说：主啊！求祢帮助我，免得我连累别人，免得他们的罪过都背到自己身上！我灵里面得不着平安，想到末了那一天，就算能得着全世界，又能再活一千年，但到头来却招致神重重的责打和怒气的责打，那么我究竟有何获益呢？”

“这些事以后，那些可怜迷途的羊，没有了牧人，捱受了各次凶残的清除运动，经历了多次屠杀残害，至终在欧德克劳斯突(OUDEKLOSTER)聚居起来；可惜他们跟从了闵斯特人的错误教训，抵挡圣灵的工作，没有遵从基督的教训，竟然拔刀自卫，（主却曾吩咐彼得收刀入鞘）。这些人虽然无知糊涂，但当他们的鲜血洒地的时候，我心里难过沉重，失去了安息，我不禁检讨自己那充满污秽情欲的生活、虚伪的教导、拜偶像的愚昧等等，天天生活如是一一并不乐在其中，内心挣扎痛苦。我目睹这些热心的人，虽然信仰并非完全纯正，但因自己的信心的原故，甘心舍下儿女和一切所有的，甚至流血舍命，而我竟然曾经向他们教导过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教义，自己还醉生梦死，一味沉迷在罪中之乐，我这样作，只不过是因为自己体贴肉体，贪图安逸，不甘愿背基督的十字架，一想到这一切，我心中忧伤如焚，不能自己。我想：我真是可怜啊！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既然醒悟过来，若还继续执迷不悟，偏行己路，不肯完全顺服神，不尽自己所能的去以主的真道责备这些宗教人士的伪善和属肉体的生活，不去指正他们对受浸和守主餐的错误教训；如果我为了体贴肉体，不去启发真理的根基，去引导那些无知失丧的羊，（这些小羊若是能获得正确的指导，必定会乐意行正路，走向基督的草场上，）那么，这些流出来的血，（虽然是误入歧途者的血），在那全能伟大的神执行审判的日子，岂不控告我、定我的罪？我一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战惊发抖。我心里叹息，流泪祷告，求神向我这心灵不安的罪人赐下恩惠，给我里面造一个清洁的新心，借着基督的宝血的功效，赦免我的罪污，洗净我的不洁，给我智慧、心志、勇敢、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好使我能忠诚地传扬那至高、配得称颂的神的名，传讲祂的道，发扬祂真理的光，使荣耀归给祂。”

“于是我就开始奉主的名公开传讲悔改的道，引导人走窄路，离弃一切罪恶和不虔不义的生活，离弃偶像和一切错误的教训，又公开见证如何照着基督的心意和原则去受浸和守主餐，都照着我从神所得的恩赐。我又提醒众人防备闵斯特人的谬误，指出他们所行的，就如称帝、多妻制度、建立帝国和动刀兵等，都不合乎真理。我殷勤忠心的工作，九个月以后，主以祂为父的灵浇灌我，伸出祂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使我豁然大悟，甘心乐意放下我在人当中所享有的美名和声誉，也撇弃我所过的下流放纵、违背基督徒体统的生活。我就在基督沉重的十字架下，谦卑顺服下来，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可怜软弱；我存着敬畏神的心，找到一些敬畏神、信仰纯正、热心的人，与他们相交。我向那些被人遗忘了的人传讲真道，借着神的大能的帮助，又用祂的话，把他们领到主基督面前，又把硬心固执不信的人，交托给主。读者们，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就是这样蒙向人发怜悯的主，以祂的白白的大恩，首先在我心里作工，给我换上新心，叫我谦卑俯伏，存心敬畏神，又认识自己的本相，把我从死亡的路上引到永生的窄路上来，又将我呼召出来，进入圣徒的交通。愿颂赞永远归给祂，阿们！”

“一年以后，有一天当我在安静地阅读写作、思索神的话的时候，来了七八个人；他们都同有一个心志，我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信仰和生活都无懈可击，遵照圣经的话，远离世俗，在十字架的引领下，

不但以闵斯特人所作的视为畏途，且厌恶世人一切邪恶的宗派分争。他们存着敬畏神的心，恳求我纪念那些痛苦灵魂的愁苦和需要，因为人心实在饥渴，而忠心看守的人也实在太少了。我感觉到神是与我同心，同行，也与他们同心、同行。他们盼望我能把神所托付我的，而我也配得的银子，好好地去投资。……当我听了他们这番话，心里深感不安，满了痛苦与战兢；一方面我深知自己的恩赐短缺，学识肤浅，天性懦弱、肉体的恐惧、多有败坏；还有世人的对抗专横、宗派林立、邪灵的诡诈，与自己快将背起的沉重十字架等等；但另一方面，我看见人的可怜饥饿，敬畏神的儿女稀少，如同没有牧人的羊，被人遗弃。经过他们苦苦的恳求后，我终于把自己完全交在主和祂的教会手中，任祂差遣；我也请求他们留下来，与我一起切切的呼求主。如果主的恩慈美意是要我服事祂来荣耀祂，求祂就以为父的心，赐给我像保罗那样的心志和性情，好叫我能为祂作见证。我要像保罗一样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但假如这不是主的心意，求祂就加以拦阻。……所以，读者们，请看：我并非是受了闵斯特人，或是任何煽动性的宗派的影响而服事主，这一点不过是人捏造出来的谎话。我虽然是不配，但却是因为受了这些乐意跟随基督和祂的话去行的弟兄们的规劝。他们敬畏神，过悔改清洁的生活，用爱心服侍邻舍，忍耐背负十字架，寻求众人的好处，盼望那些人能得着救恩，爱慕公义和真理，恨恶不义和罪恶。他们绝对不是人家恶意附会所说的宗派，而是实实在在活得满有能力的见证人，是真正的基督徒。虽然不为人所知，却是深信基督的话是真正正确的，并且祂那毫无玷污圣洁的典范，也是纯全没有瑕疵的。

“就是这样，我这个可怜的罪魁得着主的光照，澈底悔改，逃出了巴比伦，进入了耶路撒冷，至终负起这艰巨崇高的任务，因为上面提及的人不停地请求，我的良心也催迫自己，……因为我实在领会到这极大的饥渴和需要。……我将身体和灵魂，都交在主的手中，将自己交付在祂的恩手中，就开始（一五三七年）教导人，照着神的圣言，给人施浸，尽自己的一点点的恩赐，为主作工，建造祂的圣城和圣殿，把失落了的石头搬回原来该摆放的位置。因着我们与真正信徒的交通，和这些忠心的弟兄们的工作和帮助，我们这一点微小的事奉和教导，就给全能伟大的神所使用，在许多城市和国家内，见证了这个真正悔改的福音，也印证了他那满带着恩惠和能力的话语，也叫人看见了荣耀的教会，那不可摧毁的教会，不但使许多骄傲的人谦卑下来、不洁的人得了洁净、醉酒的人苏醒过来、贪婪的人变为慷慨、凶残的人变为仁慈，心中没有神的人也敬畏神；还叫他们因为这荣耀的见证而忠心奉献财物，甚至流血牺牲，这一切都是我们到如今天天都能目睹的。这些事，肯定不可能是假教训所能带出来的果效和现象，因为神不会借着假教训作工。如果不是出于全能者的话语和大能，这些果效亦不可能在这么沉重的试炼和苦难中存留那么长久。这些信徒心中满了基督所应许给属祂的人的厚恩和智慧，完全彰显了神的性情，以致那些自称为基督徒而且是满有学问的著名神学家，和那些流人血的暴君，（愿神怜悯他们！）只好蒙羞后退，没法在这些不屈不挠的英雄和基督的见证人面前站立得住。他们对付信徒的唯一武器就是放逐、酷刑、火烧、或杀害，这些都是那古蛇在我们荷兰多处地方从开始就用的手段，每天都是这样。”

“你们请看！这就是我们所接受的呼召和信仰，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果效。可是，我们因此竟遭受诽谤和仇视。神的众先知、使徒和忠仆的事奉，有没有带来同样的果效，我们不敢遽下判语，留待其它的人说句公道话吧！……只要这邪恶的世代肯听我们的话，（其实不是我们的话，而是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话)，又肯敬畏神，依从祂的话去行，世界就一定会大大的改观，一定会比目前更好、更活出基督。我感谢我的神所给我的诸般恩惠，使我爱慕并盼望将世人从他们无法无天的景况中抢救出来，使他们归服基督，我就是流血牺牲也是甘心。

“……借着主的帮助，我盼望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我贪图安逸的生活。我没有金银、也没有财富，我也不爱慕这些东西，然而有人竟存心不良，强说我比别人都多吃肉，多喝酒。……那将我买赎回来，又呼召我事奉祂的，祂认识我，也知道我不求富贵，不贪恋地上的宴乐和享受。我只求祂的称赞，只愿自己得救，也愿多人得救。为此，我要多受苦楚，和弱妻幼儿一起挨受一切的惊险、压力、愁苦、贫困和迫害，经过了十八年之久，我仍旧一贫如洗，朝不保夕地忍受着各种危险和灾难。对了，当牧师们高卧在软床上时，我们却要静悄悄地缩在隐蔽的角落；当他们在宴席上尽情吃喝、撤夜笙歌之际，我们却要提心吊胆地过活，担心席上的宴客随时会来抓我们；当他们备受颂扬，誉为博士大师的时候，我们却要忍受人家咒诅我们的各种称呼，就如‘重浸派’，‘角落传道人’，‘骗子’，‘异教徒’等；末了，当他们正享受高薪厚禄，过着优裕的日子时，我们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的待遇却是烈火、刀剑、和死亡。”

“我的读者们请看：我这可怜人就是这样在焦虑贫困、愁苦和死亡的阴影下，不停地忠心事奉主，直到如今，而且盼望因祂的恩慈，得以尽此余生继续事奉下去，将荣耀归给祂。我和这些真诚的同工们，在这种艰苦危险的事奉中所寻求的，可以凭我们工作的本身和它的果效得出评价，但我要再一次请求有心的读者，为了耶稣的缘故，用爱心接受我这一篇有关我蒙光照、悔改蒙召的自白，并且从其中得着教训。我写这篇自传，实在是出于无奈，目的在使敬畏神的读者明白事情发生的始末，因为我到处受牧师们的恶意诽谤，诬指我是一种激烈教派所呼召按立的。你们这些敬畏神的人啊！请在细读以后才下评语吧！”

门诺西门奉献他一生来传道，探望那些因受逼迫而分散各地的信徒，把他们再召聚一起，建立教会。他在荷兰劳苦作工，直到一五四三年，被人指控为不法之徒，当局悬赏缉拿；如有人加以包庇，就必纠以同罪；如果告发而令他被逮捕归案的，就是犯人也获从宽减刑。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离开了低地国家，经过好几年的漂泊，历尽艰辛，结果在和勒斯坦(HOLSTEIN)的弗勒斯信堡(FRESENBURG)获得阿弗尔德伯爵(COUNTALEFELD)收容保护。这位贵族不但接待他，也收容了大批受迫害的弟兄。他获悉这些无辜者所受的不平和折磨以后，深受感动，以极大的爱心接待他们。弟兄们不但在他那儿安居工作，还享受敬拜的自由，因此在武司顿弗尔德(WUSTENFELDE)和附近的地区，建立了不少教会。在弗勒斯信堡，门诺能自由写作，还可以自由出版；这些出版物迅速分发各地，有一部份流入那些国家的统治当局手中，使好些不分皂白镇压信徒的人，渐渐的明白这真道，因此逼迫也就放缓下来，信徒得以享受一点敬拜的自由。后来门诺就在弗勒斯信堡平安去世（一五五九年）。

移居和勒斯坦的人，在该地创设了新工业，为该地带来繁荣，可惜后来的“三十年战争”将这些建设全部摧毁了。

马贝克(PILGRAMMARBECK)在一五四二年写了一本小册子，记叙当时弟兄们的教训和生活。不错，弟兄们在某些见解上容或有分歧，但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知道他们如何忠实真诚地去领会圣经，并切实的活出来。虽然马贝克对信条的表面奉行极其看重，但弟兄们所常受人指斥的罪名，却并未见载

于小册子内。作者在小册子书名中说明是为一切真诚相信、敬虔良善的人而写的，叫他们得帮助和安慰，指示他们圣经内有关受浸和主餐的教训。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不少经文支持他的论据，然后下结论说：“上面既已说明了我们对于受浸和主餐的领会、意见和信念，在结束本文前，要在此再覆述一下这两件事的用途，尤其是要说明一下设立受浸和主餐的目的。基督耶稣不但在教会中要人承认祂的名，他也要借着教会叫人认识祂，目的是要祂在全地上受属祂的人的高举和称颂，因此基督除了吩咐人传祂的福音以外，还吩咐人行这两件事：受浸和守主餐，好使教会能维持那外在的纯正与圣洁。如果我们领受那真正的亮光，就知道基督的教会，是要借着三件事来表明的：真正的传福音、行正确的浸、和真正的守主餐。如果真正纯全的基督徒教会不如此行，或缺少了其中的一件，教会就不能坚立和持守外面的见证。

“如果要召聚信徒，开始和坚立神的教会，就必须传扬那真正、纯全的福音，这就是向人撒出的生命之网，因为世人深陷于世界的淤泥中，就如禽兽一般。照本性而言，他们是可怒之子。那被网或钩救出来的，（网和钩是指福音之道），意思是说：当他们听见福音又坚定相信的话，他们就能出黑暗，入光明，就有可能由该受咒诅的可怒之子的地位，改变成为神的儿女。就如彼得所说，这些人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基督的教会，因为基督的教会，就是真正相信的神的儿女们的聚集，为要颂扬神的名，只有信徒能在其中，因为人的本性不能明白属神的事，只有真理能叫他们明白基督，对他生出正确的信心。除此以外，圣经并没有指出别一条途径，所以必须由传讲神的话和听道开始，使人认识神和祂那圣洁的教会，又把人们召聚起来，这一切的信，都是源于神的话。信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圣洁的教会的肢体。……”

“建立教会的第二件事，就是神圣的受浸，也就是进入圣洁教会的入门。照着神的命定，除了受浸，人不能进入教会。因此，凡被接纳进入那圣洁的教会的，就是进入信基督的人的聚会的，都必须是向魔鬼和世界死的，也是与一切世界的荣华，肉体的邪情私欲、和今生的骄傲断绝关系，拒绝和舍弃这一切，然后他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纯全的真道；这样，他才能奉主的名受浸，归入耶稣基督，因着悔改和相信，他的罪污就能得洗净，毫无玷污，并且完全顺服基督，与神同行。……这就是受浸所表明的，使信徒能有进入教会的具体表现，也表明圣洁的教会接纳了他。”

“主餐的功用有二：首先，圣洁的教会中信徒能用守主餐而彼此联系，持守信仰的合一，保持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心；其次，所有不属圣洁纯全的教会的一切顶撞神的邪情罪污，能因此得以完全的脱离。”这本书的作者马贝克，原是个著名的工程师，生于泰罗，在该地曾负责重要的工程，因而获得政府颁发奖状以示嘉许。我们不晓得他何时开始和弟兄们在一起，但在一五二八年，当他公开承认信仰时，就被剥夺了一切的荣誉。他曾著书述及这件事，说：“我双亲笃信天主教，但我却脱离了天主教，改为传扬威登堡信徒所信的福音。但当我发觉在路德派福音工作的地方，信徒依然过着放纵肉体的生活，我就开始生出怀疑，而且失去了里面的安息；后来我就受浸，表明因信而顺服，专心寻求神的道，和他的命令。”他被迫放下了一切所有的，与妻儿流亡到国外去，家产全部充公，但他满有才能，因此无论到那里去，总可以维持生计。在史塔司堡，他负责建筑运河，把黑森林的木材运来，使该城繁荣起来。他性格完美，热心爱主，极得弟兄们所爱戴。当地的弟兄很多，属改革宗的布塞珥和加比多，都很钦佩他的为人真诚，和属灵的恩赐。他放胆传讲信徒受浸的道理，很快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

甚至布塞珥也起来攻击他。不久他便下狱，加比多毫无顾忌，往狱中探望他。市议会经过冗长的辩论后，议决婴儿受洗并非不合乎圣经真理，于是下令马贝克在三四个星期内变卖财产，离开该地（一五三二年）。

宗派主义，限制了信仰的纯全。有人强调圣经中某部份真理，某些从天上来的启示，于是人心里接受了，有了一定的反应。当人继续详细研究，并将这部份真理加以解释并传扬的时候，就叫那些接受这部份真理的人，深受其中的能力和丰富所吸引，而在此同时，真理的另一面，或者说，启示的另一个看法，虽然也是在圣经里的，就不免似乎受到忽视，甚至有人觉得它与所强调的那方面的真理相违，于是为了维护所强调的见解，本来各方面均衡并重的真理，就不再被重视，人就把它轻忽地支吾过去，甚至拒绝不信。就是这样，基于一部份的启示，片面的真理，宗派就形成了。宗派也传道，也行真理，所以也有一定的用处。可是因为不能全面认识真理，也不接受全本圣经，所以那用处也属有限，所行的真理也不能均衡。宗派里的信徒，不但丧失了运用整本圣经的福气，也失去了和其它许多圣徒交通的机会。这些圣徒或能较全面认识真理，或在某方面偏重，并不一样，但结果使主的子民四分五裂，我们实在深以为憾，因为这些外表明显的分裂，实在使信徒间基本的合一昏暗了。然而在众教会中，信徒有自由强调各人所学习或经历的，也不失为颇有价值的事；甚至宗派间为了高举真理的不同角度而彼此冲突，结果激发了信徒去深入研究圣经，发掘其中蕴藏的真理。可是，这种冲突如果持续下去，以致破坏了彼此相爱的心，那么损失就太大了。可是，还有一个情况，是比宗派分争更糟的，那就是强制性的合一，或是漠不关心的联合。

克立夫(CLEVE)，宇力(JULICH)，卑尔(SERG)，和马可(MARK)的约翰公爵(DUKE JOHANN)曾下过一道命令，其中的规定是这样：“虽然大家都知道应该如何对付重浸派，……但我们现在与科伦大主教发出联合声明，好叫没有人可以说不知情而推搪。从今以后，凡给人重新施浸，或接受重浸的人；又凡相信婴儿受洗并无意义，或如此教导人的；这些人统统要处死，以示惩戒。……同样地，凡认为在圣坛上所举行的最可敬的圣礼中，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真正存在，认为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这样的人，我们也不会放过，必须要放逐出境；如果三天之内，他们还不离开，就要受刑，……所施的刑罚，就要如我们所公布用以对付重浸派的一样。”接踵而来的事，就是将信徒烧死、溺毙、或斩首；这一切的经过，均有记录可查。

在科伦，教会秘密聚会的房子建筑在城墙上，有两处进口，方便信徒在房子受搜查时可以尽快逃出。一五五六年，德乐赫尔(THOMAS DRUCKER VON IMBROEK)——一个非常虔诚和满有恩赐的教师，年仅廿五岁。在被捕后，在几处不同的塔堡内囚禁过，受尽折磨，但他始终不肯放弃信仰，结果被斩首。他在狱中写成的美丽信札和诗歌，和他坚守信仰的遭遇，在弟兄们中间传诵一时，后来还印刷成集流传甚广，大大激发了真理的传扬。他在狱中时，妻子写了下面的诗句劝慰他：“亲爱的朋友，你要持守纯正的真理，不要惧怕。你知道自己立下的誓言，你要接受十字架，因为基督自己也曾走过这条路，使徒们也跟随了他的脚踪。”德乐赫尔殉道，并未叫科伦的教会丧胆。一五六一年，又有三位弟兄被淹毙；接着那一年，又有两位弟兄被捕，其中一位被淹死，另外一位在将受死刑前忽告减刑，遭放逐出境。信徒继续聚会，一直到一五六六年，其中有一位信徒出卖他们，向官府告密，结果房子受包围，全体信徒被捕，姓名全给登记下来，然后分囚在不同的监牢内。马提亚所尔法斯(MATTHIAS

ZERFASS)自动承认自己是信徒中的教师，始终坚守信仰，受了不少酷刑，仍然忍耐到底，后来给斩首。他在狱中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人在我们身上施酷刑的目的，是要我们说出我们当中作教导的人的姓名和地址。……他们又要我承认他们是属基督教，又要同意婴儿受洗是合理的；但我紧闭嘴巴不说话，只将自己交托给神，默默地忍受一切，心中想到主曾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还要受许多的苦，但一切的事，都在主手中，我也只求祂的旨意成就。”

后来当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要将这些宗派所有的头目、教师、传道人等，都抓起来，……当地官府要派出探子，侦察在篱笆后及围墙内的活动，尤其是要在重要的节期来临前，或连续有月亮的晚上，就要格外留意他们秘密聚会的地方。”

可是，在一五三四年，闵斯特大主教写信给教皇的时候，还一再提及重浸派信徒所作的美好见证。科伦大主教纒耳曼五世（一四七二——一五五二年），也感到罗马天主教会内亟须改革，于是发奋图强，进行改革。他本人也是惠特(WIED)和伦克尔(RUNKEL)的伯爵，帝国选侯，十五岁就出任科伦的座堂首席牧长，不久便被立为大主教。他心地善良，思想开明，深得佃户们所爱戴。但他对狩猎的兴趣，多于教会的事务，而且对神学和拉丁文也没有多大研究。他反对路德，尽毁路德的著作；他辖下的宗教裁判所，也定过两位殉道信徒的罪，但他也深知人民无知迷信，忽略教义，而教会又受了无知的教士所控制，身居国外的地主又吸收了大批进账。他也目睹主餐受到亵渎，又见劝导堕落的教士们回转到正典教规的一切努力均已落空，于是他和教会内高层人士中的有志之士商议过后，开始试图以伊斯拉谟的理想来进行内部改革，但努力终于失败。他又得布塞珥和墨兰顿的帮助，尝试在教会内进行福音性的改革，可是遭到由耶稣会修士简尼修所组织起来的教士、与及大学和科伦市内的人的联合反对，结果又功亏一篑。他见自己孤掌难鸣，心灰意冷之下，便辞去大主教职位，隐居到自己的田庄里。

当时有一个人，始终不与罗马天主教沾上关系，也没有附从路德派和改革宗，却又不是重浸派当中的人。他是个西里西亚(SILESIA)的贵族，名叫士文克斐特(KASPAR VON SCHWENCKFELD)（一四八九——一五六一年），给本国和国外的人很大的影响。他从事于和日耳曼小国的生意贸易，从来很少留意圣经。但在他三十岁的那年，被马丁路德的“神奇妙的号筒”唤醒了，决志顺服在“那临到他身上的神恩惠的真光”中，成了西里西亚宗教改革的“灵魂”。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批评路德的教训中的一些论点，最先指出的，是有关主餐的教训。为此，他受到路德恶毒的抨击，路德又运用势力，将他排挤，作为外人和异教徒看待。但士文克斐特一直都承认自己在属灵的认识上，从路德那儿领受了不少；而在经过多年所受到从路德和路德派牧师那儿而来的攻击后，他依然劝告那些同情他的人说：“让我们为他们求告神，因为日子快到，那时他们就必与我们在一起，在我们的主基督面前，承认自己的愚昧。”

士文克斐特最喜欢读圣经。他计算过，如果每次读四章，一年内就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起初的时候，他就这样定规自己每天读四章圣经，但后来他学习让圣灵管理他，引导他，不限制自己每天读多少。他说：“全本圣经的总和，就是基督。……整本圣经的主要目的，是叫我们能完全认识主基督。”对他来说，相信圣经的准确，又相信圣经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并非仅是一种古老不可靠的教规，

而是使他能不断在圣经里有新发现，有无穷享受；这种相信，也绝不是旧有的迷信，反而是新式的进步。他形容自己读圣经的情况如下：“沉思、探索、钻研、详读、覆读、咀嚼、默想、反复思想、仔细澈底思想。”“因为圣经要向相信的人启示其中纯全的宝藏，犹如珍珠、金银宝石。”他提出下面这条“安全规则”给解经的学者：“如果碰到发生争辩的经文，就要把经文全部上下文一起研究，以经证经，又以全部印证个别经文，彼此作出比较，找出应用的意义。不能单凭个别经文的外在意思，要根据整本圣经的主旨。”他又研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不但参照路德所译的圣经版本，也参照那本《古老的圣经》（重浸派所用的）和通俗拉丁文译本。研究结果，他找到了不少在新约圣经中所引用的旧约经文的解释秘诀。他决心在信仰上和实际生活上，完全顺服圣经的引导，并说：“如果我们有所不明白的，就不要指责圣经，只能怪自己无知。”

在他受圣灵光照后八年，他又有了另一个经历，影响他余下的一生。这次经历以前，他所热衷的，不过是传扬圣经和路德主义。但这一回他有了更深的经历以后，往日在理智上所领会的，就转而为心灵里的完全折服。他明白了从天上来所给他的呼召，深深得着救恩的确据，将自己完全献给神，作个“活祭”。他一面深感罪孽深重，一面又明白了基督借着死和复活，为我们成就了全备的救赎。这一点领会，使他全人全心俯伏在神面前，完全顺服他，使他得以自由活出神的旨意。

他不但发现圣经所给我们的成圣与称义的确据，也给教会明显的指引。他说：“如果要改革教会，我们就要根据圣经，尤其是要根据使徒行传，因为其中记载了教会初期的样式，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才是神和主基督所称赞和悦纳的。”他发现在使徒时代和接着的世代中的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不仅是限于某一个地方，而是在多处出现的。他怀疑这种情况是否已不复存在，因为他说：“圣经只认明那些承认基督为元首，又肯将自己交给圣灵管治而得着各种属灵恩赐及知识的人。”主耶稣随己意分给各人属灵恩赐，因而运行在全教会中，也运行在个别的聚会中。在这些聚会中，圣灵的恩赐显出来，为了叫众人得好处。同一的圣灵将分别不同的恩赐，在各肢体的身上显明出来。圣灵能绝对自由运行；有人受圣灵感动站起来说话，那正在说话的弟兄就当停止不说。众教会并不可能完全没有瑕疵，总会在不知不觉中让假冒为善的人偷了进来，但一经发觉，众人就要将他们逐出教会。士文克斐特不能承认改革宗是个教会，因为大部份受洗的基督徒并没有基督的灵，行圣礼的时候也没有神的恩惠同在。假如那些传教团体不借取耶稣基督众教会的地位，他也会乐意接受他们的帮助。他说：“国家教会其实只是退步到旧约圣经时代那样程度的组织。”

他还说：“无疑地，所有基督徒都是蒙召去传扬他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宣扬那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并要在万民面前承认他的圣名。”凡不承认信徒的祭司职份的，就是限制了圣灵的工作。“假如在保罗的时代，他们只准许那些有职位的人传道的話，基督教信仰能传扬多远呢？福音又怎能传扬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信徒们当中有部份人被选召出来担负特别的事奉，不是经过众人的研究、选举、或按立，而是由于圣灵的启示和显明，“印证了基督与他们同在，并显明他的恩慈、能力、生命和祝福在他们身上。”既然“他们是单单由神呼召和差遣，他们就领受了基督百般的恩惠，满有能力的事奉，并且有圣灵同工的确据，因此就有人得了拯救，人的心灵也得了更新，基督的国度也得以建立起来。”“信徒听这些身为属灵领袖的使徒讲道，他们百听不厌，因为他们从讲道的人身上，享用了神的能力，得着灵食，正如主基督所说过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

接待我。’(约 13:20)。从来不会有未悔改相信、行为不清洁的人，可以做合宜的牧者，而能带领教会长大，管他是博士或教授，都无济于事；就算他能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或能口若悬河地讲道，也没有用处。”“有人说：人品和职位，是两回截然不同的事，所以当主教、神甫、或牧师的，都可能是个恶人，他一样可以占一席位，讲解圣经，甚至可供圣灵差遣，这种理论，与圣经及基督的定意，大相违背。”“这究竟算是哪一等事奉？教导人的，自己心中竟然不受教导，……不相信自己所教训人的。换句话说：就是言行不一致。事实上，根据新约圣经样式的事奉、使徒的教导、和主基督自己所留下的榜样，言行必须是一致的。”

有关受浸这方面，士文克斐特的见解，是认为受浸不能使人得救，人可以不受浸而得拯救；可见，士文克斐特明了受浸的意义，指出凡承认主名及相信的人，都该受浸。襁褓中的婴儿既然不可能分辨相信与否，他们就不该接受洗礼。

士文克斐特却并没有参加进重浸派的人中。他承认他们是敬畏神的信徒，和那些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大有分别；他们行为正直，虔信真诚。但他批评他们墨守成规，虞浅无知，而且也像其它许多人一样，把圣洁坚忍的弟兄们，与那些介入农民战争，和闵斯特人那种作风的狂热信徒，混淆不清。他声称他认识那些第一代的“浸礼派”的人，还把在农民战争中因煽动罪名被杀的闵次尔曾(MUNTZER)的为人，详细的形容出来。他又形容胡伯迈尔那类信徒，是跟随韩斯纒的。其实前者曾极力反对韩斯纒那种极端偏激的教训。他曾覆述一个有关韩斯纒在狱中自尽的传说，但又说明有些人认为他并非蓄意自杀。他称一般人所称“重浸派”的信徒为“韩斯纒派浸礼教徒”。他又述及有人写信告诉他一些关于“重浸派”的不雅的轶事，其中有一则还是来自一位刚脱离“韩斯纒派”聚会的人，但他对这人的信仰，不大恭维。他批评他们对罪、白白的救恩、和救恩的确据，都没有深入的认识，尤其是未有领会使徒教会那完美的样式。他说：“他们被自己的聚会接纳以后，马上便自以为是神的圣洁子民，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是纯全没有瑕疵的教会。……可是，在他们当中，很难找到圣经所形容的那些满有圣灵恩赐的模样，也没有像基督教会那样的华美。”对于他们来说，基督教会的标记，就是表面上可见的正统信仰，因此他们的特色，就是一种不合乎圣经真理的论断人的精神，和属灵的骄傲；“他们自满于自己的成就，因而把一切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人，就是不接受他们的浸礼，和不参加他们的聚会的人，一概给予定罪，认为他们不配与神的圣徒相交，认定他们是在撒但势力下的人。浸礼派信徒，就算满有信心，与司提反一样，又满有圣灵和属天的智慧，也算不得甚么，因为他们过份拘泥于小节，也太自骄自满。”他们在自己聚会中擘饼纪念主，看重主餐和受浸，过于那些更重要的内在实意。“假如你们参加他们的聚会，一定以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在外面确实是表现得十分敬虔。”但是他指出，在圣经比喻中的法利赛人，也比文士更有敬虔的外貌；他接着又加上一句话说：“我们并不是批评浸礼派或修士们的外在敬虔，可是，光叫人去受浸是不成的。”他又指出他们辖制个别信徒的良心，拘泥于习惯、衣饰、及其它外在的规矩；他也反对他们对发誓、战争、和政治参予的主张。然而，在一大群人中，就算他们是基督徒，总会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重浸派”最受人批评的是思想狭隘和墨守成规，可说是他们一点不足之处，也是一些更乐意寻求神心意的人所经常反对的。士文克斐特最反对人家对他们加以迫害。他说：“我很乐意谅解他们当中那些敬畏神的人。”他又常提醒那些听他讲道的人，重浸派中也有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虽然缺少属灵的知识，里面却有神的生命，他为他们在苦难

中仍有喜乐作过见证，说：如果他们果真是煽动份子的话，自有政府去对付他们；别人不该迫害他们。他又说：他认为他们爱好和平，并未怀煽动挑拨的阴谋。

士文克斐特殷勤传道作工，在西里西亚的信徒日渐增多，开始在立尼兹(LIEGNITZ)一带聚会，成为附近信徒的敬虔典范。因为当时多人误解主餐，士文克斐特只好暂时停止主餐，指出应该如何守主餐才有意义。他的理论极具影响力，甚至立尼兹的路德派的牧师，也效法他的做法（一五二六年），于是引起许多人抨击士文克斐特，认为他的处理未免太轻率。其实他这样做的原因，正好相反，他极其重视守主餐的意义，盼望因此能带出教会的合一。他曾说：“啊！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真正活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实际，以爱彼此联系，合而为一。……唉，可是直到如今，我们的实际，始终赶不上当年初期教会的表现，始终不能像当日信徒那样，彼此同心合意。”“但是，我们要坚守基督那使我们释放的自由，不加入任何人为的宗派，也不离弃那宇宙性基督教会的真理。我们不要受任何形式的捆绑，要一心持定耶稣基督。”……“我心中唯一的愿望和心志，就是帮助每一个信徒，去认识基督的真理。基督和他的圣灵是分不开的，我不要信徒因我而分门别类、或因我而使他们离开基督。……既然现在有四个自称教会的团体，就是：天主教、路德派、慈运理派、和浸礼派（或称毕克派），而他们彼此指斥，路德派又抨击慈运理派，和那些狂热教徒。有人不免就要问：究竟他们是否都是真正的基督教会？若不然，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呢，让人可以去参加而蒙福？……在此情况下，我们只好用彼得的话回答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主所悦纳。’（徒 10:34、35）。……所以，尽管这些教会彼此指责排挤，那些行为正直、生活圣洁的信徒，在神眼中始终不会被掉弃。……虽然我本人直到如今未有参加任何教会，……我却从来不轻视任何教会、任何信徒，任何作带领的，或教导人的。我只愿自己能服事属神的儿女，与每个热心寻求神和真诚爱基督的信徒为友，为弟兄；……因此我求神在一切的事上带领我，帮助我，使我能依照使徒的教训，正确地辨别诸灵，尤其是耶稣基督的灵；又教导我，使我能印证，又能分别一切的事，持守一切正确的真理，好叫我在这信徒分裂，彼此分门别类的情况下，能以在基督里以清洁并稳固的良心，去认识真理与合一之道。”……“我在真理里面的自由，不是人人都会同意的。……有人因此说我行为古怪，……许多人对我的多所怀疑。……但神知道我的存心，……我不主张……宗派。借着神的帮助，我盼望自己不会破坏信徒彼此间的和平相处。”……“我宁愿死，也不要破坏任何的好事，因此我没有完全依附任何宗派或教会，好叫自己能照神的旨意，靠着祂的恩典，不沾染宗派，服事众信徒。”

士文克斐特的教训，和他所建立的教会，日益兴旺，引起费迪南德皇帝的注意。皇上认为他蔑视主餐，迫令他离开本地（一五二九年）。他失去了一切的名誉和地位，三十年之久，飘泊各地，路德派教会指他为异端份子，多方迫害，叫他到处流浪。但他所到的地方愈多，接受他的教导的人也愈多，尤其是在德国南部的地区，那儿的统治者，甚至有给他庇护的。在士文克斐特的教导下，这些信徒并不承认是教会，恐怕被人误会他们是与其它的团体划了界线，失去服事他们的机会。他们甚至停止施浸和擘饼，等候更好的时机，同时他们祈求主，盼望在主再来以前，圣灵再一次浇灌他们，使他的教会合一。他们的本份，就是借着读经、探望，和各种见证的方式，为那大日子预备圣徒，又借着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悔改信主，同享那将要显明的荣耀。

可是，他们为了避免惹起困难而停止施浸和守主餐的行动，不但不能帮助弟兄们，反而成为他们

的软弱，幸而那些弟兄们都能一直凭着信心，继续实行圣经中有关教会的教训，正如当日使徒时代教会所行的。其实这些属灵原则如果实行出来，不但不会使他们成为宗派，使他们与其它不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基督徒分别出来，反而会成为所有信徒彼此交通的根据，也是他们同与基督相交的根据。

士文克斐特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浸礼派弟兄于一五四二年印发的新单张”，责难那些聚集成教会、施行浸礼和擘饼的信徒。于是马贝克和其它的人，联合发表声明。覆文题目长达八十三个字，以问答应对方式，答复士文克斐特的问难。答案共有一百个。其中马贝克及其它弟兄们说：“有人指斥我们拒绝承认那些不同意我们的浸礼的人为基督徒，又说我们指责他们否认基督，引人入了歧途。这些指责都是不对的，我们不会论断那些不照基督命令受浸的人，也不会因此定他们的罪。”

第十章 法兰西与瑞士

一五〇〇——一八〇〇年

勒非甫尔(LEFEVRE)——巴黎的信徒——摩市(MEAUX)——法勒尔(FAREL)的讲道——米兹——圣像遭毁坏——处决——在法兰西的逼迫转剧——法勒尔在瑞士法语地区——纽沙特勒(NEUCATEL)——窝度士派(VAUDOIS)与改革宗会面——法勒尔与疏尼亚(SAUNIER)同赴谷地——工作在纽沙特勒开展——法兰西南部信徒一同擘饼——加尔文(JEANCALVIN)——在坡阿帖(POITIERS)的信徒一同擘饼——差遣传道者——弗若敏(FROMENT)在日内瓦——日内瓦以外的信徒一同擘饼——加尔文在日内瓦——苏西尼主义(SOCINANISM)——瑟维都(SEVETUS)——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标语——施图麦(STURM)致书墨兰顿——法兰西众教会的组织——预格诺派(HUGUENOTS)——圣巴多罗买(ST.BARTHOLOMEW)的大屠杀——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以龙骑兵逼害信徒(DRAGONADES)——废除南特敕令——逃出法兰西——色芬群山(CEVENNES)中的先知——加米撒尔战役(CAMISARDS)——沙漠地区的教会改组——若哲尔(JACQUES ROGER)——库尔翁团(ANTOINE COURT)

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六世纪初期，在巴黎有一位思想敏捷、充满干劲的中年人，名叫勒非甫尔(GACQES ROGER)。他虔守罗马天主教一切教规，是当地大学最负盛名的神学博士。他在一四五五年生于毕伽地(PICARDY)的益他皮勒斯(ETAPLES)小镇，先后在巴黎及意大利受教育，天才横溢，勤奋过人，一四九二年在巴黎大学出任教授时，在同侪中崭露头角。当时由于文艺复兴的结果，吸引了各国大批学者云集巴黎。勒非甫尔提倡语文研究，感于在神学范围内的古典文学和经院哲学均未能满足心灵需要，于是他指导学生直接研读圣经。他对圣经的讲解精湛感人，研究态度认真，吸引无数学子纷纷就教，而他为人和善可亲，不但深得学生敬重，且获同侪的信任。

有一年，勒非甫尔当时在所尔波恩(SORBONNE)（亦即巴黎大学神学院，译者按），已任教十七年之久，因其著作而名闻遐迩，有一位二十岁的年青人，名叫法勒尔(GUILLAVME FAREL)，他从在多飞尼(DAUPHINY)山区的农庄，来到巴黎，远离了和他一样虔信罗马天主教的父母、三个兄弟、和一个姊妹。他目睹巴黎人士那种放荡犯罪的生活，心中忧伤。他参加当地教堂的崇拜，深为勒非甫尔过人的

热心所感动。两人旋即结识，且成为忘年之交。法勒尔深受这位著名的教授那种仁慈的态度和认真的研究精神所吸引，两人便一起研读圣经。当时勒非甫尔正从事写作那本称为《圣人生活》一书，夙夜匪懈。他照着在各月份日期来记载各“圣人”的事迹，其时他已完成了在首先两个月份内的人物，并已出版成册，但他逐渐发现研究这些生活荒唐的圣人，和研读满有能力与真理的圣经，对比强烈，于是放弃了该书的写作，转而专心研究圣经，尤其是致力于保罗书信的研究，写了不少铨释。

他的教导方法，平易简明，他说过：“唯有神才能在恩典中借着人的信，叫人永远称义。”这个道理，早在慈运理在苏黎世宣告以前、在路德于日耳曼提出之先，就在巴黎由勒非甫尔明说出来，因此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虽然这原来早已有的古旧的福音，正是主自己和祂的门徒所传扬的，但多年来已被罗马教会的“靠圣礼得救”的说法所代替，所以一旦有人提出来的时候，听的人顿感耳目一新。法勒尔在灵里经历颇深，他也是因信神儿子和祂救赎大工而获得救恩的人当中的一个。他说：“勒非甫尔使我明白一切都是出于恩典；他把我从相信人的积善的谬误解救出来。他一说明这个道理，我就接受下来。”

当时在法蘭西斯一世的宫廷中，也有人接受了这福音，包括摩市(MEAUX)主教毕力公纳次(BRICONNET)，和瓦来士(VALOIS)的玛嘉丽(MARGARET)，后者是亚兰桑(ALENCON)公爵夫人，是王上心爱的姊妹。她才貌双全，尤以热心过人、努力行善著称。此外还有亚台斯(ARTOIS)的伯尔金声(LOUIS DE BERQUIN)，是贵族中最有学问的一位，恪守教规，善乐好施，他是因为人猛烈抨击圣经才开始留意圣经，细读之后，他悔改加入了当地一小群的信徒当中，其中包括阿诺(ARNAUD)和饶素(GERARD ROUSSEL)，二人同为毕伽地人，与勒非甫尔同乡。伯尔金归信以后，立刻写书、翻译，作品遍及法兰西各地，引起大家对圣经的注意，可是也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带头的是大臣杜伯勒(DUPRAT)和大学高级人员伯达(NOEL BEDA)，结果使为福音作见证的主要人物，均须离开巴黎。一五二一年，其中的几个人，包括勒非甫尔和法勒尔，受到摩市主教的邀请，前往该地避难，而摩市主教也在该教区内积极进行改革。

在摩市，勒非甫尔印行了他所翻译的新约圣经和诗篇的法文版本，圣经就成了当地人士的热门话题，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法勒尔到处讲道，不但在教堂内，也在户外地方传讲。他说：“耶稣基督之死，究竟为我们从神那儿带来了甚么福气？如果我们认真思想一下耶稣的死是什么一回事，就能真实领会到我们父神的恩典和怜悯，如何在这深恩大爱的行动上，彰显了出来，叫神得荣耀称颂。看见了神因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可怜的罪人岂不会来亲就祂？神的儿子因爱罪人，甘愿舍生流血，为凡相信祂的人成了完美的祭牲、完备的救赎；祂这样作，岂不叫我们确实晓得祂实在是愿意罪人来就近祂？……祂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能力和智慧、是神自己的降卑，以至于为我们死；是那位圣洁和公义的主，为不虔不义的罪人，献上了自己，好叫我们得以洁净和纯全。父神的旨意，是要凡因祂儿子的宝贵救恩而得救的人，都有救恩和生命的确据，确实的知道自己的一切罪污都已洗净。……神将祂儿子的宝贵救恩，赐给一切受魔鬼、罪恶、地狱和咒诅所辖制的可怜人。……满有恩惠的神、慈悲的父，叫这样的人，成为祂的后嗣，……使他成为新人；又赐下圣灵，叫他可以靠着圣灵而活，联于基督，成为祂身体上的肢体。……因此，让我们甘愿为了父神的荣耀、为了神圣福音的见证，摆上这个必死的生命。……啊！那要来的日子，是何等光明、有福；是何等的充满得胜和喜乐！

主救主在肉身中要再来；他这肉身曾为我们多受痛苦，被人唾弃、鞭伤，脸上比别人都多带创痕。那日子，祂要召聚所有属祂的人，就是分享祂的灵，有祂的灵内住在里面的人，把他们接到荣耀里，在荣耀中要亲自向他们显现，叫他们复活得永生，模成基督的样式，在极大喜乐中与祂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为了这蒙福的大日子，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劳苦叹息中等待着；那日子，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得胜再来的日子，一切仇敌都必要伏在祂的脚下，而祂的选民则要被接到空中与祂相遇。”

当时摩市是宗教活动的中心，毕力公纳次主教给教区内的人分送圣经。悔改信主的人中，有一对整理羊毛的兄弟，姓黎律(LECLERC)，和他们的母亲，还有刚路过探望主教的学生柏芬(JACQUES PAVANNE)，和一位来自力甫里(LIVRY)的寻求神的隐士。他隐居在巴黎附近的力甫里森林中，行乞过活；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位来自摩市的人，送给他一本圣经，他读了以后，就得蒙拯救，而他隐居的茅舍就成了寻求神话语的人聚会的地方。

在摩市的方济各会修士，因当地所发生的事情，向罗马教会和巴黎大学投诉，于是巴黎大学的伯达，和他的同事，马上采取行动，要粉碎福音的见证。伯尔金在他的乡间的别墅中被捕，他毫不胆怯，勇敢坦承所信的真道。在快将受刑前，皇上出面干预，他获得释放，勒非甫尔也获释，而且还获准留居摩市，但行动却要受限制。摩市的主教面临免职抄家甚至丧命等威胁，结果屈服，同意在教区中恢复罗马天主教的制度。法勒尔早就担心他在摩市的朋友不能坚持到底，因此提早离开，往巴黎一行后，随即折返故乡。

摩市和该区的信徒，从一开始就知道圣灵的恩赐，并不限于任何指定的阶层人士，而是分给基督身体的各肢体，因此，当作带领的人因突发的厉害迫害而不得不离开，或要三缄其口的时候，信徒并未因此星散，反而继续秘密聚会。一有机会，弟兄们就照着各人的能力讲解神的话。当时最热心而又有讲道恩赐的，是小黎律。他除了在聚会中讲道和逐家探望外，还在天主教堂门外，用标语大书罗马教会的罪状，结果被捕下狱；一连三天，他给拉去游街示众，一面走，一面被鞭子抽打，还在额上给烧红的铁烙上了记号，表示他是个异端份子。当时在人群中有人喊出来说：“愿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和祂的见证人。”原来这喊声是来自他的母亲，主教目睹这一切，结果不得不释放了他。

黎律脸上带着烙痕，迁到米兹居住，重操旧业维持生活，但仍不断向人讲解圣经。有一位学者，称为涅特斯罕(NETTESHEIM)的亚基帕(AGRIPPA)，也迁来米兹居住，在市民中颇负盛名。他阅读路德的著作，因而开始研读圣经，受到光照以后，也开始向人见证他所信的真道。可见当时不论是劳苦的大众、或是上流社会的人士，都对圣经深感兴趣。有一位奥古斯丁派的修士，名叫查司特兰(JEAN CHAISTELLAIN)，在荷兰认识了基督，来到米兹。他那动人的讲道，影响不少人。此外有兰伯特(FRANCOIS LAMBERT)，他是由亚威农(AVIGNON)的方济各会教士抚育成人的，在孩提时即对周遭所见的罪恶深感厌恶。他受内心的催促就去研读圣经，他领会了过来，相信接受了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不久就开始传扬祂。他从修道院出发，四出传讲真道，大有果效，引起修士们的嘲讽和敌视。他从路德的著作中获益更多，后来抓着机会离开了修道院，往威登堡见路德，使这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大感快慰。兰伯特又与来自汉堡(HAMBURG)的印刷商人洽谈，印行法文所写的圣经和单张，然后运送去法兰西各地。后来他在路德结婚前两年结了婚，是第一位娶妻的法国僧侣。他妻子甘冒生命的危险，与他一起回到法兰西的米兹（一五二四年）。但不久以后，他们两人就被逐出境。可是，在信徒中不断

有新信主的人加入——有一位著名的武士得斯次(DESCH)；又有一个年青人陀桑池(PIERRE TOUSSAINT)，他本来大有希望在罗马天主教会中获任要职。还有许多其它的人。

不久以后，摩市快将庆贺大节日，市民循例出城去数哩外的天主教堂朝圣；该教堂是以童贞女和各种圣像著称的。黎律深为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废除偶像行动所感动，于是在节日前夕，静悄悄地溜出市区，把该教堂的圣像悉数捣毁。翌日，当朝圣者抵步骤见圣像被毁，满地碎片的时候，大为愤怒。黎律并不隐瞒他所作的，还利用机会劝人单单敬拜神，又指出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唯有祂配得敬拜。愤怒的群众把他交给官府，他被判火刑；临受刑前还遭惨无人道的酷刑。当他的身体一片片的受宰割时，他仍不停地大声背诵诗篇二五篇的话：“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它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祂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他成为这次迫害中首先殉道的，接着就是查斯特兰教士，他当众被焚毙。得斯次、陀桑池和其它的人等，纷纷逃生。然而米兹的信徒人数继续增加，在洛林(LORRAINE)全地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南施(NANCY)，安东尼公爵(ANTHONY THE GOOD)曾下令将一位名叫舒次(SCHUCH)的福音使者用火烧死。当这位弟兄闻判决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一五二五年，法兰西王法蘭西斯一世在帕维亚(PAVIA)之战役中，败于查理士五世手中，成了阶下囚。官府趁机要将法兰西境内的离心份子铲除，甚至王的姊妹玛嘉丽亦爱莫能助，孤掌难鸣。摄政王很快就妥协，而天主教会，国会，和所尔波恩的人士，都联合起来对付信徒。国会还向摄政王提出咨文，指法蘭西斯一世一贯姑息异教徒的政策，是造成战役惨败的真正原因。当时得到天主教会的同意，成立了四人委员会，审查一切受路德派信仰所毒害的宗教人士，一经查明，即转送官府究治。这四位委员，都是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他们首先对付摩市主教毕力公纳次，认为他是要犯，首先将他处决，可使信徒丧胆，要收杀一儆百之宏效。不错，毕力公纳次曾经向迫害信徒的人屈服，但不久以后，事实证明他是为形势所迫，事实上他的内心中仍是忠于福音。委员会深深知道，如果能使他就范，会比将他处决更收宣传的效果，于是用尽一切方法说服他，毕力公纳次心里仍能保持信心，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终于表面上向罗马屈服，还循例去行忏悔圣礼。第二位受到抨击的是勒法甫尔，但有人预先通风报讯，他及时逃往史塔司堡，受加比多接待到家中，也受到布塞珥的欢迎，又与法勒尔和饶素等重逢相聚，有机会与更多属神的子民交通。当时留在法兰西遭禁锢并杀害的，有来自力甫里的隐士。他自从归信主，心中得着平安以后，便专心传道，在所住的茅舍内接待问道的人，借着圣经指出救恩之道。当时官府隆重其事地，把他解到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前的广场，敲起钟来召聚市民，然后将隐士当众烧死，他就是这样默默地坚守所信的道而受害。伯尔金当时亦已被捕，下在牢中等候处决，但皇上复位（一五二五年）后，便将他释放。当时得玛嘉丽公爵夫人的帮助，许多流亡在日耳曼和瑞士的传道人，亦纷纷归国，但法勒尔却例外。因他的主张比别的更积极，而当时尚有人希望能与罗马教廷作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所以法勒尔的激烈主张，不大受欢迎。

在法勒尔留居本乡的期间，他的三个兄弟都决心跟随基督；此外还有一个年轻的武士，名叫亚尼曼德科(ANEMONDE DE COT)，还有其它许多人，都归信真道。法勒尔经常在户外和任何能用的房子内讲道，许多人大感诧异，甚至反感，认为他是未经按立的普通信徒，不应该讲道。但他却是个极理想的

传道人；有学问、不畏缩、善词令，虔信真道、熟识圣经、向神忠心、对人友爱。他外表引人注意，中等身材，个子瘦长，长了红胡子，眼光锐利，声音低沉洪亮、态度严肃，满有生气，讲道时那慑人的能力，吸引全场的注意。他自本乡被逐，又在各地被人追踪，最后只好抄远路越过边界，逃往巴色，在当地立刻受到厄科兰巴丢的接待，两人成了密友。但他始终没有去见伊斯拉谟，因为认为他在见证方面不够澈底认真，故此伊斯拉谟也诸多的反对他。后来法勒尔有机会和厄科兰巴丢一起在巴色公开证道，成功地证明神的话语大有功效。法勒尔的热诚与才能，使听众大为倾心。但当他往苏黎世去探望慈运理作了短暂的逗留后回到巴色的时候，就发现敌对他的势力占了上风，官府在压力下宣布将他放逐出境。于是他转往史塔司堡，受到加比多的热情接待，也就在此时与勒非甫尔和其它自法兰西流亡在外的信徒重逢。

法勒尔的工作，在瑞士法语地区进行得最成功。这个风景宜人的国家，多年来陷在属灵的昏暗中，直到法勒尔在此长期劳苦耕耘后，情况才大为改观，大部份地区的人受了光照，后来这个地方有一段长时期成为福音派的基督教中心。纽沙特勒(NEUCHÂTEL)的故事，正好表明了法勒尔工作的果效。当时这个地方似乎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让真理传入，但恰巧邻村的副牧师，准许法勒尔在他的教堂外院中讲道，消息传至纽沙特勒，众人都赶往参加，不久法勒尔便要迁到市集广场上讲道，因为听众甚多，果效亦甚佳，许多人接受了真道，但亦有人激烈反对，整个城市和附近的地方，都陷入骚动中，法勒尔被迫离开了那里几个月以后，又和几位同工再回到那里，工作不但得以继续开展，而且还扩展到瓦伦根(VALANGIN)，遍及瓦尔底勒斯(VAL DE RUIZ)一带及日内瓦湖畔的乡镇，直达格兰森(GRANSON)和俄比(ORBE)。在瓦伦根，法勒尔和弗若敏(ANTOINE FROMENT)几乎被愤怒的群众推入河中淹死。他们虽然逃过此厄运，但在堡垒教堂中又被人殴打，血溅墙壁，至终给下在牢中，但后来又被纽沙特勒的人救了出来。在一五三〇年十月，距离法勒尔第一次在教堂院子内向人讲道的日子不足一年，纽沙特勒举行全民投票，以仅十八票之优势，通过废除罗马天主教的制度，改奉更正教，但容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改革的消息，传至瓦勒度教派，或称窝度士(VAUDOIS)的信徒那儿。这些信徒，除了在偏远的阿尔卑斯山谷地外，也散居在迦勒比利亚(CALABRIA)和亚普里亚(APULIA)，与及普鲁旺斯、多芬尼和洛林等地。同时，在改革运动播扬的邻近国家内的信徒，也听见在遥远的亚尔卑斯山地及其它地方，有人自古以来便信奉他们目前正在坚持的信仰。窝度士信徒称长老为巴比(BARBE)。其中一位长老马丁哥宁(MARTINGORNIN)，他是安革劳尼(ANGROGNE)人，听到了这些消息，心中甚为激动，决心要到瑞士和日耳曼去见这些改革宗的信徒。一五二六年，他终于成行，回程时还把所采集的消息，和一些改革宗所出版的书籍，带返谷地，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在一五三〇年举行的大会中，弟兄们公推两位长老——摩若尔(GEORGES MOREL)和梅逊(PIERRE MASSON)——去和改革宗建立交通。

这两位长老来到巴色，找到厄科兰巴丢，向他自我介绍一番以后，弟兄们就召聚起来。这两位纯朴敬虔的山地信徒陈明了他们的信仰，又说明这信仰是源出于使徒时代的。厄科兰巴丢便说：“我感谢神，祂呼召了你们，寻找到这奇妙的光。”在交谈中，碰到意见分歧的见解，就提出来讨论。两位巴比在回答问题时，说：“我们的传道人都是独身不娶，也从事各种职业。”但厄科兰巴丢说：“信徒婚娶是很合宜的事，尤其是对这些该作群羊榜样的信徒而言。我们又认为传道人不该像你们的那样，从事体

力劳动，因为他们应该把劳动时间用在研读圣经上面，那就更为有益。传道人要学习许多事情，神从不会叫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如有神助地，就学会一切的事，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去学习。”当巴比承认在逼迫的威胁下，他们有时会被迫把儿女送去受罗马神甫的水礼，有时还要参加弥撒，改革宗信徒一听之下，大惑不解。厄科兰巴丢说：“甚么！基督，就是那位神圣的代罪者，岂不是已经为我们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吗？既然有了各各他的代赎，我们还需要其它的赎罪祭吗？你们在神甫主持的弥撒中说‘阿们’，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谈到人犯罪堕落以后的光景，巴比说：“我们相信人都有某些与生俱来的美德，就如草木，甚至石头所有的。”改革宗的信徒说：“我们认为人能信服神的诫命，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强，而是因为神的灵的大能运行，使他们的心志更新。”巴比说：“唉！最叫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感到困扰不安的，就是我们所听到路德所说有关人自由意志和神的预定的教训。……我们大感疑惑，因为我们一无所知，请你们教导我们。”这些分歧的意见，并没有叫弟兄们彼此疏远。厄科兰巴丢说：“我们要教导这些基督徒。但最要紧的，我们要爱他们。”改革宗的信徒对这些窝度士长老说：“基督在你们里面，如同在我们里面一样，因此我们爱你们如同弟兄。”

摩若尔和梅逊继续行程，往史塔司堡，回途中经过迪庄(DIJON)。他们与人们的交谈，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指他们是危险人物，把他们逮捕。摩若尔带着随身的档成功的逃脱出来，但梅逊却遭处决。摩若尔回去报告了与改革宗信徒交通的经过，引起弟兄们的热烈讨论。后来决定召开众教会大会，邀请改革宗的信徒派代表出席，以便共同讨论问题。马丁哥宁和另一位来自迦勒比利亚的巴比乔治，负责把邀请信送去瑞士。一五三二年夏，他们到了格兰森，正巧法勒尔和其它传道人在那里正在商议，如何在瑞士法语地区内进一步传扬福音，长老当场陈述了一些与改革宗分歧的见解，并即请求派人与他们一起回谷地，好能达致意见上的合一，同心合力向外传福音。法勒尔马上便接受了邀请，立即和疏尼亚(SAUNIER)及另外一位弟兄一起前往。

经过了一段艰险的旅程，弟兄们抵达安革劳尼，就是马丁哥宁的本乡。改革宗的信徒亲身看见了这些住在山坡上村居的瓦勒度派信徒，而且探视他们。当时决定在湛幅伦斯(CHANFORANS)庄居内召集众人，但因建筑物容不下所有出席的弟兄，于是放在户外开会，场内摆设了一些粗木橧作为座位。当年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在瓦勒度派的势力范围外进行，大家全无瓜葛。但瓦勒度派却一直保持自古以来与其它无数弟兄和教会间的联系，这些教会远在改革运动以前就已存在，他们虽然同情宗教改革，但一直并未参与其事，因此在这次大会中，意大利众教会的长老，甚至最南端的教会长老，也未参加；还有从法兰西各地来的，从日耳曼来的，特别是有来自波希米亚的。参加的信徒，有农民、工人，也有意大利的贵族，包括赖夫努布尔(RIVE NOBLE)、米染度喇(MIRANDOLA)、和索拉路(SOLARO)的贵族们。在栗树浓荫下，群山环抱中，大会于一五三二年九月十二日“奉神的名”正式召开。法勒尔和疏尼亚，把改革宗的主张清楚陈明，而两位巴比——来自瓦伦斯(VALENCE)的但以理，和慕连士(MOLINS)的约翰——是主要发言人，赞成保持在谷地的窝度士信徒的信仰。谈到谷地弟兄们在逼迫中向罗马教会屈服，同意遵守天主教的节期、斋戒及其它礼仪，甚至间中参加天主教仪式，并且表面上听从神甫的指示等，法勒尔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已偏离了已有的传统，极力鼓励他们完全摆脱罗马教会的习例。改革宗信徒主张：罗马教会中一切，凡圣经中没有明文指示的，都必须绝对摒弃；但瓦勒度派信徒却辩说：凡与罗马教会有关的习例，如果圣经明文禁止的，他们都已一律拒绝。会中又提出

许多关于生活实行的事例；但引起最大激辩的，是有关一项信仰的问题。法勒尔说：“在世界被造以先，神就已经拣选了每一个预定得救的。因此，凡预定得救的人，没有可能得不着拯救。谁主张自由意志，谁就是完全否定了神的恩典。”但瓦伦斯的但以理，和慕连士的约翰，同时强调人所能作的，和他对接受神恩典的责任。在场的贵族，和许多出席的信徒，都支持这一个见解，又认为改革宗提出的改革，并无必要；不然，就无异是把多年来忠心带领教会的弟兄们定罪。但法勒尔的口才和热情，助长了他的声威，结果大多数人接受了他的主张。接着大家根据这些讨论，写下信仰宣言，大多数人均签署同意，但亦有人拒绝签署，表示不赞成。

当时弟兄们把众教会所用的圣经抄卷拿出来给改革宗弟兄们看，还展示他们所保存的档，例如“高贵的学习”、“基督教要学”、“敌基督”等，及其它古籍。改革宗弟兄们不但大感兴趣，认为这些古籍甚有价值，而且认为有印行法文圣经分发给各地信徒的必要。结果由阿立威坦(OLVETAN)负责将圣经译为法文，他是在巴黎固有的改革宗信徒中的一位忠心的同工。谷地信徒们竭尽能力负责印行的经费。圣经终于在一五三五年出版。法勒尔与疏尼亚亦收拾行装，策骑返家，继续在瑞士法语地区工作，特别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日内瓦。慕连士的约翰和瓦伦斯的但以理，则连袂前往波希米亚，与当地教会商谈后，波希米亚的弟兄们，写信给谷地的弟兄们，请求他们不要在信仰和实践上，未经慎重考虑，就随便采纳外国弟兄们所提出的任何重大改革。

一五三〇年秋，纽沙特勒居民把大教堂内的偶像捣毁，又经全民投票通过了奉行更正教，虽然压迫人民的专制政体已被推翻，真理叫人得以自由，而市政亦因而大大整顿，可是，这些人却没有认清一件事：神的众教会，若靠民主制度的投票方式来接受引导或权柄，其结果并不会比听命于罗马教廷理想，因为教会只能接受主的引导和权柄；唯有基督是教会的中心，是召聚属祂子民的力量。圣徒彼此间交通的根据，在于他们共同与主相交，他们亦因此得到了操练，完全不是为了要辖制人，同时他们也不受人的辖制。为了强化教会与属世组织的区别，法勒尔设立了桌子，（代替在纽沙特勒天主教堂内被拆毁了的圣坛），使圣徒围着桌子擘饼纪念主。法勒尔指出，在桌子前，信徒可以在圣灵中和真理里敬拜基督，除净一切他所不喜悦的污秽。在桌子前，只看见基督在信徒当中，也只有他的命令所指定的事。翌年，法勒尔向俄比教会大群信徒讲道以后，有八位信徒在那里擘饼纪念主。

一五三三年，在法国南部的一些信徒迫切感觉有经常在一起查经的需要。当时玛嘉丽已是纳瓦利(NAVARRE)王后；她从巴黎来到她丈夫管辖的地区，随行有勒法甫尔和饶素。他们本来是参加天主教会的，后来改在城堡里聚会，有许多村民来参加；聚会中总有一篇讲解圣经的信息。这些信徒，有些渴望能擘饼，于是就不顾有生命的危险，他们在城堡内平台下的大堂里举行聚会，那大堂的地点不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大堂内安放了桌子，上面有饼和酒，信徒一起分享主的晚餐，没有特殊的仪式，王后和其它身份最卑微的人，在主面前也不分尊卑地一起纪念主，接着读圣经，又为穷人收集捐款，聚会完了，大家就敞开。在此同时，有一个青年名叫加尔文，(JEAN CALVIN)因为信仰的问题，被逼离开巴黎，来到坡阿帖(POITIERS)，遇见不少深切爱慕圣经的信徒：他们讨论路德和慈运理的教义，自由批评罗马天主教会。后来因为信徒来参加聚会，容易惹起注意，于是就把聚会移到城外郊野地区的山洞内，称为圣本泥狄山洞。他们在这山洞内查经，没有受到骚扰。最经常引起讨论的题目，就是天主教弥撒不合乎圣经原则。他们渴慕照着主的心意纪念主的死，于是他们在聚会时，除了祷告、读经以

外，还擘饼喝杯。若有人受圣灵感动，就自由交通，劝勉各人。

然后他们开始关心到住在附近的人，也关心到他们对福音的需要。于是在某一次聚会中，有三位弟兄自动提出要出外传福音。众人深知他们在这方面是满有圣灵的恩赐，因此同心把他们交托给主，又为他们集资，然后差遣他们出去，结果，他们的劳苦大有功效。其中巴伯诺(BABINOT)是个满有学问，性情温和的信徒。他前往陀流，特别向学生和教师们作工，吸引不少人听道，也带领了不少人归信基督。这些归信的学生和教师，格外有助于向青年人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因巴伯诺具备着完美的品德，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善人”。巴伯诺四出找寻那些聚在一起祷告和擘饼的小群信徒，殷勤探望他们。另外一个出外传道的弟兄，名叫维朗(VERON)，他充满活力，徒步传道，二十年间足迹遍及法兰西各省份。他为失丧的羊劳苦作工，传扬那位好牧者基督，人称他为“收庄稼的人”。他到每一个地方，例必查问谁是最德高望重的，他就竭力带领这些人归信真道。他也特别关怀青年人。许多青年人，因他所传的道，成为忠心跟随基督的信徒，甘心为祂受苦。第三位出外传道的弟兄叫维尔努(JEAN VERNOU)，起初在坡阿帖作工，在该地区内的学校传福音，为众人所熟知，后来他到了萨复伊(SAVOIE)，结果在产百里(CHAMBERY)因承认基督而被焚毙。

在日内瓦，自从弗若敏在四围惊吓中创设了学校以后，福音拯救的大能就开始大大的显明出来（一五三二年）。弗若敏向学童讲解圣经故事，他本身又具备医学常识，所以不久便吸引了许多人来亲近他。其中有些是城中显贵们的眷属，她们悔改信主；亦有商贾和其它阶层的人士信主。这些信徒很快就在各处聚会读经祷告，悔改信主的人渐多，建立起的聚会也增多起来。这些聚会内容很自由释放：先由一两位弟兄读出经文，然后由懂得经文意思的信徒，加以讲解，或是带领众人一同祷告。聚会中也为穷人收集捐项。假如有些有恩赐的外人路过该地，他就会被邀在较大的聚会地方讲道，众人也就前来听信息。这些教会在不久以后，就盼望能聚会擘饼纪念主，为了避免受到骚扰，他们在一位信徒所拥有的园子内聚会。园子四周围着墙，刚好是在城墙的外边。这些聚会都是在不断的威胁下进行的，尤其是当信徒们开始围着主的桌子聚会纪念主的时候，他们所遭受到的逼迫更是利害。不久，城内因此发生了暴乱，弗若敏和其它弟兄们被逐出城，但聚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后来在一次的聚会中，参加的弟兄有八十人，还有一些姊妹，会中一位弟兄在擘饼前，给其它的人洗脚，于是更引起众人的敌对。当时在这种混乱不安的情势下，阿立威坦正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为了要把原意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他把一部份原来保留希腊原文的字眼，翻译成法文：例如“使徒”，他译作“使者”；“主教”，译为“监督”；“教父”，译为“长老”。这样的翻译就把希腊原文的意思表明出来，而非音译，他说他在圣经中，找不到“教皇”，“枢机主教”，“大主教”，“副主教”，“修道院长”，“副修道院长”，“修道士”等名词，所以没有机会把它们加以更正。

日内瓦在经过一连串哄动的事件以后，也和纽沙特勒一样，脱离了罗马教会，可是不久以后，又开始了某种的宗教组织形式，给众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但在圣经中却没有这类组织形式的先例。阿立威坦是加尔文的亲戚。他首先引导加尔文研读圣经，加尔文天资过人，年青时候已才华毕露，许多人深受他的影响。后来他被迫离开了法兰西，到了巴色。一五三六年，他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一书，立刻成名，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神学家。同年，他要前往史塔司堡，但因战事进行的原故，必须绕经日内瓦，原意在该地度宿一宵，翌晨便继续行程，但法勒尔一获悉他路过该地，马上去见他，缕述过

去在该地的福音工作的进展，并告诉他弟兄们所遭遇的难处和工作的需要，竭力挽留他停留下来一起同工，应付四面八方来的急需。加尔文正要婉拒辩称自己无能，需要安静研究，性格又不适宜应付太多的活动等等。法勒尔却恳求他，不要因为自己喜爱研究，或因自己任何的偏好，而拦阻自己顺服神的呼召。加尔文深为法勒尔的热心所感动，接受了他的邀请，在日内瓦停下来。此后，除了有三年时间因被逐以外，他在日内瓦度过了一生，他的名字亦与日内瓦结不解缘。他经过一番争辩以后，在该市强制实施一种根据旧约圣经形式的政教联合制度，市议会拥有最高权力，管理宗教和一切民政事宜。后来市议会变为加尔文独揽大权的工具。所有公民均须签署认信文，否则必须离境；又必须恪守一切有关道德与生活的严谨规则。本来因顺服新约圣经教训而长大起来的众教会，就在加尔文所提出的改革行动下，几乎全部被拆毁；改革宗取代了罗马教皇的权力，而人良知的自由依旧受到禁锢。

加尔文实施严厉统治的目的之一，是要遏制当时一种流行的反三位一体论的谬误信仰。这主张由来已久，在某些方面接近亚流主义。但在此时，人称之为苏西尼主义(SOCINIANISM)，原因是由居于意大利的苏西尼(SOZINI)叔侄——利里奥(LELIO)（一五二五——一六二年），和浮士都(FAUSTUS)（一五三九——一六〇四年）——二人所提倡之故。浮士都居波兰多年，当地与德兰斯斐尼亚(TRANSYLVANIA)一样，容许这种主张存在，而这主张也散播广泛。浮士都将波兰境内各种反三位一体教派联合起来，人称之为“波兰弟兄会”。他们的《拉寇问答》(RACOVIAN CATECHISM)一书，说明这种教义。波兰也成为苏西尼主义的传播中心，早期的时候，对更正教教会内一些信徒颇有影响，后来影响渐大，尤其是在更正教内的神职人员中，影响最深。这种教义，主要是批评当时的神学理论，它是由理性入手，而非着重心灵与悟性。

有一位西班牙籍物理学家瑟维都(SERVETUS)，提出与这种教义有关的理论，他抵达日内瓦，与加尔文及市议会冲突起来，因他不肯承认错误，结果被烧死（一五五三年）。这件事，可说是当时设立这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加尔文的管治下，日内瓦声望日隆，成为远近受迫害信徒避难的集中地，其中有好些信徒是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些信徒深受加尔文的天才教导所熏染，把他的主张传扬出去，加尔文主义于是成为世界一种新兴的力量，其中严格的训练，无疑是把许多人模成美好的品德。法勒尔甘让加尔文独掌大权，但他拒绝留在日内瓦，也拒绝接受任何荣誉及酬劳。他迁居到纽沙特勒，并且成家立室，但他仍然继续周游传道，过艰苦的生活，直至七十六岁高龄，才安然去世。

在逼迫的压力下，法兰西的教会继续努力，传福音的工作亦没有间断。但到了一五三四年，这种情况突然起了变化，福音工作受挫。起因是在巴黎有些信徒，认为法兰西境内基督教的进展太慢，远比不上瑞士的教会，于是派了弗勒特(FERET)前往瑞士，征求弟兄们的意见，看如何能更放胆宣扬真道。结果，瑞士的信徒为他们印刷了一些标语和单张，猛烈抨击天主教的弥撒。这些单张和标语，给带返巴黎。当时信徒们对应否张贴这些标语，并把单张分发出去的问题，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库尔奥特(COURALT)代表“权威人士”发言，说：“请大家小心处理这个张贴标语的提议。我们如果这样作，只会使我们的敌人老羞成怒，结果会令更多的信徒分散各地。”但有人说：“假如我们做事畏首畏尾，害怕牺牲的话，我们就会放弃跟随耶稣基督。”结果，持激烈主张的人，获大多数人拥护；于是众人进行周详布署，在一个十月份的晚上，一夜之间，把标语在全国各地张贴起来，甚至把一份张贴在布罗柯

(BLOIS)宫内王的寝室门外。标语内文相当长：“这真理宣言，是有关教皇违背我们的主所设立的晚餐的吩咐，自行主持弥撒的错误做法。我们的主，就是那唯一的中保与独一的牧主耶稣基督。”翌日，当众人读到这些标语时，不禁大为震怒。王对更正教的政策，一向迟疑不决，但此刻亦不得不同意马上铲除改革教派。国会开会第一天，通过悬赏给凡能将张贴标语的人的姓名告密者，并要严厉处分凡窝藏罪犯的人，一经查出即一律烧死。于是政府先从缉拿那些受嫌参加聚会的人着手，然后凡赞成改革的人，不论赞同程度如何，一律列在缉捕名单内，包括那些原来反对张贴标语的人，一时情势引起极大的恐慌，许多信徒纷纷离乡别井，远走国外。法兰西全地都有烧死信徒的事件，尤以巴黎为甚。一五三五年，举行圣像及圣物大游行。王上、王室眷属、宫廷人士，僧侣教士、贵族，还有大批的群众参加游行，游行以后举行大会，就在圣母院教堂举行大弥撒，完了以后，王上和大批群众先在圣安娜(ST. HONORE)，后在荷列斯(HALLES)，亲自目睹信徒被焚，刑具还加以特别设计，故意延长犯人受苦的时间。被烧死的信徒，不少是巴黎的精英。他们至死忠心，坚持承认主基督，没有一个例外。他们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使折磨他们的人也不得不佩服。

施图麦(STURM)是巴黎皇家学院的教授，满腹经纶，性情温和。他写信给墨兰顿说：“我们本来在一些满有智能的信徒带领下，情况很好。但现在看看：因为听从了某些愚拙人的见解，我们落到何等大的灾难和痛苦中。去年我曾去信给你，提及这儿各事顺利，还希望有一天王上会主持公道。不料，几个偏激的人就把我们这段好时光破坏无遗。在十月份的一个晚上，一夜之间，法兰西全地每个角落，都给张贴了攻击僧侣制度、弥撒、和圣礼等的标语，……他们还斗胆到在国王寝室门外贴了一张，好像故意挑衅，要引起危机。就因这回轻率鲁莽的行动，一切就都改观了，造成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官府震怒，王上不安。于是法庭天天开庭审讯。就算这些莽汉不是这场大祸的起因，起码也是导火线。如果法官们能主持公道就好了。可是现在，有些被捕的已受刑，其它的人为保自身安全，纷纷逃亡，许多人无辜的受累。告密的人公开亮相，人人可以同时起诉和作证。墨兰顿，我现在所写的，并非传闻故事，我实际上亦未将全盘事实奉告，也没有渲染我们所遭受的惨痛。至目前为止，已有十八位福音使者被焚死，其它的也朝不保夕，殃及的人愈来愈多，连清白的人，也须担心给人告密。他们目睹这些恐怖事件，也不能不义愤填胸。与我们作对的人，正是当时得令，大权在握，所以反而令人以为他是秉公行义，镇压暴乱。在这多灾多难的日子，我们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人人因这些残杀事件而生厌，王上亦会因流人血而自惭。迫害信徒的人，全受仇恨所煽动，并非存心要主持正义。假如王上知道发动流血者的存心，他一定会另谋对策。可是，我们并不绝望。神在宝座，祂会惊散这些风暴，把我们带到藏身安稳之所，祂也必为善人预备避难所，让他们能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法兰西的多处地区，一群群信徒聚会读经敬拜，并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有一次，在巴黎的一个聚会中，有一个信徒关心自己刚生下来的儿子受浸的事，结果导致产生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这位信徒，在良心上，他不能把儿子带去罗马教会去受洗，但亦不可能把儿子带去国外受浸。于是全教会聚会，为这件事祈祷，结果决定组织教会，选立马桑(JEAN DE MACON)作牧师，委任长老和执事，采取了有组织的教会形式。牧师有权柄为人施浸，主持各种他们认为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行的礼仪。这个聚会这样开始以后（一五五五年），在法兰西境内的许多信徒聚会便纷纷效尤。采用这种长老制的教会，迅速增加，由日内瓦供应大部份的牧师人才。在荷兰和苏格兰的改革宗教会，受这个在法兰西首

创的先例的影响，更甚于他们向日内瓦所采法的。加尔文主张每处聚会各归自己的牧师和长老带领，但法兰西教会不久就开始设立由代表各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组成的区会，牧师也有权柄管理各教会。本地的聚会后来又派出代表组成省总会。一五五九年，第一届全国性教会总会在巴黎举行，会中通过了信仰宣言。身为牧师的，都必须签署，以示同意；又草拟教会规则，以便众教会有所依循，牧师都必须恪守这些规则。

这些教会的信徒，统称为“福音派”，但后人称之为“预格诺派”(HUGUENOT)，原因未明。数百年来，福音在法国东南部广传，虽然有时因信徒屡遭残杀，真理因而受阻，但到了这个时候，信徒爱慕真道的那种不能摧毁的迫切，又告复苏。有部份地区，全体信徒加入了预格诺派。在其它的地方，通常只有少数人属预格诺派，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常呈紧张，所以国家的法令允许人民有信仰宗教自由，并期望改革与容忍的措施，可带来两大教派间的和谐。国会采取宽容政策，而母后加德林麦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她写信给教皇说：“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人很多，已非法律所能制裁，或以武力干预所能禁止，其中且有贵族和官员参加，实力雄厚，上下齐心，力量日益壮大，在全国各地形成一股可怕的势力。但感谢神，幸亏他们当中，没有重浸派，或任何不法之徒、或宣扬毒素的份子。”她末了还提出与这些信徒同守圣餐的可能性；甚至提议，在罗马天主教圣餐礼仪中可以进行改进的几方面。可是教皇态度强硬，因此双方都随时准备面对那要来临的正面冲突。预格诺派的领袖科利尼(ADMIRALCOLIGNY)说：“我们有二千五十个教会，有四十万可以作战的壮丁，这个数字，还未包括那些秘密附从我们的人在內。”

可是，天主教派的领袖吉斯公爵(GUISE)，出其不意发兵突袭一群在谷仓内聚会的信徒，他们手无寸铁，只有束手就擒被杀，于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两派间仅存的一线和解希望亦告消失。内战一触即发，全国满目疮痍。经过几年战乱以后，双方同意停战，并缔结婚约，由预格诺派领袖纳瓦利王伯安(BEARN)的亨利，迎娶加德林麦第奇的女儿，她是法王的妹妹。一五七二年在巴黎举行婚礼，隆重庆祝。预格诺派信徒认为从此可以息弭争端，大批人，包括他们的领导者，都涌进城内参加庆典。

在圣母院教堂举行婚礼后不到七天，天主教人士依照事前的预谋发难，讯号一举，立刻行动，预格诺派信徒可谓祸从天降，成为圣巴多罗买大屠杀(MASSACRE OF ST.BARTHOLOMEW)的牺牲者，无一幸免。因为预格诺派信徒的住处，早已分别用暗号标志，所以男女老幼，一律遭殃，科利尼是首先被杀的。四天以后，巴黎和塞纳-马恩省河(SEINE)满布支离破碎的尸骸，正是四天前挤满市内街道的兴高采烈的男女老幼。法国全境各地，都发生类似的屠杀。当第一次突袭时，侥幸逃脱的预格诺派信徒，在纳瓦利的亨利和康地(CONDE)王子率领下，曾组织起来反抗，于是内战爆发，战祸绵续了二十年之久。

一五九四年，纳瓦利的亨利登位，为法王亨利四世。他胆识过人，但非虔信宗教。他领导预格诺派，亦只不过把它作为政治团体处理。他登基以后，因法兰西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而历年来的君主也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他处境十分为难，于是他索性改依天主教，以保王位，法国因此再度落入罗马天主教的势力下。但他也利用权力，立法袒护预格诺派。一五九八年，他签淮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准许预格诺派享受宗教信仰自由。

天主教势力却不肯低头就范，法王便下令镇压，并将耶稣会教士驱逐出境。预格诺派成为国内的特殊阶级，受到敕令保护，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特权。敕令公布后十二年，法王遭暗算毙命，预格诺派

又受到迫害，大屠杀又告复发，信徒迫得武装起来自卫，但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率兵攻击，信徒屡战屡败。他们的大本营堡垒陷落，全军溃败，而预格诺派作为一个有军备的政治团体，亦告崩溃。幸而黎塞留仍准许信徒享有有限度的自由，使他们与政府和解。从此，信徒们转而专致力于农事、工业和贸易上，发奋图强，终成法兰西境内有财有势的人物，为国家带来繁荣。

马撒仍(MAZARIN)死后，路易十四(LOUIS XIV)取得政权，马上向预格诺派施行镇压，在耶稣会势力笼罩下，他们被迫加入罗马教会，抗命者均遭迫害。有人坚持忍耐到底，但难处愈来愈大，信徒的儿女们给带走，送去修道院接受天主教教育；各地都有大屠杀，信徒的聚会被禁止，军队占驻民居，为所欲为，这就是臭名昭彰的“以龙骑兵对付更正教徒”的政策(SYSTEM OF THE DRAGONNADES)。人民四出逃难，但骑兵在树林内到处搜索，追捕回来后，强迫他们服役，又施行各种酷刑，迫使他们“悔改”；如不就范，就把他们折磨至死。

一六八五年，政府宣布废除南特敕令，预格诺派挣扎求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亦告粉碎。政府敕令所有牧师在两星期内离境，不到数星期，八百处聚会地点遭受毁坏净尽，政府规定所有儿童都必须交由罗马教会施洗和教育；违令者根本无从谋生；试图逃亡而被逮回者，男的一律判送船上，一生当划桨苦工，女的则终生监禁。可是，尽管如此，信徒仍甘冒生命危险，扶老携幼，离家别井，偷越守卫森严的封锁线，大批逃亡国外。乐意收容他们的国家，包括瑞士、荷兰，伯兰顿堡、和英国，因此得着法国这些精英，其中不乏精明能干、信仰坚强的人，深具各种制作及贸易的长才。他们不久便在各地成为政治、军事、航海，甚至艺术及科学等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南特敕令被废除后，虽然大批信徒离开法国，但仍有不少不情愿或不可能离开家园的，这些信徒继续受到龙骑兵的苦待折磨，尤以在多芬尼和兰各铎两地为甚。在这水深火热的恶劣环境下，兴起了一种奇异的属灵现象，遍布信徒之间。起因是儒理敖(PIERRE GURIEU)在一八八六年写了一本启示录诠释，指出倾亡的巴比伦，就是预表罗马教会，并说这预言将于一六八九年应验。他的门徒杜塞里(DUSERRE)在多芬尼把这预言教导小孩，这些小孩们在龙骑兵的兽行下长大，对他们深恶痛绝，于是一群一群地遍行四乡，传述启示录所预言的可怕审判，并宣告预言快要成就。在这些“小先知”中，最著名的，是个叫爱莎宝(ISADEAU)的小女孩。成千上百曾经被迫送去罗马教会的孩童，就因此回到信徒家中，坚决拒绝再去望弥撒。在兰各铎，后来有三百个这样的小先知，给囚禁在同一个地方。

在色芬群山中(THE CEVENNES)的男女信徒，平时只会操本地土语，但在陷入魂游象外的境界时，他们就会用圣经的纯正法文交谈。他们的勇敢，鼓舞了不少信徒。他们虽受尽迫害，对国土却始终忠心耿耿。一六八三年，他们当中的牧师、贵族，和主要人物，开会商议，然后向路易十四呈递效忠宣言。但是教皇坚持要把他们铲除，称他们为“该受咒诅的阿勒比根斯派的后人。”

可是，有人发明了一种特别酷刑，残害这些在色芬山区内的信徒，信徒们终于揭竿而起，把那个发明酷刑的侏拉(ABBE DU CHAYLE)杀了以后，武装组织起来对抗龙骑兵。其中为首的是迦瓦利(CAVALIER)，父亲为面包师傅，十七岁便领导加米撒尔教派(CAMISARDS)，各人身穿白衬衣制服。他才能超卓，三年之内(一七〇三—一七〇五年)，打败了法国好几位战绩彪炳的元帅，他手下不过三千人，而对手则为六万大军。他终于赢得了光荣的和平，但有一部份追随他的人，在作战时丧失了生命。

加米撒尔一役，是唯一的胜仗。在其它地方，预格诺派毫无反抗地忍受临到他们身上的各种厄运，

许多人被吊死或焚毙，许多妇女受囚禁，尤以格林怒堡 (GRENOBLE)和瓦伦斯两地的信徒所遭遇的最为惨烈。有一个妇人——叫宝福(BEAUFORT)的慕莲(LOUISE MOULIN)，因参加信徒聚会的原故，被判在家门口吊死（一六八七年）。临刑前，她央求给她最后一次机会，给襁褓中的儿子哺乳；她获准如愿后，便安静果敢地接受死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沙漠中的教会”，或称“十字架下的教会”，继续持守见证。在南特敕令给废除后，逃离多芬尼的信徒中，有一个信徒叫若哲尔(JACQUES ROGER)（一六七五——一七四五年），获悉在故乡的弟兄们所受的痛苦，而自己远居国外过安舒的日子，心中深感自咎难过，于是决定重返祖国，和弟兄们一同受苦，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他回到法国，目睹剩下来少数忠心的信徒，在险恶的逆境中坚守真道，又看见在某些地方，信徒受那些男女“先知”的活动所影响，多陷入狂热的混乱中。他认为必须马上有人补上那些流亡国外的牧师空缺，重建崩溃的教会体系。其它信徒与他共同作工。在一次出外传道旅程中，认识了库尔翁团 (ANTOINE COURT)。这个年仅二十岁的年青人，当时早已备受赞赏，后来他就是为“沙漠中的众教会”劳苦作工的弟兄中的佼佼者。库尔翁团判断力强，聪颖过人。他四处传道，不辞劳苦，把教会组织重建起来，甚至恢复各省教会区会和全国总会的活动。他在洛桑(LAUSANNE)，主持一所训练牧师和传道人的学院；这是一所殉道者的学校，因为从学院训练出来往法国各地的弟兄，大部份后来都被吊死殉道，其中有些年纪还很轻。若哲尔自己则在七十岁那年在格林怒堡给吊死。这些传道人穿林越岭，遍访各乡教会，传讲真理，经常要面对九死一生的危险时刻。这些“沙漠中的众教会”，不但未被铲除，反而欣欣向荣。一七八七年，路易十六颁布“宗教容忍条例”，这些教会才得以脱离灾难。后来在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成功以后，他们才喜获完全的信仰自由。

第十一章 在英国的不奉国教者

一五二五——一六八九年

廷德勒(TYNDALE)——禁止读经——英国教会成立——马里皇后时期的迫害——浸礼派和独立派教会——白朗尼(ROBERT BROWNE)——巴饶(BARROWE)，革林武德(GREENWOOD)，彭力(PENRY)——在伊利沙伯女皇时期的异己者受害——在伦敦的隐蔽教会(PRIVYE CHURCH)——呼克尔(HOOKER)所提倡的教会组织——流亡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英国信徒的教会——亚米纽斯(ARMINIUS)——弟兄们由英国迁至荷兰——鲁滨孙(JOHN ROBINSON)——清教徒航海至美洲大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的各种教会——印行圣经钦定译本——内战——克林威尔(CROMWELL)的新模范军队——宗教自由——差会——福克斯(GEORGE FOX)——“公会会”(SOCIETY OF FRIENDS)运动的特色——对付不奉国教者的法案——基督教的著作——本仁约翰(JOHN BUNYAN)

从外面看来，罗拉德派运动受了遏制，可是，不少信徒保留下来。他们聚会查经祷告，时刻因此受到难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活动，燃起了人们对圣经的普遍兴趣；而圣经的新译本，也推动了广泛的复兴。廷德勒(WILLIAM TYNDALE)深受路德的著作所影响，他曾在牛津及剑桥大学攻读，复留校任助教。那段期间有教士到访他家的时候，他总指出天主教的实践与真理大有出入，为此他受到迫害，

要离开英国。他清楚人们最大的急需，就是要熟识圣经，因此定意，“如果神救他免死的话，在不多年以后，他要使所有在田间作活的青年都能认识圣经”，要比那些一直不容他们读圣经的宗教人士更多认识圣经。他在欧洲大陆过着流亡的生活，“但心中火热缅怀祖国，竭尽所能带领同胞领受及明白神的圣言，和他的真实，就如神所赐给他的恩惠一样。”他所翻译的新约圣经英文版本，在一五二五年刊行。翌年，就印行第二版。这新约圣经在科伦面世，接着就是摩西五经，然后是旧约圣经的其它书卷，都是在盎威普(ANTWERP)和汉堡(HAMBURG)完成的。此外，他并将新约部份多次印行新版。要把这些圣经大量运去英国，其困难和危险性不下于在把它们分发出去时所会遭遇的。天主教教士们尽他们所能的，极力排斥这些新译本。汤马士摩亚爵士(SIR THOMAS MORE)，也是激烈反对者之一。这版本虽然是日后钦定译本所根据的几种版本中最常用到的，但起初出版时，不少人认为译文多有错误。最受抨击的字眼，就是以“聚会”代替“教会”。摩亚批评它错误百出，还说：“如果要把错误处处都指出来的话，就等于是把全卷圣经由头说一遍。”又说：“要在其中找出错误，等于是海里寻水。”

这些圣经给偷偷地运入英国，由一个自称“基督徒弟兄”的团体负责在国内分发，所到各处，人人争相购阅，后来运到大学内销售，学生们组织读经会，一起研读。伦敦主教一早便宣布禁令，禁止人读这些英译本圣经。他说：“我们根据可靠的各种报告，又根据事情明显的表现，有许多罪恶之子……，极端愚顽瞎眼、偏离真道，违背天主教信仰，他们巧妙地把新约圣经译为英文，……这些译本数量很多，有些书面还烫上光泽，里面用英文写成那些危害社会的毒素，大量散播全伦敦教区，……无疑地，这些禁书会将那些交付我们手中的羊群毒害，使他们误入异端教训。……现在各人必须将这些圣经英译本，全数交出，不论是全卷的，或单本的，一律要缴呈代理主教，否则将开除教籍，并将视为异端份子，接受处分。”他还硬指在此英译本内，共有二千处异端教训。后来他查出这些圣经的批发商，名叫柏京顿(PACKINGTON)，就想利用他，把圣经英译本悉数毁掉，当时经过情形是这样：“主教满以为他可以随意对待神，事实上他是与魔鬼携手合作。他对这批发商说：‘柏京顿先生，请你费神把这些译本收集起来，不管你要花费多少，我必照数偿还。这些译本错误百出，害人不浅。我打算要将它们全数在圣保罗十架堂烧毁。’”事情就照这协议进行，而更正教徒就赚了一大笔钱，印刷了更多圣经。当时有一个因被控传异端而下狱的信徒，被人问及究竟廷德勒和他的同工是获谁人资助时，他说：“是伦敦大主教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因为他付了一笔数目不少的款项，要把新约圣经烧毁。这笔款项就成了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和资助。”英国国教人士四出搜索这些禁书，许多人因拥有圣经英文译本而要给判罚款、或下狱、或处死。当时的记载说：“许多人因被查出阅读廷德勒所翻译的新约圣经而遭受处分，……但读这英译本圣经的人，日益加增。”

后来由英国派遣的密探，查出了廷德勒匿藏的地方，于是把他逮捕，在比利时审讯他，判处绞刑，还用火烧尸（一五三六年）。可是，廷德勒已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已勇敢无畏地付上了他所该作的。他与其它帮忙翻译和分发圣经的信徒，还有将其中所启示的真理教导和实行出来的众信徒，大家一起努力，带领人认识神，并明白生命的道。

当时，在英国正掀起大变化。一五三一年，亨利八世被人承认为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英国教会代替了罗马教会，而英皇也取代了教皇的地位。教皇与英皇之间的冲突正代表了一面是拥护教会控制国家的主张，另一面是提倡国家权力高于教会的论调，两者间的不协调，也正是教皇至上的理论和伊

拉斯田(ERASTIAN)的见解的冲突。企图使政府的力量高于教会的权力(伊拉斯田主义 ERASTIANISM)的努力,已经在伯兰顿堡和萨克逊展开,克蓝麦(CRANMER)认为这是最好的途径,因此亨利八世也采用此为国策。

廷德勒死的那年,他所翻译的圣经,由皇上下令指派科威对勒(MILES COVERDALE)加以修订,译成钦定本,成为英国国教信仰所依据,全国教会均采用。但不久这个自由又给撤销。一五四三年通过法案,宣称“为了要推广真理,并铲除异端,……所有英文旧约及新约圣经,凡根据廷德勒那错谬不确的译本的,均须废止毁灭,不得保留。”凡不服从的,即遭严厉处分,有些人甚至遭终身监禁,信徒可以读其它的书藉,但只有审判官、贵族、官长及法官等,可以向自己家人谈论圣经。“商人也可以私下里自己读圣经,但妇女、工匠、学徒、工人、各级侍从仆人、农民、奴工等,都不得读圣经或新约英译本,不论是个人阅读,或彼此诵读,或私下、或公开,一律禁止。”贵族的妇女却可以自己阅读。皇上宣布要严厉清除这些书藉,并立法严刑执行。但不管许可与否,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阻止一般人去读圣经。在教会中有人大声诵读圣经,人就去听。当局宣布禁止的话,人们就想尽方法去获得圣经。有一个工人,在他那本新约圣经里写着:“在一五四六年,购于牛津,由约翰达比尔(JOHN DARBYE)带来新碧里(SEYNBURY),购价十四便士,当时我正为力铁迈尔(LETYMERS)先生理店,这本圣经当时被禁,连牧养教会的人亦无从阅读。我祈求神医治人的眼瞎。罗拔威廉斯(ROBERT WILLIAMS)志此为念。”就是这样,人们领受了摩西和众先知的教训,学习了历史书和诗篇,尤其是从福音书内认识了耶稣基督,又从使徒行传中得以追溯祂救赎大工的果效,结果全国人心大为改变。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圣经影响人心思的深浅,就表现在该社会显出公义与同情的程度上。

在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在位六年间,当权者把英国教会比前更坚立在抗罗宗的路线上。但在接着而来的玛利皇后(QUEEN MARY)统治的六年期间,却倒行逆施,又恢复向罗马教皇效忠,全盘接受天主教的谬误异端。可是,政府当局虽然是这样反复无常,人民却坚定不屈,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使他们屈服于与神的话相违背的道理下,因此成千上百的信徒,不分男女尊卑,在英国各城乡内给公开烧死。这些殉道者所受到的迫害,比掌权者的政策和宗教界的辩论显得更有力,终于粉碎了罗马教会的势力。英国人民对这些惨痛的经验、记忆犹新,成了他们的警戒,提醒他们不要重返天主教的怀抱。

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在伦敦有一个建基在圣经真理上的教会,由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信徒组成。早一些日子、也有这种性质的英国人教会,其本源可直溯至罗拉德党时代。伦敦主教在一五二三年曾说过:当时大批的威克里夫派异端份子,并非是晚近才出现的,他们事实上早已存在一段时日了。根据记载,一五五五年,在英国已有“信徒聚会”;而远在一五八九年前,在伊利沙伯女皇时期,也早已有浸礼派。这些称为“独立教会”或“地方教会”,和那些称为浸礼派的,都是信徒所组成的独立教会,彼此间的区分,仅在于受浸的遵奉:浸礼派为信徒施浸,而独立派信徒则为婴儿施洗,但规定婴儿的双亲之一,(或监护人),必须是信徒。

白朗尼(ROBERT BROWNE)积极主张每个信徒聚会各自独立,因此人称这些聚会为“白朗尼派”,就如以往人习惯为国立教会以外的任何信徒起教派名称一样。若里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曾在国会里提出报告,说白朗尼派教徒有好几千。白朗尼的著作,给予当时的社会极深的影响。他所出版的

书籍，例如“《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与行为——与土耳其人、天主教徒、异教徒的分别》，及《论及早进行改革》等，都很著名。有两个人，因为销售这两本书而在圣厄门士(ST.EDMUNDS)被焚。白朗尼本人后来被捕下狱，受尽酷刑，以至精神及身体健康均告崩溃，最后他还是重返国立教会那儿去。

各种与国家教会分离的敌派，例如清教徒(PURITANS)和长老会派(PRESBYTERIANS)，尤其是浸礼派和独立教派，纷纷受到无情的迫害。牢内挤满了这些受迫害的信徒，里面齷齪不堪，难以形容，结果无数信徒死于疾病及各种煎熬苦害之下。

在独立教派中，最著名的几个人，是巴饶(BARROWE)，革林武德(GREENWOOD)，和彭力(PENRY)。前两人坚决认为：如果有人不同意国家教会那些不合圣经原则的作风，最干脆合理的做法，就是与国立教会分离；人们如果附从自己所不信服的主张，或因传扬这些自己不能苟同的见解而接受薪酬，那是十分可耻的行为。这两个人受囚禁多年以后，终被吊死。同一时间，在韦尔斯，彭力不忍看见人民可怜无知的光景，竭力传扬真理，努力不懈，并且劝勉人也要劳苦作工，结果激怒了那些国家教会的人士。彭力多有传道的恩赐和能力，生活敬虔，满有爱心，格外关心丧失的灵魂；他满有学问，又富同情心，爱护家人，忠心传道；工作大有果效，许多罪人悔改，信徒亦得造就建立。他的工作主要是在韦尔斯，但大部份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后来他在伦敦被捕，在上述两位福音事奉上的同工被吊死以后不久，他自己也惨遭同样的命运。

这些信徒都是属于所谓“在伦敦的隐蔽教会”的成员。这个教会的建立原则，是根据主的话：“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8)他们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只在信徒家中或户外郊野聚会。一五六七年，其中一个聚会遭解体，他们当中有十四、五位作带领的弟兄给下在牢中。一五九二年，又有五十六位信徒在聚会时被捕。大批信徒年复一年备受种种折磨，不少人带着锁链被囚在地窖内。在六年中，有十七位信徒死在狱中；后来又在一年的内，死了二十四位弟兄。

在此期间，呼克尔(RICHARD HOOKER)写了一本维护英国教会体制的书，备受推许。书中反驳那些提倡改革英国教会的主张，极力指出单凭圣经，不足为教会的指引。他说：使徒所行的，有好些并未见于圣经教训内，但仍不失为使徒原则，他又认为神的律法，有好些是可以随意更易的；信徒日常生活中所行的，好些并未有圣经明文教训指示，而人的行为中，也不是每一样都必须根据圣经教训，这些行为可受限于理智的法则；他也认为人的信心亦可建基在圣经以外的信仰上，因为天赋予人相当的自主能力。他又说：圣经中所记述的，不一定都可以视为主的命令。就因为呼克尔这样强调圣经有限的权威性，暗示圣经大可以忽略过去，结果人就可以把一些与圣经相违的惯例和教义，看为理所当然，例如：婴儿受洗，圣礼可以救人等主张，就给一般人所接受。呼克尔又说：“有人指责我们在多方面离开了基督和他的使徒的古老单纯的教训，批评我们加添了不少外表的冠冕堂皇；又说我们遵循的宗教仪式，好些都不讨神喜悦，也非热心事奉神的人所同意的。又有人指出：教会起初的情况，是最理想的；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也是最完美的，当时的信徒明确的领会圣经，生活敬虔。以后人所发明的习俗、规矩、和教条，对基督教会来说，都不大合宜，所以最佳的办法，就是把以后所发明的一切人为的做法，一律废掉，将一切简化，恢复起初原来的样式。”对于这些批评，呼克尔的答辩如下：“凡如此主张的人，必须承认在使徒时代教会的制度并不明确，因为在这方面，圣经未有完整详细的记载，

而他们又拒绝接受圣经以外的一切记录。所以，当他们把教会的样式，局限于使徒时代教会的样式时，就等于是根据一种极不明确的规格，除非他们无需任何教会制度，只求遵守记载在使徒书信内的形式。……”他又说：“我十分相信，他们的意思，并非指我们现在就要秘密聚会来事奉神，或要在山溪小河内给人施浸，或指定在吃肉用饭后才守圣餐，或要恢复教会信徒一起用饭的习惯，或要取缔全部牧师制度，或要人完全出于自动来全时间专心事奉神。在这一切事上，他们不难发现，原有的样式是如何不通用于目前的情形，虽然在第一世纪时，这种样式十分合适方便。前人的信心、热心、和敬虔，实在值得我们钦佩，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证明基督教会的样式，必须与那早期的样式相似呢？我们是否因此不能采用当时所没有的样式，或是就因此而必须废除任何当时所未采用的样式呢？由此可见，那些主张把教会恢复到最初原有的样式的人，必须在他们的主张上加上某种界限。”就是这样，呼克尔眨低了圣经的权威性，又批评那些与他对立的人，指出他们如果要贯彻自己的主张的话，就该在宣称回复圣经样式的努力上，做得更彻底。他最后下结论说：英国教会无须再加以改革，因为它较符合圣经真理和一般的常规。然后他把英国教会各种信条和实践，逐一讲解，又提到教会组织的最高元首是亨利八世和以后继承皇位的人，力说这种制度完全符合圣经教训。说到这个教会，他认为“英国教会内的每一个份子，都是英联邦内的一份子；而联邦内的每个人，也都是英国教会内的成员。”他的主张和推论，虽然如此积极，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言论还算审慎严肃，大异于当时其它教派攻击信徒的狂暴和护骂的作风。

伊利沙伯女皇在统治末期，已不复把那些反对加入英国国教的人囚禁，而是改为将他们放逐出境。结果不少白朗尼派和重浸派的信徒，在荷兰找到藏身之所。他们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成立教会，在杨孙(PRANCIS JOHNSON)和爱因斯沃夫(HENRY AINSWORTH)带领下，在一五九六年发表了“流放于低地国家的英国信徒的信仰宣言”。

荷兰成了十分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在那些著名的教师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亚米纽斯(JACOBUS ARMINIUS)（一五六〇——一六〇九年）。虽然他的名字常与那些宗教斗争连在一起，人又常把亚米纽斯派(ARMINIANISM)与加尔文派互作比较，但事实上，他本人并非分门结党的人，见解亦未见得走极端。自从奥古斯丁提出神拣选的权能，而伯拉纠却为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辩护以后，这个神人之间的关系的主要问题，一直引起不少争论。加尔文，还有追随他的人，曾经有力地指出圣经有关神的权能和拣选的教训，却尽量避免不提在圣经中这个真理的另一面，因此他们的推论，就只根据片面的真理，而非全面的真理；于是所得的结论，就是人成了命定的对象，自己无法改变命定。这种说法，结果引起强烈的反应，而且这些反应流于极端激烈。亚米纽斯深受加尔文的主张所影响；人公认他品德完美，才华超卓，都推举他为加尔文主义较温和的一派执笔辩护。当时这温和派，备受抨击，处境危殆。他在深入研究以后，发觉他所要维护的见解，大部份不能成立，因为这种说法，等于是承认神会犯错误，限制了祂救赎大恩的程度，使大多数人落入绝望的处境，失去得救的可能。他读了圣经以后，明白基督代罪的大工，是为所有的人成就的，而人自由的意志，是神的命定的一部分内容。他竭力回到圣经原有的教训，和教会的信仰中，避免陷入双方长久以来争执的过激见解内。他这个信念，使他与影响他最深的加尔文派，发生正面街突，结果他因此丧生。他的教训，后来发展下去，带出来循道会派的复兴，充满生气和传福音的热忱。

詹姆士一世登基后，曾经一度在伊利沙伯统治期间放松过的推动宗教统一的努力，又重新加强。当局虽然多方遏止，人民却继续向外逃亡。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信徒在根司波鲁(GAINSBOROUGH)聚会，带领的弟兄叫斯弥特(JOHN SMYTH)。有些信徒每主日从十至十二哩外的地方走来聚会；后来这些信徒出来在斯克比(SCROOBY MANOR)另立聚会，而在诺立赤(NORWICH)因受逼迫逃出来的鲁滨孙(JOHN ROBINSON)，也加入了这个新建立的聚会。可惜他们能安心聚会的时日不多，不久，他们聚会的房子便受到监视，谋生的工具又被抢走，甚至有人被捕下狱。结果，有一部份人，试图逃往荷兰，但告失败。最后大家决定把整个教会迁到海外去（一六〇七年），但途中迭次遭受围捕，不少人妻离子散，亦有被抓回去下在监内；最后抵达目的地的人，仅为少数，各人一贫如洗，但内心不屈不挠。到了阿姆斯特丹及其它地方，受到当地教会的接待。

可是，阿姆斯特丹的教会，不久就因信徒意见分歧而遭遇难处。荷兰的门诺派教会，主张“信而受浸”，这一点，斯弥特和赫维士(THOMAS HELWYS)亦表示同意。但是，大部份的人表示反对，教会内部顿呈分裂。斯弥特和赫维士，还有四十多位信徒，被迫离开，自行组成独立教会。浸礼派信徒认为政府无权干预人民的宗教信仰，也无权强施任何教条。政治只应处理政治的事务，负责维持治安。但其它信徒则认为国家有责任管理宗教和教会的秩序；他们虽然反对政府任何强施于教会的措施，但并不愿意让其它持相反意见的信徒有充份的自由。斯弥特领导下的信徒，认为基督徒当兵，或当法官或官长，都不合乎主的教训。杨孙和爱因斯沃夫，却渐渐趋向采用长老会式的教会组织的主张，鲁滨孙却表示反对，为了避免惹起更多争端，鲁滨孙和一部份信徒，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到了来丁(LEYDEN)建立新聚会，大家同心，和平相处。鲁滨孙工作，大有能力，接触面广泛。这些教会，不但成为受迫害的圣徒的家，维持真理的见证，后来还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以后的情况有了改善，有些信徒回到英国去，大大地帮助了那里的信徒。赫维士和其它弟兄们，约于一六一二年，在伦敦成立浸信会；几年以后，原为鲁滨孙同工的亨利雅各(HENRY JACOB)，在伦敦成立了独立教会。后来有一批信徒从当中分了出去，组织了一个“特别”浸信会，或称加尔文派浸信会。但在此同时，有部份信徒，却想到更长远的计划；他们想要去新大陆设立教会，可以享受信仰自由，敬拜和见证的自由。那些流亡海外的信徒，逐渐感到催迫，要到新大陆去。经过了长时间的祷告和商议后，“斯皮得威勒”号(SPEEDWELL)就出发去完成这壮举。分离并不好受，鲁滨孙在得力夫港(DELT HAVEN)向船上出发的人所说的一番话，更是叫人难忘。他说：“我在神和他蒙福的天使面前，嘱咐你们，不要效法我，过于你们在我身上所见的向基督的效法。神若借着他别的器皿教导你们，就当听从，正如你们从前听从了我所传的真理一样，因为我实在相信，主借着神的圣言，要启示更多的真理。至于我，我为那些改革宗教会所落到的光景，感到惋惜，不能自己，因为到了现在，他们仍旧停留在起初提出改革时的光景，并未有向前再跨一步。路德派的人，也仍旧停留在当年路德所领会的地步，我们的神向加尔文所启示的心意，路德派誓死不肯接受这些启示，然后你们看，加尔文派亦老是停留在这位伟大的神人所领受的启示里，而加尔文也未能领受全面的一切真理，这种光景，实在是可怜复可叹！因为虽然他们在当时曾真正为神发光，但这光却未能参透神全部的心意，如果他们现在还活在人世的话，他们一定乐意接受更多的光照，正如起初他们受到光照一样，因为基督教这么晚近才能脱出那些敌挡基督的黑暗是没有道理的，而完备的真理也不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向人启示出来。”不久，“五月花”号(MAYFLOWER)亦从英国载来

一批人，会同“斯皮得威勒”号，一起出发。但“斯皮得威勒”号发现船身破裂入水，只好驶回原地，船上的人一起挤到“五月花”号上。这艘小船就从普里茅斯(PLYMOUTH)出发（一六二〇年），海上的大风暴，几乎迫使他们回航；但各人决心继续航程，奋斗到底，经过了九个星期的航程，其中一百零二人，终在新英格兰的普里茅斯湾登陆，奠下了一个新的国家的基础，这国家比任何其它国家都更兴旺繁荣，并能一直维持当日敬畏神和热爱自由而立国的男女信徒的特色。

英国国教源出于罗马教会，但一直与之分离，且深受路德派及瑞士改革宗的影响。英国国教以国王为元首，因此带有政治色彩。它与改革派教会相同之点，是沿用罗马教会的教牧制度，连同接受婴儿受洗和由牧师施主餐的惯例。起初的英国国教并非是圣公会派，但在伊利沙伯统治时代后半期，作风渐渐倾向罗马教会化；不久，便全部抄袭罗马教会的管治制度。清教徒就是一直坚决的反对这些罗马教会的作风，竭力希望保持抗罗宗的特色，维持圣经的权威性，拒绝接受管治教会的人士所发施的命令。当时长老会比英国国教较同情欧洲大陆的改革宗。长老会后来在苏格兰成为一个正式的教派；但在苏格兰，这种不与国教合一的政策，是不容存在的。在万士窝特(WANDSWORTH)（一五七二年）成立的长老会，曾被当地政府解散。当时独立教派坚持每地信徒聚会应该独立，各自直接仰望主的引导，正如圣经中的教导，这个主张与当时的国教大异其趣，又因他们不承认国王与会督(BISHOPS)在国教中所占的特殊地位，甚至认为，除非他们本身都是真正悔改的信徒，否则就连做教友资格都不能有，因此他们大受迫害，受到无情的监禁，或罚款，或受酷刑，浸信会的处境最为不幸，因为这些信徒在教会真理上，不但和独立教派同一主张，而且否认国家有权干预宗教，也不同意婴儿受洗。他们竭力恢复初期“信而受浸”的做法，直接打击教牧的特殊权力。在属灵的事上，他们接近重浸派、瓦勒度教派，和其它相类的教派，因此他们的遭遇，不免就像这些教派和独立教派一样，不容于那不顧一切要全国人民接受的国教。

在这些圈子中，不论是罗马教会、或安立甘派(ANGLICAN)。或自由教会，其中都有个别的真正基督徒，而在那些遭逼迫和受人鄙视的信徒聚会中，有不少是根据新约圣经中神的众教会的样式的。他们在这混乱不安的世代中，仍然能坚持见证，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就像以往及日后的圣徒一样，备受考验。

一六一一年，圣经的钦定译本出版。译文流畅有力，大大推动了福音的传播；其中所采用的文句和比喻，也成了英国文学中的基本部份。这圣经钦定本，销售量一直高踞首位。在引人向善方面，亦比任何出版书籍更具影响力。

在苦难逼迫中，信徒聚会反而日益增加。一六四一年，上议院的报告指出，在伦敦及该市附近，一共有八十处不同“宗派”的聚会。其中事奉的工人，受人鄙视，被人戏称为补鞋匠、裁缝师傅，“及其它垃圾之类”。

但国内情势不久就因内战而大大改变。在战争进行中，有人提出组织一个新的国家教会。当时会督们拥护国王，不肯妥协，而新教会的推行，又必须获得苏格兰的全力支持。因此，国会委派着手草拟新国教体制的宗教界人士，决定采用苏格兰公约和长老会体制。这个建议获国会通过，长老会人士坚持这种新教会体制应在全国中实施，如有拒绝依从的，一律须受严惩，所有宗派并须一律废止，那些参加此项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ISTER)举行的会议的独立派人士，抗议无效；而主张宗派完全自由

的浸信会人士，根本无从参加意见。在内战中，克林威尔(CROMWELL)的“新模范军队”(NEW MODEL ARMY)成立，成为日后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军队是由宗教人士组成，大部份是来自所谓“宗派”的信徒。在内战中，不同教派的人士并肩作战，包括圣公会、清教徒、长老会、独立派、浸信会等。他们在战争期间，还一同敬拜聚会，学习在患难中彼此容忍的功课。他们并未有想到奋斗争取的宗教自由会真的实现，反而还在忍受思想偏狭的立法当局所漠视。但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草成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会议和国会，同时解散，共和政体成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在信仰、言论及出版各方面的自由。

一六五三年，国家议会宣告，不许以任何形式强迫人民信奉国教，并称“凡因耶稣基督信神的，虽然在教义上，或敬拜方式上，或教会管理制度上，各持不同意见，但不得因此受禁制，在信仰和宗教奉行方面，人民一律受保护，好叫公共治安得以维持，而公民权利均受保障。”教皇制度及主教监管制度，则不在受保障之列。国家教会又委出“检验员”(TRIALERS)，检查主持教会人士的生活。如果发现他们生活不俭点，立即予以开除。结果被开除的人，为数不少，改由被认为有资格教导信徒的人出任牧师，这些人多为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也有几位是浸信会的。禁制解除以后，以前一直受到压抑的各种恩赐，就逐渐显明出来，兴起了一批大有才能的牧师和属灵作家，带起人民灵性方面的复苏，传福音的工作大为蓬勃；有好些并没有宗派色彩的教会，因此建立了起来，教会亦开始注意到异教徒的需要，国会并成立了一个在新英格兰传福音的机构，宣称“因为获悉在新英格兰的异教徒开始求告主的名，认为有责任去协助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力加鼓吹的，有依略特(JOHN ELIOT)；他因逼迫逃出英国，远渡重洋，抵达波士顿，住在印第安人中间，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便将圣经及其它书籍，翻成印第安文，又在他们当中传扬福音，提高了他们的灵性和社会地位。

在罗彻斯特郡(LEICESTERSHIRE)，福克斯(CHRISTOPHER FOX)夫妇，为人敬虔。在一六二四年生了儿子乔治(GEORGE)。乔治福克斯孩童时，心思意念便比平常儿童显得严肃早熟。后来他自述说：“当我看见成年人举止轻率胡闹时，就从心底里生出厌恶。我便对自己说：有一天当我长成时，我一定不会这样。”年仅十一岁，他就决心不要多言多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又规定自己不随便饮食，注意健康，“善用万物，尤如差使仆役，为了荣耀造物主”。他从事商业一段时间以后，蒙神呼召离家，时年仅十九岁。接着四年，他旅行各地，偶然返家探视亲人。在这段时期，他心灵内有极大的挣扎痛苦，他祷告禁食，长时间单独散步，又向不少人请教，但发现那些神学教授们的言行并不一致，心里甚感不安，节期的时候，例如圣诞节，他不参加庆祝，反而逐家探望那些穷寡妇，周济她们。他的金钱足以糊口，也有余帮助他人。在散步的时候，他自称常得主的启示。有一天，他正要去考文垂(COVENTRY)，心中想到：不论抗罗宗或天主教徒，只要是基督徒，他们也就是信徒；然后他自忖：“可是，信徒都是重生的，已经出死人生，否则他就不是信徒了。”他就恍然许多自称为基督徒或信徒的人，事实却不是。又有一次，在主日清晨，当他走过田间，主向他启示：“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受教育，未必就能使人有资格做基督的工人。”他深深记得下面这段经文：“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约壹书 2:27)因此，他就认为不用去教会聚会，反而带着圣经，走去叶园或郊野去安静读。主又启示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顿感诧异，因为一般人常称教会为“神的殿”，“可畏之地”，或“圣所”，但他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原来神的子民，就是他的殿，神也住在其中。在此时，他终于离开家人亲友，到处流浪，每到一处，找着房间安顿，住几个星期后，便又离开住别处去。他也不复向教士们请教，而转向不奉国教者求助，但连后者也不能为他解决问题。他说：“当我向人所存的一切希望幻灭以后，外面任何事物都不能给我帮助，我也不晓得该如何作，这个时候，我就听见一个声音向我说：‘唯有耶稣基督能帮助你。’当我一听见这句话，里面就欢欣起来。”于是他心里安息下来，享受与基督的相交，知道他已成全万有；在祂里面，他亦已得着万有，他也就完全信靠祂。他清楚主的命令，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引领人出黑暗入光明。他说：“我晓得基督为众人死，为众人赎罪，借着那从上而来叫人得生的生命，启示众人；唯有相信祂的，才是真正的信徒。……”又说：“我并未靠谁人的帮助，也非凭字句得以明白这些事，虽然字句明明的写出来，但我却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光中，和倚靠祂的圣灵和大能，才得以明白，正如那些把圣经写下来的属神的圣者所领受的。我尊重圣经，圣经是何等宝贝，因为我是在那位感动人写出圣经来的圣灵中，领受神的圣言。神向我所启示的一切真理，与圣经中所说的，完全一致。”听他讲道的人渐多，其中多有悔改归信的，于是“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聚会陆续在各地展开。

福克斯的原则，是信徒应该拒绝武装或从军。他绝对不主张运用武力，教导人要好好的忍受一切，要饶恕人，人不可立誓，反对十一捐。他以无畏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推动这些主张。他的“见闻录”(JOURNAL)中有这么一个事例：我往三哩外一间教堂去，有一个著名的高级教士在说教，他本身还是个医生，……我走进去，等那教士说完了话，他引用的经文是：“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喝，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我当时被主神所感动，就对他讲：“你这骗子，下来吧！你吩咐人来，不花钱就可以得着生命活水，但你传福音，却领取每年三百镑的薪酬，你能不羞惭脸红吗？说这些话的先知以赛亚和基督，白白赐下生命活水，他们有没有接受任何薪酬呢？基督差遣工人出去传道时，不是说过‘白白得来的，要白白舍去’吗？那个教士听了我的话，不禁吃惊，匆匆离去。他离开以后，我就有机会向聚会群众尽量说出我想要说的，把他们从黑暗中领出来，走向光明，得着神的恩惠，使他们得着教导，也一并得着救恩，又领他们在里面接受神的圣灵，圣灵在他们里面就能作他们的师傅。”当时在国内全境和国外，都发生了冲突。“公谊会”聚会所采用的方式，连政府所鼓励的容忍政策亦无法宽容，各地人民的激愤和仇恨，一发不可收拾，人戏称“公谊会”为“贵格会”，这些信徒被鞭打，罚款，甚至给关在龌龊不堪的牢房内，受尽了侮辱欺凌。福克斯本人多次入狱，被人鞭打苦待，当时信徒很多，同一时间内受监禁的，总不下一千之多。可是这些信徒从不埋怨，亦从不逃避畏缩，而且人数日益增加，遍布全境。他们又差遣男女信徒出去传道，不顾危险，不久又在海外工作，西至西印度群岛及新英格兰，东至荷兰和日耳曼。

在詹姆士二世在位时，“公谊会”聚会的信徒，和其它信徒一样，重获自由。他们便致力于为人解除痛苦及消弭不平而努力。这种工作，成为他们活动的特色。

他们的见证最大的果效，在于把人家已遗忘了的事实摆明出来。这事实就是：圣灵内住在人里面。他们并没有建立任何照新约圣经耶种形式的教会，入会资格亦未规定人一定要悔改重生；他们也不施浸，也不纪念主，但是在聚会中，圣灵能借着所拣选的人，自由运行在其中，不受任何人为的规例所限制。

复古运动开始以后，一切要强迫人奉行英国国教的措施，卷土重来。一六六二年，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通过，规定每个牧师都要向会众公开表示他相信并同意公祷书中所写的一切，而牧师必须由圣公会按立，结果约有二千位牧师拒绝服从而被革职，其中当然有不少精良份子。这批人大大加强了国内不奉国教者的阵营，而政府接着通过一连串法案来对付他们，规定不奉国教者，不得在地方政府任职；又规定他们在领聚会时，除家人以外，人数不得超过五名；他们亦不得担任公职。被开除的牧师，不得走近从前服务过的市镇五哩之内。凡触犯这些法例的，均受严惩。可是浸信会和独立教派继续秘密聚会，贵格会亦如常聚会，不久以后，结果又是大批信徒被捕下狱、判罚款、上颈枷、上木狗、不一而足，受尽酷刑。国家教会和不奉国教的离心份子间无情的激烈的对抗又告展开，由十七世纪中叶直至十九世纪，延续多年，但在面对这些残酷的仇恨的经历中，不奉国教的份子逐渐赢得公民所当享有的权利。

在这些冲突中，一种异常的属灵与悟性的恩慈与能力，在不同的圈子内，渐渐显明出来。在一大群佼佼者中，有长老会的巴克斯特(BASTER)，他以所著的《圣徒永恒的安息》一书而留名后世；欧文思(JOHN OWENS)是提倡公理会教义最有力的；瓦特斯(ISAAC WATTS)是独立教派的信徒，所作的诗歌叫人能自由发表敬拜和赞美的心思；还有本仁约翰(JOHN BUNYAN)，他所著的《天路历程》，脍炙人口，是除圣经以外最受基督徒欢迎的一本书。他因受苦和竭力作工，得以跻身于最崇高的圣徒中。

本仁约翰是斐德福(BEDFORD)地方教会的信徒也是长老，以后成为该教会的牧师，该教会的会议记录中，记载着教会如何经常祷告禁食；在接纳信徒加入的程序上，在属灵生活的操练上，在探望和教导信徒的事奉上等等，都十分慎重，就算在逼迫苦难的日子中，因要缴付罚款而经济顿形拮据的时候，聚会没有固定的地点，可是长老们依然殷勤事奉，热心见证不懈。虽然那教会是浸信会，但信徒彼此交接，并非纯粹根据受浸这一件事，也不因信徒有时意见分歧而妨碍了彼此同心。本仁约翰渴望与众圣徒相交。他说：“我绝对不会让受浸成为教会的规条，成为拦阻人进入的门闩，或把浸礼作为将义人与不义的人分隔起来的墙栅。”他又说：“既然你们已知道了那使我与他人有别的姓名，那么让我告诉你，我是个‘基督徒’，神若看我配，我宁愿称为基督徒、或信徒、或其它圣灵许可的名称。”

第十二章 喇巴第、敬虔派、亲岑多夫、非拉铁非

一六三五——一七五〇年

喇巴第(LABADIE)——在罗马天主教会内成立团契——加入改革宗——往俄冉遮(ORANGE)——往日内瓦——提领克(WILLEM TEELINCK)——佛依地(GISBERT VOET)——罗顿斯台恩(VANLODENSTEYN)——喇巴第往荷兰——长老会派和独立教派间的意见分歧——米第堡(MIDDELBURG)教会进行改革——与改革宗教会会议冲突——唯理主义(RATIONALISM)上的争论——喇巴第指责教会会议——喇巴第被逐出改革宗——在米第堡成立新教会——新教会被迫离开米第堡——迁移至威耳(VEERE)——再移至阿姆斯特丹——家庭教会成立——许热曼(ANNA MARIA VAN SCHURMAN)——与佛依地分道扬镳——家庭教会发生难处——移至纆立佛得(HERFORD)——喇巴第死于阿统拿(ALTONA)——家庭教会迁往魏窝特(WIEUWERD)——家庭教会解体——见证的果效——施

本尔(SPENER)——敬虔派(PIETISTS)——夫兰克(FRANKE)——基思强大卫(CHRISTIANDAVID)——亲岑多夫(ZINZENDORF)——纒仁护特(HERRNHUT)——分裂——接纳亲岑多夫所立的规条——复兴——在西投(ZITTAU)发现的文献——恢复波希米亚教会的决心——与路德会的关系问题——黑人安东尼(ANTHONY)——摩利维亚差会——在英国的差会——森依克(CENNICK)——中央集权制度不宜于教会扩展——“非拉铁非”(PHILADELPHIA)组织——模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盖恩夫人(MADAME GUYON)——阿尔诺得(GOTTFRIEDARNOLD)——威根司坦(WITTGENSTEIN)——马尔堡(MARBURG)版本圣经——伯尔堡(BERLEBURG)版本圣经——非拉铁非发生的呼吁——霍次努(HOCHMANN VON HOCHENAU)——特尔斯铁根(TERSTEEGEN)——斯提领(JUNG STILLING)——早期教会、改革宗、及其它教会——回到圣经原则去的各种途径

罗马天主教会内的神秘主义思想，使年青的喇巴第(JEAN DE LABADIE)深受影响。他在一六一〇年生于波尔多(BORDEAUX)，在耶稣会教士门下受教，准备日后成为该会的成员。但他对从事的宗教研究，大失所望。于是转而专心研读新约圣经，深感福音的浩大，又见当时基督教的腐化败坏，深知恢复的唯一途径，乃在返璞归真，回复起初在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的样式。一六三五年，他被按立为神甫，但他感到自己并非受主教所按立，而是由主自己按立他，是主把他从母腹中分别出来，为要改革基督教会。

不久，他就感到必须离开耶稣会，当时他还未正式加入该会，但情势不许他摆脱当时的身份，他也不可能回头了；因此，他只好把自己交付神的手中，让他开路。后来他生重病，需要长期疗养，耶稣会也只好放弃叫他加入的计划。他这才得偿所愿的离开了波多尔和昔日的环境。他在波多尔那段时间工作出色，因此大主教同意他接受一份教职，先在巴黎，后在阿免因斯(AMIENS)，从事教学工作。

许多人受他的教学工作所吸引。他的教法是叫学生先读圣经，有时一口气读好几章，然后由他加以详细讲解。他广泛供应新旧约圣经让人阅读，人人专心研读圣经，放弃背诵玫瑰经。他指出福音是信心与敬虔唯一的指引，而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才是历世历代所该遵循的。在主教的同意下，他设立了“聚会”，或称“弟兄会”，由那些已醒悟过来的信徒所组成，每周聚会两次，默想神的话；各人又在家中读经。他对这些信徒表示，自己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在神的心意中，教会有一天能恢复原来的样式，使人能在聚会中聆听并思想神的话，照着教会原来的方式，宣扬真道（林前十四章），又能擘饼饮杯纪念主。为此，他受到耶稣会不断的迫害，结果他要离开毕迦地，往他的出生地盖因尼(GUYENNE)去，同行的有好几位“弟兄会”的信徒。在该地，他涉猎了加尔文的著述，并加以研究，希望能从其中找到一些为神而活、并依照圣经原则去行事、相信及敬拜神的一类人，但他发现自己所得着最要紧及关键性的真理，都是来自他还在罗马天主教会时自己研读圣经的结果，并非因研究加尔文思想所获致的。他又读到在十六世纪期间勒非甫尔、毕力公纳次、饶素及其它人所进行对教会的改革。因他不断受逼迫，只好把自己隐藏在圣衣会(CARMELITES)的人当中，匿居在同情他的人的保垒内，因而认识了一些属改革宗的人。这些改革宗信徒的生活和教训，使他深受影响。他本来要继续服务罗马教会，并尝试尽力矫正弊端，但终于明白他与天主教修士间的对立形势，不可能叫彼此间言归于好，他希望在加入改革宗以后，能得以自由公开承认神放在他心中的真理，而他亦基本上同意改革宗的教训，于是在一六五〇年，在孟投本(MONTAUBAN)正式加入了改革宗，但心里仍旧认为改革宗在信仰上

未够严谨，在实行上亦未够彻底。可是自己所提倡的改革，既然不见容于罗马天主教，他就决心将改革的努力，转而施于改革宗的教会内。

在他的著述和讲道内，喇巴第指出，改革和敬虔生活的能力，源于与神交通的内在生活，因此他详细教导人祷告和默想。他说：基督徒要持定的目标，就是顺从神的旨意，与神联合，无条件地舍己爱神，又要在任何环境下爱神，并荣耀祂。

喇巴第被迫离开孟投本，路经俄冉遮(ORANGE)。当地教会的长老央求他留下来。在信徒的协助下，他进行了教会内彻底的改革，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受到改革的教会”。但不到两年功夫，因为路易十四不断的恫吓，使他不敢再逗留在俄冉遮王子统属的地区内。于是他接受在伦敦的一个法国人教会的礼聘，出任牧师。他绕道瑞士前往，路经日内瓦，被人挽留下来充任当地教会的传道人（一六五九年）。他讲道满有能力；使当地教会在加尔文的严格统治后所转呈的散漫作风得以扭转，信徒重新恢复寻求公义，使全城人民道德情况为之改观。他在家中举行的读经聚会，格外蒙恩。他教导聚会的青年人说：基督徒的“双手”，是“纯正的信仰和圣洁的生活”。这些深得读经聚会的帮助的青年人中，有施本尔(PHILP JAKOB SPENER)。

一六六一年，喇巴第受邀前往荷兰，在一群热心为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当中工作。其中有佛依地(VOET)，罗顿斯台恩(VANLODENSTNYE)，和许热曼(ANNAMARIAVANSCHURMAN)。他们请求他留下来在米第堡(MIDDELBURG)的教会担任牧师。提领克(TEELINCK)曾在该教会内工作，大有能力，叫许多人蒙福。

俄冉遮在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英明领导下，尼德兰一带脱离了西班牙的铁枷而独立；此后，低地国家在宗教自由和物质文明方面，一直凌驾于邻邦之上，并且成为属灵活动极为蓬勃的中心。弗兰那克(FRANECKE)大学的教授，亦多为学术的权威，且为人敬虔。导致人民对宗教发生兴趣的原动力，却出自提领克。他生于一五七九年，父亲在该国政府内担任要职，他曾在法国、苏格兰及英格兰等地求学。在伦敦，他结识了一些清教徒；他们在他们当中所见闻的，改变了他以后的一生。他学习祷告禁食，放弃攻读法律，决心专一事奉主。他在半伯尔(BAMBURGH)寄住在一位信徒的家中，目睹信徒的祷告生活和善工，是他从来未接触过的，也是从来没想到会有此可能的，就如：家中经常祷告和讲解圣经；饮食前谢恩；平日的交谈话；同心唱诗；参加聚会等等。上自家主，下至仆婢小童，都极为热切，满有兴趣。家主对人和气慈祥，乐意周济穷人；这一切都大大影响了他一生。他回到荷兰以后，殷勤作工，一面传道，一面写作，大有果效；再加上他个人生活的敬虔榜样，因此引起当地教会大大复兴。他在米第堡工作了十六年之久，直至一六二九年去世为止。他一直以改革宗教会徒有虚名而引以为憾，深感当地教会尤如行尸走肉，了无生命亮光或温暖，因此他一心致力教会内真正的改革。他主要还是采用各种属灵的方法，但在这些方法无法矫正一些基本谬误的情况下，他便认为不妨假手于政治力量。

提领克死后，由佛依地起来带领教会。他在当时各种宗教问题的争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改革宗教会大力辩护，驳倒反对的人士，声誉日隆。在教会例常的聚会以外，他创立了一些较小型的聚会，由普通信徒参予带领。后来他的门生罗顿斯台恩更着意栽培这些聚会，他也是在弗兰克大学攻读的。这些小型的聚会在他的带领和鼓励下，成为该国宗教生活的重要部份。

回头再说到喇巴第，他接到厕身在这种宗教气氛中的信徒的邀请，不免响往，虽然日内瓦的教会多方挽留，他结果还是去了荷兰。旅途极为险阻，但刚好在日内瓦有八十名瓦勒度派信徒，领取了通行证件，要往巴勒登丘，其中有三人因病须在日内瓦留医，于是他们的通行证件转由喇巴第和他两位友人依旺(YVON)和杜力农(DULIGNON)领用，就这样混在旅客中出境，到了海得尔堡(HEIDELBERG)，与敏努勒特(MENURET)会合。这四个人立志完全分别为圣，舍弃世界一切情欲与荣华，专心跟随耶稣基督，甘愿过贫苦、被人蔑视及迫害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式，背起他的十字架，甘愿受辱，将自己完全献上给神，为福音摆上；自己先以身作则，好能帮助别人。

到了荷兰，他们首先前往乌突热赫特(UTRECHT)，被邀到许热曼的家中，受到她和佛依地及其它信徒热诚的接待。住了十天，在这期间内喇巴第讲道教训人，充满能力，满有果效。许热曼深受吸引，但佛依地和罗顿斯台恩，很快就发现他的灵大异于提领克所表现的，因此担心大家未必能合作愉快，也怀疑教会能否如喇巴第所相信的那样把世界从其中赶逐出去。

就算在这段较早的时期，长老会和独立教派间所存在的分歧，也已渐渐显明了出来。改革宗教会一般性采取长老会制，而在英国的教会，则较多保留独立教派的作风，这也正好是喇巴第所赞同的。独立教派不承认教会会议的权力，认为独立的教会是直属基督的，也该直接向祂负责。可是，荷兰和法国的改革宗则设立教会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各教会分别派出两位代表参加，由这些代表向各教会传达会议的决定。改革宗亦十分重视牧师的职权和训练，尤其是当他们目击门诺派教会的牧师制度崩溃，他们就更坚持自己的牧师制度。但另一方面，独立教派却不认为这些教会组织或制度是必须的；他们的主张，和喇巴第的一样，认为教会是信徒的聚合，而教会的教导和见证的根基，则在乎信徒们共同的信仰。提领克和佛依地却认为教会是福音大能彰显的场所；他们工作的目标，就是引领教会内各人回转，过有意义的生活。罗顿斯台恩认为“改革宗”这名称，并不完全恰当，应该称为“须加改革的教会”才对。他和佛依地一直希望能在两种不同的理想之间，谋求折衷的模式。同时，教会内亦另有一部份信徒，认为教会已完全堕落，不复在地上存在，信徒所等候的，唯有是主再来。

喇巴第到了米第堡以后，对荷人和法人聚会属灵情况低沉的光景，大感失望；教会内纪律散漫，和他本人的理想相差太远。于是他着手进行改革，透过讲道、编写信仰问答、小组聚会、灵性操练等方式，叫人最深受影响的，还是他个人的虔诚舍己的生活。他劝勉负责教会法庭(CONSISTORIUM)的信徒，要禁食祷告，从罪中分别出来，这样才可以有效地运用基督所交付教会的权柄，“或捆绑、或释放”；又激励他们更多舍己，更多思想主的话；如此，教会才能有起色。

在荷兰，这类教训是空前的。他习惯随时祷告，也教导别人这样作。这样的作法，在当时来说，可说是新奇的。他所提出的与神在心灵中的合一，也非信徒以前所领会的那般。在他的带领下，信徒学习依照新约圣经的原则去实行；弟兄们人人可以运用“说预言”的恩赐，在圣灵感动下，可以在聚会中随时站起来讲解圣经，照着教会的需要而应用出来。喇巴第写了一本书，名叫《圣经所说的真正教会的三十种特征》，指出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的聚会，才能称为真正的教会；借着圣灵，信徒彼此联络，成为一个身体，在教会内同受基督的灵的引导。

喇巴第的教训，不但在米第堡赢得了许多人的信服，就是在荷兰全境，也广受欢迎。照当时的情势来说，如果众人果真能依照这些教训去行，改革宗教派定必大为改观，也会一改作风，更多注重人

在灵里与神的相交。可是，当时的人担心这样的改变，会使人失去灵里因基督救赎的大工所享有的安息，又流于过份着重行为，忽略了信心；偏重成圣，而低眨了称义；他们也担心一旦给予信徒自由讲道的机会，亦会削弱教会所按立的牧师的权柄。

喇巴第所提倡的改革，遭遇到大部份教会领袖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改革过于新奇，破坏了一向的惯例。这些反对日益加剧。一六六七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法人教会会议中，通过要求他签署比利时教会信条，表示同意。在多年前他虽曾在孟投本、俄再遮和日内瓦等地，签署过类似的教会信条，但这一回他却拒绝签署，因为他认为那些信条内容，多有不合乎圣经教训的字句。为此，反对他的人更大力抨击他。在来丁举行教会会议时，大家议决：如果再下一次在威列星根(VLISSINGEN)举行教会会议时他仍拒绝服从的话，就要把他革职。消息传到了米第堡，众人大为愤怒，市议会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结果教会把该项议决案从记录内删去。

在此同时，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医生美遮(LUDWIG MEIJER)，出版了一本书，强调圣经一切的解释，必须根据天然的悟性。这种提倡唯理主义的论调，立刻引起全国相信圣经是圣灵默示的人民所激烈反对，以致官府不得不委出博学知名的科克由教授(COCCEJUS)负责拟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同时亦有其它人写书驳斥唯理主义，包括乌突热赫特的法人改革宗教会牧师倭勒座根(LUDWIG WOLZOGEN)。可是他所写出来的，表面上是驳斥唯理主义，但因论点与教会传统的信仰有太大的差异，以至那些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信徒，感觉到他的著作反而好像是维护信徒所要驳斥的。喇巴第也着手写了一本驳斥理性主义的书，论调铿锵有力。米第堡的法人教会于是决定在威勒星根举行会议时，宣告正式谴责美遮教授的主张。会议结果，委出三处教会分别针对美遮教授的著作提出报告，在拿阿丁(NAARDEN)举行下一次会议时公开讨论。这三处教会，包括米第堡教会。结果，三份报告内容大不相同，但出乎意料之外，会议讨论结果，大部份人认为美遮教授的书，并无不是之处，而且还通过认可倭勒座根的论点。喇巴第见状，马上离开会议，返回米第堡与教会的弟兄们商议。但与此同时，大会会议决定将他暂时解除职务，罪名是他提倡的教训过份怪异新奇，又指控他的教导错误，说当时仍旧是恩典时代，等到基督胜过了祂一切的仇敌，成就了神创造的目的，把神起初所创造的万物原来的样式都恢复以后，基督掌权作王的千禧年才会来临。会议决定，如果喇巴第不肯就范，就要被革职。大会派出代表前往米第堡教会，授权代表们革除任何反对的教会成员，可是米第堡教会全体负责弟兄，拒绝听命，歇力声辩喇巴第的教训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和原则。于是教会议会遭暂时禁止活动，并决定下次大会时就要正式宣布禁止喇巴第讲道。

喇巴第满有特殊的恩赐，因此反对他的人格外忌惮他。他毫不胆怯，放胆传道，还发表声明说绝对不和教会大会有任何交往，因为他认为他们已经腐化堕落，深陷在各种谬误中；他不但指出比利时教会信条内的错处，还力指教会大会并未接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教训，他又谴责教会会议和法庭的组织，责备他们循例举行宗教仪式，读圣经的时候不加讲解，又准许未得救的人担任洗礼的证人，还允许他们守主餐。他亦指责教会主持婚礼时，容许不虔不义的人照基督教的方式起誓及祝福，而教会内掌握大权的人，就像天主教教皇一样，借着各种教规，囿限信徒的良心。他指出教会中唯一的权柄，是圣灵及神的话，就是指圣经中所说的话，信徒心中所经历的真理，也正和圣经的话吻合。既然基督徒的良心只接受神的话的引导，因此拒绝与神的话相违的教规，或其它人为组织的命令，就不算是违

命反抗。相反地，基督教会为了信徒良心上的自由，正应如此，并且要反对任何越过神话语的规模并高举自己的教皇制度式的系统。

等候多时的大会，终于在一六六九年在度突热赫特(DORDRECHT)举行。喇巴第和米第堡教会的负责弟兄，和一些其它信徒，在该地守候了一个星期，要在大会中提出上诉，但大会根本不让他们有机会发言，迅速通过将他和一切支持他的人逐出教会，原因是“他们不服从教会的命令，并意图挑启争端”。

喇巴第清楚他蒙神的呼召，要重建使徒时代样式的教会。他在四十岁前，一直为罗马教会的改革努力，然后又花了二十年的工夫，为改革宗教会效力。为此，他摆上了一切自己的恩赐和整个生命，热切地献上一切，但结果处处落空，徒劳无功。因此，他得着的结论是：“任何现存的教会，都不可能加以改革。如要恢复使徒时代教会的样式，就必须先脱离现存的教会组织。”他一经醒悟以后，就把所领受的在米第堡教会实施出来。有三百人跟随他离开了原有的聚会，另立聚会，由几位长老和三位传道人负责牧养，每天两次聚会，主日则举行三次聚会。聚会的地方只设木凳，没有讲台，只有一列较高的木凳，专供长老和传道人所用。信徒们都习以为常地在聚会中轮流讲道。他们不采用“改革宗”这名称，宁愿称为“福音派”，只有重生的信徒才可以加入聚会。

这个新建立的教会，与原有的改革宗教会不同，因此当地政府勒令新成立的教会离开米第堡。距离一小时路程的威耳(TE WEERE)的人获知这消息后，马上邀请被逐的信徒迁到那儿去。信徒们欣然前往，米第堡的大法官立刻知道犯了大错，因为人人蜂涌前往威耳听道，米第堡教会空无一人。他心中有所不甘，只有向更高层的地区政府请命，要求指令威耳地方法庭将喇巴第和依旺赶逐出境，罪名是他们挑拨离间，扰乱民生。米第堡的法庭派了武装人员去执行命令，但威耳的人民如同一人，起来极力反抗，看来内战可能一触即发。喇巴第挺身而出，说明不愿意因他的原故而导致流血事件，他也清楚神的手要带领他离开威耳，到阿姆斯特丹，他向众人说明谁乐意跟随他的，都可以一同前往。威耳的人深感不安，但喇巴第去意坚决，该地人民只好让步。当地法庭宣称让他离去，“实是出于无奈，诚不得已。”

喇巴第和三个朋友，及一些同情他的人，一起移居阿姆斯特丹，受到该地人民热切的欢迎，并获保护及信仰自由的保证。过去喇巴第的工作在该地曾引起极大的影响，所以他一开始聚会时，成千上万的人就涌到那儿，不再在改革宗教会内守圣餐。在其它国家的大教派，也受到同样的影响。他们虽然没有亲自来参加聚会，但他们亦深受喇巴第的教化。改革宗的人士深恐这种趋势会危害他们本身的制度，于是求助于政府。但当时执掌政权的，是那英明的政治人物维特(JAN DE WITT)；他的政策是维护宗教自由，所以改革宗的阴谋，并未得逞。

可惜当时喇巴第本人的心思，和他周围的人所作的，影响了他的事奉，比任何外来的攻击所带来的影响更大。他从经验中，从神的话语内，已领会到他不可能将某个城市，或某种教会制度，全盘加以改革来实现他的理想；可是他对那些自称依照使徒时代样式建造的教会，亦未感满意。不错，这些得救的人一起聚会，又与周围的世界分离，可是，这些信徒仍然软弱失败，需要不断照顾牧养，因此他决定建立“家庭教会”，亦即“家庭就是教会”。他相信这么一来，其中的成员们可以彼此认识，彼此扶持，真正跟随基督，与神合而为一。他在阿姆斯特丹租赁了一幢房子，供四十人居住，就这样成

立了“家庭教会”，经常聚会，每周一次大家一起用缮。外面的信徒可以参加聚会，在聚会中用法文讲道，用荷文翻译。依旺、杜力农和敏努勒特则出外布道，福音传遍尼德兰及邻近的国家。

许热曼也迁来阿姆斯特丹，在该房子内租住一个单位，参加了家庭教会。她曾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女性，曾用各种文字和欧洲各地知名的学者文人通信联系，人家亦尊重她的意见，接受她的劝勉。这些学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各有专长。许热曼从小就笃信基督；在她用拉丁文写成的《优吉里亚》(EUKLERIA)一书中，她忆述说：“我还不到四岁那年，有一次和保姆坐在溪边，她向我反来覆去说：‘不再是我自己，我是属于我那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听了以后，心里充满了对基督的爱慕，当时那股强烈的感受，使我一生难忘。”她又写了下面的话，为自己加入家庭教会的行动辩护：“我多年来因见基督教已远离了它的根源，失去了原来的样式，深感痛苦；又看见那些教会人士所作所为，实在难以令教会恢复该有的样式；事实上这些教会人士本身亦亟需改革。现在，我已找到了神所预备的仆人，能把腐化了的基督教，彻底改变，心中正充满喜乐，有谁能禁止我加入呢？”她因为颇负盛名，所以当各地的人获悉她加入家庭教会的时候，纷纷去信请求她返回改革宗。但她正乐得摆脱了旧造，又已经得着了那没有人能夺去的上好的福份。她以前一面寻求神的荣耀，一面也要自己得好处；但到了这个时候，她一心一意只求神的荣耀；她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交给喇巴第，以后也没有为此后悔。在家庭教会中的人事多次变动，但她一直是得力的助手，德高望重，深得各人敬佩。

佛依地认为这种新发展的趋势，带着潜伏的危机。他多年来大力支持喇巴第，但现在则起而加以反对。

他写了一本书，指出信徒不应该因改革宗的败坏软弱和不冷不热而离开，也不应加入这种代替教会又与人隔绝的修道院式的家庭教会组织，又说这种家庭方式，容易引起各种恶意的推测。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于是出现了一封反驳的匿名信，措词激烈卑劣，后来有人发现该信出自喇巴第的手笔，顿使他的声名一落千丈，许多人群起而攻之，但这些抨击，却使家庭教会的信徒更紧密的联结，也有其它的信徒陆续加入，包括阿姆斯特丹的市长。

但过了不久，家庭教会发生了难处。他们当中一名寡妇死了，谣传她是被谋害的，尸身给秘密的葬在花园内；这消息一传开以后，大群人包围着房子，几乎引起了暴动；当局赶紧派兵镇压，并守护着房子内的人，经过了三天之久。后来喇巴第所疼爱如亲生儿子的敏努勒特，患了精神病，结果发狂身亡。家庭教会的人经历了这些变故，不禁自问：如果这教会是真正属神的，为何会有这类的事情发生？他们检讨之后，发现虽然他们对接纳家庭成员一贯采取审慎的态度，但成员中竟有人是奉苏西尼主义的，另外又有人附从贵格会的主张。这两个成员受到斥责之后，老羞成怒，印发传单毁谤中伤家庭教会，结果事情闹到法庭去。审讯的结果，证明传单内所写的都是虚构和捏造的，可是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人人知道家庭教会中有危险的分离教派分子，一时引起了外面的人更利害的敌视。为了维持治安，地方法院下令外人不得参加这些“家庭教会”的聚会，只准住在房子内的人聚会。这么一来，聚会便无法扩展，人数也无法继续加增。

为了谋求对策，许热曼求助于老朋友伊利沙伯公主，她是纥立佛得(HERFORD)的女修道院的院长。她马上邀请家庭教会的人到她那自治地区内定居。于是喇巴第和约有五十名信徒，由阿姆斯特丹乘船往布勒门(BREMGEN)，再转车往纥立佛得（一六七〇年）。当地路德派居民激烈反对无效，公主出面袒

护他们。因为四周的居民对他们极度的仇恨敌视，使他们与外界更为隔绝，只有更专心致力于内部的属灵操练。他们深受喇巴第的教训所影响，认为到了这地步，他们才算是真正的向神完全摆上自己。于是开始凡物公用，表示他们完全舍弃世上的财物，完全舍己，与基督身体上的众肢体合一。当他们开始这样作的日子，就在擘饼纪念主的死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奇异的属灵狂热的感觉临到众人；起初只是一两个人的感受，但接着全体都感染到这份狂热，于是他们开始说方言，然后站起来手舞足蹈，这样维持了约一个小时。以后这种现象又告出现，他们大部份人相信这是表明众人在基督的灵里的完全合一，但有些人提出反调，并且自行退出。外面的人知道这情况以后，对他们更为敌视。这些信徒一直都不主张婚娶，但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改变看法。喇巴第、依旺、和杜力农等先后成家立室，娶了能在为主作见证的事奉上给他们帮助的妻子。

伊利沙伯公主虽然多方维护他们，但当地居民对他们的仇视，有增无已，最后他们只好决定离开，在阿统拿(ALTONA)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点，租赁了两幢房子。后来喇巴第在该地安然去世（一六七四年）。许热曼亦在此写成她那本《优吉里亚》。可是因为战事的关系，他们被迫再转往西弗立斯兰(WESTFRISLAND)的魏窝特(WIEDWERD)小乡村内的窝泰城堡(CASTLEWALTHA)，城堡的主人让出全座城堡给他们居住，这地方就成为他们最后的家。乡民欢迎他们；改革宗人士派出委员调查他们的信仰，查明他们并不会危害他人以后，就让他们安居下去。许热曼和杜力农及他的妻子，都在此先后去世，许热曼死时年七十岁。

这些信徒聚会的人数渐渐多起来，周围地方的人都来参加聚会。他们又派出不少人往外传道，一批人往苏立南(SURINAM)，另一批人往纽约；他们都是由魏窝特的人所资助和分配工作，可是两批人都徒劳无功而返，主要是他们并没有专一向未信的人传福音，而是致力争取当地的基督徒加入他们的阵营。这些人出外传道，花费不少，使留在家中的人更感拮据，又因遭遇实际的困难，于是奉行了二十年之久的凡物公用制度，便被迫中止。

这个决定，可说为害不浅，因为聚会中大部份信徒都十分穷苦，多年来没有学习任何谋生的技俩，其中有好些也缺乏工作的能力，长久以来只是倚靠其它较为富裕的信徒来维持生活。依旺说明当年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分散以后，大家就不再凡物公用，而家庭教会到了当时的地步，也该是分散到世上各地工作的时候，发挥有如“面酵”的作用。这个说法，如果是在早几十年前提出，他们也就无须放弃照圣经的原则所建立的教会样式，也不会改为“家庭教会”的方式，使见证的范围大大缩窄，更拦阻了他们向外的发展。最后，家庭教会解散，各人分散各地。依旺留在窝泰城堡，后来也在此去世。廿五年以后，城堡落在他人手中，最后一位追随喇巴第的信徒，也从此离去，不知所踪。

喇巴第一生努力不懈；他的能力来自心灵内与神的相交，经常的祷告，和殷勤的读经。当他认识到自己要改革罗马天主教会的大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以后，又从经历中领会到任何城邦都不可能达致人人悔改而转为教会的地步；以后，他又发现改革派抗罗宗的教会无法加以进一步的改良，使之恢复新约圣经教会的样式。结果，他经过了长期的挣扎，才领会神的真正教会起初的样式和一贯的情况。可是，后来他屡遭反对仇视，灰心失意之余，这才想到“家庭教会”的方式。他以为在小圈子内，信仰可以保持纯正，可是，他就在这一点上走了岔路，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教会，并非是一些完全人安息之所，而是所有承认主名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这些人各带着自己的软弱、愚昧和缺乏，在教会中，如

同在育婴室或学校一般，接受以永无止息的爱心所生的忍耐的教导。我们从喇巴第一生中，看见了那百折不回的勇气，看似失败，其实他的成就永存。起先的时候，他在教会内把一切兼收并蓄，连真正的教会所必须要分别出来的属世制度，也包揽在内。以后他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把教会的范围又过份缩窄，以为教会只包括那些完全的基督徒。曾经有一段时候，他建立了一些真正的教会，而他的教训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流传后世。他对教会的认识，不够全面完整，使他不免犯了错误，把教会囿限在小圈子的聚会中，结果流于过份狭隘封闭。但他的经历却是十分宝贵，给我们指出：神的话语才是真确的指南针，提醒我们不要偏离左右：不是把世界的样式都收纳在教会内，就是把其它的圣徒拒诸教会的门外。

在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抗罗宗的国家元气大伤，在国民道德方面，也因在战争暴力和动乱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代道义荡然无存，因此也陷于衰落的状态。路德派教会和改革宗教会，都各自拘泥于所奉行的正统教义，反而忽略了实行敬虔生活的必要。

施本尔(SPENER)在一六三五年生于亚尔塞斯(ALSACE)，三十五岁时就成为法兰克福路德会的主任牧师。他深感教会亟须改革，于是首先在自己的家中设立聚会，后来聚会移至教堂内举行。聚会的目的是在实行“古老使徒时代的聚会方式，……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描写的。凡有知识和恩赐的人，都可以讲道，不争先恐后，发表他们对正在寻求的问题的意见，其它的人就慎思明辨。”信徒们经常聚会，一起思想指定的题目，然后彼此交通。男女信徒分座，但只许弟兄交通。他们规定不许别的人批评，也禁止闲言闲语。起初大家选读一些属灵的书藉，彼此讨论，但后来他们只读新约圣经，一起思考神的话语。在这些私下举行的聚会后，接着可能有发问的时间，或彼此认罪，或分享属灵的经历，目的在温习所学习的属灵功课。施本尔并不鼓励信徒这样作，他只负责讲解圣经。他反对任何宗派的名称，就如“敬虔派”(PIETIST)，“施本尔派”，或其它，因为他原意并非想另立教派，一心只想返回那古老的宇宙性的教会的样式。施本尔对别的教会所行的，并不反对，甚至表示支持，但他自己却不一定跟他们那样行。他自认没有当改革家的魄力，但具备容忍歧见的能耐。在一些聚会中所进行的自我检讨和认罪，他都可以包容，但他所主持的聚会，却并不如此行。他也尊重一些信徒的属灵神秘经历，但自认并没有这样狂热的感受，就如在异象中看见新郎基督，或如“寂静派”(QUIETIST)所经历的那种舍己。他的愿望，见于下面所说的话：“我何等渴慕能见到一个单纯的教会，凡事正直，无论在信仰或实践上，都能表明使徒时代基督教会所有的样式。”他并不敢期望教会内“没有杂草”，但盼望牧养教会的人，能在圣灵引导下作工，而大部份信徒都能向世界死，过诚实虔敬的生活。他指出大部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不是得救重生的，而许多作牧师的，也不全然明白那能使教会坚立的真道。过了不久，在法兰克福施本尔所属的教会的信徒，停止参加主餐聚会，不愿意和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一起守主餐。施本尔由法兰克福被调到直历斯顿出任法庭牧师，然后又调往柏林，在那儿殷勤作工直至离世（一七〇五年）。他所创设的组织，人称他们为“敬虔派”，成为一股属灵的力量，使教会生气勃勃，虽然屡受正统基督教人士所抨击揶揄，但他们始终没有脱离路德会，只是在其中另立聚会，吸引了不少寻求敬虔的信徒，并且结出许多果子来，带来深远的属灵果效。

深得施本尔教益的人中，有夫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他生于律伯克声(LUBECK)（一六六三年），攻读神学。这些学术研究，虽然使他得着一点帮助，却未能给他的心灵带来平安。但是，

这些研究使他里面生发出一种爱慕，要在生活行为中实践他在思考中所能理解的真理。经过了好几年迫切的追求，忽然有一天，在刹那间，他有了悔改得救的实际经历，除去了他的不信，使他牢靠地得着救恩的确据。他强调人必须悔改，过圣洁的生活。他叫许多人蒙恩得救，可是也不免树敌。他被列为“敬虔派”的一份子，被迫要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阿尔弗，他原是当地教会的牧师。同日他接获伯兰顿堡宫廷的邀请，出任刚成立的哈勒(HALLE)大学的希腊与东方语文学教授。他在该地目睹人民困苦的光景，深感不安，于是设立了奉献箱，收集捐给穷人的款项，然后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有一天，他收到一笔比平常数目大许多的款项，约有十五镑。他后来记述说：“我收到了这笔款项以后，在信心完全的释放下，喊出来说：这笔为数不少的金钱，应该能作出一点有意义的事，我要为穷人开设一所学校。”这就是日后在哈勒那庞大的慈善机构的发轫。这机构从来不向人募捐，也没有外来的资助，正如夫兰克所说的：“我们一直仰望天上永生神的供应，毫无匮乏。”在他去世的时候，该机构属下的孤儿院，收容了一百三十四名孤儿，由十位男女职员照料；而在几所学校中受教育的学生，有二千二百多人，大部份不用缴费，老师共有一百七十五位，此外每天还得为好几百孤儿供应膳食，又办印刷和销售书籍，开设图书馆、药房、医院，及其它的福利机构。当时亲岑多夫(ZINZENDORF)也是其中的学生，后来长大后常与夫兰克在一起，聆听那些在座的传教士缕述他们在海外的工作。这些经历给他以后一生的影响很大。

一六九〇年，正是“白山之役”后七十年，也就是甘美纽斯带领最后一批信徒离开摩利维亚后六十二年，基思强大卫(CHRISTIANDAVID)在离福尔涅克不远的地方出生。甘美纽斯多年前所祈求的“隐藏的生命种子”果然蒙了保守。基思强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就像他们的邻居一样。他从小放羊，后来从事木工，非常虔诚，心中关切如何才能获得神赦罪的确据。他从阅读及探讨所得的答案，都相当的矛盾，使他更感困惑。结果他离开了家人，往德国去寻求真道，经过了不少遭遇和挫折，他邂逅瑟斐尔(SCHAFFER)牧师，他是个“敬虔派”的信徒；从他那里，基思强明白了救恩之道，心中充满了喜乐和火热，回到摩利维亚，到处传道。已被遗忘了多年的真道，又在听道的人心中复苏。可是这些信服福音的信徒，马上受到利害的逼迫。基思强回到瑟斐尔那里，看看能否在萨克森找到藏身之所，因而认识了亲岑多夫。

亲岑多夫从小深爱耶稣基督，他在“敬虔派”当中所受的教育，加强了他爱主的心志。当基思强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正住在伯帖勒多弗(BERTHELSDORF)，接近波希米亚边界，与友人若特(ROTHE)牧师一起在当地服事主，当时他年仅二十二岁，基思强比他年长十岁。这两个青年人讨论到摩利维亚的急需。亲岑多夫欢迎这些被逼迫的信徒前来住在萨克森他所拥有的产业上。基思强迅速返回本土，把那些可以成功偷出家门的信徒带走，攀山越岭到萨克森的伯帖勒多弗，他们都受到热诚的接待，可是却没有找到可以安顿下来的住处。离开亲岑多夫的产业约一哩外，有一个长满树林的小山，叫纻池堡(HUTBERG)，亦称“守护山”，他们将它改称为“纻仁获特”(HERRNHUT)，意即“主护城”。他们就在那里重建家园。基思强用斧子砍掉第一棵树，以身作则，勤奋作工，其它的信徒也一起动手建造。基思强一面建房子，一面传道。不久就把房子盖好了（一七二二年），成为日后“主护城”许多建筑物中的第一幢，它的建筑设计形式，也成了日后在世界各地同类房子的蓝图。

有一天，当基思强正在伯帖勒多弗盖造房子时，他的心思回到摩利维亚，突然他放下工具，连帽

子也不戴上，走了二百哩路，到了观窝特(KUENWALD)，当地有不少信徒，都是那古老的波希米亚弟兄会教会信徒的后人。他把其中一部份人带回纒仁护特，其中有尼赤曼(NITSCHAMANN)，粹斯伯尔革(ZEISBERGER)，和托尔斯斥(TOELTSCHIG)几家人，他们都是日后因新设的摩利维亚差会的国外布道工作而远近驰名。他们抵达“主护城”时，亲岑多夫和他的友人瓦特威尔(DE WATTEWILLE)，正在为新落成的聚会房子奠基。这些人就留下来，与原来的信徒一起生活。

此事以后，不少人从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前来：有些是自狱中逃出来的信徒，也有从藏匿的树林中走出来投靠的。当这收容信徒的避难所渐渐为人所知时，愈来愈多的信徒纷纷前往，其中亦有持不同信仰的：有人信奉士文克斐特的见解，有人属“敬虔派”，亦有些是自成一家的，这么一来，原来弟兄和睦同居的气氛大受破坏，争执迭起。在此同时，亲岑多夫正在致力于使伯帖勒多弗变为一个模范村，一切都按照他和若特牧师的意思进行。亲岑多夫天赋想象力，他幼年时在哈勒，基于对国外布道的热忱，他创立了一个叫“芥菜种”的团体，还设计了团章、团徽、团训、团戒指等；成立时只有五个男孩，包括他自己在内，他自任团长，后来这团体大大推动了国外布道工作。在伯帖勒多弗，他又创设了“四弟兄会”，成员就是他自己、瓦特威尔、若特、和瑟斐尔四人，会旨是向全地宣扬“那以基督自己为中心为救主的普世宗教”，后来他这“作战队伍”成为国外布道有力的工具。在这当儿，正当信徒彼此分争之际，他挺身而出，尽力劝解，指出争辩双方各怀善意。有一次，在提及某项特别激烈的争论时，他说：“虽然我们所亲爱的基思强称我为野兽，又称若特先生为假先知，但我们仍能谅解他的用心良苦，我们也相信能领他返回正途。谚语说得好，让君子在位，就算他误入歧途，他总能从经验中领受实际的教训；这些领受，并不是可以凭空臆造出来的。”他把信徒召聚起来，用了三个钟头，详细讲解他为各人所拟订的生活规条。信徒因此得着复兴，各人彼此饶恕，自此和睦共处，相安无事。

大约与此同时，亲岑多夫在邻镇西投(ZITTAU)的图书馆中，发现了一份由甘美纽斯编撰的“属灵操练之道”，是在白山之役未爆发前波希米亚弟兄会最后一次聚会时所草拟的。亲岑多夫从其中证实这些来自波希米亚的信徒，实在是当日那古老教会的信徒的后人。他读到甘美纽斯因教会见证遭受破坏而流露的哀痛，心里感动不已，决心要尽自己所能来保护这一小群来投靠他的主的门徒。当他把这档交给那群信徒传阅后，他们也大为激动，宣告要恢复原有的教会；在他们当中，多人是原有教会信徒的后人。

在纒仁护特的小区，和路德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结果不见引起争论。亲岑多夫本身属路德会，自然主张小区全部隶属路德会，但其它信徒表示反对。结果大家按照平日规矩，决定抽签，结果是决定不参加路德会。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亲岑多夫请求路德会封他为主护城的牧师，同时由柏林的御牧雅布伦斯基(DANIEL ERNST JABLONSKY)按立主护城中一位信徒为监督。(雅布伦斯基是波希米亚弟兄会教会硕果仅存的监督。)这么一来，这群信徒可算是路德会中的组织，但可以自行各种宗教仪式。事情虽然如此暂时获得解决，但反对的力量颇大，亲岑多夫最后被逐出萨克森（一七三六年）。

有一次，当亲岑多夫往丹麦探视国王基思强六世(CHRISTIAN VI)的时候，认识了一位黑人安东尼(ANTHONY)。他邀请安东尼往纒仁护特去，在那里，安东尼讲及西印度群岛的黑奴的凄惨情况，叫听者大为动容。其中一位信徒名叫杜伯(LEONARD DOBER)，自动请缨要前往西印度群岛传福音，大家抽签后，认为可行，于是差遣这位青年，和另外一位信徒大卫尼赤曼(DAVID NITSCHMANN)，一起前往。

他们两人都各有实用的专长，一个是木匠，另一位是陶工，曾在主护城内的学校受过良好的训练，也能讲道。他们徒步出发，全部行李就是两人身上的背包，口袋里只有十八英镑。这就是摩利维亚差会的开端，后来整个组织改称差传会（一七三二年）。这些传教士，为基督大发热心，甘愿在一些艰苦危险的地区工作。从此以后，纒仁护特成了世界各地传道工作的联络中心，在好些地区，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在纒仁护特的公墓内，埋葬了不少来自各国的人士，他们曾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到这组织的发源地观墓。

摩利维亚差会在英国的工作，始自一七三八年。当时薄勒(PETERBOEHLER)正要由纒仁护特前往美洲传道，路经伦敦，在一位书商胡屯(JAMES HUTTON)所创立的会社中讲道。胡屯和他的朋友，正在寻求救恩，但多时未获救恩的确据。薄勒用生硬的英语，将圣经真理详细地讲解出来，大有能力。胡屯后来追忆说：“当时，想不到我们竟然就一下子明白了基督的真理，认识了他的宝贝和他的受苦，也领会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及靠祂得以从罪中释放出来的真道。当时我们所充满的不可言喻的喜乐是何等的丰富。”这些人从薄勒那儿接受了纒仁护特那一套生活规则，又由德国来了一位牧师在他们当中工作，但他们仍旧是英国教会的成员。四年后，施旁恩伯尔(SPANGENBERG)从德国来，正式承认他们是弟兄会教会的聚会，并教导他们一些德国信徒聚会的规矩。起初，这些信徒和韦斯利(WESLEY)过从甚密，韦斯利深受他们的影响，学效他们的方式，在英国国教内另立聚会，举行信徒爱筵等。约克郡(YORKSHIRE)一位传道人英罕(BENJAMININGHAM)，他在那时教会复兴的那段时期内十分的活跃及蒙恩；他不仅在自己的教区内工作，还远赴哈利法克斯(HALIFAX)及利兹(LEEDS)等地，设立了五十多处读经祷告的小聚会。他亟须有人协助工作，于是求助于摩利维亚的弟兄们；他们马上答应，派了二十六位弟兄姊妹去约克郡协助。他们一抵涉就立刻有条理地展开工作。施旁恩保尔以外克(WYKE)为基地，指挥各地的工作；托尔斯威(TOELTSCHIG)本来和基思强一起来自摩利维亚，他在和勒伯克(HOLBECK)的教会作负责弟兄，全英国共有五个指挥中心，控制五十多处传道地点，由一些称为“国家助手”协助，他们都是英国本地的信徒。各地传道人都遭遇了一些混乱不安的日子，结果决定在英国成立一个类似纒仁护特较具永久性的基地。亲岑多夫亲自前往安排，并协助他们购得座落在利兹和布拉得福(BRADFORD)之间的溥西(PUDSEY)的一块地，由德国信徒供给经费，并将之定名为福尔涅克，用以纪念摩利维亚的福尔涅克。除了这处仿效纒仁护特的形式设立的较大小区外，在外克，米耳斐尔自(MIRFIELD)，和哥母尔索(GOMERSAL)等地，都设有规模较小的中心。各处均遵守亲岑多夫所订下的规条。

在英国的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工作开展，最著名的传道人，有森依克(JOHN CENNICK)。他在英国出生，却是波希米亚裔，是那古老的波希米亚弟兄会教会解散后逃来英国避难的信徒的后人。他起初协助韦斯利工作，后来思想倾向威特腓德(WHITEFIELD)的主张，结果他受到了排斥，转而投向摩利维亚弟兄们的聚会。他惯于露天布道，充满感人的能力，为人温和，平易近人。他短短的一生中，忠心事主，在英格兰西部及北爱尔兰一带，他工作的果效尤为显著。

这些范围广泛的组织，由远在德国的教会控制，可谓吃力不讨好，而且妨碍工作发展。虽然在制度方面已加以变更，尤其是后期在英美两地，为了适应各地特殊的需要而作的更变，但这种小区方式，实在难以适应各地不同的民族性和风尚。这一个现象，表明了一件事：人想出来的布署，不管多么明

智，总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可是，新约圣经内有关神的众教会的建立和造就的教训，却是金科玉律，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适用。

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两种属灵经历潮流的汇合，产生了“非拉铁非”(PHILADELPHIA)，组织（或称教会）的成立。

第一股潮流源于人的心灵对与神交通及合一的爱慕。

第二股潮流，是由认识神的儿女同归于一的意念所萌发出来的，目的在表明真正教会内信徒间的交通。

罗马天主教会，首先在人心灵和神之间，硬插进了神甫和圣礼。这种制度，使人无法直接亲近神。但不少信徒心中渴慕和神相交，而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信徒心中又爱慕那位天上的新郎，因此全心追求更多认识祂，经历与祂合而为一的实际，于是他们追求跟随祂，效法祂，盼望透过默想，能更多领会祂的美丽与完全，又借着禁欲舍己，胜过肉体 and 天然的意志。

抗罗宗却因本身内部的分门别类，引起了神的子民间更尖锐的彼此分离，甚至在各宗派间更挑起了彼此的敌视。幸而其中有人为此忧伤，极力指出在生命和爱心中信徒合一的事实，信徒就是那些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且因信归入基督，并与其它肢体合而为一的人。

在罗马天主教会中，那些称为“神秘主义”或“寂静派”(QUIETIST)的，一向被认为是能标榜基督徒生活的。其中有些著名的，已被封为圣人，但后来因耶稣会及法国路易十四的阻力，他们大受逼迫。其中一位西班牙籍的修士模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一六四〇—一九七年），于一六七〇年来到罗马，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他所著的《灵命指引》，成为许多天主教徒生活的指南，尤其是那些贵族和修士们，更奉之为座右铭。他成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心腹。这位教皇本身反对采用任何暴力方式，可是模利诺斯最后却给判终身监禁，死于宗教裁判者的手中，原因未明。盖恩夫人(MADAME GUYON)（一六四八—一七一七年）的一生和著作，影响了许多人爱慕追求完美而充满爱心的生活，寻求完全向神旨意的顺服。那满有恩赐和虔敬的非尼伦大主教(FENELON)，冒着牺牲他在教廷中的事业前途的危险，表示同意盖恩夫人的见解，并极力维护她。路易十四屡次将她下狱，最后把她关在那恐怖的巴斯底狱(BASTILLE)；可是那厚达十二尺的监狱石墙，却不能遏阻她给教徒们的影响。

在抗罗宗的圈子内，阿尔诺得(GOTTFRIED ARNOLD)（一六六六—一七一四年）的著作，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威登堡受教育，后来在基信(GIESSEN)担任历史学教授，但不久就辞职他去，因为他发现那种社交生活和职责的压力，妨碍了他与主的相交。施本尔并不同意这样的作法；他认为尽管生活环境并不惬意，甚至会损伤自己的灵性，但只要还有机会帮助别人，就应该坚持下去。可是，阿尔诺得却认为路德会尤如巴别塔，已经没有改良的可能，并且觉得自己离群独居，更接近使徒的生活样式。他第一部著作《起初的爱心——早期基督徒活泼的信心和圣洁的生活的写真》，是记叙教会由使徒时代开始至君士坦丁时期的历史，指出因政教合一而带来的不幸。后来他醒觉到一件事：教会历史经常是由那些得势的教派人士执笔，不免有偏见，所以必须有人把史实不偏不倚、忠实地记录下来，于是他着手写了名闻后世的《从新约时代至一六八八年教会及异教的写实》。他摒弃了以教会局限于某一特殊组织的看法，寻索那宇宙性的教会，就是那肉眼看不见，故居在全地各民各教会中的。对此书的评价，读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是基督降生以后遗害最大的一本着作，但亦有人认为它是除圣经

以外最有价值的佳作。

盖恩夫人的著作，使许多人领会到与神保持密切交通的生活的可能性。

阿尔诺得的作品，叫信徒得着苏醒，要与世人分别，和圣徒相交。

一七〇〇年，这些分散各处的信徒，渐渐汇聚起来，成立教会，人称之为“非拉铁非”组织或教会，非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之意。

位于威斯特发里亚南端，威根斯坦书(WITTGENSTEIN)小国中，接连的几位统治君侯均施仁政，采宽容政策，因此吸引了各种各式的人来定居，从色芬群山中逃难出来的信徒受到收容。而此小国南北两区的统治者，分别和一位因圣巴多罗买大屠杀而逃到尼德兰的法国贵族的两个女儿结亲。这两个家族均虔信基督。一七二一年，北区伯尔堡(BERLEBURG)由这两个家族的后人所统治，名叫迦士密尔(CASIMIR)伯爵。他与妻子和守寡的母亲，经常维护那些受迫害的信徒。

他们属于当时已散布各地的非拉铁非教会。诺立赤的莉德(JANE LEADE)及其它信徒，相信启示录第二、三章写给众教会的话，是预表教会发展历史中几个过程：撒狄教会预表抗罗宗，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老底嘉教会那种不冷不热和变质的情况，就快要应验，所有苏醒过来的信徒，于是组成“非拉铁非”。一六九五年在伦敦成立了“非拉铁非”教会，用意不在成立另一种新教派，而是要在聚会中保持彼此相爱的灵，和最初的圣洁而公正的使徒教会的形式。加入的人，不一定要脱离原有的教会，他们也从不勉强人，但他们聚会的时间，与其它教会聚集的时间相同。因此如果他们要参加原属的聚会的话，就不可能来参加“非拉铁非”聚会。他们说：当时非拉铁非教会还幼嫩软弱，必须要等到能力彰显出来时，他们所期望的现象才会实现，就如：犹太人悔改；土耳其人和一切不信的外邦人来归信主；背道的人回转；万物恢复原来该有的样式；基督亲自在地上显现等等。在德国、荷兰和其它的许多地方，都有同类的聚会：伯尔堡成了教会复兴的中心地。这次复兴的范围，包括德国西部，由阿尔卑斯山直到沿海各地。

一七一二年，这些组织印行了马尔堡(MARBURG)版本圣经，题为：“神秘及预言性的圣经——包括新旧约全书，译自原文，附主要预表及预言的解释，尤重雅歌书及耶稣基督的启示录，及其中的主要教训”。后来（一七二六——四二年）又印行了一本内容更丰富的伯尔堡版本，共八大册，印刷精美，附详细注释，连盖恩夫人的教训也包括在内。

非拉铁非教会，可说是好几种不同的运动合起来的产物，目的在撇开各教会间的分歧，并将各教会在爱中联络起来，又相信人心灵中的洁净和完全，要远比“众教会”表面的奉行宗教礼仪，更为重要。

为了彼此相助，他们约定每天早上在固定的时间内，各地信徒同时在灵里学习在神面前等候。

伯尔堡的聚会中，有一名活跃的信徒卡尔博士(DR.CARL)，是迦士密尔伯爵的私人医师。一七三〇年，他发出了“非拉铁非教会的呼吁”，劝勉信徒离弃是非爱恶的争执，摒除成见，回到问题的中心，在圣灵及真理中敬拜神。凡愿意听从的信徒，应该有同样的情操：他们说同一的语言，有同一的口味、同一的感情。但这种合一，只能在那些肯离弃属血气的字句和人为的圈子约束的人身上显明出来；他们也是那些能回到心灵和诚实中享用神宝贵话语的人。他们本身可能称为罗马天主教徒、路德派、或改革宗等。在这种合一的实际中，陶勒尔、垦普斯、亚仁特(ARNDT)、尼安德(NEANDER)等，都是合

而为一。基督教真正永存的实际，是治死旧人和活出新灵。

这个呼吁，在不少人的心中引起了响应，尤以在禹尔吞堡和瑞士为甚。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非拉铁非组织，心中却实际上已是它的忠实奉行着，他们都乐意寻求神的国，实行敬虔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在心里是以非拉铁非组织为依归，因为在那里他们看见神的国度所要求的实际，而在其它各种宗派中，他们只见教会的外壳和形式，而其中还隐伏着敌基督的灵。亲岑多夫曾尝试要将这些社团组织起来，并将它们附属于摩利维亚弟兄同盟会，却没有成功。

霍次努(HOCHMANN VON HOCHENAU)的传道工作，是造成当时教会复兴的因素之一，使许多罪人悔改，并建立非拉铁非教会。他经常出外传道，但屡受暴徒袭击，又被当局囚禁。可是所到之处，都吸引着大批人来听道；为许多人带来极大的祝福，他一生尽忠事主，热切勤劳。只在有时退到威根斯坦树林内的一所小屋里静思时，才有短暂的歇息；其它的日子，因着热爱人的灵魂，尤其是犹太人的灵魂的原故，他不停地在德国西部及北部各处传道。因他的讲道而悔改信主的，有一个年青的神学生贺弗曼(HOFFMAN)；他在国立教会外另立聚会，引领了特尔斯铁根(TERSTEEGEN)悔改归主，这人日后为基督作了极有力的见证，又因所写的诗歌使后世都分享了不少属灵的益处。斯提领(JUNG STILLING)(一七四〇——一八一七年)的一生及其著述，给人极大的影响。他记述到当时的情况，说：“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段时期的信徒，能像在这刚过的世纪内的上半段时期的信徒那样，切切地仰望主再来。起头是哈勒信徒的复兴，紧接着是亲岑多夫所协助恢复的弟兄会教会的见证，然后是伯尔堡的非拉铁非教会，结果带来了伯尔堡版本圣经的印行，同时有两位先锋出现：一为若彻(FRIEDRICHROCH)，另一为霍次努；接着还有特尔斯铁根及其它的许多圣徒。”

那些称为瓦勒度派、或重浸派、或其它类似性质的教派，都不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改革者，也不是后来试图要改良路德会或改革宗教会的。他们的起源，比这一切都更早，而且他们一直保留了起初圣经的教导，经历了后来发展出来的各种组织的兴衰，仍能持定不变。

照样，那些称为保罗派的，及其它在信仰上与他们有关联的信徒，也不是希腊东正教的改革者。他们也是老早就存在，后来与东正教教会并存，但一直都是分离独立。

但是，也有不少运动是针对天主教会或抗罗宗教会进行改革的：有的试图在现存的体系内产生影响，也有自动离开或被迫离开这体系。属于后者的，有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份子所组成的抗罗宗，形成了罗马天主教经过各种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后的各宗派。

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也有进行改革，例如亚西西的法蘭西斯，又例如好几位教皇，都曾认真努力去铲除陋习，但至终发现制度根深蒂固，经济问题牵连太大，结果都徒劳无功。

同样地，在路德会和改革宗教会内，也有人尝试着手整顿内部，例如敬虔派；但亦有人脱离他们而另立聚会，例如喇巴第派。

波希米亚弟兄会，本来源出于瓦勒度派，但亲岑多夫将他们进行改组时，却以敬虔派的信仰为依归，结果就把他们留在国立教会的范围内。

神秘派所代表的信徒，都是那些以为恢复早期教会的样式，已经不可能，便转而寻求个人成圣及与神相交的生活的人；他们同时仍旧留在原有的教会体系内，照着各人的爱恶或多或少向原有的教会效忠。在灵性上，他们接近修道主义(MONASTICISM)的精粹，这类信徒，在天主教和改革宗教会内

部存在。当“非拉铁非教会的呼吁”发出以后，他们曾尝试成立实际的教会。

因为教会已远离基督的吩咐和使徒的教训，并且在圣经的教导上处处出毛病，要立刻完全恢复原有的正确的样式，实非易事。所以起初是恢复一部份真理，然后是另一部份的恢复，逐步慢慢的改善。因为这些属灵复兴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和不同的时间内发生，结果产生了各种宗派，在历史传统上各有不同；在对起初的启示所领受的程度也各异；在返回起初样式的决心上，也各有分歧。因此，就引起了别人批评他们是分门结党，但事实上，这个现象是指出异途同归于起初的合一的可能；这起初的合一，也是他们各宗派的最终目的，因为走天路的旅客，至终会抵达目的地，正如主为他们向神所作的祷告一样：“我在他们里面，祢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来，也知道祢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 17:23）

第十三章 循道会及国外布道工作

一六三八——一八二〇年

十八世纪英国的情况——韦尔斯的复兴——暂设学校——成立团体——牛津的“圣洁会”——韦斯利夫人——韦斯利约翰和查理前往乔治亚州——韦斯利约翰回国与薄勒会面——用信心接受基督——访纡仁护特——威特腓德——在京士活(KINGSWOOD)向矿工传道——韦斯利约翰也开始露天布道——普通信徒担任传道工作——奇异的现象——大复兴——韦斯利查理所写的诗歌——摩利维亚教会与循道会分道扬镳——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分歧——会议——循道会派脱离英国教会——分裂——复兴运动带来的益处——国外布道的需求——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富勒耳(ANDREW FULLER)——差会的成立——差会与教会间的分别——哈尔登(HALDANE)兄弟——詹姆斯哈尔登在苏格兰传道——教会会议反对——大批人民听见福音——在爱丁堡(EDINBURGH)成立的教会——传教自由——浸礼问题——哈尔登若伯特往访日内瓦——查考罗马书——日内瓦信徒守主餐——教会成立。

十八世纪期间，英国人民普遍漠视宗教，道德衰败，情况恶劣不堪，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关注。当时上流社会的人士，浸淫酒色娱乐，道德废弛，而下层的劳苦大众，亦放纵无知，留连罪中。教会人士，除少数人外，在灵性和德行方面，也不比普通人强。宗教出版物内充斥着无神论调，内容混杂；酗酒的情况很普遍，暴力横行无忌。为了阻吓罪行，维持治安，政府严厉施政，却无济于事；漠视法纪的人日多，监牢的情况恶劣，穷人困苦无告。然而，深藏在人的心中，正涌流着一股宗教的热忱；这潜流暂时受到社会纵容罪恶之风所掩盖。信徒在广大的群众中，显得人单力薄，一般人都亟须复兴，可是意志却消沉不振。

就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属灵奋兴，影响格外深远。韦尔斯的情况和英国的一样黑暗，加上教士和牧师非属本土人，多是英格兰人，在民情及语言方面，都与当地人民隔膜脱节，因此情况更形不利。可是，在国立教会中有几位韦尔斯人，他们的表现与众不同。兰维彻斯(LLANVACHES)教区长若他(WILLAMWORTH)在突然悔改醒悟后，开始传扬生命之道，吸引了不少心灵饥渴的人，结果聚会的地

方无法容得下这么多听道的人，他只好移到户外聚会，甚至到教区外主持聚会；他因此被革职。一六三八年，他自行成立信徒聚会。深受他的影响的人中，包括克拉铎(WALTER CRADOCK)，他原是卡迪夫(CARDIFF)的副牧师，他亦因此被逐出教区，后来他周游四方传道，并加入了公理会。普立乍得(REES PRETCHARD)是得着救恩之道的人中之一；前来听他讲道的人很多，他亦只好在室外聚会，因此被宗教法庭所传讯，但因为有人在幕后支持他，他就得以继续传道，并可一直留在英国教会内。另外一位韦尔斯籍牧师钟士(GRIFFITH JONES)，在十八世纪初期，早已在韦尔斯作了不少善工，使人心预备好了来迎接那要来的大复兴。他在自己教区内传道时，发现人因为自己不能阅读圣经，而致灵性不能获益；于是在友人的协助下，他雇用了一些教师，巡游各地开设短期性的学校；后来又因缺乏合适的教师，他开办了一所教师训练学校，只收纳那些坚守属灵原则的信徒，他们多是不奉国教的人，年龄不一。他们虽然受到教会人士所反对，但并不气馁，反而庆幸自己有此受训练的良机。这个复兴运动给全国人民在德性及行为上，都带来了更新。在这些训练学校开办了二十年后，钟士去世；到此时为止，曾在学校工作的信徒有三千五百多人，而韦尔斯的居民有三份之一曾在这些学校里攻读。

与此同时，有一位青年人叫哈里士(HOWEL HARRIS)，在未受按立前，就开始传道，教会因此拒绝给他按立，但他并未因此受阻吓，仍然继续传道，或在户外，或逐家谈道，一面殷勤作工，一面仍保留国家教会的教友身份。福音果效甚大，许多人悔改归主，生命起了极大的改变；原来死气沉沉的家庭聚会，变得生气勃勃。有好些人协助哈里士作工，其中有牧师，亦有平信徒。为了使归主的信徒继续受造就，他们成立信徒的团体。此举不出所料，马上受到国立教会的人士反对；由地方政府及国立教会牧师所发动的暴徒，肆意侮辱护骂这些传道者。这些传道人中，不少是满有恩赐的，其中包括饶兰斯(DANIEL ROWLANDS)，他本人原是个牧师，因为在自己的教区外传道而被革职。他前往兰质多(LLANGEITHO)讲道，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来听道；听众来自远近各地，都深受他讲道所显出的那股难以言喻的能力所感动。这项在韦尔斯的复兴运动，不久就与在英国所发生的同样性质的运动汇合。整个韦尔斯人民的道德情况，为之改观。这些复兴的现象，并非是昙花一现，因为直到如今，韦尔斯的灵性低沉的情况，已一扫而空；当地人民灵性的深度和影响，是世人所熟知的。

牛津大学有一小群学生，在一七二九年开始自行成立聚会，讨论他们所面临的灵魂得救和为荣耀神而活的问题。这些聚会，备受大学内的师生们所嘲讽。聚会的学生，在行为生活上，均与别人不同：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常往探视狱中囚犯及病者，乐意周济穷人。他们被称为“圣洁会”，或称“敬虔会”，或称“热心派”，或称“循道会”。发起聚会的人，包括韦斯利约翰及查理两兄弟，后来又有威特腓德加入。

韦斯利兄弟的母亲，为人不凡，这两兄弟出色的表现和产生的影响，多归功于她的教导有方。她丈夫是个牧师，那大家庭的儿女们和家人，均由她教养及管治。她不但悉心教养儿女，且在丈夫因工作离家时，经常召聚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仆人们把这样的聚会张扬出去后，不少人请求来参加，聚会的人数渐增，有时多至二百人，一起挤在房子内读经祷告；有时因地方面积所限，不少人不得入内，只好望门兴叹。后来有人批评她所为与妇人的身份不相称，而且向她的丈夫投诉。她向他分诉说：“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是这大家庭的主妇。……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负起照顾各人灵性的责任，就如那位天地的主所交付给我的托付。……我不明白为何因此会使你蒙受不良的影响。你的妻子不

过是尽力领人来聚会，以免他们在主日羞辱神的名。在聚会中，我向他们读圣经及其它的教训。至于我，我不在乎这些人的指责，我早已脱离这个世界，我也衷心地希望自己不会招致非议。至于说我这样作，显得奇特不寻常，那我也只好承忍。其实，差不多每一件严肃的事都是不寻常的，尤其是以让神得着荣耀的事，或是叫人的灵魂得救的事。……只有一件事使我最感不安的，就是这些人来参加我们的家庭祷告；我并不担心什么，因为那蒙伟大圣洁的神所呼召的，就是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讲解圣经，也无须自惭形秽。但我深感不安的，是以女流身份来献上神子民的祷告，我怀疑这样作是否合宜。上一个主日，我原想在祷告前就把众人遣散，但他们切切恳求要留下来，我又不忍拒绝他们。”

韦斯利兄弟受按立为牧师以后，二人和其它两位信徒，一起出发往美洲的乔治亚(GEORGIA)。但是，当时他们俩心中仍在寻求自己灵魂得救的答案。在船上，他们遇见一批摩利维亚信徒；他们所表现的谦卑、和平和刚强，使约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乔治亚勾留的期间，切切实实地过舍己克苦的生活。可是工作未见有何果效。他灵里感到十分的痛苦，就回到英国去。以后他追忆说：“我往美洲去领那些印第安人悔改归主；可是，谁又能使我清楚得救呢？”他回到了伦敦（一七三八年），又有机会与摩利维亚信徒接触。在“值得纪念的某一天”，他认识了从德国来的薄勒弟兄，两人相谈甚久。后来他忆述说：“因着这番谈话，使我深知在那伟大的神手中，我是何等的不信，缺少了那能叫自己得救的信心。”他征求薄勒的意见，看看自己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否应该停止传道。但薄勒说：“不可！你要传讲信心之道，直至自己也得着为止。以后，自己既有了信心，就能放胆传讲信心之道。”因此，约翰继续向凡所遇见的人，传讲因信得救的道理，但他自己却仍不能明白人如何能因信就立刻可以得救。于是他查考使徒行传，看看以前有没有人因信就立刻得救的事例，没料到 he 发现了差不多所有信的人，都是因信得蒙拯救。但他又以为这样的事，只能在基督教早期的时候发生，而当时已物换星移，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可是，他却看见周围的人的经历，都是因信立刻就尝到救恩的滋味，因此他最后也学会了用信心来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

他的兄弟查理，和其它同工，见他在工作多年以后，还说自己还没有得救，因此对他大大生气。可是后来他的“兄弟和薄勒有了一次特别的交通以后，眼睛明亮过来，明白了那唯一使人得救的真理，认识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的道理。”

接着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让这一小群的信徒每周在一起聚会，彼此认罪代求。韦斯利约翰在伦敦各教会内，专心传讲“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叫人白白称义得救”的道理。结果每次讲道完毕，都受到人的警告，不许他下次再去讲道。

他后来前往纒仁护特，参观摩利维亚弟兄们的小区组织，他见到了亲岑多夫，又与其它信徒有交通，内心大大得着激励。他回到英国以后，继续到处传道。后来到了布里斯托(BRISTOL)，重逢威特腓德。

威特腓德出生于告罗斯达(GLOUCESTER)（一七一四年）。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他在家中排行老么，志愿是当牧师。他得了友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在品伯鲁学院(PEMBROKE COLLEGE)攻读，并作工读生。在求学的期间，他切切寻求救恩，经历了一次难忘的属灵经历。他参加了“圣洁会”，经常克己禁食，以致健康衰退；他又勤读圣经；后来他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读神的圣言，在一个月內所获得的真知识，远胜我多年来阅读许多其它著作所得的。”他认识并经历了因信称义以后，亟想传道；后

来他给按立为牧师，立刻就开始工作，效果宏大。传说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感染力极强，甚至使十五个听众的表现失去了常态。他讲道的恩赐，从一开始就显明出来，人人蜂拥前来听道。有一次他在布里斯托讲道，题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本质及必要”，引致告罗斯达、布里斯托及伦敦等地的大复兴。他有一段短时期去了乔治亚，创立了一所孤儿院。回到英国以后，他发现逐家谈道的方式，使当地的教会大感不满。结果他不获准在教会内讲道。有些朋友劝他，说：既然在美洲时他曾向印第安人传道，他大可以向在布里斯托附近的京士活(KINGSWOOD)的矿工传福音。后来他追忆说：“既然他们不让我在教堂内传道，而那些可怜的矿工却因无知的原故而正在沉沦，我就决定去向他们传福音。我在一个小山丘上，向二百多名矿工传讲得救的真理。感谢神，多年的属灵冰封的雪地因而溶解，我也得着了这工厂。……我相信我的创造主喜悦这样的事奉。我在山上讲道，天上传声共鸣，正如当日犹太人拒绝福音，主就差遣仆人大路上和篱笆那里去请人来。”第二次讲道时，有一万人来参加，他声音洪亮有力，讲了整整一个钟头，字字清楚，每一个人都听得见，他说：“我首先发现他们受感动，是因为看见这些刚从矿坑里出来的人的那给煤烟熏得污黑的脸上，给泪水冲洗出两道洁白的泪痕来。成千上百的人从心底里切实相信，事后他们的表现，证实他们的悔改是真挚的。”

威特腓德立刻把韦斯利约翰请来帮助他一同工作。约翰素来赞成在教堂里聚会。他后来说：“我晚上到了布里斯托，见到了威特腓德。起初我实在难以接受这种在田野讲道的奇特方式，他先在主日给我示范。我一生都是坚持一切的事情总该按次序作得体面，（这个看法，我到了最近才放弃。）差不多认为如果事情不是在教堂内作，就连拯救人灵魂的工作，也算是犯罪。有一天晚上，（威特腓德离开那里往别处去了），我向一个在尼古拉街(NICHOLAS)每周聚会一两次的小聚会，讲解主的登山宝训。（这可说是在野地讲道一个美丽而突出的先例，虽然当时亦有不少会堂。）翌日下午四时，我放胆作了一件人所不耻的事，把救恩的大喜讯息带到大路上去，我在城外不远的小丘上向差不多三千人讲道。”

就是这样，藩篱消失了，福音在全国境内自由传播，并且满带着圣灵的能力，锐不可当；来听道的人，有时数以万计。悔改的人，不但有最卑贱的囚犯、或贫民窟里的穷人，也有上流社会的人士，尤其是当杭丁顿(HUNTINGDON)伯爵夫人亲自出面协助福音的推广以后，情形更明显。当时能传福音的牧师奇缺，神反而是兴起了许多普通的信徒负起这个任务。韦斯利约翰起初表示不赞同，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兴起了这些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其中有些如纳尔逊(JOHN NELSON)，他全未受过教育，但却满有属灵的经历和大能，为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在起初的时候，聚会内常常出现奇特的现象。听道的人，在得着身体灵魂的释放前，有时会倒在地上混身抽搐；有人在痛悔中大声喊叫，有时甚至发出恐惧的呼叫；也有人狂野地满口褻渎的话。传道人四面受敌，甚至有些暴徒袭击他们和那些承认主名的人，使他们的身体和财产蒙受损失。可是信徒们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及柔顺，连他们的仇敌也受不了。

韦斯利兄弟俩和威特腓德，及其它的传道者，不停地四出奔跑，风雨不改，走遍了英格兰及苏格兰。最大一次的复兴，是在威特腓德在苏格兰讲道以后引发出来的。在爱尔兰，不论南北，福音果效一样的显著。威特腓德屡次远访美洲新英格兰，福音的大能在那儿同样地显明出来，后来他在该处工作的期间去世，时为一七七〇年。韦斯利约翰不屈不挠地劳苦作工，直至一七九〇年他年届八十八岁高龄的时候；他至死也“并没有半点衰老的现象”。临终前，他用尽气力举起双臂，大声向围在他床前

的人，重复说了两遍下面的话：“最大的福气，莫过于神与我们同在。”

韦斯利查理在传道的恩赐方面，虽然及不上他的兄弟，但他也一样的劳苦作工。他给教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所写的诗歌，他一共写了六千首以上，其中有多首优美如诗，属灵价值也极高，为圣诗中之佼佼者。诗中的文句，不但辞藻精美，而且都是讲述圣经中的主要教训，抒发灵里敬拜的深意，适合那些受神的灵所感动的信徒用以表达内心的爱慕和赞美。韦斯利兄弟俩发现信徒从诗歌中的文字所领受的，比从圣经中直接吸收的更多，因此他们所写的诗歌，多以教导为目的。

当时为神国作工的人众多，不免在某些见解上会各持异见。他们一旦重新抓牢了神的话所显明的真理，而且这些真理又是为人遗忘了多时的，有人就会偏重真理的一面，而另有人强调另一方面；各人很自然地会高举自己所见的，怀疑别人所领受的。虽然圣灵给赐下来是要领众人进入真理，但是，并不是每位信徒都能完全地得着。事实上，神的启示如此丰富浩瀚，往往叫人只能领会片面的真理，因而产生了不同的领会。

韦斯利起初虽曾从摩利维亚教会得着很大的帮助，但他后来在好些见解上，渐渐的与他们分歧。他们在历史上与波希米亚弟兄会的关系渊源，使韦斯利认为他们趋向神秘主义和敬虔派的作风，与他本人的讲求现实和进取的精神格格不入。一七〇二年，那个原在费达巷(FETTERLANE)由摩利维亚弟兄会和循道会信徒联合的聚会，开始分裂。摩利维亚弟兄们仍留在该地聚会，而循道会则迁去一个名叫“访得理”(FOUNDERY)的地方。

很早的时候，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在信仰上的见解就开始不一致。威特腓德在神的拣选的说法，接受加尔文的见解，而这一点却是韦斯利所坚决反对的。当威特腓德在一七四一年由美国返回英国后，他公开传讲“一般救赎”的道理，在访得理讲道时，韦斯利在座他也毫不讳言。杭丁顿伯爵夫人赞同威特腓德的见解，而当时遍及英国的循道会组织，均奉行韦斯利的教训，属于亚米纽斯派；在韦尔斯的教会，却属加尔文派，可说是与“杭丁顿伯爵夫人那类人有关的”。

这些在见地上的分歧，却没有使韦斯利和威特腓德因此反目。他们分别同样传讲因信称义的真道，大有果效，引领许多人悔改归主。虽然两人讲道的作风也大不相同，但所传讲的，仍是同一的真理，因此果效没有分别。威特腓德口才流畅有力，激烈生动，闻者动容；有时他因见无数灵魂急须拯救而不禁泣不成声。韦斯利的讲道，则条理分明具说服力，虽然内容多属解经的性质，但就算是粗野的小民，也深受吸引。

韦斯利归属国立教会的决心，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拦阻了他未能清楚领受圣经中所论及有关神的众教会的教训。他在传福音的事奉中，也从来没有考虑依照新约圣经的原则成立教会。可是在一七四六年，他说过下面的话：“在路上的时候，我在圣经中读到论及早期教会的话；虽然我因本身的教育背景，心中常存偏见，但我仍能立刻领会早期教会的样式不失为完美正确的蓝图。假如这是对话，那么监督和长老，基本上是同一个职事，而且早期的教会，每一个都是各自独立的。”为了使他的工作成果能维持永久性，他组织了“会社”，声明这些团体内的成员，并非是信徒，只是寻求真理的人；他们彼此相交的根据，亦非在信仰上，而仅属实验性质。加入组织的人，都是那些希望得救而且要逃避将来愤怒的人。这些人可以自由参加各处聚会，也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不许彼此讨论或争辩。一七四〇年，有一位成员就因为争辩神的选召和撇弃的问题，而被革除。

韦斯利常常会在合适的时机把组织整顿一下，清除那些不合宜的份子。他一直控制管理这组织，并设立纯粹由牧师组成的“总议会”(CONFERENCE)，以备在他死后继续负责治理。他原想将这些活动限制在国立圣公会的范围内，但没有作成功，原因一方面是国立教会排斥反对他们，另一方面是根本不可能把这股新生命的力量囿限于人为的范畴内，因此结果这些团体不得不正式脱离国立圣公会。

总议会要维系这些循道会的组织，却有心无力。总议会既然是由牧师组成，自然就要起而维护本身的权益，坚决拒绝普通信徒参加，结果便产生了“新循道公会团体”(METHODIST NEW CONNEXION)，后来却因要管制露天公开布道，意图将一些未经同意而擅自举行的“营幕聚会”的人逐出去，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便又成立了“原始循道派”(PRIMITIVE METHODIST)，他们表现得十分活跃和热心，以后继续发生冲突及分裂，总议会也只好逐渐改变作风，认可一些起初反对成立的新组织。

这些充满活力的团体的成立及成长，并不是十八世纪的人灵性复兴的唯一结果，也不是主要的成果。最大的成果是在人心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改变了全英国及美洲的人民的德性和风尚，唤醒了许多人起来寻求公义，摒除恶俗，解救受困苦和压迫的人，形成了一股推动社会更新的力量，促成更合理的司法制度、实行信仰自由、鼓吹解放奴隶、改善监狱的情况、推动海外布道的工作，连国立教会本身也蒙受益处，信徒开始热心传道，以往歪风陋习，一扫而空。其它的公会，例如浸信会及公理会，也因着这次普遍的复兴而受益，大幅度的扩展他们的活动。

主吩咐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是经过了十多个世纪，主的命令始终未能实现，还有数以亿计的人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这个事实，在历世历代中一些基督徒的心中，成了重负；也有一部份信徒曾尝试往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到了这时，这个重负因人的灵性复兴而更形强烈，信徒爱主及爱丧失灵魂的心，又如火挑旺起来。在这一方面，克理威廉(WILLIAMCAREY)的贡献最大。他原是鞋匠，也是茂尔顿(MOULTON)特别浸信会的牧师。他在该小村中胼手胝足以维持生计，自修各种语文，并收集世界各地的异教徒的国家的资料。在他的工作间的墙壁上，张贴了一幅用纸拼凑起来的世界地图，其上列明各国所在及一切他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这幅地图就是他的祷告对象，也是与人交谈或讲道的题目。

有一次，在诺咸顿(NORTHAMPTON)召开的牧师会议中，青年的弟兄们有机会提出题目来讨论。克理提出下面的题目：“交付给使徒要向万国传福音的命令，附带同等重大的应许，各时代的传道人应否遵行，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题目却被认为完全不合宜，给搁置一旁。当时这群牧师属极端的加尔文派，并不认识顺从遵行基督命令的必要。

后来安德烈富勒耳(ANDREW FULLER)的讲道，协助解除了这些阻力。克理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探讨基督徒带领异教徒归主的责任，并论及世界各国的宗教情况、以往传道工作之得失、及将来工作的实际问题”。在文中，他列举了各项原则及引述过去一些人的布道成果，然后就详论反对国外布道的人所提出的问难。有人指出某些异教徒的“野蛮和没有开化的生活方式”，他就说：“这一点绝对不应引起任何难处；只有那些耽于安逸的人，才会介意这些引起不便之处，使徒们和他们的后继者，往还没有开化的日耳曼人和高卢族、甚至在不列颠人当中去传福音，并没有感到有何难处；他们并没有等待这些古老的民族部开化了，才去引领他们归向基督。他们的前往的时候，只带着十字架的救恩。”他们“发现这些异教徒衷诚地接受福音，产生了美好的果效，这是以往欧洲人在还没有向他们传福音

而与他们沟通了多年所不能获致的。”他提议到国外布道时，最低限度要两个人一起去，以已婚者为佳。同行的人，最理想是具备农作知识或其它实用技能，而且最好能迅速发挥所能，以供应所有同工的需用。他又论及这些传道者所该具备的属灵及其它条件，然后说：“借着神的祝福，有人因此归信得救以后，最好是激励他们早日显出各种的恩赐，因为他们谙熟当地语言及风俗，这些条件大有助于福音的传扬；而且他们在行为表现上的改变，也能大大的加强福音的见证。”

一七九二年的牧师会议在克特令(KETTERING)一位寡妇家中举行时，即席成立了三个向外地布道的团体，他们委托十二位信徒草拟工作目的的简要说明，并签署通过。数月后，克理威廉就启程往印度；同时，富勒耳也尽心尽力唤醒英国的信徒，负起往全地去传福音的责任。

起初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慢慢的已迎刃而解。这些布道活动所带给印度和英国的属灵福气，也印证了工作的成功。福音的果子在印度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已是七年后的事：克立什拿(KRISHNA PAL)和他的全家接受了基督作救主，他不但成了有力的福音使者，而且写了许多圣诗。

对海外布道工作的热忱，引致了一七九五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成立。起初的时候，这个组织并不属于任何宗派，但不久以后，它归属了公理会。一七九九年，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也扩大活动范围，其它的宗派也纷纷仿效。

这些布道团体忠心的作工，在世界各地结出了美好的果子，他们的活动记录，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些史实。可是，这种向外布道的方式，不免引起了这些在异教徒当中工作的欧洲人彼此分裂，影响了宗教活动的开展，也削弱了福音的见证，并引起各式各样的传道差会纷纷成立，各自为政，另一方面，独立教会却忽略了向自己国人传福音的任务，失去了使徒时代众教会的见证样式。

哈尔登若伯特(ROBERT NALDANE)和詹姆斯(JAMES HALDANE)两兄弟，他们是出身于苏格兰的富豪望族：年青时在海军服役期间，成绩卓越。两人信主后，殷勤研究查考圣经。詹姆斯在他婚后曾忆述说：“当我成家以后，就开始在安息日的晚上在家中聚会。我起初并没有意思要多举行聚会，因为担心会给亲友们取笑。但后来由于责任心的驱使，我就决定敢为每早晨聚会。有一段日子，聚会是在房子后面的一个房间举行，以防有外人闯进来，但慢慢地，我克服了对人的惧怕，心里迫切要使家人得教导，因此我就开始对他们讲解圣经，内心感到十分快慰，主也藉以操练我，准备日后作公开的传道。……后来我开始心里暗暗爱慕传福音的事奉，盼望自己能有机会为主作工。我开始求神差遣我往葡萄园去，并使我准备好自己。心中这个祈望愈来愈强烈，虽然自己对这个心愿的实现，一点把握也没有，甚至有时在祷告中，自己不信的恶心会告诉自己：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并无意到大路或篱笆那里去向罪人传讲基督，可是心里总存着一点渺茫的期望，相信主必引导。”

不久以后，他和其它的一些信徒，开始在一个荒废了的矿场小村中传福音。聚会通常由牧师主持，但有时牧师不能抽身前往时，就由普通信徒负责。有一个晚上，牧师没有来，詹姆斯就代替他传讲，这是他第一次传福音，时为一七九七年。以后他和其它的弟兄们按时出外传福音，数年之间，足迹遍及苏格兰及更远的地方。

这些传道人通常以马车代步，满载福音单张出发。福音单张不但是他们自己所写的，而且也是自己动手印刷分发。所到的各地，如果可以借用教堂，就在教堂内讲道，不然的话，就利用学校或其它

建筑物，但多半时候是露天布道。听众数以百计，有时甚至数以千计；福音的见证大有能力，许多人悔改信主。当时人民的属灵需要甚大，可是由普通信徒领聚会的方式，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不寻常的传福音方式，也吸引了不少人来听，并且深为传道者的真挚诚恳所感动。

在阿伯丁(ABEREEN)举行的苏格兰国家教会议会，通过谴责“那些不用教堂，四处流动工作的传道人和主日学”，指斥他们“非宗教性和漫无纲纪”的行径。同时大会议决：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自行传道，或作主日学的教师。后来大会又指斥那些传道差会，警告教友：若不是国家教会的人传讲教训，“不得赞同或参加”，又将拒绝遵从教令的人逐出教会，其中包括他们当中一位颇有恩赐的牧师。在另外的一次会议中，又宣告“牧师不得容许没有在大学里选修哲学及神学的人及未获批准讲道的人，在教会内讲道”。但是许多信徒对这些禁令，置若罔闻，反而引起了他们去听真正相信圣经的信徒讲道的兴趣。

詹姆斯在为自己及同工们辩白时，说：“我们不要叫人误会，……以为凡跟随耶稣的人，都该离开赖以维持自己生计的职业，转为专一的传道。基督徒养家活儿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认为基督徒都有责任随时向人传福音，抓住机会劝醒罪人要逃避那要来临的愤怒，指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管他传福音的对象是两个人，还是二百人，在我们看来，他实际上是个传福音的使者，是报好消息的，这正是所传的道的真正意义。”……“目前宗教情况低沉，我们就有充份的理由到大路和篱笆那儿，尽力劝导罪人抓紧福音摆在他们面前的盼望。”传道的人极力强调因基督的死和复活，每一个人都得以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他们所到的各处，发现人民属灵的情形陷于低潮，但各人心中却极渴慕真理。他们到远在北方的克俄尔(KIRKWALL)的嘉年华会传福音时，每天有三四千人来听道，在主日的听众，更多达六十人。

有一位听众，在传道的人邀请立志归信的人走到前面的时候，他为了好奇，也走到前面去。后来他描写当时的感受如下：“哈尔登上尉骑着马来到会堂，下了马，把马交给站在一旁的绅士。那时他还年青，不到三十岁，身披蓝色大衣，领襟镶边时款，脸上扑粉，头发后束极尽绅士气派，但当他用了亮有力的声音，开始向那些慕名而来的听众讲道时，我永远不能忘怀当时的感受。他言辞简洁，却满了能力，撼动人心。那慑人的力量，叫我不敢打盹，甚至回家后就整晚不能入睡。我当时的感受，实在是毕生难忘。虽然在数年以后，我才真正的接受福音，但经过了那天晚上的经历，我不再像以往那样漠视永生的事。”

这些福音的善工，和基督徒灵性上的复兴，引起了众人开始研究以后如何继续实行圣经的教训的问题。哈尔登兄弟俩，和其它几位同工，受到国立教会内一些不信的组织所压抑，于是决心离开，与一群神的儿女一起聚会，在爱丁堡建立了教会，一开始就有三百多位信徒参加，并且人数迅速增长。他们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按立詹姆斯为教会的牧师；若伯特在爱丁堡及其它地方，安排了宽敞的聚会场所，又称“会幕”。他们相信新约圣经吩咐信徒今天所该遵守的教训和原则，因此在七日的头一日守主餐，又停止在聚会中收集金钱奉献的惯例，而由各人各按能力供应教会一切的所需。这一切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发展的。若伯特说过：“开始的时候，我教导人每个月举行一次纪念主，后来却领受了圣经的教导，相信应该是每周该有一次。……我和几位弟兄先开始这样作，……然后成立教会。我现在相信：在原来没有基督教会的地方，任何基督徒都可以仿效我

们的作法。……我起初认定，教会是不该与世界相交，但可以接受他们的金钱的。现在我想到自己竟会有这样的主张，就不禁满脸羞惭。”

他们渐渐的开始明白，如果没有人为的拦阻，圣灵就能自由运行，显出各种的恩赐来。以后，他们熟习了圣灵在信徒当中运行的实际，获得了极大的喜乐和能力。

那些年间，哈尔登詹姆斯颇为婴儿受洗的问题所困扰，他的心中存着怀疑，但他一直把问题撇开不谈，部份原因是恐怕在这问题上多花心思，会影响他的事奉。可是，终于有一天，在良心的催迫下，他不得不拒绝给婴孩施洗。不久以后，他自己也受了浸。他的兄弟和别的同工，也因领受了同样的真理而先后受浸。当他们决定这样行以后，并没有觉得要因此而离开弟兄姊妹们的必要，因为他们相信信徒之间，要彼此容忍不同的意见：他们也希望教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分裂。可是，虽然他们竭力要保持合一，结果教会仍不免引起分裂，大部分信徒仍旧继续聚会，其中有受浸的也有不受浸的；各人却保持着同心，在这事上彼此容忍。有些人却离开了，另外设立聚会，但仍用相同的形式，不行施浸，依旧给婴孩施洗；此外有些人索性回到国立教会内，或加入其它的教会。

教会如此的分裂，实在是叫人痛心。当时大部份的聚会场所，均属哈尔登若伯特的产业，因此引起的难处不少，而圣经学校训练信徒作传道人的工作，也更形艰巨。剩下来继续聚会的信徒，虽然痛惜多人离去，可是继续坚守见证，因此继续不断地蒙福。

哈尔登若伯特在百忙中，仍念念不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因此在一八二八年，他和妻子往欧洲大陆去。他们并没有亲友在那儿，也不能作出什么计划，甚至拿不准自己能逗留多久。在巴黎，他们认识了一些朋友，因而把他们的脚步带到百伦(BERN)和日内瓦。他们在日内瓦找不到好机会，正要离开的时候，偶然邂逅一个在念神学的青年学生，这个结交改变了他们离去的计划，令他们在日内瓦停留了两年之久。他们彼此的交谈，使这神学生深受感动：翌日，他把另一位朋友带来。这两个青年人正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得救的途径，也完全不熟识圣经，因为他们虽然研究神学，接触的书籍都是不信神的哲学家所写的。他们受了哈尔登若伯特的教导，心里顿时明亮过来，知道自己对圣经和得救之道一无所知，因此十分渴望能继续得着教导。若伯特就是这样决定了留下来在日内瓦工作。

当时日内瓦的人民灵命枯竭。以往瑟维都所散播的异端，并没有因他本人被焚死而消失；同时，神学院里的教授，和日内瓦教会的牧师，又深受苏西尼主义和亚流主义的流弊所影响。

哈尔登若伯特在摩里斯旅舍(PLACEMAURICE)下榻。在一个大房间内放置了长桌，开始了经常的查经聚会。神学院的教授虽然明令禁止学生参加这些聚会，但每次前来的人，总有二、三十，查考圣经时，他们参照各种不同语文的圣经版本，而若伯特的讲解，则由别人作翻译。

他详细讲解罗马书，将其中的教训与圣经内的其它书卷互相参照。他对圣经全备的知识和坚定的信心，使听的人不但感到新鲜，也深受吸引。这些读经聚会，使学生们蒙受了极大的属灵福气，其中有好些很有恩赐的，而且也很忠心，后来为主工作，十分的出色，影响至大，可见这些读经交通的成果和贡献实在难以估计。从他们当中出来的有：圣诗作者马兰(MALAN)，历史学者道碧尼(MERLE DAUBIGNE)；以后还有模诺得(ADOLPH MONOD)，耐夫(FELIX NEFF)，及其它的人，他们把他们所学习的真道，带回去说法语的地区及更远的地方。这个查经聚会，受到当地教会的反对，虽然若伯特并没有因此停止聚会，可是那些受过造就的牧师和学生，却因此受了不少苦；有些人被迫辞去职位；有

人被逐出教会；甚至有人因此要出国流亡。

若伯特在日内瓦的工作，只止于福音真道和教会真理的讲解，以后他就离开那儿。虽然有人知道他曾受浸，但他却一字不提，或许他在苏格兰所曾遭遇的经历，使他感到沮丧，他就不愿再提。他到了法国，在孟投本作工，当地亦有抗罗宗教会所办的神学院。他在此地的工作，类似在日内瓦所作的，开始了以后，便交给别人继续主持下去。在日内瓦有一个年青的牧师，为了遵行真理而受苦，他就是马兰。

马兰是最初在国立教会外自行聚会守主餐的十个信徒之一；此外有高信(GAUSSEN)。他在追述当时的纪念主聚会时，提及在场的信徒名字，有：毕德(PYT)，美乍涅尔(MNJANEL)，根提亚(GONTHIER)，归亚斯(GUERS)等。他说：“聚会的情景使我联想起在一五三六年另一次的纪念主聚会，由耶稣的一位门徒归仁(M·JEAN GUERIN)带领；那是日内瓦抗罗宗教徒第一次纪念主的聚会。”

教会成立以后，其中有一个聚会的地点，是在主教座堂的附近，在那儿所带出来的福音见证，吸引了不少人来听道，并且多人悔改归主。归亚斯、毕德、根提亚及其它信徒，也在从前弗若敏办学校的地方举行聚会。当年弗若敏的工作，引起了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另外一位神学生威韦亚(DU VIVIER)，在卡露(CAROUGE)礼拜堂内宣讲主的神性、人堕落的本性、和主的救赎大工，被人斥为无稽可耻。为了防止同类的事件再发生，当局立例规定所有神学生的讲道内容，必须经由神学院内三位教授检查通过，才可以站上讲台讲道。

第十四章 西方

一七九〇——一八九〇年

坎伯尔多马(THOMAS CAMPBELL)——“宣言”——坎伯尔亚历山大(ALEXANDER CAMPBELL)——百鲁舒仁(BRUSH RUN)的教会——浸礼——“有关律法的实训”——联邦循道宗信徒改称“基督徒”——浸信会信徒称为“基督徒”——史顿(BARTEN WARREN STONE)——奇特的复兴现象——春田长老部(Spring Field Presbytery)成立及解散——给恩列治(CANE RIDGE)的教会——基督教会团体(CHRISTIAN CONNECTION)——改革派与浸信会分离——基督教会团体与改革派联合——悔改的本质——司各特(WALTER SCOTT)——受浸使罪得赦免——尔捏特(ISSAC ERRETT)的见证

坎伯尔多马(THOMAS CAMPBELL)原是北爱尔兰某个脱离国教的长老会的牧师，他为了健康的理由，来到了美洲（一八〇七年），受到当时费拉德尔菲城(PHILADELPHIA)的教会总会所欢迎，后来给差遣往西宾夕维尼亚州(WESTPENNSYLVANIA)工作，他所表现的超凡恩赐和灵性，使他大受欢迎。可是有人怀疑他是否真诚的向“脱离国教的教会见证”效忠，因为他声称唯有圣经是信心与行为的真正根据，他并不热忠于当时众教会中所盛行的宗派精神。

他被差派到居民稀少的亚勒根尼(ALLECHANY)山区工作。在举行主餐聚会时，他接纳了一些不属于“脱离国教派”的长老会信徒，因此他受到了批评。他根据圣经的原则起而自辩，结果受到了教会内的人士所排斥，于是他索性脱离了该宗派。

许多来自不同公会的信徒，继续参加他所主持的聚会。这些信徒，对当时教会内部分裂的现象，极感不满；他们同意坎伯尔所说的一一教会要合一，就必须先回转到圣经的原则上，而且要明确信仰和意见之间的分野，才能使信徒学会彼此容忍，进而遏止四分五裂的趋势。

这些信徒在华盛顿附近举行了一次会议（一八〇九年），讨论如何实行他们的信仰原则。坎伯尔多马提醒信徒慎防分裂，并指出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圣经内神已明言教会的原则和标准，历世历代的教会都适用的，但人却在圣经的原则以外，创设各种宗教理论及制度，导致了不少争端，因此唯有回转到圣经的教训中，才能达致真正的合一。他提出下面的原则，作为指标：“圣经有明言的，我们就照样说；圣经没有明言的，我们就不说什么。”在座中有一位长老会的信徒就说：“如果我们依照这原则来行事，那么婴儿受洗就甬提了。”坎伯尔回答时：“既然圣经中没有提及婴儿受洗，那么我们就不要去作。”另外一位在座的，含忍不住，情绪激动得流下泪来，站起来大声说：“但愿我不会活到那么一天，竟让自己心里否定圣经那宝贵的话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一位脱离国教的知名信徒，立刻应声说：“在你刚才所引述的经文内，并没有任何指出婴儿该受洗的教训。”

尽管信徒之间明显地有意见上的分歧，可是大家却同心成立了“华盛顿基督徒联合会”(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并且委出坎伯尔多马，将该会的宗旨草拟出来，这就是后来经大家同意所发表的“宣言”。宣言中，说明他们相信任何人都不该因弟兄的原故而被论断，因此他也不该因弟兄的原故去论断人；各人要承担自己的过失，向神直接交账。每一个人都必须各自受神的话所维系，而不该受人的解释所捆绑和限制。他们对于分争，表示厌倦，决心采取行动，消弭分争。可是当他们在人为的意见和宗派主张的争论上，继续设法去找出路的时候，他们发现竟徒劳无益，于是只好回到基督，和祂那永恒不变的话语中去寻求答案，结果发现：唯有回到起初的样式，以神的话语为唯一的依归，这才能找到出路。他们并无意另立教会，只想成立一个组织，推动基督教的合一，和“纯粹福音的改革，借着福音的传扬，并按照属灵的原则去实行。”

当坎伯尔多马来美洲时，家人没有随行。他们计划在稍后时间才迁往定居。他的妻子是预格诺派信徒的后人，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 CAMPBELL)打算在脱离国教的长老会内，接受按立出任牧师之职。他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那段期间，获悉哈尔登兄弟的教训和工作，使他开始怀疑由总会控制众教会，是否有属灵根据；又使他开始相信公理会的制度，合乎使徒的教训。但他既身属脱离国教的宗派，并且尊重他父亲的意愿，因此未有作出任何表示，但内心却已背离了长老会的制度，因此到了每半年举行一次的主餐礼拜时，虽然他已获准可以守主餐，他却没有参加，因为想到自己既然不能再接受那种制度，就不愿意因此引起别人的误解和错觉。

后来到了他全家要迁居美洲的时候，他负责沿途照顾母亲和弟妹。船到了纽约，他们改乘马车继续前行，但坎伯尔多马一接获消息，马上前赴华盛顿与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再动身，途中互诉别后的景况。

坎伯尔父子两人却不晓得对方已脱离了长老会的组织，彼此都担心一旦表白了心迹以后，对方反应不晓得会怎样。但当他们获知两人分别均已因不同的原故而获致同一的结论时，感到真个是“异途同归”，深受激励，对主奇妙的带领，更满了感谢的心意。当亚历山大读到父亲所草成的“宣言”，并

获知他的教训与实行以后，发现与他自己所领受的推动教会合一的意愿，竟不谋而合。

坎伯尔多马担心“基督教联合会”会演变成新的宗派，或形成另一个新教会，因此决心让联合会的信徒，仍旧留在长老会内，享用信徒交通及同心事奉的机会，看看这样作是否可行。当时长老会大会刚好在一八一〇年十月在匹次堡(PITTSBURG)举行。坎伯尔多马便在会中提出要求，同时解释“基督徒联合会”的宗旨，希望大会准予“在基督教原则下信徒联合一起”，可是要求并没有获得通过，而联合会的活动反受到厉害的禁制。事实上，坎伯尔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将联合会的宗旨公诸教会内的人士，并澄清别人对它的误会。他心中明白，如果又加入任何宗派的话，就与回到圣经原则去的初衷大相违背了。

一八一一年，亚历山大娶妻成家，并协助父亲经营农场，成绩非常满意。后来坎伯尔多马离开了华盛顿，在附近另置农场，但事实上场务多由邻居负责，因为他的时间全部用在探访信徒和传道的事奉上。他的儿子工作能力过人，经营有方，可足湖口，并没有因经管农场而影响教会的事奉。

其它宗教团体对“基督徒联合会”的仇视日增，使弟兄们终于看清了：除非他们自己另立教会，否则无从过实际的教会生活。于是他们成立了“新约教会”。他们既然不能将任何已有的教会改变，就只好在这些宗派以外，另立教会，真正的活出新约圣经的原则，恢复圣经里的教会样式，促进真理上的合一。

“新约教会”在一八一一年，在百鲁舒仁(BRUSHRUN)郑重宣告成立，选立了一位长老，一位传福音的，和几位执事。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会擘饼纪念主，每周一次；信徒约有三十名。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使徒们的承继者。他们发现新约中所有的教会，为了教会得建立，都设立长老（或称监督），及执事（或称仆人），并且差遣传福音的到普天下去。按立的形式，并不表示授权的意义，只不过是见证被按立的人有权柄。牧师和普通信徒间，并无分别。至于受浸的问题，就东诸高阁，对婴儿受浸坎伯尔父子认为这礼仪已到了那个地步，大可不必再提了。因为那些已经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为何还要为所谓“加入教会的正当途径”而枉费精神？所以他们只为那些想要受浸的信徒施浸，可是在亚历山大的长子诞生时，婴儿受浸的问题又变得具体和实际了。他详细考查圣经，所得的结论是：除了给信的人施浸以外，新约圣经再没有别的有关施浸的教导，而且这也是主的命令，也是使徒所遵守的；受浸是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是不能搁置的。

一八一二年，坎伯尔亚历山大，和他的妻子，偕同父母和妹妹，还有其它两位信徒，在水牛溪(BUFFALO CREEK)受浸。这也是过去他们当中几位信徒受浸的地方。

这项行动，引起了其它许多宗派更多的敌视，只有浸信会派甚感欣慰，且提议百鲁舒仁教会与他们联合。当地浸信会信徒曾组成了教会联合会，称为“赤石”(REDSTONE)。他们虽然主张个别教会独立，可是牧师们控制了联合会大权，势力很大。百鲁舒仁教会的信徒，担心在与他们联合以后，会影响教会的自立性；加上该浸会联合会，曾采纳费拉德尔菲城浸会联合会在一七四七年的信仰宣言，其中有些教条是百鲁舒仁教会所反对的。可是，浸信会的信徒一般都爱慕圣经，行为敬虔，而且他们坚邀坎伯尔亚历山大在他们当中事奉；因此，百鲁舒仁教会经过考虑以后，将他们的信仰内容详细列明，交给赤石联合会过目。其中说及他们“反对任何限制基督教会合一与信徒相交的一切人为教条”，同时表示，如果能保有根据圣经教训来传道的自由，他们乐意与浸会联合会携手合作。这项建议，获得联合会大部份人通过，可是亦有人坚决提出抗议。

这些抗议，到了一八一六年在十字溪(CROSS CREEK)举行的联会大会时，更形尖锐化。大会中，亚历山大负责讲道，题为“有关律法的宝训”。他清楚的指出：信徒不再在律法以下，乃在基督里面，而基督是“在律法以外所显出来的义，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的”。他又指出：基督教范围内的好些习例，都是源出自旧约圣经；而新约圣经是旧约的延续及取代，我们亦从新约中得着福音和有关的教训。亚历山大这个领受，正好和当时浸信会信仰互相抵触，因此好些浸信会不再请他讲道。

十九世纪初期，发生了好些宗教运动，起因都是出于要脱离当时流行的神学思想，和宗教传统的催促，也基于要回转到圣经原则的渴慕，并相信运动能为信徒及教会在信心和实行的追求上，带来益处。

这些运动之一，源出自循道公会。美国独立以后，美洲的基督徒得以脱离国外因素的影响。当他们为教会管治的问题探索时，大多数人赞成采取主教制度，但也有一些人支持地方教会的方式，并盼望教会能恢复新约圣经时期的教会样式；但这一部份信徒乃属少数，这项提议遭受否决，于是他们决定脱离原来的聚会（一七九三年），在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和维琴尼亚州(VIRGINIA)另立教会，由奥克理(JAMES OKELLY)和其它传道人负责带领，起初取名“联邦循道宗”(REPUBLICAN METHODIST)，但不久后便废去这名称，也不采用任何别的名称，只自称“基督徒”，承认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又不设任何教规，单以圣经为根据。

不久以后，在浸信会内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有一位医生钟斯(ABNER JONES)，和一位牧师史密夫(ELIAS SMITH)，在东部几州建立了好几处教会，接纳任何宗派的信徒；只要他们信仰纯正，为人敬爱，就一律接纳（一八〇〇年开始）。浸信会的一些牧师，也加入了他们的聚会，在这新成立的教会中，兴起了不少有恩赐的传道人，把福音远扬各地，这些信徒，统统自称“基督徒”，专一遵行圣经教训。

在肯塔基州(KENTUCKY)的给恩列治(CANE RIDGE)，在十八世纪末期，有原属长老会的早期移居该地的信徒，盖了一所木房子，举行聚会，一八〇一年时，他们的牧师名叫史顿(BARTEN WARREN STONE)（一七七二——一八四四年）。

史顿在忆述自己经历的时候，说过下面的话：“这些年间，我在心思上总在思辨神学(SPECULATIVE DIVINITY)的范围内打滚。这种神学思想，也正是当时宗教人士的热门话题。……当时我相信世人全然堕落，不能得神的喜悦，只能等到圣灵作工，借着祂那全能奇妙的大能，人的灵才可以苏醒，内心更新；如此，罪人才能因信耶稣而得着救恩。我开始认定：神并没有在所有的人心内动这更新的善工，一定是有原因的；祂凭己意，拣选某一些人，在他们心中动工，却又撇下其它的一些人。……这个想法，是与神绝对的拣选和舍弃的权能分不开的，……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信仰。我既然承认人堕落的事实，也就承认神的自由拣选的意志，和自由舍弃的权柄，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许多时，当我……正在竭力带领人悔改及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一想到这矛盾的事实，里面的热心，不觉就冷了大半截，试想：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呢？他们怎么会悔改呢？他们怎能作出不可能的事呢？他们既然不能作，那怎么能定他们的罪呢？……有一天晚上，当我正在私下祷告读经的时候，心里反常地满了安慰平静，心里满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对世人的热切关怀和爱怜，与及盼望他们得救的迫切祈求。……连续几天，日以继夜地，我几乎不停地为失落的人迫切祷告。……后来我把这个经历告诉一位虔诚的信徒，并且冲口而出说：‘我何等爱罪人，假如我有能力的话，我就要把他们全都拯救过来。’

那位信徒听见了，似乎大吃一惊，回答说：‘难道你爱罪人的程度比神爱他们的心更深么？那为什么神不拯救他们呢？当然他是全能的。’我立时脸红耳热，不知所措，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马上退回去寂静的树林中，去默想和祷告。我不禁自问：神爱世人吗？神爱全世界的人吗？祂不是满有大能，可以拯救世人的吗？既是如此，所有的世人就都该得救，因为有谁能敌挡祂的大能呢？……我深信圣经所说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这么一来，结论不免就是如下：神并非爱所有的世人。可是，在我里面的灵，却如此热切的爱世上所有的人；那么，我这个灵岂非不是出于神的？会不会只是一个幻觉而已？……在祷告中，我在神面前俯伏，可是心里马上起了个意念：你是在不信中祈求，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你必须信，否则不能得神的喜悦。可是我没有信心；我不可能有信心，就如我不能造一个世界一样。那你就一定会给定罪，因为‘不信的必被定罪’。可是，难道因为我不能作不可能的事，主就叫我永远给定罪吗？我这样的胡思乱想，……心里竟然起了这种得罪神的心思，口里还差不多要说出来，一念及此，我混身冒汗如雨，地狱的火在我里面燃烧起来。……我在这种不寻常的状态下，混过了两三天，结果还是神宝贝的话语，把我从这混淆不安的紊乱心境中释放出来。从读经和默想中我领会到神实在是爱所有世人，而他却没有把所有的世人救过来，原因是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他们不信，不是因为神没有在他们身上行使他那全能的权柄，使他们相信，而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神在他的话语内给祂儿子所作的见证。‘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我因此领会了：神要求我们相信祂的儿子，是有理的，因为那些丰满的见证，足以使罪人心中生发信心；而福音的见证，也是充充足足的；人若相信接受，可以到基督那儿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救恩、和永生。这一点信心和真理的亮光，照透了我的心灵，把我从加尔文派的学说的迷惑和谬误中救了出来，使我得以进入福音自由的丰满中。”

在这个时候，史顿亲往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TENNESSEE)去，看看他所风闻的属灵复兴，看见听道的人，都深受神的话所撼动，经历着心灵中极大的痛苦或喜乐；深受感动的人，并不分贵贱。他在详细的分析事态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神所赐下的大复兴。当他回到给恩列治讲道时，同样的现象在聚会中出现。在某次的聚会中，有二万人来听道，聚会日以继夜的进行。长老会、循道会、和浸信会的牧师，同时在会场中不同的角落分别讲道，而分门别类的宗派偏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约有一千人经历了这些奇异的现象，甚至在复兴的现象过去以后，那些美好的果效还是继续存留，以致许多奴隶获得自由，教会人数加添，信徒爱主的心也大大的增长。

有好几位长老会的牧师，与史顿一起作工，传讲福音救人的大能，并指出神的见证，能使人生发信心。史顿说：“醒悟了的人，犹如大梦初醒一般——似乎是生平第一次领会到，自己必须在接受福音的事上，负上责任；而且如果人不去享用那命定的得救途径，那简直是罪过。”

可是过了不久，结党纷争之风又告兴起。俄亥俄州(OHIO)春田(Springfield)的长老会，把其中的一位牧师交给历盛顿(LEXINGTON)教会大会审查，结果引起五位牧师脱离长老会，自立春田长老部，摒弃一切人为的教条，接受圣经为信心与行为的唯一指引。

史顿把信徒召聚起来，宣告他不能再附从任何宗教组织，并说他今后的工作，只为推广基督国度，不再为任何公会服务。他决定不再接受薪给，靠着种植维生，继续殷勤的事奉主。

过了一年，这期间内他一直与春田长老部有很愉快的合作。可是，当大家认清了这种性质的组织

并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时，就决定解散，详细的理由见载于一份题为“春田长老部最终的意愿和见证”的档中。他们改称为“基督徒”，并且相信这名称，是神从前在安提阿命定给信徒的。

这些信徒，于一八〇四年在给恩列治聚会，自信是君士坦丁时期的教会离弃了使徒教训以后，第一个依照起初使徒教训去实行的教会。

类似的教会，不久便迅速加增；每处的聚会均视为一个独立的教会，而信徒也都受浸，这些都成了常规。

这些运动，在西部地区很快蔓延出去，不久便与在东部及南部两股类似的运动汇合，成立了“基督教会团体”(CHRISTIAN CONNECTION)，他们同心合意的摒除了一切人为的教规，全以圣经为依归，并效法初期教会的单纯。

这些运动，都是分别独立产生的，以后才发现彼此是志同道合。他们所信奉的，与坎伯尔父子所建立的教会所遵守的相似。不过“基督教会团体”比较上在传福音方面较活跃，因此迅速壮大起来；其它的则较多重在教导，因此在知识上的长进比较快。

坎伯尔亚历山大身兼数职：编纂、写作、教书、讲道；此外又公开辩证，并从事教育工作，及修订新约译本。他的才华横溢，活力过人，使许多人深受影响。

浸信会圈子内的信徒，也受到他的教导所影响，但有些不肯接受革新的，慢慢的便形成了对立的势力，因此在好些地方演变成为浸信会和革新者之间的对峙。最后，浸信会联会把几位活跃的革新派牧师开除，还警告说要将所有从事改革的信徒逐出教会。此后，双方宣告分裂（一八三二年）。

同时，坎伯尔亚历山大所带领的聚会，和史顿所带领的信徒认识以后，发现彼此的目标和原则基本上相同；不同的细节却没有彼此的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因此双方开始携手合作。他们都认为不宜成立有形的联会，但到了一八三二年，终于成立了团契。

在这些信徒中间，长久以来为了悔改的本质，曾引起辩论。信徒一般相信在救恩方面，人是不能作什么的，甚至不能有信心去接受，除非圣灵亲自作工，因此他们学习等候某种内在的属灵经历，就是圣灵在人心内工作的明证。可是不久以后，有人指出：人必须运用意志，在他听见福音的时候，要用信心去接受。接受与否，是人所该负的责任；如果拒绝的话，他就要永远承当那结果，就是永远沉沦。

司各特(WALTER SCOTT)是当时与坎伯尔父子同工的传道人，他的服事非常忠心，工作亦大有果效。他在较早时期就曾与史顿的朋友一起传福音，深被这个有关悔改本质的见解所影响。他认为长久以来，传道果效不大，就因为听道的人没有领会各人对福音见证应有的态度。各人有责任用信心去接受福音，不能单一的凭感觉，以为那才是圣灵作工的明证。他又留意到新约圣经的记载：信的人受浸，并没有任何的顾虑。他也留意到使徒行传三章卅八节所记载彼得说的话：“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因此他劝听道的人要悔改受浸，好叫“罪得赦”；又当他给人施浸时，除了照马太福音廿八章十九节主的吩咐那样作以外，他还引用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使它成了定例。他所认为的悔改，包括：(一)相信、(二)痛悔、(三)受浸、(四)除罪、和(五)接受圣灵。

这些教会专心查考圣经，信徒彼此相交，顿使福音更迅速广传。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给兴起来，预备自己去事奉主。他们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甚收宏效。数以千计的人悔改，参加了教会；教会

也迅速成长起来。敌对他们的人，喜欢称他们为“史顿派”，或“坎伯尔派”，但他们拒绝不接受这些名称，也不采用任何宗派的名称，只自称“基督徒”，“门徒”，和“神的众教会”。

接着下一代的信徒中，尔捏特(ISSAC ERRETT)给兴起了(一八二〇——一八八八)。他述及当时的情景：“对我们来说，耶稣的神性和作基督的位份，并不仅是一次教义的问题——这是基督教的中心真理，也是基督教的重要信仰。在这一点基本信仰上，我们坚决持守，毫不妥协。如果人对基督的心是正确的，基督就能使他在其它一切的事上不会出岔。因此我们专心传讲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人若要受浸参加教会，我们所要求的条件，就是他内心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此外并无别的条件。而我们交通的根据，也只有一点，那就是信徒对这位救赎主的相信和顺服。凡相信神的儿子，听从祂的话的，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并不介意这些弟兄们在其它见解上可能有谬误。但是，凡不信基督的救恩的，不管他们在别的事上是如何的精明能干，都不是我们的弟兄。……在一些推理性的判断上，我们尽量谋求一致的结论；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学习彼此容忍，满心相信神会引领我们达致最后的协议。在意见方面——亦即是圣经没有明言的问题，或没有定论的模糊不清的事上——我们允许信徒有最大的伸缩性的自由，但不许彼此论断，或强迫别人接纳自己的意见，或因而引起争端。”

这些教会，在澳州散播迅速，又在英国纷纷建立，并远及其它的国家。不久，主张要把这运动发展成为公会系统的趋势渐告明显。有些人主张把这些“布道”工作集中起来，归由一个核心组织控制；在某些人的心中，颇受当时流行的唯理主义所影响，因此对圣经的阐释或应用上引起讨论时，常有发生不同的意见或做法。从这些经验来看，可见起初所提出“恢复见证”的重要性，也可见“回到圣经原则”的态度，才是达致教会真正合一的唯一途径，这样才能使教会有能力的把神纯全的真道，传扬给世人。

第十五章 俄罗斯

一七八八——一九一四，八五〇——一六五〇 一六一二——一九三〇

一八二三——一九三〇 一八二八——一九三〇

门诺派和路德派信徒移居俄国——门诺派教会独享特权，因而变质——乌斯特(WUST)——复兴——门诺派弟兄脱离门诺派教会——门诺派教会复兴——俄国教会的聚会遭受禁止——准许圣经俄文译本流通——圣经翻译——路迦士(CYRILLUCAS)——斯顿得教派(STUNDIST)——福音传入俄国的各种途径——教会增添——俄国的政治局势引起迫害加剧——放逐——放逐出境的事例和新约圣经的影响——神圣议会(HOLY SYNOD)反对斯顿得教派属下的教会——福音派信徒和浸礼派——俄国境内动荡不安——容许宗教自由——教会激增——取消宗教自由的法令——无政府状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府产生——试图扫除宗教——信徒受苦与教会增长——共产党屠杀信徒——盎肯(J.G.ONCKEN)在汉堡建立的浸礼会——逼害——对宗教宽大的政策——圣经学校——在俄国的德国浸礼会信徒——美国的馈赠——拿撒勒教派(NAZARENES)——弗若列池(FROHLICH)——带来复兴——

被逐出教会——匈牙利工匠与弗若列池相遇——布达佩斯(BUDAPEST)的聚会——拿撒勒教派的传扬——因拒服兵役而受苦——弗若列池的教训。

十六世纪门诺在荷兰工作，使教会得着复兴。这些信徒的后人，在俄再遮皇子粉碎了西班牙的统治势力后，享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仰自由，教会更形蓬勃。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变成了当时的权贵，但在普鲁士，门诺派信徒却成了受苦被压迫的人，部份原因是因他们拒服兵役，处境极为困苦，因此当俄国加德林二世(CATHERINE II)在南部新占领的地区内，为他们提供田地，及应允他们宗教自由及免服兵役的时候，他们便雀跃万分，认为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拯救。

最初起来回应移居的，是那些最穷苦的信徒。一七八八年，第一批迁徙的共有三百二十八家的人，人数约有一千五百，翌年徙至伊卡德连诺斯拉夫省隼(EKATERINOSLAV)定居。起初的时候，移民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接踵而来的移民渐多，其中有家境比较富裕的，他们几经劳苦耕耘后，生活渐入佳境。俄国政府对这些移民曾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振兴农事，提高该区的生活水平，这个期望也告实现了。该区土壤肥沃，农作物年年丰收，人民住居的环境渐渐改善。四周居住的俄人及鞑靼人，以前从没有想过去开垦该区的，现在眼巴巴看见这些移民的收获累累。除了来自普鲁士的移民外，还有来自禹尔登堡因受迫逼而流亡的路德派信徒，其中多属敬虔派的。

这块小小的殖民区，慢慢的扩大，不久便在俄国南部伸展到克里米亚半岛(CRIMEA)，沿着伏尔加河(VOLGA)下游，横过高加索山脉(CAUCASUS)，直至西伯利亚(SIBERIA)，远达土耳其斯坦(TURKISTAN)及邻接中国的边境。这些移民并不受周围的文化所同化，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及生活习惯。在这庞大的帝国内，这些移民故居在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SLAV)和其它的民族中，犹如汪洋中的孤岛一般。

政府给予这些门诺派教会的特权，很快便使教会变质。为了要享受特权，人人争取参加教会，办法就是在指定的年龄受浸为会友，或借着结婚而取得会友资格；这情形一反以往的规定。以前凡参加教会的，必须要信靠基督，并有重生得救的明证。因着这些改变，门诺派教会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家教会，信的和不信的，一概接纳，道德的表现因而迅速腐败。新来的移民，原来生活严肃敬虔，不久亦因此而堕落了，酗酒、不义、及贪婪的事迭生。可是，有一小群敬虔的移民，始终抵挡罪恶，并且痛惜教会的见证失败。

信徒们为罪忧伤的祷告，果蒙垂听。神在他们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了他的仆人。禹尔吞堡的一个小客栈的店主的儿子，名叫乌斯特(EDVARD HUGO OTTO MUST)，他父亲送他去念神学。他在杜平根(TUBINGEN)大学攻读时，生活糜烂腐败：考试合格后，在一八四一年，在禹尔吞堡的国家教会内供职。他凭着天性的热诚，全人投入了工作。后来认识了敬虔派、摩利维亚派，及循道宗的信徒。三年以后，他被按立为牧师，心里经历了改变，摆脱了一切缠累的罪。一八四五年的一个清晨，他得着因信赦罪的平安，并得着成为神的后嗣的确据，心中满了无比的喜乐。他的讲道及查经，动听而又满了能力，不但吸引了多人归主，也引起国家教会人士的嫉妒忌愤，使他在工作中到处受到制肘和欺侮。后来得到敬虔派信徒的介绍，前往俄国南部一个脱离国教的教会工作。年廿八岁时，他在该教会第一次站讲台；他身材高大壮硕，声音洪亮可亲，听道的人都深受吸引。在讲道的时候，他引用圣经，说出自己内心的经历，指出基督救赎的大功，可以确保信靠的人稳妥得救。该教会平日人数已不少，现

在又加上来自各团体的听众，其中也有门诺派的信徒。乌斯特并不受宗派分裂的歪风所影响，因此不久以后，他也在门诺派信徒家中查经，并且在他们的聚会中讲道，带来了大复兴；不少罪人深受感动，纷纷悔改，并且因信而得着心灵里的安息；许多人离弃罪恶，过圣洁的生活。可是，反对的势力亦接踵而来，他们不许乌斯特用门诺派聚会的地点；可是这些行动，并不能阻止复兴的扩展。但是有一小部份信徒，因充满喜乐而任凭自己落在过份兴奋狂热中，以为这些狂热感受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幸而这些容易导致愚昧及罪恶的现象，很快就受到控制；复兴的善工在教会内外受敌的情势下，仍旧得以维持下去。乌斯特死于一八五九年，时年仅四十二岁。他在世时，有些重生得救的门诺派信徒，到他所负责的教会里，与其中的信徒一起守主餐。

乌斯特去世后，在同一年里，有一些门诺派的信徒，感到不能再留在原来的聚会，与未信的人一起守主餐，于是开始按时在各信徒的家中擘饼纪念主，参加的人都是相信并承认基督的。这项行动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信徒们本身并不愿意教会分裂，但到了这个情况下，有几位最后还是离开了门诺派的教会，后来其它的信徒也跟着离开。一八六〇年，这些脱离门诺派教会的弟兄们，另立聚会。

原有的门诺派，对待这些新成立的弟兄聚会，就像从前国家教会对待早期的门诺派信徒一样，他们谴责弟兄们，提议把他们交由地方政府去惩治，要求剥夺他们所享有的一切特权，甚至恫吓要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与政府交涉的公案，拖延了好几年，在这段期间，弟兄们受了许多苦。最后政府判决：门诺派信徒，不论属原有教会或新成立的教会，一律享有原来的特权。

这些弟兄们的教会，稳定地增长，圣灵的各种恩赐，也丰富富的在他们当中显明出来。当他们在教会的实际生活上决心要依照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去实行的时候，就领会到门诺派教会的洒水礼，并不合乎使徒的原则。于是他们就为信的人施浸。后来他们又领会到，应该与众圣徒相交，不应把交通的范围限制在门诺派的圈子内。有些由海外或别处来的弟兄，在他们中间探望事奉，扩大了他们的交通范围。

这些经历，为门诺派教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虽然在聚会中仍然混杂有不信的人，但这些留下来的人，一样感染到那曾使别的信徒离开的圣灵工作。牧师传讲福音的时候，拯救的大能照样彰显出来，其中悔改得救的人，学习过敬虔的生活，为四周的人作出美好的见证；犯罪的人受到申斥，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甚至连未信主的人，也因而提高了道德水平，而原有教会和弟兄们间的芥蒂，也慢慢的消失。双方的信徒，虽然意见仍旧分歧，但能分享在基督里的彼此相交。

许多信徒，看见很多世人还没有得救，对传福音的急需，心中满了负担，于是派遣传教士到印度及其它的地方去。这些在俄国的移民，家道渐丰，有些人就渐渐趋向物质的享受，但也有不少人心里敬畏神，为了推广神的国度，甘愿奉献钱财，他们又有大批移居到美洲去。所以他们能把信仰借着各种的方式，从他们那有限的范围，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去。

可是，俄国政府虽然准许这些门诺派的人士享有特权，但也规定他们所当负的责任和该受的各种限制。他们不须服兵役，但适龄的青年均须为政府植林伐木；在这段服务的期间，他们不得在俄人中间举行聚会，也不得向希腊正统教会的人士“宣传”信仰。他们如果遵守规定，就可以自由的聚会，所以他们也乐于遵从。在这些散布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平原上的门诺派信徒的村落内，都有经常的聚会，也很蒙恩。他们所雇用的俄籍工人，为数不少，他们有机会参加每天在信徒家中所举行的聚会，因此

听见了神的道。男人在农庄上干活或上市集时，就有机会和别人交谈；妇女在家中或田间，也可以与别的妇女碰头；他们在这些交谈的场合里，常常的提及圣经。

俄国人民并不认识圣经，在东正教堂内所念诵的，是那没有人能听得懂的古斯拉夫语。又因为在教堂内聚会并没有讲道，聚会的内容，就只是循例作完各种礼仪，唱些悦耳的诗歌，至于神的启示，人所知道的实在不多。当时的正统教会并不反对圣经的流传；他们也教训人民尊重圣经，指出那是神的圣书。因此这些本性热衷宗教的俄国人，都很爱慕认识那本人人敬重的圣经的内容，所以当奇妙的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许多人就立刻接受了救恩的信息。

斯拉夫民族的文学，始自圣经。这一种现象，在许多其它的民族中也屡见不鲜。在九世纪的期间内，为了要把圣经传给俄罗斯民族，区利罗(CYRIL)发明了一套字母(CYRILLIC ALPHABET)，是把部份的希腊字母，合并到古加拉各利文字内而组成，用以发出斯拉夫的语音，又藉此把新约圣经的大部份翻译出来。他的同工麦托丢(METHODIUS)，用尽心去推广这套区利罗字母的应用，对抗那些主张用拉丁文的人。这种古斯拉夫语的圣经文字，由摩利维亚散播到各处去，代替了希腊文，成为大多数希腊东正教国家的教会所采用的文字。后来各种斯拉夫语系衍变成各种语文，这种古老文字就不复为人所用。但在十一世纪时，基辅(KIEV)的俄人统治者雅若斯拉夫(YAROSLAV)，把圣经一部份译成当时通用的语文。

在十四世纪期间，一位牧养教会的弟兄和一位作教会执事的弟兄，为了鼓励人读经，来到皮斯哥夫(PSKOV)，后来又在诺弗哥若(NOVGOROD)举行聚会，当地正有大批人参加展览会。这两位弟兄，指出正统教会的神甫，在受按立时，并未得着圣灵；他们所主持的圣礼，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又指出：教会是真正基督徒的团体，可以自由选立长老；信徒聚会时，亦可以自行守主餐、施浸、及传福音。可惜在当时，俄国人虽可以读圣经，但从来没有按圣经的吩咐去行，因此接受这两位弟兄的教导的人，受到了压抑，终而解散。

一四九九年，诺弗哥若的大主教，搜集了各种斯拉夫语的圣经译本，并将新旧约圣经分别印行。一五八一年，整本圣经的俄文译本，在奥斯托洛(OSTROG)面世。

希腊东正教，并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经历类似的改革，可是也曾有人试图加以革新，而作过这种尝试的人，却是来自其中的高层人士。路迦士(CYRIL LUCAS)（一五七二——一六三八年），出生于革哩底(CRETE)，是当代的学术泰斗，学识丰富。他先后出任亚力山大的主教长（一六〇二），及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一六二一）。他在阿妥斯山(MOUNTATHOS)发现了一卷五世纪的圣经手抄稿，是当时已知的最古老的希腊文圣经。他将这古抄本由亚力山大送去给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现在仍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内，称为亚力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当他任亚力山大主教长时，曾把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与圣经的教训作出详细的比较，以后就决定离开教父们的教训，接受圣经的原则作为唯一的真理根基。他发现改革宗的教导，比较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都更符合圣经的原则，于是他发表了自己的“信仰宣言”，说明他在多方面同意改革宗的信仰。他说：“有人认为人传统的理论，与圣经具同等的重要性；对于这种见地，我实在无法忍受。”他大力抨击变体说和圣像膜拜之风。他指出：那唯一真正的圣教会，应该是包括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可是，在不同时代里，在不同的地方，有形的教会可能会犯错误，但圣经是永恒正确的指导，是信徒所应回转归服

的。因此，他鼓励信徒恒常读经，在他们专心查考的时候，圣灵就会使重生得救的人明白其中的真理。这样的主张，出自这位当代宗教权威的人口中，不免引起强烈的反应，众人议论纷纭，路迦士给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结果他曾被黜多次，但每次都给召回。回教苏丹(SULTAN)的大臣也信任及支持他，虽然因此有助于他将职位保留，但反而有损于他的见证，因为众人认为一位基督教的教师，竟获一位回教首脑的支持，于理实在说不过去，也不合宜。当时在伯利恒举行的希腊东正教议会，开会商议以后，一致同意保留原有的教会规例，不赞成改革。但是，这位希腊教会的改革者所受到最利害的攻击，反而是来自罗马教会。他们借着耶稣会的阴谋诡计，多方阻挠路迦士的工作。最后的一次，当苏丹正要出发往巴格达的途中，他们趁路迦士不在场，冒认他的身份；苏丹匆匆下令判他死刑，他就在君士坦丁堡被绞毙，尸身给抛入海中。他死后，希腊东正教议会还不断批判他的信仰。

沙皇亚力山大一世，鼓励英国圣书公会在俄国设立分会，并且授以特权。于是在帝国内的各地，遍设圣书公会。当时对帝国内所采用的各种不同语文的圣经译本，需求甚大，尤其是俄文版本，销量不断增加。多人有机会读圣经的结果，社会的道德为之一振；不少人回转归向神，专心跟随主耶稣基督，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神圣议会(HOLY SYNOD)更成了阻压圣经流通的首要份子。但一直到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权成立之前，为了满足那些渴慕神的话语的信徒的需求，圣经仍能借着各种方式，大量供应。

徙自德国的信徒聚会，按德文称为“斯顿得”(STUNDEN)；而当俄人信徒自己聚会查考圣经及祷告的时候，别人就称之为“斯顿得教派”(STUNDISTS)，表示不耻他们离开原来的教会。可是这些信徒从来不承认这个称呼；他们自己彼此互称弟兄。

这些信徒查考圣经的结果，使他们得着异常的启示和能力；这才知道自幼所信奉的宗教，并没有使自己真正认识神和在基督里的救恩，因此他们彻底离弃罪恶，以全备的信心和爱心，接纳基督为救主。他们看清了国家教会和圣经的教训两者间的冲突，终于离开了国家教会，照着自己所领受的圣经教训去行。

德籍移民为信徒施洗，在起初的时候并没有施浸；希腊教会有施浸的作法，但仅限于婴儿。俄国的信徒为了彻底明白这方面的真理，专心查考圣经，绝不接受当时风尚的影响。当他们一看清了新约圣经的教训是“信而受浸”以后，马上就贯彻到底，立刻实行起来：全境所有的信徒，都照圣经的教训去行。他们又认识到：擘饼纪念主，是主的命令，并且是仅为信徒而设；在这方面，他们也乐意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后来他们又开始领会宇宙性的教会，和地上众教会的组成，明白到所有信徒作祭司的身份，知道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并且祂是随己意把各种恩赐分给教会，使圣徒称义，并使福音传给万人。

这些活动，人称之为“斯顿得教派运动”，迅速广泛的传扬开来，一群群悔改信主的人，纷纷个别的在各地成立教会，把教会的见证到处传扬。圣灵起初在那些外来的移民身上所作的善工，显明只是一点点的开始，到了这个时候，善工更发展到俄国广大的群众中去，发出更大的果效。可是，本地信徒却没有移民所享有的敬拜自由，他们打从一开始，就要忍受逼迫；可是，他们那股为道迫切的热诚仍然持续下去，不能打消。

福音得以传遍欧亚两洲广阔的地土上，主要当然是归功于门诺派信徒的工作。但是除了他们以外，

当时也有其它的信徒为主作见证。伯纳肯柏尔(BOHNEKAMPER)，原是巴色会(BASLE MISSION)派住高加索传道的信徒，后来遭当地赶逐出境后，转往阿迪沙(ODESSA)附近的德人移民区内，担任教会的牧师。他为那些在区内工作的俄人，举行查经聚会，而这些人就把所接受的真道，带回去各人的家中。

此外，交谊会(SOCIETY OF FRIENDS)的格勒力(ETIENNE DE GRELLET)、阿伦(WILLIAM ALLEN)及其它信徒，往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与沙皇亚力山大一世见面交谈，使他深受影响，终而同意下令把圣经译为俄文。沙皇承认他前半辈子没有见过圣经，到了四十岁那年才有机会接触到。但一经翻阅，他就手不释卷；发现圣经中提及世人的烦恼，正是他本人所经历的。他从圣经里得着内心的光照，发现这是唯一叫人得救的真理。他因此同意交谊会弟兄们的建议，准许圣经翻译及印刷销售，为俄国带来无比的福气。

还有一个苏格兰人麦勒威尔(MELVILLE)，俄人称他为伊凡努维兹(VASSILIGIVANOVITCH)，是英国圣书公会的代理人，在高加索和俄国南部，花了六十年的时光，推广圣经的销售；不但使圣经流传更广，而且帮助购买圣经的人，把所学习的真道，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上。他终生不娶，一生致力于宣扬神的道的工作，成为那些负责经销圣经的零售商人的好榜样，使他们乐意学效他跟随基督。

新约圣经流传各地，使多人知罪悔改；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又把福音继续传扬出去。这一切，都是在其它传福音的弟兄们抵达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这种例子，在多地屡见不鲜，由北西伯利亚，以至里海(CASPIAN)南岸，都有这种现象。

同时由另一个方向，来了雅格(KASCHA JAGUB)；他是从波斯来的聂斯托利派信徒，获得美国差会(AMERICAN MISSION)的支助，来到俄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在俄罗斯及西伯利亚各地传道，差不多三十年之久。他专向穷人传福音，大有恩赐。

另一方面，贵族也喜闻福音。一八六六年来自英国的拉施塔爵士(LORD RADSTOCK)，到了圣彼得堡，在一些贵族的家中，举行查经聚会，圣灵的大能显明出来。他那简洁直率的讲解，和所举出的清楚的例子，使上流社会中不少人士因此悔改归主，甚至皇室中亦有人受到影响。这些贵族坚持真理的教训，就与南方的工人农民信徒的坚守真道的表现一般无异；这些社会阶级地位大相悬殊的信徒，不久就如弟兄一般，彼此相交。信主的贵族们受浸以后，和其它的弟兄一起擘饼纪念主。上流社会的人士，与卑贱而且目不识丁的信徒一起聚会；他们能彼此连结，是因为在基督里分享同一的生命。

在这些信徒当中，有一位富有的地主，名字叫帕斯哥夫上校(COLONEL VASSILIJ ALEXANDROVITCH PASCHKOV)。他在自己的官邸内举行聚会，自己也到处传福音——在会所及家中，甚至监牢和医院内。他运用他本身所有的财富，大量分发圣经，又印发福音单张及书籍，并且周济穷人，竭力推广神的国度。一八八〇年，他家中的聚会遭明令禁止，但他不顾一切，继续聚会，于是神圣议会判决把他放逐离开圣彼得堡，后来更赶逐出国境，他大部份家业被充公没收。

德国浸礼信徒由德国移居俄国，后来更分布在波兰及其它许多的地方。他们享有信仰的自由，但政府规定他们只能在德国人当中传福音，不能向东正教教徒工作。不久以后，受浸的俄人信徒，纷纷成立教会，并且迅速增长。这些教会与别的教会之间，明显地有分别。浸礼会统属他们的教会联合会，但其它教会则各自独立，直接归属基督；众教会彼此间的交通，就靠个别弟兄们的彼此相交，和传道

弟兄的探望。此外，浸礼会内多半各有委任的牧师，而在其它的信徒教会内，弟兄们自由的事奉，并在信徒中间选立长老。

福音就是这样借着多种不同的途径，传入这辽阔广大的地域内。俄人接受福音以后，自己成立了教会，没有让一些“外国差会”或外国组织掺杂在其中。从开始的时候，俄国信徒就已明白：神的道是直接传给他们的，无须借助任何公会的组织；而使人与神和好的职份，也接着交付给他们。他们就存着一股无法压抑的热诚，为此尽心竭力，不管要付的代价是多大，因此福音很快就传开了，并且在全国内继续传扬出去，情形大异于一些仍留在外国差会的支持及控制下的地区。俄国信徒的人数，不久便增至数百万，教会亦数以千计。

打从开始的时候，这些教会就受到逼迫，后来逼迫愈过愈利害，并且蔓延迅速。当时的专制政权，大力压制个人的自由，以致人民纷纷成立秘密组织，多方设法打击政权，他们所采取的手段甚为残酷。这些虚无主义份子(NIHILIST)（亦称民粹主义者，译者按）所发动的暴乱和暗杀的行动，使统治阶层大感震惊，于是他们更加紧镇压。沙皇亚力山大二世本人，亟欲从事改革，但他没有认识到当前局势的险恶。数百年来暴力压迫所引致的人民积怨和愤怒，有如暴风雨前夕的情景。沙皇正要专心致力改革之际，于一八八一年，在圣彼得堡的街头上，遭虚无主义的恐怖分子所暗置的炸弹炸毙。这次事件触发了人民对极权政府的反抗暴动。继位的沙皇和政要的顾问们，不惜全力去粉碎革命的行动，连那些不赞成“神圣俄罗斯”的理想，反对政府及教会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都不免遭殃。政治分离份子、国内的非俄人、尤其是犹太人及大学人士，还有许多其它的人，都受到牵连；东正教会以外的信徒，统统被殃及。

经常利害逼迫信徒的，竟是神圣议会的会长——坡伯多诺次威(POBIEDONOSTSEF)。他把信徒判处监禁、又罚款，或放逐。神甫们更煽动群众跟信徒为难，捣毁他们的房子家业。信徒聚会受到禁止以后，他们转而秘密聚会，但一经查出，信徒就被逮捕惩治，因此更多的信徒，尤其是教会的长老及带领弟兄，都给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高加索等地，但福音反而因此得以远扬，因为这些流放至边区的信徒，到处为基督作见证。信徒遭逮捕后，有时会正式经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判决；但大部份的信徒，就只凭政府的一纸命令，就被驱逐出境，无须经过审讯的程序。信徒们遭放逐时，手脚都带着锁链，脚上的锁链又重又长，有时他们得用手捧起锁链，双脚才能移动。早期流放的人，往往要徒步走好几百哩；后期的则多半用车运载，车厢内只有一个密密钉上铁枝的小窗，用以通风透光。如果交通工具充足，犯人的妻儿们也得随行流放。负责押运犯人的士兵，态度粗暴凶残，兴到时就举起皮鞭，随意抽打犯人，其中也夹杂着其它的政治犯。途中所经的各地监狱，就成了他们驻足稍息的地方。各队犯人先后抵步后，就集中听候下一段路程出发的命令，有时须停候数小时，但有时要停候数月之久。监狱内拥挤不堪，人数过多的时候，晚上躺下睡觉，就只好迭卧在别人身上。牢内没有如厕或沐浴的设备，因此所有的人身上都长出了虱子及其它的寄生虫，有的人身上还长出脓疮，景况更形凄惨；食物简直叫人不能下咽；男女老幼，一律受到监管的人任意虐待，他们亦无处躲避。官员中间或有比较仁慈的，但他们是当时政权施高压手段的执行者，因此也是有心无力。流放的人到了目的地，就各人尽力设法求生存；他们一经被分送到指定地点后，就不得擅自离开该地，虽然有时他们连当地的语言也一窍不通，他们也得住下来。途中给折磨而死的人很多；刑期有长有短，有终生流放的，也有指定的年期，

但到了期满，犯人正等待重获自由的时候，官方却会临时再加判，延长刑期。在俄国境内的好些地方，冲突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一面是信主的各阶层人士不断增加；他们借着神的话，寻找到基督作救主，决心跟随祂，并以神的话语为一切的依归。但另一方面，这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却正倾其全力去阻压，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返回去奉行那曾捆绑他们的偶像膜拜和死的仪文。可是，这些来自帝国及东正教会的压制力量，却无法胜过圣徒们那百折不回的坚忍和燃烧不息的热心。

当这些逼迫雷厉风行之际，新约圣经仍能在各地畅销，而且有事例显明，有人透过与高层人士的私人关系，获准在牢狱中探望囚犯，并分发圣经。贝特克博士(DR.BAEDEKER)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忠心地在这方面事奉主。可是，那些遵照圣经教训去实行的人，却遭受敌视，甚至被杀害。在给记载下来的无数事例中，有一些是可以让人对当时的整个情况窥出一点端倪来的。在波兰，有一个年青人，参加聚会，得聆福音，结果悔改了，离弃以往放荡犯罪的生活。他禁不住向人传讲自己所获得的救恩，引领了一些人回转归向神。后来他与其它的十三位青年信徒，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其中有七个人在途中死去，其余七个人在狱中给囚禁了三年半后获释；可是其中六位，因在狱中染上了肺病，先后因病身亡，最后剩下来这一位信徒，因无从与在波兰的家人联络，（他已婚，妻儿均留在波兰），又身无一文，付不出返乡川资，只好流落西伯利亚以打铁维生。他不断的为基督作见证，后来并在当地成立教会，教会亦日见蓬勃。

此外，有一位年轻的妇女，与父母同住，家境富裕，她悔改信主以后，经常向亲友及邻舍传讲基督，后来她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但获准乘搭火车前往。当她所乘坐的列车驶经她家附近的车站时，大群亲友和同情她的人拥去围着车厢，车厢上的小窗钉上铁枝，外面的人只能依稀瞥见她的脸孔，但她却能清楚看见那些亲友。她对他们说：“爸、妈、我的兄弟姐妹和各亲友们，我爱你们，但我可能不会跟你们再见面了。我对自己所作的事，一点也不后悔；我乐意为我的主的原故受苦，因他曾为我受苦，并舍弃了一切。”列车驶出了车站，她的声音也渐渐远去，但人群中有一个男童，回家的时候，边走边哭，不久以后便决心跟随基督。他长大以后，成为一位满有能力的传道人，许多人因此顺服归信基督。

在暗斯克(OMSK)以北不远处的乡村中有一个农民，因服兵役而随军参加与日本战争之战役。他从同胞手中得着一本新约圣经，在专心阅读以后，他重生得救了，成为新人，一改以前酗酒的恶习，成为一位态度庄重诚恳，心平气和的基督徒。他在战后回到本乡，乡人都感觉到他的改变，但却留意到他放弃了以前的宗教信仰，不再参加正统教会的仪式，家中亦不复摆设神像圣画之类的对象。他约同邻居一起查考圣经，邻居因此也归信基督，生活改变，村中的神甫惊惧起来，吩咐人把这农夫的邻居拿住，又由他父兄动手痛打他。他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众人以为他已气绝，但他的妻子把他拖返家中，悉心调理伤处，使他不至丧命。与此同时，其它的人听见了圣经的话，信从了基督，一有机会就聚集起来查考圣经。他们读到初期使徒为信的人施浸的事实，于是也照着实行，在村后的小河内，给信的人施浸，由那位以前当兵的信徒施浸。他们从起头就认识到自己这一群人就是教会，正如圣经所明说的。圣灵各种恩赐，也在他们当中彰显出来：有长老负责带领；有教师；有传福音的——各按各职，彼此相助。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会擘饼，纪念主的死。东正教的神甫和附从的人，多方设法阻止信徒的活动；信徒的住处的门窗，破入捣毁；信徒被殴打、家畜遭掳走；信徒受尽各种的残害，

可是他们满心忍耐，刚强壮胆，恒切祷告。后来，当村里有一半人参加了教会，迫害也告中止。神甫只好自我解嘲，硬指这种新宗教不过是一个无知的农民的谬见，有头脑思想的人，都不会受迷惑。有一天，村里来了四位陌生人，他们的马车一进村子，就被村民接下车请进家里；众人急不及待地发出连串的问题。不久，全村的人聚集起来，这四位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宣称他们都是因信主耶稣基督，并靠赖神的恩惠而得救的，还说他们一心要在一切的事上，遵守神的道。这番话使村里的弟兄们大大喜乐。当然，就算这些生客并非信主的，村民也不会不接待他们；但他们现在却喜出望外地接待了弟兄，顿叫他们的信心更得坚固，这就使一些还迟疑不决的人士立刻承认基督是救主。这些外来的弟兄，还带来了圣经；他们在村中逗留的那段日子，教会专心查考圣经，几乎日夜不停的聚会。

在俄国南部有一个工人，是个工作勤奋，满有信心的基督徒，经常帮助当地的教会，他因此受到迫害。有一天晚上，武装警察包围了他的住处，然后入内残暴地对待他和他的妻子儿女，接着将他加以逮捕带走。

他的妻子生下孩子后身亡，婴儿亦告夭折，剩下其它四个儿女，最长的女儿年仅十三岁。这些孩子们只剩下一个生存的目的，就是去寻找父亲，他们获悉他已被解往高加索某地，便决心跟踪前往，几经艰苦，越过平原山野，沿途求乞为生，间或得着弟兄们的周济。可是，在抵达高加索后，父亲却又远放铁夫烈斯(TIFLIS)。高加索的信徒接待他们，让他们恢复精力后，又继续前行，翻越高加索山脉南麓，抵达铁夫烈斯；当地的弟兄们，有俄国人，有亚美尼亚人，有德国人；他们热诚地接待这四个孩子，可是接着获悉那位工人又已流放到更遥远、毗连波斯的边境鞑靼人聚居的地区。这时孩子们已疲惫不堪，无法再前行；信徒们同情他们的困苦，差了两位弟兄负责前去追寻孩子们的父亲，把需用物品带去供应，并要向他保证他的儿女必会受到妥善照料。这两位弟兄赶到的时候，孩子们的父亲刚抵步不久，可是他因身心经不起折磨，竟已倒下来气绝身亡了。

一八九三年，神圣议会在坡伯多诺次威领导下，颁布一条早已订立的教令：指定所有斯顿得教派的人，必须把子女送交属正统教会的亲友抚养；如果不从命，子女们就要拨归当地教会人士处理。神圣议会又将斯顿得教派人士的姓名，开列清单，交由交通部长在铁路办事处及车厂各地张贴，防止这些信徒受到雇用；凡雇用斯顿得教派信徒的人，均须缴交巨额罚款；斯顿得教派人士，也不得租赁或买卖土地；所有属“宗派”的人士，不得自由迁徙；法律也不容许他们从事金融或商业性的活动。脱离正统教会的人，公民权将遭褫夺，他们并将遭黜放，且须在监狱感化院内接受至少一年半的感化。传福音或写作属灵书籍的人，将给判八至十六个月的监禁；如果他们再犯法的话，刑期就将加至卅二至四十八个月不等；若仍再犯，就要遭放逐。凡传异端，或协助传播异端的，一律要流放西伯利亚、或高加索以外的地区、或其它更偏僻的地区。

浸礼会是个有组织的团体，享有一定的信仰自由，是其它“福音派基督徒”所不能享有的。在福音派中，各处教会独立，没有地上组织的首长或中心，不像浸礼会那样易于受到政府控制。他们不断受到压力要成立组织，委出代表，与政府交涉；这些教会，有些屈服让步，以图生存，但其它的都不肯屈服，理由是教会如有了组织形式，就是离开了直接倚靠主耶稣基督并只向祂负责的正途。

镇压人民的措施，在俄国境内变本加厉，惹起人民公愤。俄日之战，也不能起振奋民心的作用。战事失败以后，更挑起了革命分子的希望。接着各地爆发罢工及暴动；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全国交通

陷入瘫痪的状态。政府所提出的一些小规模改革，也只能引起更大的反感。在高加索地区给煽动起来的鞑靼人对亚美尼亚人的袭击，或俄人暴动群众对犹太人发动的恐怖行动等，不但没有压制革命活动的扩展，反而引起各种屠杀的事件，使全国陷于混乱不安中。

政府终于为势所迫，无可奈何地同意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一九〇五年所颁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宗教集会自由的法案。坡伯多诺次威退休下场。国家教会宣告：“真正的信仰，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教导、谦卑、及良好的榜样表明出来；因此教会不应动用武力，不应强迫禁制犯了错误的儿女。因此，正统教会并不反对取消制止人脱离正统教会的禁令。”

信徒们获得这种保证后，立刻就尽量享用这个新自由。各地举行聚会的时候，都挤满了心灵饥渴的听道者；许多人归信基督，承认祂的名。聚会讲道之际，常会有听道的人发出反应；许多人会跪下来，或脸伏于地；祷告的时候，有时各人会急不及待地争先恐后，甚至几个人同时一起大声祈求，其中还夹着其它信徒的回应、彼此认罪之声、或发出感赞的话。许多以前隐藏的信徒，纷纷露面。真正信主的人，实际上比起初所估计的为多。以前妨碍传道的障碍，都被除去，各处都兴起了查经聚会；传福音的火热如常，而信徒事奉的各种属灵恩赐，在各阶层及不同职业的人身上，也更多的显明出来。

可是，能享信仰自由的好时光，并不长久。政府及东正教会的势力一经恢复，立刻就撤销了以前所作出的让步，对信徒的迫害又告展开，教会再度落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还有福音派教会的好些作长老的弟兄，和浸礼会的牧师，给放逐至西伯利亚及白海海岸一带。一九一七年，国内革命爆发，沙皇政权，东正教会、和古老帝国的一切，瞬息间化为乌有，在暴风雨中，引进了新纪元。

俄国革命初期，政府宣布宗教自由。可是，国家在经过长期困苦动荡不安，加上战后的萧条，各党派间彼此争权夺利，局势仍是相当的混乱：较大的城市，落入无政府的状态，大批武装流氓，横行无忌，后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分子控制了大局，但新政策实施以后，反而引起大规模的暗杀、抢掠，及破坏的行动。新政府决心毁灭所有的宗教信仰；因此，本来是压迫人的东正教会，现在反而遭受逼迫。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人士，也同遭殃，而信徒们亦在所不是。

在俄国南部，土匪们成群结队，有时人多得像一支军队，他们觊觎门诺派信徒们的家业财产，下手抢掠；信徒们只好一改常态，与其它居民联手反抗。弟兄们所经历的，就如初期教会所遭遇的一样，当时雅各被刀杀了，彼得却从监牢中被天使救出来。部分弟兄们获得奇妙的解救，但其它一些弟兄却要忍受各种的苦难。许多信徒都以为“大灾难”经已来临。但福音仍旧显出大能，许多人悔改，还包括一些红军的士兵，这些人本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受苦的圣徒大得安慰，他们忍受了极大的难处和世人的愤怒，但仍能说：“不用可怜我们；你们倒是真值得可怜的，因为我们认识神，而你们却一无所知。”

当暗杀浪潮过去以后，人民开始学习适应那代替了旧有专制的另一套新的专制政权；教会又面临新的试炼。教会信徒日益增加，有些地方的信徒偶而可以享受相当的自由，引领更多的人归信，但他们随时会受到压迫，为了应付政府所发出的反基督教宣传，传福音的人必须要具备特殊的恩赐和能力，而他们也着实充充足足的得着这些恩赐和能力。这些没有任何组织维系的教会，受尽政府的威迫利诱，要他们加入“苏维埃”(SOVIET)或联合会之类，以便政府易于对付。有许多教会屈服了，但也有不少坚

持保留原有的依照圣经及使徒时期样式的方式，宁愿为此而牺牲，甘受损失。

国内人民被迫接受无神主义，在暴力苛政下，被迫承认没有神的存在。后来德军入侵，大肆蹂躏（一九四七年），全国起而反抗，带来国内急剧的重大改革与发展，引致逼迫宗教的政策缓和下来，人民于是渐获宗教信仰的自由。俄罗斯的广阔幅员，和特有的民族性，使这些发展更具重大的意义。本来是文盲的，现在开始能阅读；本来是农业社会，现在却变为工业突飞猛进的社会；这些人民如果真正获得信仰自由，就当能使全国振兴。

不正确的历史记载，使人把那些为信徒施浸的敬虔弟兄，和十六世纪荒唐胡闹的闵斯特派人士混为一谈。因此，在一八三四年，当有十位男女信徒在汉堡决定依照圣经教训受浸时，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和反对，他们只得选在夜间秘密进行。

受浸者之一，名叫盎肯(JOHANN GERHARD ONCKEN)。他受浸的事、有意想不到的重要结果，因为后来他成立了浸礼教会。早期虽曾遭遇反对及攻击，可是浸礼教会异常蓬勃兴旺，不久这类教会更遍布德国境内及邻近的地区，甚至远及欧洲东南部及俄罗斯的广大领域内，人数达数十万。

盎肯生于一八〇〇年，终于一八八四年，生存年代几乎包括整个十九世纪。他生于宾廷克(BENTINCK)家族所统治的瓦若(VAREL)公爵领地。这家族的一支，曾跟随俄再遮威廉渡过英伦海峡，在英国成了望族。盎肯的父亲因曾参加反抗拿破仑的爱国运动，被迫逃往英国，后来就在当地去世，始终没有见过在他逃亡海外后不久在故乡出生的儿子盎肯。

当时瓦若的路德宗教会，深受唯理主义所影响。这个少年人盎肯，在路德宗教会内长大，没有机会认识救恩，一直到他十四岁的那一年，有一个在瓦若作生意的苏格兰商人，很喜欢这个少年人，有一天问他有没有圣经，他回答说：“没有！但我已经接受了坚信礼。”那位苏格兰商人赠给他一本圣经，还把他一同带回去苏格兰。在苏格兰的长老会教会内，他第一次有机会清楚听见福音，深受感动。后来他在伦敦，住在一位虔诚的弟兄家中，参加家里的聚会，又参加那家人所属的公理会聚会，使他深受影响。后来有一次在循道宗教会听道，清楚得救，心中有了极大的喜乐，马上就开始为基督作见证，带领人归向救主。

一八二三年，设于伦敦专向欧洲大陆传福音的“大陆差会”(THE CONTINENTAL SOCIETY)，差遣盎肯往德国传道，他于是又回到汉堡。他大有传道的恩赐，吸引了不少的听众，当福音的信息释放出来的时候，听众纷纷悔改。当地的人群起攻击反对这个“英国宗教”，使他遭受罚款和监禁的处分，但他再接再励，继续传道，还开设了主日学，他喜欢分发圣经，于一八二八年，受委为爱丁堡圣经公会的代理人。他担任这个职务五十年之久，负责印行及分发的圣经，达二百万本。

他自己专心查考圣经的结果，渐渐清楚新约圣经中所教导的为信徒受浸的教训。他想到自己所带领归主的人，和自己所经常接触的朋友，他就开始起意要将他们召聚起来，照着新约圣经的原则，成立教会，打算只许受浸的信徒参加。虽然当时有好几位弟兄，在一起查考圣经以后，已决心受浸，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弟兄施浸。其中有人提议先自行聚会，守主餐纪念主，以后再解决受浸的问题，但盎肯担心第一步若走得不对，以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不肯同意这样行。过了五年，他们认识了一位美国浸会信徒西尔斯教授(PROFESSOR SEARS)，由他施浸。翌日，受浸的信徒就正式成立教会，选立盎肯为牧师，由西尔斯教授给他接手。

汉堡的地方政府，不久便作出反应，表示不欢迎这个新“教派”。盎肯和其它弟兄们遭受罚款及监禁。囚禁他们的几处监牢中，其中有一处是夹在两条河道中间，两边围墙为河水所淹，牢内污臭不堪。

不久，有些满有才能的同工，加进来与盎肯一起事奉：其中有科那(JULIUS KOBNER)，是居住丹麦的一位犹太拉比的儿子，写诗歌兼传道；还有列曼(GOTTFRIED WILHEIM LEHMANN)，是盎肯在柏林施浸的六位弟兄之一；这六位弟兄在柏林成立了第一个浸礼会。福音工作蔓延得很迅速，但逼迫也不断的增加，主要是由地方当局予以罚款或监禁，有时也有人用暴力袭击他们。但信徒渐渐赢得当局的信任，逼迫因之渐减。一八五六年，汉堡教会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一八六六年，当局宣布对所有宗教派别一视同仁。

盎肯和科那开始设办短期查经班，训练青年信徒负起牧养新成立的教会的责任，这就是日后的汉堡浸会学院的前身。学院设四年制的牧师训练课程。这种性质的运动，后来传到别的国家，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并成立“负责弟兄”的小组会，负责各种事务的处理。接着美国方面来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盎肯还成了“美国浸礼派差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得以周游远方各地传道，争取各地教会支持学院和其它的工作；同时，各国的信徒亦学习分担一切的需要。

当俄国境内的德国移民中成立德人浸礼教会时，他们与原来当地实行受浸的俄国信徒发生了接触，结果好些俄国信徒被吸收参加了德人浸礼教会，因此俄国众教会分为两大阵营：原来的俄国信徒教会保持个别独立，而浸礼教会则组成联合会，与德国及美国的浸礼会成立组织上的关系。浸礼派主张每个教会由牧师管理，主持浸礼和主餐；但那些古老的俄国信徒的教会，设有长老，强调信徒都有祭司的职份，可以自由事奉。各地不同的聚会，都受这些不同意见所影响。当地政府赞成各教会都采取浸礼会的组织制度，因为必要时，政府易于与当地教会牧师交涉，也易于应付有中心组织的团体；但弟兄们坚持独立聚会的原则，这样可以不容易受外来的压力所影响。因此之故，政府对他们所称的“福音派基督徒”，不断施以压力，迫使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心委员会，和选出会长。

此外，对于美国浸礼会所予的大量经济支助，是否应该接受的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俄国浸礼会信徒显然因这些经济支持而大得补益，于是有人提议，把经济支持的范围扩大，使其它并不称为浸礼派的弟兄们聚会也包括在内。这个慷慨的提议还说明，如果弟兄们接受了经济援助，他们也无须改换名称，亦无须变更教会的管理制度；他们只须加入浸礼会世界联合会就行。有一部份弟兄们赞成接受这项提议，藉此可得着不少补益；但大部份弟兄们表示拒绝，他们感谢那些提议的人的爱心并慷慨，但认为如果接受支助，不免会叫他们背起对联合会的一份责任，而且会使他们的处境起变化，至终会影响他们要走的道路和方向，甚至可能他们不再完全专一的倚靠神，而且会使那些诽谤他们是代表外国宗教势力的人更有借口。他们深信圣经的原则，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在贫困的俄国和在富裕的美国，都是一样。

途经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人，对他们沿途所见的许多小村落，不免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并且可能怀疑在这些外观简陋的民居内，究竟正进行些甚么勾当，事实上，这些居民虽然与附近城市较优美的环境有天壤之别，其中却正进行各种属灵的活动，而且在这里居住的居民，正因为有人愿意全身全心顺服神的话而受到真正的影响。

在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地，有许多聚会，其中信徒自称“拿撒勒教派”(‘NAZARENES)。他们平静地生活，与人无尤，与世无争；如果不是因他们拒服兵役、拒配武器而与政府时常发生冲突，根本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他们提到自己的时候，这样说过：“使徒们传讲悔改与信心之道，于是信的人加添，成为神的子民。……与他们同一信仰的弟兄，在历世历代中都曾出现，各地都有。……今天，世上也有属神自己的子民，故居各地，安静生活，离世独处，远离政治的纠缠，也远离世人的享乐和追求。……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不同本源，操不同的语言，也没有任何经济上、政治上、或其它性质的联系，但因为属灵的大能与属神的大爱的连结，他们彼此紧密地联络在一起。……他们因圣灵的重生，而成为神自己的子民，……他们是许配给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他们也乐意全心全身拿奉祂，因祂曾用自己的血，从世人中把他们买赎过来；……他们一生的指导，全是根据祂的教训。”

他们又说：“基督教训的那光辉的荣耀，曾一度渐渐暗淡。……然后在一八二八年，神在瑞士兴起了一位真正忠心的见证人，就是弗若列池(S.H.FROHLICH)；他因得了重生，得以进入那‘在基督里的新造’。……是他借着福音的真光，把光再燃亮起来；为此，在一八三〇年，他被革除牧师的职位。他开始传讲那纯净的福音，并把信的人召聚起来，成立教会。他在瑞士传福音，一直到史塔司堡，在该市去世，时为一八五七年，他实在是主的一位忠心的仆人。……犹太人称使徒保罗‘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在奥地利，‘在基督里的信徒’给称为‘拿撒勒教派’，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亦然，直到今天。”

弗若列池(SAMUEL HEINRICH FROHLICH)生于一八〇三年，在苏黎世及巴色攻读神学，本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他因着不信，极力的抵挡摩利维亚的弟兄们，也反对查考希腊文新约圣经，实际上是反对一切针对属灵复兴的活动。但在年二十二岁时，他醒悟过来，深感自己不配作传道人。他决志向神忠心，克胜罪恶，但是却屡次失败，景况是十分的可怜；他在树林中，在山丘上，切切的祷告，向神呼求，但没有用处，直到有一天，他转向主耶稣基督，心灵里便得着了平安，他在父亲的家中，勤奋温习，以备应付考试，但他那强调福音的信仰，不为主考官所欣赏，因此迟迟不给他按立，直到一八二七年，才正式授他牧师的职位。他在几个不同的教区中服务，时间都不长，但他帮助信徒读经，使大家在灵里面得着更大的释放。他被派往路维尔(LEUTWEIL)一个不信神的会堂内工作，他放胆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带进信徒的复兴，却招致当地教会人士的反，迫令他在讲道前，将讲章交由教会长老们及其它神职人员过目，他们就肆意把其中凡提及人“死在过犯罪恶中”，或“因信得以在耶稣基督里称义”的这些字眼，全部删除。这些话曾叫不少背负罪担的人得释放，并且得永生，可是在今世聪明之子的眼中，却给视为愚昧，为绊脚石。在教导初信的人的时候，他得着了新约圣经有关受浸的亮光。他不顾一切的逼迫和反对，继续忠心作工，有两年之久；一八三〇年，教会人士获得政府的支持，废掉一切旧有的属灵书籍，改用一些高举唯理主义的出版物。弗若列池不肯采用这些新书，又因他平日不肯妥协的表现，当局便判以触犯法律的罪名，革除他所担任的牧师职务。

有两位来自匈牙利的工匠，在旅途中由布达佩斯(BUDAPEST)来到苏黎世，有机会听到弗若列池的讲道，因而悔改相信，而且受浸，其中一位名叫邓克尔(JOHANN DENKEL)，他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殷勤的向他同行业的人宣扬福音。归信的人中，有亨赫西(LUDWIG HENCSEY)，后来成为一位十分活

跃的福音同工，成立了不少“拿撒勒教派”的教会。他引领了一位贵族柯瓦斯(JOSEF KOVACS)归信基督，这位贵族后来以拉丁文和弗若列池有书信上的来往。在布达佩斯，一位寡妇腾出了她房子内的一个房间，作聚会之用。亨赫西写书详述信仰的原则，信徒们将这些书翻印以后，分发出去，引领了不少人归信（一八四〇——一一年）。后来有一批信徒由布达佩斯出发到各地传扬真道，信徒在各地建立起聚会，远达土耳其边境一带。同时在美国，也有不少教会成立。

拿撒勒教派信徒所到的各处，都能表现出他们是服从守法的人，但他们却坚决拒绝服兵役，也不肯起誓。他们虽然表示肯充当任何非战斗性的任务，但军事当局并不予以谅解同情。又因他们人数众多，使政府方面更加紧设法摧毁他们的反抗势力，好争取他们，因此不惜运用严厉对策，以致大批信徒被下在监牢，不少人就此远离亲友，在牢中凄惨痛苦的景况下，渡过大半生。他们一批接着一批地给解到法庭上受审，被处以长期的徒刑——刑期很少定十年以下的，他们却表现出无比的坚忍及顺服，赢得了不少未信的人的钦佩。殉道的事件继续不断地出现，信徒们除了受到监禁以外，还备受了不少残酷的折磨和凌辱。有些信徒在快要服满刑期时，忽然获得特赦，提早出狱，并得以恢复所有的公民权利，可是政府立刻征调他们入伍服役，当他们又再度表示抗拒时，政府便又再判刑，刑期和先前一样，但以前服刑的年日一律作废，重新开始服刑。

弗若列池因着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大力的痛斥当时那些大教会——天主教的和抗罗宗的徒有形式的宗教，而拿撒勒教派信徒，在抨击一切他们认为与新约圣经教训相违的主张上，也总是不遗余力；他们曾称其中一个路德派教会为“一窝强盗”；他们也大部份深信在自己的教会之外，人根本无法能得着救恩。弗若列池的教导，往往流露出这类极端的论调。

他写书论到“敬虔的奥秘和不法的隐意”（提前 3:16；帖后 2:7），指出世人现今所受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亚当犯罪的结果，因为这些罪恶和过犯，已因基督受死而除掉了；世人受苦，是因不信基督，撒但就趁机把世人引入第二次的受欺和第二次的堕落，方法就是利用那些所谓基督教会的愚昧；他们以为借着婴儿受洗和其它的宗教仪式，就理所当然地入教，却不认识到自己必须从罪恶和拜偶像的邪恶中悔改回转，并因信脱离撒但的权势；那些徒有外表的宗教仪式和虔诚，并不带着属灵的能力，那正是撒但第二次蒙蔽欺骗人的手法，给世人带来第二次的灭亡。只有那些蒙神呼召，并因完全成圣而使他们的蒙召得以坚定的人，才能脱离撒但的权势。

这些弟兄们故居在多瑙河(DANUBE)中部广阔的山谷和平原地带，并深入巴尔干半岛；他们那种严肃及安静勤劳的生活表现，使他们明显地在世人中分别出来。长期的受逼迫叫他们的心志更见坚强，无可摧毁；另一方面，他们虽然经历一连串的逼迫和压制，受到了极严厉苛刻的对待，但却一直持守着坚忍包容的态度，不以恶报恶。他们的敬拜和教会生活，纯朴而合乎圣经的原则，对居住在他们四周的人作出了有力的见证。

第十六章 葛若弗斯、穆勒、卓曼

一八二五——一九〇二年

在都柏林成立的教会——葛若弗斯(A.N.GROVES)——与信徒前往巴格达——工作开展——瘟疫与水灾——葛若弗斯太太去世——来自英国的同工——科屯上校(COLONEL COTTON)——葛若弗斯迁至印度——在此停留的目的——把传道工作带回去新约圣经的样式——使神的子民重新合而为一——穆勒(GEORGE MULLER)——革拉克(HENRY CRAIK)——在英国毕士大教堂内成立教会，实行新约圣经的原则——穆勒往访德国——设立团体及孤儿院以激励对神的信心——卓曼(ROBERT CHAPMAN)——伊文思(J.H.EVANS)——卓曼悔改信主——他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的事奉和周游传道——接受圣经为唯一指引的个别团体

在十九世纪初期，有不少人相信，在个人救恩及行为上，甚至在教会的次序和见证上，返回圣经教训的理想，不单是必要的事，也是可能办得到的，于是有人极力设法将这个理想实现出来。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是住在普里茅斯的一位牙医生；他因在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几度前往都柏林(DUBLIN)。一八二七年在该地解逅伯勒特(JOHN GIFFORD BELLET)——一位执业律师，是当地的居民。两人因研究圣经而彼此认识，在一次的闲谈中，葛若弗斯指出，圣经记载：跟随基督的门徒，照着主所吩咐的，可以自由聚会擘饼纪念主；而且如果他们乐意照使徒的榜样去行的话，他们就会把主日分别出来，纪念主的死，正如主快要离开使徒们的时候所吩咐他们去行的。不久以后，两人在都柏林找到一群信徒，他们老早已经是这样行了。

最初参加这些信徒的人中，有一位叫克伦宁(EDWARD CRONIN)，他原来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但后来与独立教会多有来往。他深知神的子民基本是合一的，因此一直经常与那些脱离国教的不同教会的信徒，一起擘饼纪念主。他在都柏林安顿下来以后，发觉如果要能和这些不同教会背景的脱离国教的信徒一起擘饼的话，他就必须要参加其中的任何一个教会。他晓得这样的作法，是与他所领受的合一的真理大相抵触的，因此他拒绝妥协，于是有人在这些教会中的一个讲台上，公开的指责他；可是马上也有人抗议这项指责，这人是圣经公会中的一位同工，结果他和克伦宁两个人在自己的家中祷告，擘饼纪念主，接着就有别的人来参加，他们就把聚会移到克伦宁的家中，一八二九年，聚会的人数日增，结果便迁到在他们当中聚会的纒琴孙(PRANCIS HUTCHINSON)所借出的房子内聚会。

在此同时，在都柏林又有另一个类似的聚会建立起来。在一八二五年左右，柏纽尔(JOHN VESSEY PARNELL)（亦即日后的刚够屯爵士(LORD CONGLETON)和他的两位朋友在周日聚会读经祷告，但到了主日，各人就分头回到自己的公会内聚会；为此，他们心感不安；为了要显明神儿女们合一的见证，他们设法要找个合宜的聚会，免得这见证受到拦阻，但过了许久，他们仍然无法找到合适的聚会；后来他们看清了，聚会不一定要在分别为圣的房子内举行，也不一定要由正式封立的牧师主持，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房子内自行聚会，并且擘饼。过了不久，他们当中有人在主日遇见在伯勒特那边聚会的弟兄，交谈之下，发现虽然大家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却彼此分道扬镳；因此不久，两个聚会就合并起来。当时葛若弗斯经已离开英国，但伯勒特那里的聚会，又有一位在教会里事奉的年青弟兄加入，他就是达秘(JOHN NELSON DARBY)；这些人不久就与在纒琴孙家中聚会的弟兄们合在一起，聚会选在大家认为方便的时间举行，以便那些愿意同到自己所属教会聚会的弟兄们不致感到为难。

聚会的人数渐渐加添以后，大家感觉到在私人家中聚会，有点不便，于是在安及亚街(AUNGIER STREET)购置了一座拍卖场所，作为聚会之用，信徒们都感到主的同在和祝福，大大的喜乐。克伦宁追

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当我们在星期六晚上移动家俱，把饼和酒放在桌子上时，我的灵里面充满了何等大的喜乐，委实是毕生难忘的；这一点感受，柏纽尔，史杜斯(WILLIAM STOKES)及其它弟兄们，都与我一同分享，我们十分相信我们的主喜悦这样开头的聚会。”

后来他们偶而又发现到，在英国岛屿及其它的地方，有个别的聚会是与他们同有一颗心志，就是属主的子民该返回切实遵行主的话，照着自己所能领会的主的吩咐去行；这些个别的聚会，往往彼此不相识。还有不少个别的信徒，一发现有其它弟兄们正照自己所曾领受到的亮光去行的时候，就马上参加到弟兄们的聚会去。

葛若弗斯在都柏林传道的工作，大有果效。他的年纪还轻，事业亦大有成就，婚姻美满，他和三个儿女住在厄克协特(EXETER)，有一群意味相投的亲友。他在十余岁还没有悔改得救以前，就觉得基督徒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去当传教士；所以当他信主以后，他就愿意奉献自己去海外传道。他所心爱的妻子，与他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悔改，和他同有一颗心志事奉主，并且乐意将他们的家庭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分给穷人，后来这些奉献出来的钱财，增加至收入的四分之一；最后，他们看清了自己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于是决定不再为自己积存财富，也不再为儿女们储存金钱，把家庭支出尽量节省下来，将全部家财献上给主。可是，葛若弗斯太太，起初并不同意丈夫去当传教士，到海外去传道。

葛若弗斯既然知道妻子不赞成，就极力约束自己，不再向她提及去海外传道的事。可是，他妻子因为周济的时候常与那些贫困痛苦的人接触，心里深受感动，有了更深的经历，几年以后，心里终于也放下了歧见，同意她丈夫心中所要去行的。

他们感到第一件要去作的事，就是让教会把葛若弗斯按立为牧师，由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他们往海外去。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不时要往三一学院去，也就因此使他有认识伯勒特，与他交谈之下，引出了聚会的建立，一起擘饼。在稍后一次彼此见面的时候，他领会了圣经所启示的，明白圣灵自由运行在传扬神的真道上，看清自己无须经过英国教会按立，也可以出外传道，因此他对伯勒特说：“我深信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应该单纯，像当日的门徒一样，没有必要一定要站在讲台上，或是受按立；我们应当相信主会照着他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教导，并启示他自己。”伯勒特后来追述说：“当他一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深信自己已得着正确的答案。当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好像不过是昨天所发生的事一样；那一刻，我心灵也获得了更新。”

但葛若弗斯仍旧希望能受英行教会的差派，因此就去伦敦，请求以普通信徒身份接受他们的差遣；可是他获悉，如果自己保持普通信徒的身份，就不能领擘饼纪念主的聚会；就算当时没有正式受按立的牧师在场，他也不能领聚会。于是他撤回自己的请求。他在厄克协特曾受浸，但当别人对他说：“你已经受浸了，那你当然是浸礼派的。”他马上回答：“不是！我不过是愿意效法任何跟随基督榜样的样式；我绝不愿意因加入了任何宗派，而使自己与其它信徒隔绝。”

一八二九年，葛若弗斯夫妇俩人，携同九岁及十岁的两个儿子，和儿子们的私人教师契度(KITTO)（后来成为著名的圣经学者），并其它的一些信徒，一同出发，取道圣彼得堡与铁夫烈斯，往巴格达。途中路径南俄罗斯一带，与当地门诺派的信徒相会。后来他们横越高加索山脉的丘陵地带，远远看见雄崛在其中一座山巅上的索撒城(SHUSHA)，他们的车子爬上陡峭的山坡后，来到他们首先到达的一座

大房子；房子内的人，是巴色传道会的传教士普芬达(PFANDER)和撒伦巴伯爵(COUNT ZAREMBA)；他们马上把弟兄们接进屋内。这两位传教士在该处一带作了不少善工，直到后来他们被逐出境为止。普芬达还陪同弟兄们一起到巴格达，逗留了一段日子。他因以往的工作经验，又因能操当地的语言，使工作得以提早开展。这次旅程的需用，得着各方面的供应预备。葛若弗斯记述说：“我没有得着任何组织的资助，十分快乐，能自由在称为基督徒的人和回教徒当中工作；我可以对其中的任何一位说：我并不打算把你带去任何教会，只愿意把你领回去神话语的真理那里；也可以对其它的人说：我们盼望你能好好地读圣经，学习分辨神的真道，不根据你在周围教会内所见的，单凭神自己的话。”

这一行人就在巴格达安顿下来，马上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借着医治病人的工作，与当地居民接触，又开办学校，大受欢迎。亚美尼亚人肯来听福音；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当中，也有一点机会；回教徒的态度则甚为恶劣，但弟兄们也有机会和其中的一部份人交谈。

葛若弗斯说：“末世的日子里，教会的使命有两个大目标：一是在各地印发基督的见证，一是在巴比伦势力下被掳的属基督的羊群呼召出来。”

踏入第二个年头的时候，他们所开展的工作渐有起色，但战争的风声和瘟疫的威胁，愈来愈紧张。后来瘟疫在城内散开的时候，他们去留的问题，亟须马上解决；有许多人已经离开，但弟兄们顾念到工作刚刚开展，而且又渐入佳境，且获悉已有一批增援人员从英国来，已经在途中了，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瘟疫蔓延迅速，居民们仓皇撤走，但围城入侵的军队，把出路截断。城内闹着严重的水荒，盗匪乘机四出抢掠。城内的居民半数已离开逃难，所剩下来的四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死于瘟疫的人日达二千。后来城外河水泛滥，城内被水慢慢渗入，城墙终于溃崩，洪水淹至，冲走了数千间房屋。当时正受瘟疫威胁的居民，只好挤住在一起，粮食的供应渐渐短缺，在一个月內，城中这三万居民苦不堪言。城四周三十哩內的庄稼在正要收割的时候就给摧毁无余。那些传福音的弟兄们，目睹四周那种难以言喻的悲惨情景，内心痛苦万分，可是葛若弗斯却仍能作见证说：“主赐给我们极大的平安，也使我们在他的爱顾下平静安稳；凭他的应许的确据，我们必能继续有饼，也有需用的水。只有为了服事这样的一位主，我才能留在这种光景下工作；我深信主会继续作工，直至主在这些蔑视神的儿子的名并祂的所是和所作的人身上完成祂的审判为止。我盼望在这些入当中，主要为祂自己留下余剩的人；这些灾祸都是为了他们的回转而预备道路的。……主叫涨溢的河水停于我们街头的那小块低地，因此我们的房子未被淹没，各人的性命也得保存。”谈到那些正在开展的工作受到遏阻的时候，他说：“在这种多灾多难的日子中，心灵能在神面前保持安息，实在须要对他的大爱有极大的信心和经历才行。目前我们的处境可说是四面受困：远离祖国、走投无路、哀鸿遍野，而自己却束手无策。可是，尽管在这样的光景下，主仍因祂那无穷的怜悯，保守了我们，使我们平静安稳，倚靠祂那大能膀臂的荫蔽；虽然有千万人在我们四围仆倒，但我们每天仍能照常聚会，人数也没有减少。还不只如此，祂也使我们知道为何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为何叫我们认清不能在这个岗位上退下来。”

洪水渐退，瘟疫亦停息。就在此时，这一家人中那作妻子和母亲的玛利却病倒了；她一直是全家人的支柱，她的爱心、恩慈、和坚固的信心，长久以来作了众人的扶持。她的丈夫和一位忠心的看护，悉心料理她。她一直满心的相信他们这一家人应该继续留在巴格达，现今面临与丈夫、儿子、及不久前才生下来的婴儿诀别之际，她说：“我希奇主的作为，更希奇自己能在这种处境中有安息。”她病逝

了；她的丈夫一面在哀伤中，一面却赞美说：“眼看着自己心里爱得最深最长久的人受疾病的折磨，而自己却爱莫能助，那实在是叫人感到十分难堪的事，明明知道那位让疾病临到的天父，大可以叫她脱离疾病，可是似乎祂是掩耳不听我的呼求。但是与此同时，在我心中的深处，我感到无论如何，祂是一位有无限慈爱的神。撒但利害地试探我，但是主借着诗篇第二十二篇叫我看见，那儿有一个更迫切的呼求，主也明显地没有垂听。虽然我至今仍不能真认识祂那圣洁蒙福的道路至终把我引到甚么目标，但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已得胜了疑惑，顺服了我父的旨意。”

接着那才生的婴儿也染上病，作父亲的虽然悉心护理，可是婴儿结果也夭折了。葛若弗斯最后自己也病倒了，几乎要死，可是结果病愈，也很快复元。

瘟疫和水灾的威胁一旦解除以后，围城的军队立刻加紧进攻，城内是一片混乱，暴民四出抢掠，葛若弗斯的房子迭受搜掠，可是虽然弟兄们完全没有还手的力量，却一个也没有遭害。炮弹在房顶上呼啸而过，房子也被炮弹击中；街上的暴动频仍，信徒们的遭遇十分恶劣。最后城被攻陷，但入城的军队的表现出奇地温和有节制，因此城内的秩序很快就恢复正常。

一八三二年夏天，那期待已久由英国来的增援人员，终于抵达。人员中包括鳏居的克伦宁，并他那还在襁褓中的女婴和他自己的母亲；还有柏纽尔和纽曼(PRANCISW. NEWMAN)（他的兄弟就是日后著名的红衣主教）。葛若弗斯和弟兄们心中大得鼓舞；大家立刻开始加紧作工，一起专心查考圣经，彼此交通，彼此扶持，得以进入对神更丰满的认识，并那属灵敬虔的知识。他们凡物公用，每星期五禁食祷告，殷勤学习圣经；许多人听道后悔改信主，那种情景委实叫人毕生难忘，那些日子也叫一部份不同国籍的弟兄在神里面开始新生。

在前来巴格达的途中，克伦宁的妹妹嫁了给柏纽尔，但她不久就去世，她的母亲亦跟着死去。于是同年纽曼和契度连袂返回英国，要征求更多信徒来协助。翌年，科屯上校(COLONEL COTTON)来巴格达探望弟兄；他曾在印度工作多年，在当地协助居民治服三角洲的水患，为当地带来极大的繁荣。葛若弗斯跟随他前往印度，留下弟兄们在巴格达独自作工一段时期。

往印度去的目的，正如葛若弗斯自己所记述的，是“要与当地所有传福音的团体能在心灵中有更真实的合一，要表明不管彼此之间容或有分歧，我们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他们愁苦的时候，我们为他们忧伤；他们兴旺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他已往那些深刻的经历，使他果然能有这样的感受；而他那特别纯真的谦卑性格，使他能很快认识到别人的长处，而不轻易责备。他对圣经的知识和在工作上的实际经验，使他有充份资格能向别人提出明智的忠告，且能提出各种改善的对策，而不是只会夸赞恭维。他清楚看见亟须福音拯救的无数灵魂的急需，所以即便所用的方法不是十全十美，他也不反对；要用尽一切方法去传，总比不去传福音为佳。此外，他又希望能在基督教的国家以外的地方，例如印度，使信徒能摆脱一切公会的歧见，显明神的众教会那因信服圣经和出于爱心的容忍，彼此真实的合一；这样，福音传播的主要拦阻，才得以除去。这个理想，十分伟大，也实在值得他不顾一切地去争取。当他周游各地，探望不同宗派的传福音团体，或在某地停留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所显出来的恩慈、能力、和舍己的爱心，使许多人悔改回转，结出了许多果子。可是，当他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到一些在某方面离开了真道的个人或团体时，他就受到反对。他那出于爱心的事奉，被这些传教团体误会为刻意的批评，说他的作风自高自大，还说他所作的会威胁到这些团体的安定，这一点，使葛若

弗斯深感痛苦。

他这样的记述下来：“学习与我们所亲爱的主一同受苦、一同谦卑，实在不容易(腓 2:3-10)。但是，我想我们忍受身体上或心思上的试炼，远比在世人面前降卑为易。我们定要能领会到——我们的降卑，事实上是自己的荣耀，而我们的软弱，正好是叫自己得能力——那实在须要极大的信心。不论我往何处，我都看见那些对立的歧见所带来的坏影响。我深知道：如果不跟随我们的主，而去跟随世人的样式的话，就会叫自己失去能力；如果保持自己清高，虽然能保全自己的能力，但是那能力仍是属地的。呵，巴不得主兴起人来，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在印度，当人在心思里接受真道，真理就大有能力地充斥在他心中，比一般在英国接受福音的人更明显。在印度的信徒，他们只有神的话语，那些自认是宗教人士的圈子比较少，影响不大，所以信徒都能单纯地依据圣经的教训去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比现今这日子更形重要；我们要尽力使他们不要受那些邪恶的宗教势力所吸引，就是现今正在折腾着欧洲众教会的属地的骄傲和权势。”他又说：“对印度来说，这个时代所具备的重大意义，比任何其它的时代都更大，直至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自由敬拜及事奉；许多人因读神的话，或因别人的引领，悔改归信，饮于生命的活泉中。可是，英国教会现在却要扩张它的势力，而独立教派和循道宗也在把自己关闭。”

“我在印度工作有双重目的：一是要克制这些排外的宗教组织的活动，指出在基督教会里面，不可能全体信徒都是圣洁和道德完美的；二是要帮助每一个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肢体，明白自己在身体的功能上，各有本份，要彼此劝勉激励，专心服事主。如果主允许的话，我有一个迫切的心意，要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一个教会；我也十分渴望能将所有传福音活动的计划，重新改组，使它能依照神的真道的原则去行，主叫我所得着的激励，远超我所想所求的；我得着出于爱心的接待，不是只有一个团体这样接待我，而是所有的团体。”又有一次，他这样记述说：“我所涉猎的愈多，愈看清楚欧洲人在印度所作的福音工作，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作的，也看清楚如果他们不与本地人融合在一起的话，工作的果效一定不能长久。当我一想到这些阶级性的问题，就联想到神的儿子如何降卑自己，也就更看出他们那样的作法，是如何不像基督。基督既是在荣耀中与父原为一，祂却倒空了自己，成了罪人的肉身的形像，与税吏和罪人为友，好使他们得拯救，那么，有些如虫的人，竟然怕受玷污，不肯与其它也是如虫的人一同吃喝，一样的生活，这种态度委实是可憎可恨。主所给彼得的启示，明显地指斥这种态度：‘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当他安排在印度的生活时，他说：“我们立志要在家务的安排上尽量简单，尽量撙节，而一切的计划只为了传扬福音。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打破在欧洲人和当地人之间因骄傲而筑起的隔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传教士出外工作的时候，应与二至六位的本地人同工一起前往；大家一同吃喝，一同起居，一起谈论关于神的国度的事，就如主自己预备他的门徒所作的，一句一句地教导，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照着他们所能领会的程度，并且由始至终，认定自己的本份，不勉强人去作自己不愿意作的，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要凡事以身作则，作弟兄们的好榜样。我并没有感到绝望，相信总有一天，在印度给兴起一个教会，在这个基督教正面临乌云密布的日子里，成为信徒的一个小小的避难所。”

葛若弗斯返回英国，再度结婚以后，又回到印度去，随行的有一班传教士，包括鲍顿(BOWDEN)和彼亚(BEER)两兄弟和他们的家眷，他们就在三角洲一带工作，而葛若弗斯本人则在马德拉斯(MDRAS)安顿并工作，以前留在巴格达的同工们，前来与他会合，一起作工。他多年来，一直是仰望主借着神其它的仆人所馈赠的，得着一切供应，现在到了马德拉斯，情势叫他感觉到，他应该学效保罗，按照环境的需要，或靠众教会的馈赠而维生，或自己亲手作工以糊口；于是他决定重操牙医旧业，事业相当顺利。

他过去为了协助个别不同的传福音团体所作出的努力，引起了其中一部份人的反对，并排挤他，敌视他，使他感到相当难受，这是使他离开马德拉斯的原因之一。他迁往直度亚(CHITTOOR)，使该地不久后就成为很活跃的福音工作中心。

为了鼓励事奉主的人，尽可能亲手作工以维生，同时让其它从事各行业的人，有机会作属灵的事，葛若弗斯买了田地，起初从事蚕丝的培育，后来种植蔗糖，使许多人得着从业的机会。这些事业曾蓬勃一时，但后来也曾有了亏蚀；有一次为了要扩展营业，接受了一笔借款，使他劳苦营役、操心挂虑了一段日子，后来终能将债项还清。在这段时期，他写了一封信去英国，表明他当时的意图：“叫你们的馈赠显得加倍可贵的，是你们对我们每个人所显出的不停的爱心，并神在这些荒凉，无人纪念的地上所施行的大工。我相信我们对现在实行的传福音方式，都感到很有意思：我们若不是亲自作工，就是与那些称为‘从事正当行业’的信徒，一同工作，……因而为其它的人，作出好榜样，叫他们学习作工，扶持软弱的人。我们最近听说，有好些其它的传教士，对我们这些办得颇为成功的活动，深感兴趣。那位称为阿若立本(AROOLAPPEN)的本地青年，数月前离开了我们这里，在不断的打击和不停的试诱下，直到如今仍能矢志不渝。他离开这儿的时候，是决心往邻近这儿不远处的人口稠密的地区，开始作工，并有一位该地的弟兄协助他；这位弟兄立志专心建造，就像当日犹太人在多灾多难的日子，一手拿镐、一手拿兵器，专心重建城墙。亲爱的阿若立本拒绝接受薪酬；他说：如果他是受薪的话，那些人一定会说他是为了薪金而传道。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因为他给我们作过一些翻译的工作，我就打算按月给他一点生活津贴；但他不像那些本地人那样，坚决拒绝任何津贴。以前我提及过的那两位弟兄，也决心学习这样凭信心生活；他们两人，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本地的装钉书籍的工人。”提到这位英国弟兄，他说：“他适应这儿的气候，一天行四十哩路，全不感到疲乏。他能写和读泰米尔语(TAMIL)和提理古语(TELEGOO)。并且相当流畅；他放弃了一份月薪三十五卢布的职业，一匹马，和一座房子，为的是为神作工。他的小马车内塞满了书籍和单张，及其它出售的物品，遍游操泰米尔语及提理古语的地区，一面用当地的土语向那些土人传福音，一面也用英语向驻防军事基地的英军传道。他带领了两个土人信主：其中的一位是……那位书籍装钉工人，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仆人。我可以保证说：就算是除了这两三位弟兄以外，我们并没有结出其它的果子，而这两三位弟兄能如此有原则地去事奉，我们的劳苦，在基督里委实并没有归于徒然。所以我想：在神的引导下，我们在印度居留的这段日子，在当地的那些信徒和异教徒中，建立了这种事奉的方式；而我也相信，靠着神的恩惠，我们若能坚持下去，就可以叫这样的事奉得以坚立并扩大。那些认识这地方的本地人的性格的，我敢说他们也必与我有同感，同意这种让本地人学习专一倚靠神，为的是使他们培养出独立的性格。在好些地方，当地的信徒并没有培育出独立见证的能力，深以为憾，一时也没有找到任何补救的善法。本

地土人的天性是贪爱舒适，喜欢仰赖人，结果他就失去了独立的能力；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欧洲人爱以统治者自居，使本地人屈从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但事情很明显，如果本地人的教会不学习倚靠神刚强起来，而倚赖人的帮助的话，若政治风云在瞬息间变色，那么目前这些靠欧洲人建立起来的一切，都会给扫除净尽，不留一点痕迹。最近有一次，阿若立本回他本乡探望家人，和当地那一大群工人讨论到这些事奉的原则，虽然他并没有在家乡留下来，但他的工厂离该处不远，他们仍可以亲自观察他的生活和工作的原则。因此我们要求你们要为这圣灵所刚显出来的能力切切祈求，好叫我们的弟兄能以真正的谦卑和倚靠神的心灵，继续作工。我们这样使本地信徒的牧养和交通，建基在单纯的基督信仰上，这委实是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我们没有来印度以前，除了受按立的牧师以外，本地信徒一律不得主持擘饼聚会或施浸；所以当我们的弟兄阿若立本和安得烈(ANDREW)与本地的信徒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引起了一阵你所想象不到的骚动和惊讶。有好些人，因为不停在圣经中查证，已经能在这些在事奉上和教会有关的问题上，看清楚那该有的新地位。”

虽然如此，葛若弗斯也明白有时也会有人蒙召全时间事奉。他说：“神所呼召的人，应该全时间把自己摆上事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要有好的聚会，就必须要有有人所公认的有牧师和教师恩赐的人，而他们也必须是神所需要及命定的。有一些聚会，主并没有为他们预备全时间事奉的工人，我不会反对与这些聚会的信徒联合；但是，若有人以为有全时间事奉的工人，就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那么我个人会感觉到不能与他们联合在一起。”至于他自己，他当时这样说：“如果主能把各样难处除去，我十分盼望能把我所剩下无几的余生，专一事奉主。”他提及有两位英国教会的教友，曾大大帮助过在三角洲工作的鲍顿及彼亚两兄弟。他说：“虽然这两位教友的背景是属宗派的，但实际上他们本身并不属于宗派。和一些名义上是属宗派，而实质上没有宗派观念的人打交道，总比与一些虽无宗派的背景，但却有宗派观念的人交往，要胜十倍。”

一八五三年，葛若弗斯返英探亲，染病身亡；虽然受到疾病的痛苦，但他安然在布里斯多(BRISTOL)穆勒(GEORGE MULLER)的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另外有一位深信并绝对顺从圣经教训的重要性的人，就是穆勒。他本是普鲁士人，在一八〇五年生于哈伯斯特(HALBERSTADT)附近的地方。他曾攻读神学，但生活放荡邪恶，甚至曾因讹骗人而入狱。正当他郁郁不乐之际，他的朋友带他参加一个在哈勒的家庭聚会，听人讲解圣经，当时他年二十岁。虽然他以往读过不少圣经，但那天所听见的，是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马上就深被那满有大能的话语所感动，不久以后，他就用信心接受了主耶稣给他的大爱和他的宝血救赎的大功。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以后，他灵里面还有不少的挣扎，但他那每天经常读经和恒常祷告的习惯，使他对神的旨意的认识，不断的增加。

他十分盼望作一个向犹太人工作的传教士，于是便往英国去读书，打算日后在伦敦的犹太人传道会(LONDON JEWS SOCIETY)内任职。到了英国以后不久，他喜悉葛若弗斯如何为去波斯传福音而放弃入息优厚的职业，又知道他如何仰赖主供应他的需用。后来因健康的原因，穆勒给送去提恩茅斯(TEIGNMOUTH)休养，他在那儿认识了革拉克(HENRY CRAIK)，两人日后一生成为了密友。革拉克本来是葛若弗斯家中的成员。穆勒在提恩茅斯继续蒙受各样属灵的福气，特别是更清楚的认识到的话是信徒唯一的指引，而圣灵是唯一的师傅。他在接受更多的亮光以后，心思上为了加入传道会而作难；

后来得了传道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彼此解除合约的关系。他离开传道会的原因是：他看清楚如果自己受路德会或圣公会按立，就是违反圣经原则，而且这些公会，事实上是世界与真正的教会的混杂，所奉行的教义，总会叫人离开神的话，又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团体，就算他们从圣经中得着亮光，也很难改变他们的路线。此外，良心不许他在传福音的事奉上接受人的命令和指派。他身为基督的仆人，就应该只接受圣灵的引导，决定事奉的日子时间和工厂。他虽然爱犹太人，也不应单在他们当中工作。但是那时他碰上了难处，因为他曾接受传道会的经济津贴，有责任要完成训练，但后来传道会给他格外宽大的处理，事情完满的解决。

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生活上的需要，但他并没有为此事烦恼，因为他深信主的应许，正如写在马太福音七章七、八节；六章廿五至卅四节，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里面的，深知如果他自己真能先寻求神的国和祂的义，其它一切生活所需的，主就必会加给他。正当此时，提恩茅斯的以便以谢教堂(EBNEZER CHAPEL)的牧师辞职他去，该教会全体十八位信徒邀请穆勒出任牧师，年薪五十五英镑。他接受了邀请，经常在他们当中工作，但也在附近许多地方传道。他发现他在讲解圣经的工作上，最有果效。

有一天，他听到三位主内姊妹在谈论受浸的事。他虽然向来主张婴儿受洗，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就这个问题查考过圣经，于是他决心好好地查考圣经，明白了圣经的教训是“信而受浸”。他想到要去实行自己的领受时所可能遭遇的种种反对，但他确信这是主的旨意，要他切实遵行祂的命令，于是他便受浸。过了不久，他又看清楚使徒所留下的样式，是在每个主日擘饼纪念主，虽然这并不算是个命令，但却是该如此行的；他又明白：圣灵要借着他自己所拣选的弟兄，自由运行的作工，好使众人因主在信徒当中所显明的各样恩赐而得着恩惠。这一切的启示，经过全教会的考虑后，便付诸实行。

同年（一八三〇），穆勒娶了葛若弗斯的妹妹，她与丈夫同一心志，要寻求认识并遵行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旨意，她特别关心到接着要采取的步骤，因为她 and 丈夫都已看清楚不该再接受由教会供给的固定薪金，穆勒终于决定放弃薪酬，但这一个行动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在神面前立志永远不求人的帮助，也永远不要向人泄露他们的需求；他们只要仰赖主来供应他们的一切所需。约在此同时，他们也蒙恩学习切实遵行主的命令：“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五十年以后，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当时我们所作的决定。我们的神，在他的仁慈怜悯中，一直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以坚定所立的意愿，并实行出来，我们也因此真正的经历了神对他的儿女所显明的大爱和看顾，甚至在最微小的事上，神从来不叫我们的等候落空，这些经历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尝受过的，格外叫我们能更完全的认识他是一位听人祷告的神。”

一八三二年，穆勒和革拉克搬到布里斯多工作，在基甸教堂里作了一段时日的牧师工作，但他们也租用了毕士大教堂，起初的租约以一年为限，有一位弟兄和四位姊妹在那儿和他们一起聚会，“并未设立任何规矩，只想着要依照主借着祂的话所启示出来的去实行。”这个小小的聚会慢慢的长大起来，打从开始时起，聚会是十分活泼，他们多作善工。过了五年，他们当中产生了难题，使他们不得不要查考圣经，好寻找出答案。原来起初教会成立的时候，所有的成员都是已经受浸的信徒，后来有三位姊妹请求参加，她们的信心与敬虔，都绝无问题，可是她们并未受浸，而且在有人向她们指出有关的圣经教训后，仍然不感到有受浸的必要。教会中大多数人，包括穆勒和革拉克，都认为可以接纳交通，

但有几位弟兄觉得接纳未受浸的信徒，并不合宜，经过详细的交通以后，反对的人只剩下几位；有一部份人是得着卓曼(ROBERTCHAPMAN)的开导；他为人敬虔、深识圣经、处事有方，所以深得众人所敬重，他用下面的推理方法解决了这个疑问：未受浸的信徒，只能属于下面两种人之一：一种是不按规矩而行的，那我们就必须远离他们(帖后 3:6)；另一种就是并非不按规矩而行的。如果信徒是不按规矩而行的，那我们不但要在主的桌子前远离他们，而且还要在一切的事上，包括彼此的交通往来，我们都要采用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我们和按规矩而行的弟兄交往的态度，大有分别。可是目前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受了浸的信徒，绝对不该这样待他们那些还没有受浸的肢体，圣灵也不许可他们这样作，祂见证他们虽没有受浸，却不等于就是不按规矩而行，因此受了浸的，和没有受浸的信徒之间，可以有最宝贵的交通；圣灵也不容我们拒绝与没有受浸的信徒在祷告、读经、社交、和对主的事奉上有相交。但如果他们是不按规矩而行的话，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就不能与他们在任何的事上有相交。教会审慎考虑的结果是：“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罗 15:7)，不管对方所蒙的恩惠及所得的知识有多少。”因着这个决定，有几个人离开了教会，但后来大部份都返回教会，此后也再没有因这个问题而发生争论。

弟兄们不久又开始思索有关长老，教会的次序和管理的问题，因而专心查考圣经，发现主自己在每个教会内都设立了长老，负责管理和教导，虽然教会衰微，但仍然该照着使徒的日子所作的那样行。那意思不是说：凡在教会交通上有份的信徒，就可以随己意选立长老。不是的，他们要等候神兴起有资格作教师和管理教会的人，是照着圣灵所选立的；圣灵暗中呼召那些受选立的，赐给他们当具备的条件，并祝福他们所作的工；圣灵也同时向其它接受长老服事的信徒启示，使他们明白，又承认那些弟兄所接受的作长老的职事，并同心把他们交托给主。关乎管理和教导的事，必须在全教会中作最后的决定，由全体负责。“至于接纳弟兄的事，长老和全教会都要学习顺从主的命令：我们必须照着圣经的吩咐，接纳凡真实相信基督的人。圣经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上面的各项决定，都不是教会所定出来的规则，只不过是表明信徒们的领受，和他们所决心在没有从圣经中得着更多的亮光以前所要行的。说到守主餐，虽然“我们并没有领受任何有关应守多少次的明文规定，但照着使徒们和早期门徒的榜样，我们决定每个主日守主餐。”“既然在守主餐的事上，我们一同分享主的死、并与主联合及与信徒联合等所带来的一切福气，我们就该趁机会让教导的恩赐显出来，有弟兄讲道，信徒们也在祷告和敬拜赞美中彼此相交。可是，如果聚会中只规定一个人讲道，那么我们在彼此的恩赐上分享的事实，就不能完全彰显出来了，因此聚会的方式，应该让那些有恩赐及有责任教导的人，有充份的机会，不要给他们限制。”

一八四三年，穆勒往德国去探望弟兄们；在他们的邀请下，停留了几个月。他们乐意接受他们在他们当中的事奉，但不许可他与他们一起擘饼，原因是穆勒同意与国家教会的基督徒，和那些还没有受浸的信徒一起纪念主的死。他们甚至要穆勒答应以后永不和那些虽然本身已受浸但却同意与还没有受浸的人相交的信徒一起擘饼聚会。

论到这些事，穆勒说：“这些神的儿女认识到；依照圣经教训，信徒要受浸；也认识到应该脱离国家教会：这一切的认识是正确的。……可是他们过份强调了这两点。虽然信徒受浸，不错是神的真理；虽然神的儿女认识到教会是‘信徒的聚集群体’，因而必须脱离国家教会，这也是正确的认识，因为他

们看清楚了在国家教会内，不外是世人与一些真正信徒的大混杂。可是，如果把这些认识过份高举，过份强调，好像是唯一的真理那般，那么，必定会招惹属灵的亏损。不仅是这样，任何一部份的真理，就算是最宝贵的真理，就如关于我们在基督里复活，或关乎我们所得着的从天上来的呼召等真理，如果有人要过份强调，又过于注重的话，早晚会叫他在灵里受到亏损，如果这个人本身是教师，他就会连累那些受教导的人。在司徒嘉德(STUTTGART)这地方，情况正是如此，对于这些亲爱的弟兄们来说：受浸和脱离国家教会这两件事，比一切真理更重要。‘我们才是教会；只有在我们中间才能找到真理；其它的都是错谬里，都是被掳去巴比伦的。’这是我们的弟兄们所常使用的字眼。……”“愿发怜悯的神教导他们，保守他们，也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革拉克和穆勒这两位弟兄，坚信每一个信徒都必须作基督的工，方式可以不拘，但所采取的方法，却绝不能向人求助，尤其是不能向那些不信的人求助，只能凭信心向主祈求。为了实行这个信念。他们在一八三四年成立了“圣经知识协会”(THE 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ION FOR HOME & ABROAD)，目的在协助那些根据圣经教训去进行教学的日校、主日学及成人学校；散发圣经；援助遵照圣经吩咐去实行的海外传教士等。当时已有不少各式各样的宗教社团，他们也不否认这些社团作了一些善工，可是在一些见解上，他们不能存无亏的良心而与他们合作，因此他们便创立了这个新组织。他们说：这些宗教社团工作的目标，是改良世界，使所有世人都悔改；可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只有在主再来的日子，世界才会回转；在现今的世代，从属灵的这方面来说，世界只会一天比一天败坏，主却要从万民当中把一些人召聚出来；再者，这些宗教社团都和世界保持联系，只要缴交所认捐的款项，就是不信的人也可以加入为会员；而且这些团体还常向不信的人募捐；当主席的，或赞助人的，也多是由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出任。此外，这些团体有时还会负债；这一切都是与新约圣经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因此弟兄们立志不向人请求经济援助，但若有人甘心情愿捐助的，他们也乐意接受；他们也决定不容许不信的人参加协会内的工作，也不要因工作的扩展而负债，宁愿在祷告中“把协会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并按着神所预备的去行”。协会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开始了，起头的时候并没有甚么基金之烦，但从其中不停地流出祝福，叫愈来愈多的人蒙恩：贫困的人得着困济；学校在各地兴办起来；大量的圣经得以销售或分发出去；在海外各国的传教士得着援助。协会说明这些海外传教士的方式，以不干预他们的事奉为原则，只是供应他们的生活需要和工作上的所需。这一切的活动，范围极广，而且日益增加，他们却是完全单纯的倚靠神。好几次，他们在各样的需用上，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了经费，可是，往往因为他们祷告的结果，供应就及时来到，他们以在神面前的信心和跟他的交通，因而得以坚固，而别的人在学习走信心的道路的，也因此大得激励。

一八三六年，穆勒开设了第一所孤儿院，他在布里斯多的威尔逊街(WILSON STREET)租用一幢房产，租期一年，收容了二十六名孤儿。提到开设孤儿院的目的，他说：“第一：是要叫神得荣耀，祂喜悦供应我一切所需的时候，人就会看见，信靠祂的必不至于羞愧，神的儿女们的信心也会因此得以坚固。第二：是为了这些无父无母的孤儿得着属灵的帮助。第三：是为了这些孤儿的生活所需。”穆勒目睹许多属主的子民，天天为各种忧虑所缠累，他就决心要作出眼见确凿的事例，证明在今天，神也如往昔的日子一般，垂听及应允人的祈求，而我们若能信赖祂，并寻求祂的荣耀，祂就要供应我们的需

用。哈勒的夫兰克在德国，就是全凭对永生神的信赖，开办了规模宏大的孤儿院，并且持续有年；这个事实，叫穆勒的信心大得鼓舞，他深信在布里斯多举办这项善事，是对本国人见证神的信实的最佳途径。结果这一切的期望不但实现了，而且那些果效，实在是超过所想所求的。虽然有时他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日常需要，可是院内的孤儿一直没有尝过缺乏的滋味。这项工作一直维持到他年九十三岁去世的日子，以后续办的人也贯彻同样的精神工作下去。这所孤儿院所收容的孤儿之多，（其中许多都在院内悔改信主），建筑规模之大，和经办的费用之巨，每一样都说明了出于信心的祷告所能发出的能力的浩大。

一八三七年，穆勒写成了《自述——神在穆勒身上所作的工》这本书的第一卷，并且加以印行，使许多人深受影响，叫他们对神的信心，大得激励。

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的德文郡(DEVONSHIRE)，因卓曼(ROBERT CLEAVER CHAPMAN)曾在该地工作七十年之久而与卓曼这名字结了解之缘。卓曼于一九〇二年在该地去世，享年差不多一百岁。他本是出生于丹麦(一八〇三年)，父母均为英国人，他所深爱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很大。他在丹麦的时候，受教于一位法籍教士，后来往约克郡继续接受教育。他对文学深感兴趣，造诣亦颇深，成为一位语言学者。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受圣经所吸引，开始详细研读，并深受感动。后来他专攻法律，离校后执业律师，事业相当的成功。

当时伊文思(JAMES HARRINGTON EVANS)正在伦敦工作，在他的友人为他盖造的约翰街教堂(JOHNSTREET CHAPEL)讲道。他本来是教区的副牧师，有一次教区长借给他一些讲章，他读了以后，悔改得救，并开始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以致许多罪人悔改，信徒也得着复兴，但因此招致教区长的反感，他便被迫离去。后来他发现婴儿受洗和政教合一的歪风，叫教会无法实行真理，于是索性脱离国家教会。不久以后，他和妻子二人同时受了浸。可是他却不愿意成为浸礼宗教会的牧师，因为他若参加浸礼宗，就不能与许多其它别的信徒相交，而他认为这些信徒比他更象样。在约翰街教堂的教会，每主日晚上都有擘饼纪念主，而那些有劝化及教导教会的恩赐的，都常有机会在聚会中运用这些恩赐。

卓曼年二十岁的那一年，在偶然的会下，来到这个聚会。那天黄昏，他路经约翰街教堂，有一位长老碰见他，邀请他一起去聚会，就是这样，他参加了聚会，几天以后，他有了悔改重生的经历。后来他忆述说：“主呵，我没有忘记祢如何在我心中作工！当祢的手第一次抓住我，祢的灵叫我知罪的那一刹那，我的杯中满了自己的罪污和犯罪的恶果，……我心里如同隆冬的天气一样灰暗。我对世界深感厌倦，并且极其憎恨，因我的心灵常受困扰，自己却不能也不愿意把世界丢弃。……到了指定的时候，日子满足了，祢对我说：‘这就是那使疲倦的人得休息的安息，叫人重新得力。’祢的话何等甘甜！祢又对我说：‘小子啊，你要喜乐！你的罪已得了赦免！’神的羔羊何其宝贵！那义袍又是何等的荣耀！它把我一切的罪污，都在我的审判主的圣洁目光下遮盖起来！那时瘸子果然跳跃像鹿，哑吧的舌头果真能歌唱！在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里面，我的心已找到安息，我也安稳在祢大爱的怀抱中。”他受了浸，在约翰街与信徒们一起聚会。

这些行动，使许多朋友离开了他，他的亲友也纷纷指责他，可是他打从得着新生命时开始，他就定意一心跟随基督，读经成了他的喜乐，他也学习用信心祷告，而且常常关怀穷苦和有困难的人，后来他清楚神的呼召，要全时间事奉主，有人批评他不是传道人的材料，他就回答说：“我最大的目的只

是要活出基督。”他一生不娶。在一八三二年，开始在班斯泰甫的以便以谢浸礼会堂事奉。伊文思经常关心他在那儿的工作，并曾这样的提到卓曼说：“他是照明我的一颗明亮的星星；我认为他是现今的属灵伟人之一。他坚固而稳定。”

卓曼放下了他所有的一切，恒常倚赖神供应他日用的所需，除了他简单的生活所需以外，他把所有的都施舍给人。在提及他在班斯泰甫的早期工作时，他说：“当我被邀离开伦敦，前往以便以谢教堂为神工作的时候，当时那里的信徒都是属严谨派浸礼宗的，我同意接受邀请，但声明条件是必须容许我照着我从圣经中所领受的去教导人。结果我有一段时期可以自由讲道，主也大大的赐福。当时有一位来探望我的弟兄，鼓励我废除那只允许受浸的信徒一同擘饼的规条，但我告诉他，我不能强迫弟兄姊妹们的良心，于是我继续如常作工，耐心地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我深知我若在当时提出，必能获大多数通过，但我相信神更喜悦我耐心的继续教导，直至所有信徒们都同有一个心志为止。此事以后不久，在班斯泰甫居住的一群还死守教规的基督徒，命令我们不得继续使用该教堂。我把信托书详细研究过，并没有发现我们在任何一点上有违例，可是我们决定把教堂交回给他们，就如我把外衣交出来给那向我索要的人一样。当我告诉你：在不久以后，主为我们预备了更大更好的地方聚会，你大概不会感到惊奇吧。”

约在此时，卓曼认识了穆勒和革拉克，也认识了那些在都柏林及其它地方遵照圣经教训而行的弟兄们。

在班斯泰甫那两幢简陋的房子里，卓曼和他的朋友黑克(WILLIAM HAKE)同住了二十七年之久，直至后者于一八九〇年去世为止，这房子成为世界各地信徒经常来寻求属灵指引及帮助的地方。

卓曼曾在好些国家中周游传道。他在西班牙带领了好几位主的仆人，使他们在该国内专心传福音，结果累累。他那圣洁的生活样式，使许多和他交往的人都受到影响。经过许多年以后，有人在西班牙仍能碰见不少当年因与卓曼交谈而悔改重生的人，他们一直持守着在基督里那美好的见证。在罗马尼亚(ROUMANIA)境内的一个黑海海港中，有人曾遇见一位在该地经商的英国人；他们谈起属灵的事的时候，那位英国人说他在来到罗马尼亚之前，他是个虔信宗教的人，但他已放弃了一切的信仰，认为所有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伪君子，但他补充的说了一句：“我只遇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以前常经过我在德文郡的住处；他名叫罗拔卓曼。”

在圣经的启示完成以前，教会早期的习惯和教导，已经是在新约圣经里接受了一个永久性的样式，作为个别圣徒和神的众教会的实际指引。历代以来，尽管有荒凉黯淡的日子，要照这些样式去行的信徒的努力，却从未有断绝。在近代，这些例子包括哈尔登两兄弟在爱丁堡所建立的聚会；在都柏林，葛若弗斯、克伦宁、伯勒特和其它弟兄们所参加的聚会；穆勒、革拉克、和其它同工们在布里斯多所建立的教会；在南俄罗斯的门诺派弟兄；和在俄国各地的斯顿德教派的聚会等。但这些也只不过是在各国中许多同类活动中的点滴，或是人数不多的小型组合，或是伸展到各阶层的庞大工作。在最基本的信仰原则上，他们都与那些没有受当时所流行的唯理主义影响的浸礼宗，和独立派教会，有着显著相似之处。

第十七章 交通与灵感的问题

一八三〇——一九三〇年

在普里茅斯的聚会——瑞士法语区的情况——达秘的探望——他的理论的演变——“在败坏中的教会”——若查特(AUGUST ROCHAT)——达秘与那些接受新约教会样式的弟兄们在教导上的分歧——由地方性教会转为普世性教会的原则——聚会扩散出去——葛若弗斯写给达秘的信——提议成立中央权力组织——达秘与牛顿(NEWTOS)——达秘与在毕士大堂的教会——达秘排斥那些不与他同心拒绝在毕士大堂的教会的人——与教会断绝交通的原则的应用普及各地——拒绝服从这个断绝交通原则的众教会——给其它信徒的影响——在各国内依照新约圣经样式建立的教会——理性主义——圣经批评学——圣经广传各地

在普里茅斯有一处聚会，因带领的弟兄们所彰显的特别恩赐很快便产生影响；这个聚会的信徒与都柏林和布里斯多的弟兄们，都直接认识。这处聚会的特别和重要，乃在时人冠以“普里茅斯弟兄会”，此后便成为他们一个专有的称号。其中作教导的，最出色的有达秘和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达秘原是在伦敦聚会的，但平日因传道事奉，经常周游各地，也常常在普里茅斯工作。他与他的同工不同之处，是他始终主张婴儿受洗，虽然他自己本人已经脱离了英国圣公会。不过他的主张的出发点，又与圣公会的有别，而是比较接近伯拉纠的看法，认为这可以将他们引进一个属灵的团契，得着蒙受神恩惠的机会。

曾一度与葛若弗斯在巴格达同工的纽曼，现在成为理性主义的倡导者；而他的兄弟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却是单张运动(TRACTARIAN MOVEMENT)（或称牛津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引致英国圣公会复兴；与此同时，达秘在工作和信仰上的发展演变是高潮迭起，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

一八三八年，他被邀前往瑞士的法语区，当地的属灵光景，大有利于信徒的复兴。国家教会的牧师们，大半受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所影响，引起了自由教会(FREE CHURCH)运动，但这个运动又不能完全满足附从者的愿望。一百年前亲岑多夫和他合群同工，建立了不少聚会，其中的信徒都是认真的追求真道，并多作见证；这些工作的果效，至今仍留存。在附近的山区中，仍然存在着一一些以圣经为信仰基础的信徒，过去他们曾被视为重浸派而屡受迫害。在日内瓦，哈尔登与人查经所结的果子，仍满有功效；自由教会运动的主要领袖，都曾受哈尔登兄弟俩作工的果效所影响，结果在一八一八年开始自行聚会，就是那称为“新教会”的。当时在国家教会内部，亦有各种运动开展，就如在国家教会范围外，正进行着各种不同的运动。那个和弗若列池有关的运动，从一八二八年开始，就引来了复兴；高信(GAUSSSEN)和道碧尼(MERLE DAUBIGNE)正奋力设法把国家教会从理性主义的势力下挽回回来，恢复加尔文派的信仰；其它信徒也在极力抗拒政教合一的趋势，建立新教会，这些信徒中有微内(VINET)，他与其它八位神学家，在一八四〇年脱离国立教会，五年以后，又有一大批牧师步他们的后尘。

在这样充满兴奋和改革的气候下，那满有恩赐的达秘，不难就吸引了大批听道的人。有一段时日，他参加新教会的聚会。他传讲主的再来、教会的地位、“在基督里”的信徒等要道，又讲解圣经中的预

言，大受欢迎，他又乐意与各处聚会信徒相交，并不在乎他们的教会背景，因此吸引了不少人。他在洛桑(LAUSANNE)主持的聚会，许多人踊跃参加，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渐渐地这些听他讲道的人，形成了一群特别的信徒，就是称为“那聚会”的；他在此开始发展他那一套对教会的特有见解。

论及圣经里不同的时代，或者说，在不同的时期内神在人当中所作的工，达秘认为每个时代从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并没有例外。每次都是人这方面全然立刻的失败，可是神继续容忍，以恩典继续作工。但不是挽狂澜于既倒，不住进行恢复的工作。只是人借着信心偶而带来一阵子的复兴，但大局终不能全然挽回。”这些时代一开始人就失败了，就如：挪亚醉酒；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并否认撒拉是他的妻子；以色列人制造金牛犊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人在每个时代的开始就失败了。

说到教会，道理也是一样，达秘说：“基督教的骨子里有一股离弃神的倾向。”就算在使徒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这些现象：“离道反教”、“危险的日子”、“末了的日子”、“背弃真道”；还有“不法的隐意”的活动。使徒们也没有实行主的使命，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反而留在耶路撒冷，其实老早他们就该离开，分散各处；结果，一个给外邦人的新使徒，给兴起来，补足使徒们的缺欠。达秘接着说：“因此，教会这个时代，就如其它的时代一样，从开始就失败，……一开始就崩溃——还没有形成便全然衰败。”

然后他就发出下面的问题：“在今天的日子，信徒是否有能力可以依照早期教会的样式来建立教会？”“建立这样的教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他的答案是：“不！”，因为“教会的情况经已败落”“起初那次离开神的心意，是个致命伤，也是招致审判的因由。”“圣经从来没有为这种光景的时代预备一个恢复的途径。”他又指出：“这样的情况，就叫我们的心思认识到我们是活在离经背道的时代，而且时代也快要作最后的结束，并不是引进教会，也不会引进另外一个神以恩典的信实来托住的时代。”在圣经里，我们认识到：“(一)神的众儿女们的合一；(二)在每个地方神的儿女们的合一；……但这种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既然圣经中所说出的光景今天已不复存在，基督徒应如何明辨？如何行动？你或会说：‘基督徒应该把应有的样式，恢复过来。’这个答案正是谬误的一个明证，因为人已假定了自己里面有力量。我要说：请听神的话；并要顺从！因为神的话正用得着在这种堕落了的时代中。你的答案肯定了两件事：一、是神的旨意要把这失落了的世代重新恢复在原来的地位上；二、而你本人不但有力量也有权去恢复它。”

“……在我能同意你的见解之前，我必须要先能看见教会不但是在起初的时候有合一的光景，而且在今天也是神的心意，要把她恢复原来起初的荣耀；还有，三两个，或二三十个的团体，在同一地区自发的聚会，这些团体，每一个都能称为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本该是包括地上每一个聚会的地方的所有信徒的。你还要使我看见，靠着神所给的恩赐和力量，你能把所有的信徒召聚起来，也能理直气壮的指出，那些拒绝邀请的人是分裂教会的、自招咒诅的，也是神的教会的门外客。让我在这儿提出一些重点，是那些坚要建立教会的人所忽略了的；他们的心思全部贯注在自己的教会上，几乎看不见那宇宙性的教会。”

“根据圣经，地上众教会的总和，就是宇宙性的教会，或者可以这样说：是在地上的那属灵的教会。不论在什么地方，教会就是那组成属灵教会的一部份的信徒的团契，而这些信徒是组成在这地上的基督整个身体的一部份；如果有人不是属于他所居住的地方的教会，他根本就不属于基督的教

会……。”“教会情况败坏；……假如那自称为教会的，情况并不败坏，那么我要问那些脱离正统教会的弟兄们：你们为何要脱离呢？既是如此，那就要承认教会是败坏的——离经背道，离开了起初所站的地位。……”

“那么，圣灵又如何作工呢？既是这样，人的信心应该如何活出来呢？我要说：要承认教会的败坏，要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因而要谦卑下来。至于我们对这光景要负上责任，我们是否想只须动手补救一下就行了呢？不能如此，因为如果我们要这样动手尝试的话，就证明自己根本没有谦卑下来。不如让我们谦卑的俯伏下来，听神针对这光景而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不要像那无知的小子，打破了宝贵的瓶子以后又设法把碎片再粘合起来，企图遮盖那些裂痕，以掩人耳目。”

“我这一番辩证，是针对那些企图要重新整顿教会的人。如果有真正的教会，也不该是这些人去建造；如果说：真正的教会起初是有的，但现在已不复存在了；那么就是说，现今的世代败坏，教会已经完全离开了起初的地位。于是这些人自命要去重新建造；就是这一点，他们就得要提出充份的理由，否则就没有根据了。……人若要因此而动手重新建造教会，使众教会回复到起初所站的地位，那就得先承认教会目前的失落，自己既没有顺服神的见证，也没有认识到神在今日的计划和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要去查证众教会是否老早就在圣经写成的时候就存在，而是要查证：真正的教会在因人犯罪的原故，而不复存在，信徒也四散以后，那些自命要负起使徒的职份去重建教会、使时光倒流，重回当年的光景的人，是否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是否由神赋予能力，使他们能完成自己所揽来的使命。……我要查考寻求的，是神的话语和圣灵所论及失败了的教会的光景，而不是自认有本领可以去实现圣灵所说的教会起初的情况。”

“我要指斥的是：有人盲目地跟从了人的思想，模仿圣灵所记载当日存在在早期教会内的样式，却没有真真实实的去寻求神的话语和圣灵针对我们现况所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模仿使徒，我们的责任是要顺服。……若有人告诉我们说：众教会所受的命令，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适用的。那我就要问：如果那个时代，或某处地方，有形式的教会并不存在的话，这些命令还适用么？于是我们回到那个疑问——既然整个时代都败坏了，谁去建造教会呢？……”

“若有人问我：在目前教会所处的光景下，神的儿女们应该作甚么？我的答案很简单：他们应该与世人分别，在基督身体的合一见证里，彼此聚会。……至于在细节上，就要留意主的应许：‘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这是凡爱神并抛弃世界的人所需要的。你们这些作神儿女的，作耶稣的门徒的，要留心主的应许。假如你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会，祂就在他们中间；神也使祂的名在其中，就如昔日祂使祂的名在耶路撒冷祂的圣殿中一般无异。你们不必需要什么，只须凭着信心聚会，神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就必看见祂的荣耀。……还要记得：当门徒聚集的时候，就擘饼纪念主。……神若差遣人，或在我们当中兴起人来，喂养我们灵性的所需，那就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又存着感谢神的心，都是照着神所给他的各样恩赐。……永远不要定下什么规则；圣灵必定要引导你们。……至于说到纪律，记得：断绝交通是最后的对策。……保守主的桌子的圣洁是最积极的要务，……我们是要向基督负责任的。不错，在某种情形下，我们要存惧怕的心抗拒罪恶(犹 23)，可是，我们得慎防落在论断中，就如慎防自己家中起火一般……！“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就算整个的组织系统归于无有，我仍能

回到起初那些宝贵不变的原则里，就是那不但带着基督的名字，也带着祂的权能的源头；那联系众人 and 释放众人的能力，正是那位使“两个”或“三个”人聚集起来的主。”

至于说到离开某处聚会，或所谓另外设立桌子，达秘说：“我并不像一些其它弟兄那样恐惧这些事，但我必须说明我的理由。如果那个聚会就是该地的教会，那么，人若离开该处的聚会，就是叫自己与神所呼召的教会分离。虽然无论在那里，若有两三个人奉基督的名聚会，祂就在他们当中，而教会的祝福与托付，也按理该在其中，但是，若有信徒建立起一些组织作为教会，又用教会的名义在其中行什么宗教仪式，那我就应该离开他们，因为他们是假冒的，也没有摆出应有的见证，就是神要我们表明的，指出教会正在败坏中；那处聚会已经没有了神的见证，没有了他的子民的桌子……。可是，另一方面来说，为真理摆出合一的见证，是从上而来最大的祝福，因此，如果有人凭着血气，离开了那两三个人的聚会，而这两三个人是在基督整个身体的合一的见证中，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那么这个人的离开，不但是分裂教会，而且他定规会失去神同在的祝福。”

在瑞士，有不少人反对达秘的见解，其中最突出而又最有能力的，是若查特(AUGUST ROCHAT)。他指出达秘的所谓“教会在败坏中”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教会是那完整合一的身体，是不可能败坏的，纵然有个别信徒有失败软弱，也不能使教会败坏；他又指出：圣经有提及地区性的教会，但从不要把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团体称为那教会，把她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教会。教会应当是信徒的组合，必须包括历世历代在各地的信徒，连那些不再活在世上的，及那些还未出生的，都包括在内；在各地方的教会，不过是信徒因彼此相爱和肢体交通而聚集一起。达秘说：只有使徒，或他们的代表，才有权在教会内选立长老，可是在这些离经背道的日子，教会只能承认那些有神的恩赐而专一事奉的人，但不能作任何正式的指派。若查特却驳斥说：圣经里没有任何一些经节是支持这一点的，相反地，众教会有权为教会中各种事奉选立人，并把他们带到使徒面前，让使徒给他们接手，承认他们的职事。若查特也不同意达秘把“败坏”、“离经背道”等字眼用在教会身上；他认为属灵的事物的安排，都不会离经背道，只有个别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表现；真正的教会决不会离经背道；神的话语也从来没有提及教会有离经背道的事。

达秘这些见解，就是论到每个时代的失败的理论，尤其是论到“教会的败坏”，并其它引申出来的结论，正好使他在原则上与其它在教会历史上主张保持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或是那些主张以圣经为永远的正确指引的人，背道而驰。

他认为作为教会的指引的圣经中的书信一经完成，众教会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这个见解是的话，那么新约圣经的大部份，对今天的情况而言，就不再适用了。

他的教导，抹杀了众教会各自独立并直接联于基督的事实，引进了一个整体的主张；人得以进入教会，或被摒于教会之外，是超越地区性的；换句话说，是以公会的原则代替了地方性教会的原则。

达秘虽然不赞成设立众教会，（意指地方教会：译者注）可是他所主张的两三个人的聚会，却具有管治的权力，不但是在个别地区的圈子里，而且更伸展到一切有关的团体里。

达秘的见解，虽有不及之处，可是他的一部份教导，也实在是把圣经中的真理恢复过来；这些教导，极有能力，也为多人带来了祝福。他不但指出当时各公会的缺点，他的事奉也能挑旺信徒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话的爱慕，使人有更多的儆醒，等候主再来；他又强调圣灵的自由运行，随己意把各样

恩赐分给基督的身体内的众肢体。在他所带领的聚会中，有许多人蒙恩；这类性质的聚会，迅速扩散到各地，不但在瑞士，也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意大利，及向更远的地区扩展出去。

这些信徒们彼此间有着紧密的相交，这就引起许多人渐渐脱离了一些从前与达秘也有联系的聚会。一八四二年，部地华(BOURG DE FOUR)的聚会中有六十位信徒脱离该处聚会，转去达秘那儿聚会，而在花特丹(CANTON DE VAUD)，也有不少人离开了自由教会，转去随从达秘教导的聚会。

达秘所发展的主张，被人指为有危险的倾向，甚至有一些对他本人仍心存爱戴的友人，也不免有这样的反应。这一点，可见于葛若弗斯于一八三六年临离开英国重返印度前写给他的信，内文如下：

“……我盼望你能确实的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的心与你疏离，也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减少我对你的信任；我深信那曾使我受吸引的那些重大又丰富的要义，仍不断在你的心中发动。虽然我感觉到你已离开了以前你曾高举的原则，而且在原则上拾回你过去所唾弃的，但我心里仍然满心信赖你对神心意的爱慕，并且相信不久你就要看见，你起初宣称所要脱离的系统的一切谬误，已开始在你当中萌发出来。你多半不会因你自己的心思的活动而看清这个趋势，但你可以从自起初就认定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人的作风中觉察出来；他们并没有你那样的经历，也没有那些最早与你在一起的弟兄们的经历，他们并没有实际地经历痛苦及忧伤，他们无从认识到那能在无法言喻的黑暗中仍能独存的真正的真理，因此他们无法存怜悯同情的心；而你们中间的联结，不再是出于亮光及对真理的爱慕，而是纯粹基于训诲和理论；你们当中的管治，虽然暂时还没有完全的显出来，但不久就会叫人感到那纯粹是出于人的权柄。别人并非因你亲见的而认识你，而是因你所提出所要反对的来认识你；事实不久就证明你是在反对所有的人，而认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有人曾坚称……我已改变了信仰的原则，我所能说的却是：以前我所宝贝的在神的话语中所发现的真理原则，我今天所感受的，更是十倍于当日的，因为我发现，在目前的教会的情形下，在各种不同的困境中，这些真理的实用性，屡试不爽；我也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与人分享，不但是与个别信徒，也是与集体的信徒，而我却没有附从他们的谬误。我从开始就认识到，我们彼此相交的原则是在乎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同作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起初同有的心思。可是你那些小型的聚会演变的经过，表明它们不再是为那荣耀纯全的真理站立，而仅为见证你们所认为别人的错谬而站立，这一点，使我对它们的评价由天上降至地上。……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同有的心思是如何最有效能地去表彰我们从主耶稣得来的生命，（我们深知这才是那好牧人向神的儿女们的呼唤），并盼望能在别人身上找到同一的生命；而当我们确信找到有同一生命的人时，我们就凭着神对这同一生命所发出的应许，嘱咐他们来与我们分享那在同一位圣灵里的交通，（虽然他们的心思在别的方面或许会过于偏狭），敬拜我们同一的元首；我们接纳他们，如同基督接纳他们一样，把荣耀归给父神。再者，在真理的范畴内，我们有自由与他们分享聚会，纵然不能是全部的聚会，起码可以是部分的。……我实在宁愿包容他们的错处，而不愿失去分享他们的好处的机会……。我心中确信，因着你从主那儿所得的教导，总会有一天你那宽广丰富的灵要冲破这一切的限制，冲破那些心思比不上你那么宽广的人所施加在你身上的限制明显的发表出来，切切的要使那永活的元首的众肢体早日成长，满有长成的身量，而不是受困于那些小型的聚会，这些为数不小，以你为创设者的小型聚会。”

过了不久，达秘的一位亲爱的同工威勒蓝(WIGRAM)——，写了一封信谈及在伦敦的聚会，并提出

是否要考虑设立一个控制各处聚会的中央集权的组织。信中说：“在这些地区，圣徒相交的聚会，应该如何加以指引？为了主得荣耀，为了加强见证，是否应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负责管理范围内所有的聚会，并照着能力所及去引导它们？还是任由这些聚会成长，彼此无须有联系，各自照着各自的能力而独立自由发展为好呢？”

一八四五年，达秘在往访欧洲后回到普里茅斯，要处理他以为当时因牛顿的影响和教导而在教会所产生的不满意的景象。在这两位能力过人的领导者之间，长久以来已存在着一些分歧；在有关时代的真理、预言、和教会的次序上，两人所持的意见并不相同，因而双方唇枪舌战已有一段时期，结党分争的迹像已渐渐形成，这一回因达秘的到场而更趋白热化。在一次主日聚会结束的时候，达秘宣布他决意“离开聚会”的决心，数星期后，他开始和一些拥戴他的人在他处另行擘饼纪念主。两年以后，有一份牛顿以前讲道的笔记，落在拥护达秘的人的手中，讲词内包括了一些对诗篇的讲解；达秘和他的同工便指称在这些讲解内，牛顿在述及其中的经文是如何应验在基督身上时，提到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的那一部分，与正统信仰的解释不相符。这些受到批评的笔记，并没有经牛顿本人过目，便予以发表，还加上附注，把不合正统信仰之处胪列出来，并将推论列明，归纳以后就给牛顿加上异端的罪名。至于牛顿，他立刻拒绝那些从笔记内文中推理出来的指责，而且坚称他毫无疑问地确信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的真理，并未被罪所沾染，但他承认自己所用的字眼，容易使人引起误会，使人错解了，而透过推理作出并不正确的结论；于是他发表了一篇自白，题为：“为某些信仰谬误发表声明和坦承书”，在其中他承认自己所犯的过错，亦承认这些是过失，并收回以往一切在文字上或口头上提及过的这些谬误的话语，且表示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深感歉意，并祈求主不单赦免他，还要铲除一切恶果。但是这份声明，并未能使攻击牛顿的人改变态度，他们继续大力的抨诋他，并不理会他所否认的，继续指明他在传异端。

当普里茅斯教会发生分裂时，在布里斯多的毕士大堂事奉的穆勒和革拉克，及该处的教会，并没有袒护任何一方，他们保持中立，仍旧承认双方都是主内的弟兄。

一八四八年，有两位给达秘在普里茅斯的聚会驱逐出来的弟兄，来探望布里斯多的教会，照往来的惯例，在毕士大堂聚会擘饼；当地教会在仔细验明他们的信仰，证实并没有受给人指责的牛顿的谬误所影响后，便照以往一样的接纳他们。当时达秘便要求毕士大的教会就普里茅斯的事件作出判断，可是毕士大的弟兄们拒绝这样作，理由是他们自觉不配在这件事上批判教会，而且辩论这类的问题会引起争端，可是到了最后，又因同时受到来自内部的压力，他们结果提出这问题来加以考虑，并因此写信回复说：“凡支持牛顿先生的见解或单张，或为他辩护的人，一个都不能接纳一起交通，”接着又说：“就算写这些单张的作者，在基本上是个异端份子，我们也不会保证一定拒绝那些曾接受他的教导的人，除非我们查明他们本身也接受并吸收了这些与基本真理相违背的见解。”达秘收信后，就写说：“我不能不将毕士大的事例摆明出来，我认为整件事是与弟兄相交有关；因此，既然不能把公认是撒但的工作及权势抵挡出去，保护基督所爱的小羊不受害——既然弟兄们不能承担这一份为基督的事奉，那么他们就不能称为身体，因为基督的身体是该有这份承担；他们的聚会就真要成为羊群的网罗了。……我绝对……没有意思要减少我个人对革拉克弟兄和穆勒弟兄的尊敬，原因是他们以往用信心使神大得荣耀，……但我要提醒弟兄们，本着他们对基督的忠心，和对他所亲爱的灵魂的爱，他们

要凭信筑起围墙，抵挡这些罪恶的势力。凡爱护穆勒及革拉克两位弟兄，或他们本身的安舒，过于对基督所亲爱的圣徒的爱慕的，有祸了！我要坦白的作出声明，凡接待自毕士大来的，（除了那些对以前发生过的事全不知情者以外），就等于是向这像瘟疫似的可憎的邪恶势力大开门户，我们曾花了不少代价才能从其中脱离出来。在毕士大，他们正式并故意承认，他们决不去查究，（这本身就是个拒绝防避毒根的原则），事实是掩饰其词。那么，那些接待毕士大的人的，就等如在心思上与这些犯错的人同走一路，因为作为身体的教会如此行，就要共同负起他们所认可的错谬的责任。假如有弟兄认为可以接纳那些妨碍基督的见证和荣耀的人，或包容那些引进谬误虚谎的说的，他们最好还是明说出来，好让我们这些不愿意这样作的人，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至于我，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去毕士大，也不会去任何肯开门接纳从那里来的人的聚会那里。……”

就是这样，他们与毕士大教会就断绝了交通，也与一切仍保持与毕士大教会相交的聚会断绝了往来；表面上看来，这项行动是基于信仰上的争辩，可是毕士大的教会事实上从来没有主张过那些谬误的信仰。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这样：毕士大的教会所行的，其实是达秘起初所行的，就是持守个别聚会的独立性，坚持聚会有权接纳每一位经教会认为是已重生得救并有完备信心及行为的信徒；可是到了此时，达秘已经离开了他原有的立场，对有组织性的众教会采取了“大公教”的立场，就是排斥那些凡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教会，确定了要服从一个中央权力支配的主张，而在当时，这个所谓中央权力，就是他自己和他在伦敦所主持的聚会。这么一来，弟兄相交就不再是基于同一的生命，而拒绝与毕士大的教会相交也成了事在必行了；如果有人拒绝与毕士大教会断绝交通，他们必不会受到任何的宽贷。

达秘虽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叫大家改变过来听从他，可是，在他继续大力宣传之下，不少教会终于屈服了，同意在接纳交通的原则上，以对方是否肯与毕士大的教会断绝交通为原则；断绝交通的根据，是因他们所持的谬误信仰，而事实上，他们却从来没有这样主张过。这些听从了达秘的教导的众教会，由于他不厌其烦的重复做告，居然真心相信他们与毕士大的弟兄们断绝交通，是因为他们接受牛顿的错误主张；事实上牛顿本人对这些主张已极力加以否认，而毕士大的教会，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主张。听从达秘的信徒们的这种作法，一直维持下去，甚至在西印度的黑人弟兄们，也要批判毕士大的事件，而在亚尔卑斯山区乡村内的瑞士农民弟兄，也要遵命查证牛顿的谬误信仰，并要公开的拒绝它。

这样的做法，自然免不了带来更多的分裂，就是在达秘还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产生了这些分裂的现象，各派都坚持己见，互相排斥不遗余力，其程度不下于他们联合对抗葛若弗斯和穆勒的热心。

那些没有随从达秘的其它教会，继续努力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行，这些教会，在许多方面虽各有分歧，但因为他们都不认为任何一处教会有权柄断绝那些在主张上有分歧的教会的交通，所以他们并没有引起教会的分裂。其中有些提心吊胆的防避达秘的随从者那种“闭关”的作风，自己却在不多的程度上，也成了闭关弟兄，但是，其它的则仍然维持与众圣徒的相交，他们虽然不断受到那些离开他们的人所诬蔑和排斥，但仍然乐意接纳这些攻击他们的人，也承认他们为弟兄。卓曼的表现，正代表了他们的态度；他不愿使用“闭关弟兄”这些难听的字眼，而称他们为“所亲爱的弟兄”，并说“这些弟兄是为了良心的原故，拒绝与我相交，同时也拒绝我与他们相交。”

那些与卓曼同一主张的众教会，就是坚持相交的原来立场的那些弟兄们，人称他们为“开放弟兄会”。其中虽可能有一些个别弟兄或教会在心里存着宗派的私见，也可能因此称得上为宗派，（任何属灵运动，都会有演变为宗派的危机），但始终有不少信徒还是极力持守着合一的灵，他们绝对无意要叫神的子民分裂。他们一直保持极强的福音见证，远及世界大部份的地区。

这些运动的影响力，远超出那些有关的教会范围内所能作的。当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之际，歪风充斥在神学院内，脱离国教的团体的讲台，和英国圣公会的一大部分，都受到理性主义所侵蚀，但上述那些教会，他们一直绝对忠心的持守着神所默示的圣经原则，并且满心火热，极力维护这个原则，使好些在各处不同地方的聚会里蒙受信奉理性主义的牧师的教导的众信徒，因此得着有力的帮助。

类似这种遵守新约圣经教训及榜样的信徒聚会，在世界其它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他们并没有受到那些已远离圣经样式的组织的历史发展所影响，而且因着本身信仰的单纯，使他们能适应各阶层不同背景的信徒的需要，也能适应各种情况的变化。他们没有出版物，也没有作过任何统计调查，也不靠宣传，或呼吁外人协助他们的见证，因此在世上罕为人所知，甚至宗教圈子内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默默地为主作有效的见证，而这见证的能力，在逼迫来临的日子，格外显得可贵。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各式各样的信徒中，也不断的有这类聚会的建立，把生命之道，满有能力的远扬四方，聚会也渐渐增加，他们的历史，往往叫人联想到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有人到过他们当中，这些人发现他们的工作，和主自己所作的相似，（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认识他们），“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以上已经提及到的一些接受圣经为神所默示的个别信徒及教会；他们相信，无论在个人得救与行为上，和在教会的次序或见证上，圣经已经足够作为指引。

我们也看见了一些有圣品阶级的宗教团体兴起，渐渐的得势，并且发展出一套仪式主义(RITUALISM)，成为那些专心奉行圣经教训的信徒的死对头。

另外有一种攻击圣经的势力，可以称它为理性主义，在十九世纪期间形成。他们撇开神的默示，高举人的理智，认为人可以靠理性寻索真理，以达于至善。

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突飞猛进，本可叫人在对神的创造的大工有更深的领会，但也叫另外的一些人起意在神以外设法解释万物的创造，为此，他们必须要证明，创世记所写关乎创造的记载，并非出自神的默示，而是出于人的无知；这些活在我们以前的人，所知无多。在自然的浩瀚领域内不断有新发现以后，各种学说应运而生；人以为这些理论是与创世记所记载的格格不入，因此就根据这些论说去证明圣经的不正确。当愈来愈多的新事物被发现以后，更多的新学说也随之成立，取代了旧有的理论；每样新学说都经它的立论者所吹嘘，他们身为科学界的权威，于是所创立的学说广受欢迎。一八五九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物种原始论”(ORIGIN OF SPECIES)，正是这种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些不相信创造的事实的人，自然就不会认识那位创造者，跟着也就不会有因启示而得到的知识，因为神借着圣经的启示，是以神的创造作起头；没有了神的创造，也自然不会有那受造的人的堕落，也就无需有救赎，也不会有被救赎的可能了。结果，从人的心思中演化出来的新理论，将圣经所教导有关人的堕落撇下不谈，而以一种主张人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理论代替了，而这套理论，却是经

常在修改。有了这些学说，救恩的经历和得赎的指望，就成为不可置信了，就算这些学说能为人类带来什么幸福，活在地上的人却都没有指望了。

虽然在大多数人的心思里，进化论已替代了创造的神，本来是从神而来的人，竟然要从其它的生物中寻找他们的根源，他们并不认识神是救赎主，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相信，甚至在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中，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随从这些学说。如果说：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增加，就自然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圣经，这样说就错了。有许多人发现一个事实，他们愈多认识神在创造中的大工，就愈能欣赏到这些新发现如何与圣经中所记载的吻合，事实上，强说近代有知识有教养的人，都不会相信圣经，这是毫无根据的。若说人愈有知识，就愈不相信；或说：愈无知的人，愈多有信心；这些话都是与事实不符的。

奉行理性主义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人并不是光有理智的；人有理智，也有心灵，而人的理智是受心灵所影响的。心灵——也包括人的性格、意志和感情——正是人的经历的中心，能左右理智，并运用理智所发出的悟性和理解能力。人的心灵运用理智，找出无数批判神的理由，发掘在圣经中所谓自相矛盾的地方和错谬，来支持他们对神和圣经的不信；但假如这个人，有了使他看见自己的罪的经历，认识他需要救恩，并有基督向他显现启示的话，他的心灵——就是指他的意志和感情——就会降服下来，他也会用信心去接受基督作救主，而他也就得着从神而来的永生，正如圣经所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他的理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虽然在能力、悟性及知识上，不会比以前好，也不会比以前坏，但这理性受到经历了改变的心灵所影响，就能在它以前所鄙视的圣经中，寻找到真理、美善、和启示，并且能在神一切的作为中，不断发现使他发生感谢和敬拜的因由。那曾逼迫信徒的扫罗，成了使徒保罗，就是个显明的例子。

在十九世纪期间发展出来的另一股抨击圣经的风气，称为“圣经批评学”。它本身，正如科学的研究一样，是有其价值的，但在理性主义之风所影响之下，竟演变出一些错谬百出的学说。自古以来，对圣经内文的批评验证，包括古卷抄稿的研究，都极有价值，帮助人发现一些抄写上的错漏，把圣经的内容、能力和意义，更丰满地发表出来。

“高层批评”，是把圣经中各书卷写成时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和其它外在的背景因素，都包括在研究的范围内，并分析其中文体的风格，从而推断出各书卷的写作年代及作者；这些研究工作，引出不少重要的发现。可是后来这些高层批评学者，采用了唯理主义的那种理解方法，在神以外去研究圣经，把圣灵的默示如何透过人工作，并与人同工这一点，完全撇开不管，结果带出了各种怪诞的理论。

圣经是透过特选的器皿——以色列人——而给世人的，摩西和众先知都是凭着神的命令去说话，他们所说的话，就记载在不同的书卷内，或在律法书内，或在历史书卷中，或在诗篇或预言里，由犹太人凭他们特有的慎重和坚韧的民族性，将这些话保留下来。基督和众使徒，都接受旧约圣经为神的话语，并加以充份引用，而旧约加上了新约部分，就完成了神的话。在历世历代中，这书卷——圣经——一直为人所接纳，承认是神所默示的，并在人的心里和生活中显出功效，证明那从上而来的能力；当然也一直有人在反对圣经，但是到了十九世纪，这些反对的势力，才有了极端的发展。

高层批评在早期较突出的演变所产生出来的理论之一，是根据创世记里面所用的神的几种不同的

称呼，因着这些不同的名字，有人就辩说这卷书一定是出自几位作者的手笔，于是有人别出心裁，把这卷书，和其它的一些书卷，分拆开来，硬说是分由几位不同的作者所写成，而不同的批评学者，也各采不同的方去去辩证；这么一来，摩西原来突出的性格就无形中消失了，不久还有人否认亚伯拉罕真有其人，又说其它较早的书卷中所记载的人物，全属虚构，只是神话中的人物，并且是将传说中的几个英雄人物汇集起来而构想出来的。到了一八三四年，锐斯(EDUARD REUSS)推出另一套新理论，使这些论调起了更迅速的演变。他说：律法书是在众先知书以后写成的，而诗篇的完成，更是以后的事。这项假设，引起了各方面对旧约圣经的各部分的推敲，设法要使这新创设的假定得以成立。同时，他们也认为新约圣经的神迹不可信，并大费周章地去解释，说这些神迹的记叙是如何的出于误解，只不过是一些传奇性的产物。他们将福音的历史重写，而任南(RENAN)所著的《耶稣生平》(VIE DE JESUS)，和司特老司(STRAUSS)的《耶稣生平》(LEBEN JESU)，有一段时期风行一时。后来这些批评愈来愈胡闹；只要是圣经肯定的，都差不多总要加以质疑。但是这种极端的现象，反而引起了反效果；许多给批判了的经文，重新获得肯定，而考古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许多被评为难以置信的经文在历史上的准确性。

这些意见上的冲突，引起了许多信徒更多钻研圣经，结果发掘出其中的更多真理和亮光。圣经仍旧是叫各式各样的罪人得着救恩的途径。

宗教人士所奉行的仪式主义，结果使罪人无法得以找到救主；理性主义则全靠那些深受其影响的牧师和神学家，而得以在近代盛行，并叫不少人落在不信中。奉行理性主义的人，也似乎成了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他们差不多全部垄断了神学院和传道人训练所，结果虽然羊群并不甘愿，也只得给他们牵着鼻子走，去往没有草场的地方；他们给羊群的教导，是叫他们相信没有所谓圣灵感动的默示，也没有创造主；没有那为救罪人而成为人的神的儿子，也没有神的儿子胜过罪恶和死亡，为人开通了回到神面前去的道路的那回事。这些理性主义者，把神的儿子贬低，只说他是个善人，虽然屡遭误会，仍不失为我们的模范。他们又说这些道理，可以带来世界和平与繁荣，并能引进世界大同；可是事实上世人所遭遇到的是战争，终日落在备战的紧张状态中，也只见罢工风潮，经济崩溃。这些不认识那位来为世人受苦受死的主的，也自然得不着因主再来的盼望而带来的希望。

在当时那许多抗拒这些学说，坚持享用圣经的大能，并见证出那是神所默示的话的信徒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当他十六岁那年二八五〇年)悔改信主后，就参加了浸信会，接着就开始为基督作见证；一年以后，虽然他没有经过传统上的神学训练，却当起浸信会的牧师，开始传道，满有属灵的能力，吸引了许多人听道，以致聚会场所也不敷用，于是盖起足容六千位听众的会堂，一生就在此经常传福音，而且讲解圣经，满有恩赐，他为人真诚谦和，并协助建立起依照新约原则实行的教会，使数不清的人大大蒙恩。他紧紧的照着圣经的教训讲道，满有感人的力量，喜欢举例讲解，有时语带讽刺幽默，使听众久久不能忘怀。他的讲词流畅，读出来跟听起来一样动人，因此每次讲道后，讲词马上印发出来，分送到各地传阅，直至他去世以后仍然在流传。他感觉到当时在浸礼宗的圈子内，流行相信受浸可以叫人重生的说法，大大妨碍了福音的传播，于是他大胆的在讲台上指出这个谬误，并且印行出来，引起了许多抗罗宗和福音派团体的攻击。因为这一场冲突，一年后他退出了“福音联盟”(Evangelical Alliance)；以后又因批判圣经之风暗中破坏人

对神所默示的圣经的信心的歪风，渐渐的渗透了“浸礼宗联会”(BAPTIST UNION)，司布真结果也退出了这个组织（一八八七年）。此举使许多人与他疏离，并且与他引起激辩，但另一方面，也使不少怀疑自己信心根基的信徒，大得鼓舞，在当时那困难重重的情势下，激励了信徒对圣经的真实性的信心。不久以后，因着古代历史文物的研究和近代科学的探索，结果更大力证实了圣经的可信性。

与此同时，圣经已渐渐广传各地，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圣经，也有更多的人因此悔改，信徒的信心也大得坚固。圣书公会和其它团体，不但继续努力工作，还不断把圣经翻译为各种文字，销路亦日益增加，销售圣经的地方渐多，销售各地的范围更广；圣经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的结果，使远方各地的民族都得以享用这宝库。虽然有人并没有重视读圣经的自由，（他们的先人却为争取这自由不惜流血牺牲），但这些后来蒙召的，却在这方面比以先的人领前了。

踏入二十世纪以后，人类的文化在各方面突飞猛进；其情况有如雪崩一般，起初开始的时候，伤势缓漫，几乎不为人所察觉，但后来速度渐渐增加。竟成了排山倒海之势，照样，人类文明的发展，早期缓慢，但到了这个世纪，就成了一股急流。空气中所隐藏的能力逐渐给发掘出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长期以来，人类就靠着呼吸空气而活，但现在的科学家已发现：空气运载光与热，也是电的导体，并且输送音波，使声音能转播全球各地，无数人可以同时收听；而气体可以承负各种进步的机械，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使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把世界各地更紧密联系起来。科学家研究物体的结构和性质，发现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形态，并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变化多端的运动。在这些文化奇迹围绕下，人类的智能更形活跃，知识的运用更广阔，或利或弊，都在促使这世代快要达到完成的阶段。在这一连串伟大的成就中，圣经真理屹立不摇动，可以适用于人类生活不停变化着的各种环境。那些因信顺服跟随主的人，不论是在聚会中、或散居在各地的，都发现到这指南针永远指向基督；圣经的话曾指着基督作见证说：“万物是借着祂造的。”神曾差遣祂到世上来，“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那些以圣经为指引及榜样，并根据其中的原则而行的信徒，并没有受到唯理主义所影响，正如他们并没有受仪式主义所影响一样。这些信徒成了抵挡不信的恶势力的坚固营垒，也是那些寻求遵从神的话与同一心志的信徒交通的人的避难所。他们人数日渐加添，并且扩散到各地去，而圣经所到的各处，不停地有新的教会在各地同时建立起来，这一切现象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深信，就算有许多不同的宗派离开真理，其中必有信徒兴起，跟随以前的圣徒的脚踪，成立信徒聚会，实行圣经的教训，向人宣扬那牧人的福音。而宗教界的人士，也有因决意回转到神话语的原则上去，而带来教会的复兴，这种情况会继续发生的。那曾作宫廷教牧的胡司、作修道士的路德、路德宗的牧师施本尔和夫兰克、和英国教会内的韦斯利兄弟俩和威特腓德等，都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当这些人一旦从抑制他们的信仰的桎梏中逃脱释放出来以后，他们以往所受的训练和经历，就叫他们发挥了更大的效能。

第十八章 总结

众教会仍能依随新约圣经的教训和样式么——不同的答案——注重仪文的教会——唯理主义——改革宗——神秘派及其它——福音奋兴派——历世历代以来以新约圣经为指引的弟兄——福音的传扬

——外国传道差会——回转到圣经原则而带来的复兴——每个基督徒都是传教士、每个教会都是传福音的组织——教会与布道所的分别——社团与教会的分别——众教会的合一和福音的传扬——在万人中建立在同一根基上的新约圣经教会——结论

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或应否，继续依照新约圣经的原则和样式去治理众教会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答案：

一、注重仪文的教会，例如罗马教会、希腊正统教会，及其它类似的教会系统，他们相信所谓“教会发展”的理论，认为教会已逐渐发展到一个地步，比原来开始的样式更好，而圣经也已加以修正，或甚至已经给传统代替了。既然如此，就不值得再去依照新约圣经原则和样式去行了。

二、主张唯理主义的人，也持同一的说法，认为如果回到原来的样式，就等于是开倒车，因为他们并不承认圣经是永存不变的权威。

三、现存的教会改革者，尝试过一些折衷的办法，不是全部回到那原来的样式，而只是作部份的恢复。路德、施本尔、和其它的人所作的，正是这样。

四、有些人索性放弃了努力，就如神秘派的信徒，他们宁愿专心追求个人的圣洁和与神的相交。模利诺斯、盖恩夫人、和特尔斯铁根等，就是例子。又例如公谊会（贵格会），撇开外面该遵守的受浸和主餐，宁愿多花时间去寻求里面亮光的见证，而不去专心查考圣经；又例如达秘和跟随他的人，索性放弃了责任，而改为“地上教会已经败坏了”这个说法的吹嘘。

五、福音奋兴派，例如韦斯利的循道宗，及救世军(SALVATION ARMY)等，则认为这事无关重要，还是专心致力于传福音，使罪人悔改；若有实际需要，才去发动应急的工作。

六、可是，历世历代以来，有不少弟兄却认为应该依照新约圣经的样式去行。他们的名称虽有不同，但心志则一。这些信徒包括：迦达尔斯、诺洼天派、保罗派、波各米勒派、亚勒比根斯派、瓦勒度派、罗拉德派、重浸派、门诺派、斯顿德派、还有其它许多的人，有些属于浸礼派、独立派、和弟兄会的。他们都同有一个心志，要照新约圣经的原则去行，效法新约圣经里的教会的样式。

与上面的问题有密切关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传福音，能否和起初那样？若是可以的话，福音会不会更迅速的传扬？这个问题扩大来说的话，我们又要问：是否神的儿女必须回转到圣经那里，才可以彰显出合一来？才可以叫福音传遍地上？

起初的信徒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本地”与“海外”之分。以后众教会逐渐在各国各民族间敞开，而早期使徒教会样式的众教会，演变为宗教团体，开始差派传教士出去，代表那些团体的中心组织，到各地去传福音。基督教的各宗派公会愈多，差遣到各地去的布道团体也愈增加，虽然都是传讲基督，但亦各自分别代表所属的公会，结果那遗祸基督教的宗派分门别类的混乱的情形，也随着福音给带到异教徒的地方。以前传福音，并不需要倚靠物质或金钱，单单倚靠圣灵的大能，而且昔日传福音的信徒，常饱受困苦贫乏。可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传福音方法，却需要充裕的经费，因为这些公会，并没有认识圣灵恩赐的运用，而这圣灵也是内住在那些新悔改重生的信徒心中的，足够供应福音工人作见证的一切需要。但是公会却舍近取远，在各地成立“布道所”来供应福音的需要。“布道所”需要经济支持，因此就要在国内筹募经费；有时为了避免被人误会缺乏信心，就要靠印行一些动人的事件或急需的报导，设法激发起国内信徒对海外布道工作的兴趣。为此，对“海外”布道工作的控制和支

持，大部份仍操在“国内”信徒手中，因此在海外所成立的组织，实质上是外来的，使当地福音的继续传播，大受妨碍。

人若要舍己、跟随基督，就要预备好心志，脱离他所属的公会的捆绑，使他能自由与所有属神的子民，有真正的相交，并且因着目前各人的软弱，要学习彼此容忍。假如我们忠于圣经的教训的话，我们就要放胆把真理放在万国的信徒手中，不但教导训诲他们，而且要以身作则给他们作证明，真理是给他们预备的，正如是为我们预备的一样，而且满心相信神会保守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成为独立的教会，与众圣徒同列，得着当有的地位。

在近代海外传道活动范围以外，在我们的能力明显不能达到的环境中，究竟有甚么圣灵的恩赐显出来，我们不得而知。那曾受逼迫的俄国教会所经历的，是我们所无从领会的；在他们当中显出的热心和专一，是其它在较安舒的环境中自认是基督徒的人所没有的；很可能在他们当中，还会有合一和大能见证的奇迹出现，是我们曾经要去实现而结果失败的。在以前是异教的地方，也许会有属灵的领袖兴起，充满能力，能以摆脱欧美差会那些分门别类的作风，也无须靠着差会的经济支持，而能在当地自己的人当中带领人归主，建立神的教会，虽然他们也许要从错误的经验中领受教训，但最低限度不会受我们的错误所连累。在神凡事都能，他甚至能从回教人当中，呼召忠心跟随基督的门徒，并且能在回教人中，使用他们为祂作见证。当然我没有低贬差会的贡献，这些差会长期以来所付出的忠心事奉，仍旧在世界各地显出功效。可是目前这一切，指出那唯一能带来复兴的路，就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否则照目前的进度，恐怕还会有一段长时期，在万民中仍然有不少人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借着圣灵在基督里显明祂自己，是一位施慈爱、寻找拯救并保守丧失的人的神。再没有比这一个更叫人深受感动的启示，就是：神为了怜悯失落的世人，甘愿撇下天上的荣耀，成为人，披上肉身，担当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愁苦，借着死，败坏死权，叫走向灭亡的罪人都得永生。因此，凡因信接受这永生的人，都必须像那赐生命的主一样，乐意把生命传扬出去。为此，每个基督徒自然就是个传道人，也就是个传教士；他在灵里面听见这个催迫的声音，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新约圣经里，作牧师的和普通信徒之间，应该是没有分别的；所有圣徒都有祭司的职份。在传教士和非传教士之间，也应该没有分别；每个信徒都是“被差遣”出去的，都该有一个“使命”，要在地上为基督作见证。可是，现在那些传教士自成一等人，分属于各种差会的组织，需要特别的布道经费去支持，在各布道所中工作，虽然他们的贡献是不少，可是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就是使大部分基督徒满足于自己不是传教士的现状，看不见异象，那就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每个圣徒全属于主，必须全心事奉祂。福音的目的是叫罪人悔改，使他们成为圣徒，而圣徒召聚起来，就是教会。既然教会中每一份子都是传教士，为基督作见证，那么，教会也就应当是“差会”，是一群为福音作见证的人。

布道所和教会的分别，在于布道所是差会的分支，是当地信徒获得指引和供应的中心。另一方面，根据新约圣经的解释，教会从起初当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就已经像最古老的教会那样，有同一的中心，同一的原则，虽然在恩赐和经历上，会有分别，但是都分享同样的恩惠，从同一的来源得着供应，而且教会也是在当地进一步推广福音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其中的信徒会熟识当地人民思想和语言，习惯与需要。布道所也有它不小的贡献，但永远不该成为教会的中心，因为教会唯一的

中心是耶稣基督。

教会与普通社团、例如医院或学校，也有分别。这些社团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可以宣扬福音，也可以得着人民的信任，但假如这些由外国人创办的医院或学校，成了当地信徒教会的中心，又成了教会所倚赖的中心，那么，这个教会就不可能根据新约圣经的样式来发展；它始终只能是个外国的宗教组织，倚靠外国的供给，甚至会养成一群受雇的“本地传道人”，严重的伤害了当地信徒，使他们不能学习专心仰望神的供应，妨碍他们认识主的追求。

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福音会传遍全地上，然后所有世人都会悔改；相反地，圣经教导我们要提防世人更多远离神，使全地招受可怕的审判。摆在教会前面的指望是——主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我们在等候这荣耀的事实降临的时候，就会想起主为门徒所作的最后的祷告说：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来。”

这两件事——神的子民的合一，和向世人传扬救主——，是所有与主相交的人的愿望。教会的历史表明了一件事：回转顺服神的话，便会带来复兴。主这一个祷告，也是个应许，事情也必如他所祈求的那样成就。无疑地，这个应许的全部应验，必须等到他再来的日子，但在地上所要来的最后的大复兴，可能就是那快要在天地间实现的事的预兆。

当主的门徒悔改，离弃那叫人远离神话语的道路，并直接倚靠祂，聚集起来成为教会，脱离人为组织的捆绑，可以自由接纳属主的人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历主的丰富，就如那些走在他们前面的圣徒一样的经历；一面能脱离与不信的人的相交，另一面能与众圣徒彼此有紧密的交通。

还有，当他们向万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能领会到神的话语是为众人所预备的，不是光为他们自己；又会明白：所有相信的人，会同样地联于基督；国籍不同，绝对不会影响那在神面前的教会的地位。圣灵在众人当中的工作，印证了彼得所认识的，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

当我们回顾走天路的教会所走过的漫长路径的时候，就会注意到一些显著突出的事实；这些事实虽然混杂在许多琐碎细节的经历中，但对当时的当事人来说，格外显得尖锐动人，而且特别值得人去留意，因为这些经历，成了后来在这道路上继续奔跑前头路程的人的指引。

第一点：走天路的教会，由五旬节的日子开始，一直到今天，在圣经中找到了稳妥和充足的指引，并且确信圣经会作为教会的引导，如同明灯照在暗处，直等到那作生命之道的主再显现的荣光照耀的时候(彼后 1:19)。

第二：走天路的教会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教会虽然在世人当中，却并不属于这世界；教会永远不会成为属地的组织。虽然教会是向世界一项有力的见证，并且为世人带来祝福，但既然这世界曾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世界的本身也一直没有改变，因此门徒甘愿效法他们的主，所以走天路的人，都会用下面的话彼此劝勉激励：“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来 13:13\14)

第三：教会只有一个，我们知道自己是走天路的教会中的一份子，可是我们也承认那些同走这生

命道路的人，是我们的同伴，是圣徒。过去的分歧，虽然在当时显得很尖锐，但当我们放眼去看摆在面前那天路历程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变得黯淡无光了。我们要在极度的谦卑中，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也要在衷心的喜乐中承认他们是与我们同走天路的。他们受苦，我们也受苦；他们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的见证，因为他们的救主、元首、和盼望，也就是我们的救主，元首、和盼望。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学会了与他们一起，分享父神在说下面的话的时候的喜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 3:17) 我们也会在那一天与他们在一起因着神的儿子为自己得着那“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弗 5:27)，而大大的喜乐。

中英名词索引

依笔划次序，英文原名后列出该词在本书中首次出现之章数。

二 画

十字溪 CrossCreek (14)

力甫里 Livry (10)

力铁迈尔 Letymers (11)

三 画

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16)

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15)

士林质亚 Turingia (6)

士文克斐特 Schwenckfeld (9)

士求 Sergius (3)

士昆隆尼斯德 Speronistae (5)

大马色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 (3)

大陆差会 Continental Mission (15)

大公教会 The Catholic Church (1)

四 画

“五月花号” 'Mayflower', (11)

仁士曼爵士 Six Steven Runciman (牛言)

公谊会 Society of Friends (11)

匹次堡 Pittsburg (14)

厄克协特 Exeter (16)

厄科兰巴丢 Oecolampadius (9)

反对崇拜偶像者 Iconoclast (3)

天恩 Tyn (7)

夫兰克 August Hermann Franke (12)
巴比 Bathe (10)
巴色 Basle (6)
巴色会 Basle Mission (15)
巴伯宾阿给 Papa ben Aggai, (4)
巴伯诺 Babinot (10)
巴克斯特 Baxter (11)
巴拉洛 Blaurock (9)
巴格达 Bagdad (4)
巴书一世 Basill (3)
巴都亚的马尔西革流 Marsiglio of Padua (6)
巴勒登丘 Palatinate (9)
巴涵五世 Bahram V (4)
巴斯底 Bastille (12)
巴登 Baden (9)
巴维利亚 Bavaria (6)
巴实给尼 Passagini (5)
巴饶 Barrowe (11)
方济各会 Franciscan (3)
方济各沙勿 Francis Xavier (14)
日耳曼人 Germans (2)
日耳曼奈 C,ennanus (3)
口耳马狄艾 Germadius (3)
比力克 Bilek (3)
比绍 Basil (3)
比雪溺 Beziers (5)
水牛溪 Buffalo Creek (14)
牛顿 Benjamin Wills Newton (17)
五 画
他泊派 Tabor (7)
以便以谢教市 Ebenezer Chapel (16)
以悉究 Issyk-Kul (4)
以撒克 Isaak (4)
加比多 Capito (9)
加米撒尔教派 Camisards (10)

加拉各利父 Glagolitic (4)
加尔文 Caivin (5)
加德林麦第奇 Catherine de Medici (10)
匈奴 Huns (2)
北卡罗来纳 North Carolina (14)
半伯尔 Bamburgh (12)
卡立夫(回教王) Caliph (3)
卡备斯 Carbeas (3)
卡尔 Carl (12)
史太亚 Steier (6)
史勿夫非尔 Smithfield (7)
史杜斯 Williams Stokes (16)
史坦拿 Steinach (9)
史特石 Steshak (3)
史密夫 Elias Smith (14)
史提芬伏克咨 Stefan Vuktchitch (3)
史塔司堡 Strassburg (5)
司布真 Charles Hadden Spurgeon (17)
司各特 Walter Scott (14)
司徒嘉德 Stuttgart (16)
司特老司 Strauss (17)
司提反 Stephan (7)
司提反哈定 Stephen Harding (2)
古林宾 Kulin Ban (3)
尼古拉 Nicholas (7)
尼西亚 Nicaea (2)
尼安德 Neander (12)
尼赤曼 Nitschamann (12)
尼努斯拉夫 Ninoslav (3)
尼高米底亚 Nicomeaia (3)
左劳高 Tvrko (3)
布里斯多 Brist01 (16)
布拉得幅 Bradford (12)
布勒门 Bremen (12)
布塞珥 Bucer (9)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 (15)
布达佩斯 Budapest (15)
布鲁斯 F. F. Bruce (序言)
布罗柯 Blois (10)
布兰胡百 Brandhuber (9)
弗甲西塔 Felicitas (1)
弗甲堡 Freiberg (9)
弗若列池 Samnel Heinrich Frohlich (15)
弗若敏 Antoine Froment (10)
弗勒特 Feret (10)
弗勒斯信堡 Fresenburg (9)
弗兰那克人学 Franecke (12)
本仁约翰 John Bunyan (11)
本尼狄 Benedict (2)
札谷伯克 Jakoubek (7)
瓦来士 Valois (10)
瓦若 Varel (15)
瓦咸大主教 Warham (7)
瓦伦斯 Valence (10)
瓦特堡 Wartburg (8)
瓦特斯 Isaac Watts (11)
瓦特威尔 Watteville (12)
瓦特腓德 George Whitefield (12)
瓦勒 Peter Waldo (5)
瓦勒度派 Waldenses (3)
瓦勒司胡特 Waldshut (9)
瓦尔匠勒斯 Val de Ruz (10)
甘巴乐 Kambaluk (4)
甘美纽斯 Comenius (7)
田纳西州 Tennessee (14)
白奈斯 Baanes (3)
白金汉郡 Buckinghamshire (7)
白朗尼 Robert Browne (11)
皮里道夫 Pilichdorf (6)
皮耶尔 pierre (10)

皮特芒 Piedmont (5)
皮斯哥夫 Pskov (15)
立比次 Liebich (9)
立尼兹 Liebnitz (9)
六 画
伊凡努维兹 Vassilig Ivanovitch (15)
伊夫斯咸 Evesham (7)
伊文思 James Harrington Evans (16)
伊卡德连诺斯拉夫 Ekaterinoslav (15)
伊克哈尔特 Eckart (6)
伊拉斯田 Erastian (11)
伊拉斯田主义 Erastianism (11)
伊拉斯谟 Erasmus (6)
伊格耶丢 Ignatius (1)
伏尔加河 Volga (15)
列曼 Gottfried Wilhelm Lehmann (15)
列铁时 Lititz (7)
各密尔 Gomil (4)
吉斯 Guise (10)
同寅会 United Brethren (7)
外克 Wyke (12)
多芬尼 Dauphiny (5)
多明俄会 Dominican (3)
多明涅克 Dominic (5)
多纳徒 Donatus (1)
多纳徒主义者 Donatist (1)
多马百里 Thomas Badly (7)
多马阿奎拿 Thomas Aquinas (6)
多瑙河 Danube (15)
多博 Dobj (3)
安及亚街 AnngierStreet (16)
安立甘派 Anglican (11)
安色尔字体 Uncial (2)
安多尼 Anthony, the hermit (2)
安波罗斯 Ambrose (2)

安东尼 Anthony, the negro (12)
安单劳尼 Angrogne (10)
安娜干慕拿 Anna Comnena (3)
安基拉 Ancyra (3)
安德烈 Andrew (16)
宇力 Julich (9)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4)
托勒斯 Taures (4)
托尔斯威 Toeltschig (12)
有王权的选侯 Elector Palatine (7)
百伦 Bern (9)
百鲁针仁 Brush Run (14)
米耳斐尔 Mirfield (12)
米兹 Metz (5)
米染度喇 Mirandola (10)
米第堡 Middelburg (12)
米兰 Milan (2)
考文垂 Coventry (11)
自由教会 Free Church (17)
色芬群山 Cevennes (10)
色勒斯丢 Celestinus (2)
西巴拉图 Spalato (3)
西托薛 Citeaux (2)
西弗立斯兰 West Friesland (12)
西伯利亚 Siberia (15)
西里西亚 Silesia (9)
西里安 Sillian (9)
西利维斯特 Sylvester (2)
西克斯都五世 Sixtus V (6)
西投 Zittau (12)
西门蒙德服 Simon de Montfort (5)
西免施泰拉 Simeon Stylites (2)
西哥德 Visigoths (2)
西淇门 Sigismund (3)
西尔斯 Sears (15)

西缅提多 Simeon Titus (3)
西宾夕维尼亚州 West Pennsylvania (14)
七 画
亨里 Henri (5)
亨里派 Henricians (5)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7)
亨利亚诺 Henri Arnold (5)
亨利治慕伦伯克 Heinrich Mollenbecker (9)
亨利雅各 Henry Jacob (11)
伯安 Bearn (10)
伯拉纠 Pelagius (2)
伯帖勒多弗 Berthelsdorf (12)
伯勒格 Braga (2)
伯勒特 John Gifford Bellet (16)
伯哥基帕 Barcochebas (1)
伯纳若特曼 Bernard Rothmann (9)
伯纳肯柏尔 Bohnekamper (15)
伯达 Noel Beda (10)
伯盖尔斯 Beccles (7)
伯尔金 Louis de Berquin (10)
伯尔堡 Berleburg (12)
伯尔拿 Bernard (2)
伯赫 Beghard (5)
伯翰 Beghine (5)
伯兰顿堡 Brandenburg (6)
佐息末 Zozimus (芝)
福克斯 George Fox (11)
佛依地 Gisbert Voet (12)
佛罗棱斯 Florence (6)
克力门三世 Clement III (5)
克土椰 Kirschner (9)
克立米亚半岛 Crimea (15)
克吕尼 Cluny (2)
克里威廉 William Carey (13)
克拉夫 Cleve (9)

克林威尔	Cromwell	(11)
克若格斯	Crocus	(9)
克伦宁	Edward Cronin	(16)
克殊格	Kashgar	(4)
克泰荫	Kattayam	(4)
克劳逊	Klausen	(9)
克雷华	Clairvaux	(2)
克鲁兹那克	Kreuznach	(9)
克蓝麦	Cranmer	(11)
利沙	Lissa, ie. Lesno	(7)
利里奥	Lelio	(10)
利兹	Leeds	(12)
利恩纆德	Leonhard	(9)
利欧尼达斯	Leonidas	(1)
努西亚	Nursia	(2)
努美地亚	Numidia	(2)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1)
君士坦梯亚士	Constantius	(2)
坎伯尔多马	Thomas Campbell	(14)
坎伯尔亚历山人	Alexander Campbell	(14)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2)
希坡	Hippo	(2)
廷德勒	William Tyndale	(11)
李顿约翰	John of Leyden	(9)
杜力农	Dulignon	(12)
杜平根	Tubingen	(15)
杜伯	Leonard Dober	(12)
杜伯勒	Duprat	(10)
杜科波	Dukhobors	(序言)
杜塞里	Du Serre	(10)
沃木斯	Worms	(8)
沙彼理派	Sabellians	(5)
沙尔令格	Scharlinger	(9)
沙撒聂	Sassanid	(4)

贝特克 Baedeker (14)
里昂 Lyons (5)
里海 Caspian (15)
八 画
亚力山大钞本 Codex Alexandrinus (15)
亚仁特 Arndt (12)
里奥 Leo (3)
里察诺 Reichenau (7)
赤石 Redstone (14)
亚他耶修 Athanasius (2)
亚台斯 Artois (10)
亚尼曼德科 Anemond de Cot (10)
亚西西的法蘭西斯 Francis of Assisi (5)
亚米纽斯 Jacobus Arminius (11)
亚米纽斯土义 Arminianism (11)
亚伯筛 Abbaside (4)
亚美尼亚 Armenian (3)
亚威农 Avignon (10)
亚流 Axius (2)
亚流主义 Arianism (2)
亚基帕 Agrippa (10)
亚勒此 Albi (5)
亚勒比根斯派 Albigenses (3)
亚勒克修 Alexius (3)
亚勒根尼 Alleghany (14)
亚普里亚 Apulia (10)
亚尔西 Alzey (9)
亚诺迪司德 Arnoldistae (5)
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7)
亚兰桑 Alencon (10)
佶和 Kiho (4)
来丁 Leyden (11)
依旺 Yvon (12)
依略特 John Eliot (11)
卓曼 Robert Chapman (16)

卑尔 Berg (9)
呼克尔 Richard Hooker (11)
和勒伯克 Holbeck (12)
和勒斯坦 Holstein (9)
坡伯多诺次咸 Pobiedonostsef (15)
坡阿帖 Poitiers (10)
孟他尼主义者 Montanist (1)
孟投本 Montauban (12)
居普良 Cyprian (1)
屈梭卓 Chrysocheir (3)
屈梭多模 Chrysostom (5)
屈案马勒斯 Chrysomalus (3)
帕皮图亚 Perpetua (1)
帕科缪斯 Pacbomius (2)
帕斯哥夫 Vassilij Alexandrovitch Paschkov (15)
帕斯乐维兹山 Paslovatz (3)
帕维亚 Pavia (10)
帖木儿 Timur (4)
帖次勒 Tetzal (8)
底米特里斯 Demetrius (1)
彼良 Pekin (4)
彼亚 Beer
彼莉思嘉 Prisca (1)
彼得波路 Pierre de Brueys (5)
彼得波路派 Petrobrussians (5)
彼得堡 Petersburg (15)
拉施塔 Radstock (15)
拉寇问答 Racovian Catechism (10)
所尔波恩 Sorbonne (10)
东英格利亚 East Anglia (7)
东哥德 Ostrogoths (2)
林巴德族 Lombards (2)
林斯 Linz (9)
拔叙鲁布之 Bjelopolje (3)
法勒斯人 Friesians (2)

法勒尔 Guilhume Farel (10)
法兰克人 Franks (2)
法兰克福 Frankfurt (3)
法兰第 Flanders (3)
武司顿弗尔德 Wiistenfelde (9)
武殊堡(人学) Wurzburg (2)
武尔彻斯特 Worchester (7)
波尼法修 Boniface (2)
波各米勒派 Bogomils (3)
波利卡普 Polycarp (1)
波拿 Bona (2)
波麦华尔 Bohmerwald (6)
波斯尼亚 Bosnia (3)
波尔多 Bordeaux (2)
“物种原始论” “Origin of Species' (17)
直里维斯 Treves (2)
直拉亚 Trier (2)
直度亚 Chittoor (16)
直历司顿 Dresden (7)
肯塔基州 Kentucky (14)
舍普二世 SaporII (4)
花特州 Canton de Vaud (17)
长老会派 Presbyterian (11)
门诺西门 Simon Menno (9)
门诺派 Mennonites (6)
阿夫勒赫 Afrahat (4)
阿立威坦 Olivetan (10)
阿弗尔德伯爵 Count Alfred (9)
阿西安得 Osiander (9)
阿妥斯山 Athos (15)
阿免因斯 Amiens (12)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11)
阿迪沙 Odessa (15)
阿拉利克 Alafic (2)
阿奎亭 Aquitaine (3)

阿奎坦尼亚 Aquitania (2)
阿若立本 Aroohppen (16)
阿伦 William Allen (15)
阿勒芬所 Alfonso (5)
阿统拿 Altona (12)
阿维勒 Avila (2)
阿尔弗大学 Erfurt (6)
阿尔韦聿伯拉纠 Alvarus Pelagius (6)
阿尔诺得 Gottfried Arnold (12)
阿尔塞斯 Alsace (6)
阿诺 Arnold (10)
阿罗本 Olopun (4)
非尼伦 FeneIon (12)
非利济亚 Phrygia (1)
非拉铁非 Philadelphia (12)
陀流 Toulouse (5)
陀桑池 Pierre Toussaint (10)
九 画
侯勒特 Herat (4)
俄此 Orbe (10)
俄冉遮 Orange (12)
俄冉遮威廉 William of Orange (12)
俄亥俄 Ohio (14)
俄利根 Origen (1)
保度瓦的温索 Wenzel of Budowa (7)
保罗派 Paulician (3)
勃艮第族 Burgundians (2)
勃迪加拉 Burdigala (2)
南施 Nancy (10)
南特勅令 Edict of Nantes (10)
契度 Kitto (16)
威耳 Verre (12)
威列星根 Vlissingen (12)
威克里夫 Wycliff (6)
威根司坦 Wittgenstein (12)

威特腓德 George Whitefield (12)
威勒蓝 Wigram (16)
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11)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Peace of Westphalia (7)
威登堡 Wittenberg (7)
威廉斯 Robert Williams (11)
韦尔斯 Wales (7)
威廉所德 William Sawtre (7)
威踊逊街 Wilson Street (16)
度突热赫特 Dordrecht (12)
律伯克 Lubeck (12)
施皮特迈亚 Spittelrrieyer (9)
施本尔 Philip Jakob Spener (12)
施马加登同盟 League of Smalcald (8)
施旁恩伯尔 Spangenberg (12)
施道比次 Staupitz (6)
施图麦 Sturm (10)
春田 Springfield (14)
柏太伦 Patarene (3)
柏京顿 packington (11)
柏芬 Jacques Pavanne (10)
柏纽尔 John Vessey Parnell (16)
柏梭 Passau (5)
柏实 Pasak (4)
柏蒙谷 Pag-Mangku (4)
查司特兰 Jean Chastellain (10)
查理曼 Charlemagne (3)
乍得斯 justus (3)
柯瓦斯 Josef Kovacs (15)
柯列特 Colet (6)
柯斯慕司 Cosmas (3)
洛林 Lorraine (10)
洛其该那 Rokycana (7)
洛桑 Lausanne (10)
祖利安 Julian (2)

“神之友”	'Friends of God,	(3)
“神的城邑”	'City of God,	(2)
神哲主义者	Marcionistes	(1)
神圣议会	Holy Synod	(15)
禹尔吞堡	Wurttemberg	(9)
科屯上校	Colonel Cotton	(16)
科那	Kobner	(15)
科克由	Coccejus	(12)
科利尼	Admiral Coligny	(10)
科威对勒	Miles Coverdale	(11)
科伦	Cologne	(5)
科伦巴	Columba	,(2)
科伦的华尔德	Walther in Cologne	(6)
科伦宾	Columban	(2)
突法利司	Tephric	(3)
突伦	Turin	(3)
纪莪哲	Giwargis	(4)
约克	York	(7)
约克郡	Yorkshire	(12)
约瑟彼尼	Josepini	(5)
约轮公爵	Duke Johann	(9)
约翰占密实司	John Zimisces	(3)
约翰古堡爵士	John Oldcastle	(7)
约翰亨利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17)
约翰波尔	John Ball	(7)
约翰街	John Street	(16)
纒仁护特	Herrnhut	(12)
纒立佛得	Herford	(12)
纒地堡	Hutberg	(12)
纒耳曼	Hermann	(9)
纒居斯	Hegius	(8)
纒特	Huter	(9)
纒琴孙	Francis Hutchinson	(16)
美国浸礼派差会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5)
美国差会	American Mission	(15)

美遮 Ludwig Meijer (12)
耶士德格一世 Yezdegerd I (4)
耶柔米 Jerome (2)
耶赫格若特 Gehard Groote (8)
耶稣会 Jesuit (8)
胡屯 James Hutton (12)
胡司 Huss (7)
胡司派 Hussites (3)
胡伯若斯切 Hubert Ruscher (9)
胡伯迈尔 Hubmeyer (9)
哈伯斯特 Halherstadt (16)
哈利法克斯 Halifax (12)
哈柏斯堡 Hapsburg (7)
哈勒 Halle (12)
哈斯丁斯 Hastings (绪言)
哈尔登 Haldane (13)
若里爵-L Sir Walter Raleigh (11)
若查特 Auguste Rochat (17)
若哲尔 Jacques Roger (10)
若特 Rothe (12)
若登堡 Rottenburg (9)
若彻 Friedrich Roch (12)
英行教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6)
英罕 Benjamin Ingham (10)
英哥斯大 Ingoldstadt (9)
英诺森 Innocent (2)
范鞞儿 Vandals (2)
迦太基 Carthage (1)
迦他利 Cathari (3)
迦瓦利 Cavalier (10)
迦示密尔 Casimix (12)
迦勒底人 Chaldean (4)
迦勒比利亚 Calabria (10)
迦达尔斯 Cathars (1)
拜占庭 Byzantine (2)

述慈 (序言) A. Rendle Short (序言)
 迪庄 Dijon (10)
 迪温特 Deventer (8)
 重浸派 Anabaptist (6)
 莘考丢 Claudius (3)
 革利免 Clement (1)
 革林武德 Greenwood (11)
 革拉克 Henry Craik (16)
 革哩底 Crete (15)
 韦马森 Witmarsum (9)
 音斯蒲若克 Innsbruck (9)
 十 画
 修道主义 Monasticism (12)
 伦巴第 Lombardy (5)
 伦卡利教派 Runcarians (5)
 伦克尔 Runkel (9)
 伦拔斯 Lombers (5)
 伦敦犹太人传道会 London Jews Society (16)
 倭勒座根 Ludwig Wohogen (12)
 哥士 Gorz (9)
 哥尼流 Cornelius (1)
 哥白尼 Copernicus (6)
 哥母尔索 Gomersal (12)
 哥托斯高 Kotorsko (3)
 哥保咸 Cobham (7)
 哥伦布 Columbus (6)
 哥匿士堡 Konigsberg (7)
 哥莱珊 Khorasan (4)
 哥德人 Goths (2)
 哥数伏 Kossovo (3)
 埃比勒 Epirus (4)
 库尔翁团 Antoine Court (10)
 库尔奥特 Couralt (10)
 息利尔 Cyril, Bishop of Alexamdria (4)
 息克司拿德 Sicke Snyder (9)

拿邦 Narbonne (5)
拿阿丁 Naarden (12)
拿勒的贵格利 Gregory of Narek (3)
拿撒勒教派 Nazarenes (4)
根司波鲁 Gainsborough (11)
根和尔德 Kunwald (7)
根德 Kent (2)
格司恭尼 Gascony (5)
格里布 Grebel (9)
格拉斯哥 Glasgow (13)
格拉齐安 Gfatian (2)
格伯多慈恩 Cappadocian (3)
格哥利马哲斯推劳 Gregory Magistros (3)
格勒力 Etienne de Grellet (15)
格兰怒宝 Grenoble (10)
格兰森 Granson (10)
桑历克 Thonrak (3)
森伯 Sembat (3)
泰米尔 Tamil (16)
泰罗 Tyrol (9)
流窝顿 Leeuwarden (9)
浮士都 Fautus (10)
“海利晏”(“牧主”) ‘Heliand, (2)
海伦娜 Helena (3)
海德尔堡 Heidelberg (9)
涅特斯罕 Nettesheim (10)
烈本 Lipan (7)
乌音 Ulm (8)
乌律迈亚 Urumiah (4)
乌特热赫特 Utrecht (12)
乌索拉 Usora (3)
乌斯特 EduaxdHugo Otto Wust (15)
特士良 Tertullian (1)
特利彼桑 Trebizond (3)
特拉斯 Thrace (3)

特尔斯铁根 Tersteengen (12)
班斯泰甫 Bamstaple (16)
益太古司 Rhacus (2)
益他皮勒斯 Etaples (10)
益格兰南 Eclanum (2)
盎肯 Johnn Gerhard Oncken (15)
盎格鲁撒克逊 Anglo—Saxon (2)
盎威普 Antwerp (11)
真尼西柯 Genesisios (3)
纽瓦利 Navarre (10)
纽沙特勒 Neuchatel (10)
纽曼 Francis W. Newman (16)
索拉路 Solaro (10)
索撒 Shusha (16)
茱丽亚 Julia (4)
马丁五世 Martin V (7)
马丁哥宁 Gornin Martin (10)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6)
马六巴 Malabar (4)
马天尼 Martinitz (7)
马可 Mark (9)
马可奥吕利乐伦高 Marco Aurelio Rorencio (5)
马可奥利流 Marcus Aurelius (1)
马西米亚 Maxmillia (1)
马贝克 Pilgram Marbeck (9)
马拿挪列 Mananalis (3)
马桑 Jean de Marcon (10)
马提亚 Matthias (7)
马提亚所尔法斯 Matthias Zerfass (9)
马提斯 Jan Matthys (9)
马塞麦斯 Maximus (2)
马尔堡 Marburg (12)
马德拉斯 Madras (16)
马撒仍 Mazarin (10)
马卢达 Maruta (4)

高加索 Caucasus (15)
高信 Gaussen (17)
高卢 Gaul (2)
十一画
勒非甫尔 Jacques Le Fevre (10)
勒威格 Ludwig (6)
勒特兰 Lateran (5)
区利罗 Cyril, Byzantine Missionary (3)
唯理主义 Rationalism (12)
培利司里安 Priscillian (2)
执事亨里 Henri the Deacon (5)
基信 Giessen (12)
基波沙 Kibossa (3)
基思强大卫 Christian David (12)
基督教会团体 Christian Connection (14)
基尔士威司基 Cheltschizki (7)
基辅 Kiev (12)
寂静派 Quietist (12)
密辅 Merv (4)
康士坦斯 Constance (7)
康地 Conde (10)
康勒格拉札 Konrad Krajek (7)
康斯坦丁西拉 Constantine Silvanus (3)
得力夫港 Delft Haven (11)
得斯次 D'Esch (10)
悉吕人 Seres (4)
悉劳西亚一实土方 Seleucia-Ctesiphon (4)
捷克人 Czech (7)
教会法庭 Consistorium (12)
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18)
敏努勒特 Menuret (12)
敏努斯拉夫 Minoslav (3)
曼斯 Manz (9)
曼德尔 Mandl (9)
曼热撒 Mamesa (8)

梅逊 Herre Masson (10)
条顿民族 Teutons (2)
清教徒 Puritans (11)
理真司坦 Lichtenstein (9)
产百里 Chambery (10)
毕力公纳次 Briconnet (10)
毕士大 Bethesda (16)
毕加派 Picards (8)
毕伽地 Picardy (10)
毕斯尼亚 Bithynia (2)
第三级教士 Tertiaries (5)
荷列斯 Halles (9)
“荷勒克拉斯的市集” ‘Bazaar of Heraclides, (4)
荷复贾 Hrvoja (3)
莉德 Jane Leade (12)
庄悉土喀 Jan Zizka (7)
莫甫索斯亚 Mopsuestia (4)
许热曼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12)
通俗拉丁文译本 Vulgate (6)
部地华 Bourg de Four (17)
都柏林 Dublin (16)
都尔 Tours (2)
陶烈斯 Tauris (4)
陶勒尔 Tauler (6)
雪比亚 Serbia (3)
雪司突西安 Cistercian (2)
雪威司特利安 Schwestrionen (6)
鹿特丹 Rotterdam (6)
麦托丢 Methodius (3)
麦拉么 Mramor (3)
麦施查 Muschag (3)
麦勒威尔 Melville (15)
麦第奇 Medici (6)

十二画

凯尔特人 Celts (2)

西泽 Caesar (6)
西泽奥古斯德 Caesaraugusta (2)
劳达 Lhota (7)
博各纳德司 Pogonatus (3)
博克尔逊 Bockelson (9)
喀力慈 Kralitz (7)
喀利孟那 Cremona (5)
喇巴第 Labadie (12)
单张运动 Tractarian Movement (17)
乔治以色列 George Israel (7)
乔治雪比氏 Georg Schepss (2)
奥古士丁 Augustine (2)
奥古斯达 John Augusta (7)
奥斯堡 Augsburg (5)
彭力 Penry (11)
惠特 Wied 9)
提阿多 Theodore 4);
提阿多拉 Theodora 3)
提阿多修二世 Theodosius II (4)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3)
提恩茅斯 Teignmouth (16)

提理古 Telegoo (16)
提领克 Willem Teelinek (12)
费迪南德一世 Ferdinand I (7)
斐德幅 Bedford (12)
斯巴勒丁 Spalatin (7)
“斯皮得威特号” 'Speedwell' (11)
斯克比 Scrooby Manor (11)
斯拉夫民族 Slav (7)
斯拉瓦达 Slawata (7)
斯拜尔 Speyer (8)
斯提领 Jung Stilling (12)
斯顿得 Stunden (15)
斯顿得教派 Stundist (15)

斯弥特	John Smyth	(11)
普坐茅斯	Plymouth	(11)
普芬达	Pfander	(16)
普鲁士	Prussia	(7)
普鲁旺斯	Provence	(3)
棣克	Take	(4)
森依伯	John Cennick	(12)
湛福伦斯	Chanforans	(10)
汤马士摩亚	THomas More	(11)
犹他米	Euthymius	(3)
犹西比乌	Eusebius	(3)
犹努密派	Eunomians	(5)
犹流二世	Julius II	(6)
犹斯底年二世	Justinian II	(3)
疏尼亚	Saunier	(10)
登克	Denck	(9)
笔名雷玛	Pseudo-Reimer	(5)
给恩列治	Cane Ridge	(14)
腓力波甫利斯	PhilippopoUs	(3)
腓白	Faber	(9)
腓特烈	Frederick	(7)
舒次	Schuch	(10)
菲沙尔	Fisher	(6)
贵格里	Gregory	(7)
贵钧利一世	Gregory I	(2)
买音慈	Mainz	(6)
费卞安	Fabian	(1)
费拉德尔菲城	Philiadelphia	(14)
贺弗曼	Hoffman	(12)
量尼派	Leonist	(5)
闵次尔	Muntzer	(9)
闵斯特	Munster	(9)
雅布伦斯基	Daniel Ernst Jablonsky	(11)
雅若斯拉夫	Yaroslav	(15)
雅格	Kascha Jagub	(15)

黑克	William Hake	(16)
黑森	Hessen	(9)
十三画		
塔尔	Tepl	(6)
奥克里	James O'Kelly	(14)
奥拔仑	Oberland	(6)
奥斯托洛(俄罗斯地名)	Ostrog	(15)
奥斯曹洛(波兰地名)	Ostrorog	(7)
微内	Vient	(17)
爱安拿岛	Iona	(2)
爱任伊	Irene	(3)
爱任纽	Irenaeus	(1)
爱耶多利安	Anatolian	(3)
爱因斯沃夫	Henry Ainsworth	(11)
爱莎宝	Isabeau	(10)
爱案林里奥	Leo the Isaurian	(3)
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	(11)
敬虔派	Pietist	(12)
新柏拉图主义	Neo-Platonism	(2)
新碧里	Seynbury	(11)
杨孙	Francis Johnson	(11)
溥西	Pudsey	(12)
瑟斐尔	Schafer	(12)
瑟维都	Servetus	(10)
福音联盟	Evangelical Alliance	(17)
福尔涅克	Fulneck	(7)
绥威人	Suevi	(2)
圣卡勒门	St.Felix de Caraman	(5)
圣加伦	st. Gallen	(9)
圣安娜	st. Honore	(9)
圣各陀勒	st. Gertrude	(6)
圣衣会	Carmelites	(12)
圣杯派	Calixtines	(7)
圣林拔	st. Lambert	(9)
圣书公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6)

圣莫甲斯 St. Maurice (9)
 圣基利司 St. Gilles (5)
 圣经协会 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ion
 for Home and Abroad (16)
 圣乐署 St. Roch (5)
 圣苏菲亚 St. Sophia (3)
 万士窝特 Wandsworth (11)
 落革铁利 Rogatitza (3)
 叶洛哈三世 Yabh-alaha III (4)
 詹姆士一世 James I (7)
 葛若弗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 (16)
 路西坦尼亚 Lusitania (2)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0)
 路迦士 Cyril Lucas (15)
 路浦尔德 Leupold (9)
 路维尔 Leutweil (15)
 达此尔 John Darbye (11)
 达秘 John Nelson Darby (16)
 达斯 Dax (9)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7)
 雷尼里亚 Reinerius (5)
 雷尼劳撒干尼 Reniero Sacconi (3)
 雷门六世 Raymond VI (5)
 预格诺派 Huguenot (9)
 十四画
 慈运理 Zwingli (9)
 汉堡 Hamburg (11)
 尔捏特 Isaac Errett (14)
 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 (1)
 玛利皇后 Queen Mary (11)
 玛西安 Marcion (1)
 玛西米良 Maximilian (7)
 玛嘉丽 Margaret (10)
 碧尼 Merle D'Aubigne (17)
 窝泰城堡 Waltba (12)

粹斯伯尔革 Zeisberger (12)
维杜恩 Leonard Verduin (序言)
维吾尔族 Uigur (4)
维特 Jan de Witt (12)
维朗 Veron (10)
维琴尼亚州 Virginia (14)
维尔努 Jean Vernou (10)
肃玛 Zuma (4)
豪斯查恩 Haussehein (9)
宾廷克 Bentinck (15)
 盖因尼 Guyenne (12)
 盖恩夫人 Madame Guyon (12)
 赫司哥维那 Herzegovina (3)
 赫曼 Hermann von Wied (8)
 赫劳里族 Heruli (2)
 赫德修斯 Hydatius (2)
 赫德琐 Hetzer (9)
 赫维士 Thomas Helwys (11)
十五画
墨兰顿 Melanchthon (9)
德文郡 Devonshire (16)
德勒芬哥 Travancore (4)
德尔马舒亚 Dalmatia (3)
德乐赫尔 Drucker Thomas von Imbroek (9)
德兰斯斐尼亚 Transylvania (10)
慕尼卡 Monica (2)
慕连士
慕莲 Louise Moulin (10)
慕尔那 Mullner (9)
慕尔堡 Muhlberg (7)
摩市 Meaux (10)
摩尼教派 Manichaens (1)
摩尼教 Manichaeism (1)
摩利维亚 Moravia (6)
摩若尔 Georges Morel (10)

撒拉哥沙	Saragossa	(2)
撒拉逊人	Saracens	(3)
撒拉涯伏	Sarajevo	(3)
撒伦巴伯爵	Count Zaremha	(16)
撒马尔罕	Samarcand	(1)
撒特拉	Michael Sattler	(9)
撒尔司堡	Salzburg	(9)
撒复伊	Savoie	(10)
乐特茅斯	Lutterworth	(7)
模利诺斯	Miguel de Molinos	(12)
欧文思	John Owens	(10)
欧顿巴克	Odenbach	(9)
欧德克劳斯突	Oude Kloster	(9)
欧曹鲁思亚	Euchrotia	(2)
蒙特可维诺	Monte Corvino	(4)
蒙撒勒特	Montserrat	(8)
邓克尔	Denkel	(15)
锐赤林	Reuchlin	(6)
锐斯	Eduard Reuss	(17)
锐斯布若克	Rysbroeck	(8)
鲁道士二世	Rudolph II	(7)
鲁滨孙	John Robinson	(11)
黎律兄弟	Leclerc, Pierre & Jean	(10)
黎塞留	Richelieu	(10)
十六画		
儒埋敖	Pierre Jurieu	(10)
济拉	Abbe du Chayla	(10)
垦普斯	Kempis	(8)
学列哈	Shliha	(4)
朴麦斯	Pomaks	(3)
历盛顿	Lexington	(14)
卢文密思允	Rulman Merswin	(6)
卢百令	Reublin	(9)
穆罕乳德	Mohammed	(3)
穆勒	George Muller	(16)

穆勒尔 Muller (9)
韦斯利 John Wesley (12)
亲岑多夫 Zinzendorf (12)
诺立赤 Norwich (11)
诺弗哥若 Novgorod (15)
诺伦堡 Nffremberg (5)
诺斯底主义 Gnostic (1)
诺福克 Norfolk (7)
诺洼天主教 Novatian (1)
赖夫努布尔 RiveNoble (10)
霍次努 Hochmann von Hochenau (12)
鲍顿 Bowden (16)
十七画
“优吉里亚” 'Eukleria' (12)
“检验员” 'Triers' (11)
联邦循道宗 Republican Methodist (14)
薄勒 Peter Boehler (12)
薛乐天的查尔士 Charles of Zerotin (7)
赛纳河 Seine (10)
赛华 Savoy (5)
迈可三世 Michael III (3)
迈耶 Meyer (9)
钟斯 Abner Jones (14)
隐蔽教会 Privye Church (11)
韩斯纆 Hans Hut (9)
饼酒同领派 Utraquist (7)
十八画
简尼修 Canisius (8)
聂斯托利(景教) Nestorian (2)
魏窝特 Wieuwerd (12)
十九画
罗拉德运动 Lollards (2)
罗彻斯台恩 Van Lodensteyn (12)
罗彻斯特郡 Leicestershire (11)
罗耀拉 Loyola (8)

庞每拉 Palmyra (4)
庞麦雷尼亚 Pomerania (6)
庞培 Pompey (6)
二十画
宝福 Beaufort (10)
二十一画
苏丹 Sultan (15)
苏立南 Surinam (12)
苏西尼 Sozini (10)
苏西尼上义 Socinianism (10)
苏坦尼亚 Soltania (4)
苏所 Suso (6)
苏稚埃 Soviet (15)
苏黎世 Zurich (9)
兰士 Paul Lenz (9)
兰各铎 Languedoc (5)
兰伯特 Francois Lambert (10)
兰格直 Hansen Langegger (9)
兰振曼特尔 Langenmantel (9)
兰贵夫 Landgraf (9)
铁夫烈斯 Tiflis (15)
饶素 Gerard Roussel (10)
二十三画
变体说 Transubstantiation (7)
二十五画
观窝特 Kuenwald (12)

走天路的教会

书号：BH—72

作者：博饶本

译者：梁素雅

王国显

出版发行兼：晨星出版社

香港尖沙咀邮箱九八四二五号

电话：二四九三二九八九

承印者：民生信封制造厂有限公司

主历一九九八年十月三版(2, 000)

版权所有

ISBN 962-366-022-7

THE PILGRIM CHURCH

Cat. No. BH-72

by

E.R. Broadbent

Translated by

Christine & K.H.Wong